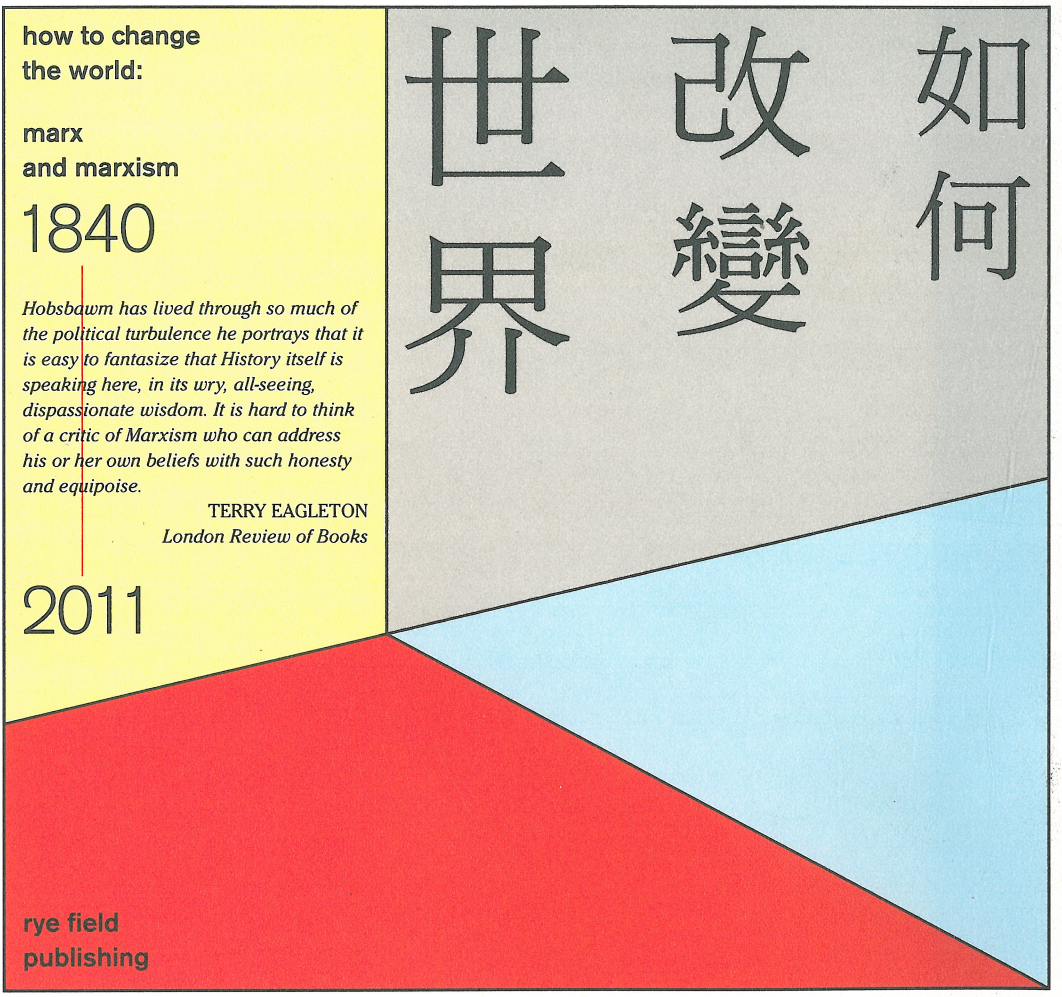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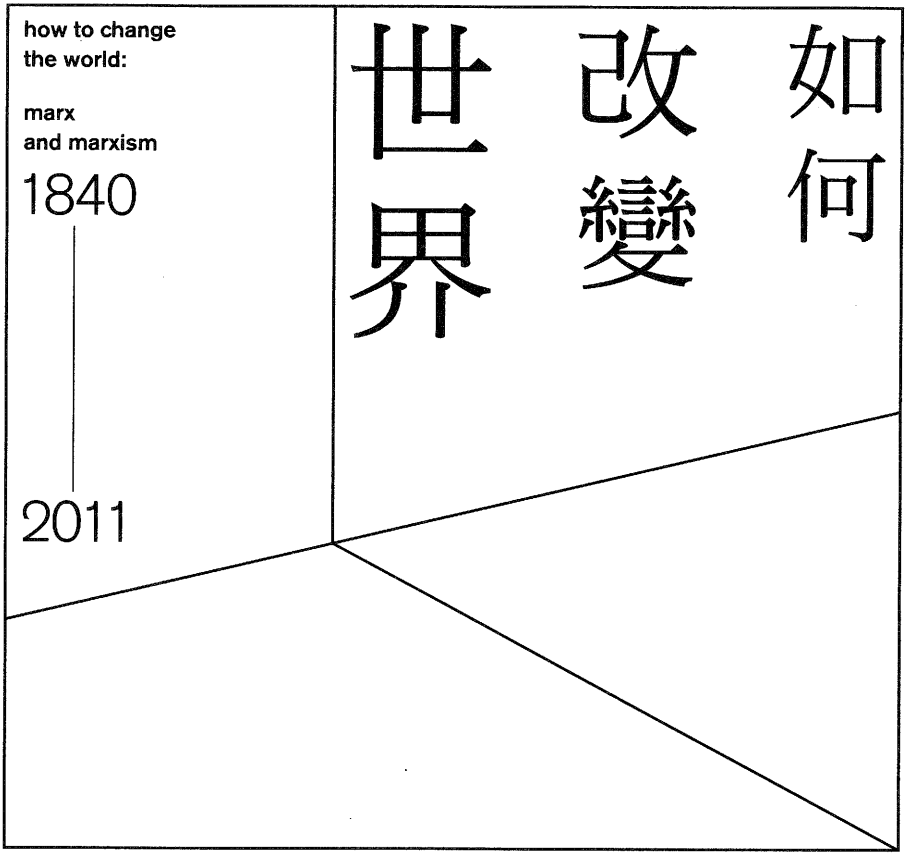


如何改變世界

馬克思與馬克思主義，回顧、反思，與前瞻

林宏濤 黃煜文——譯 麥田出版

eric 霍布斯邦 hobsbawm



馬克思與馬克思主義，回顧、反思，與前瞻

林宏濤 黃煜文——譯 麥田出版

eric 霍布斯邦 hobsbawm

目錄

前言 5

【第一部】

馬克思與恩格斯

第一章 今日的馬克思 9

第二章 馬克思、恩格斯與馬克思之前的社會主義 23

第三章 馬克思、恩格斯與政治 61

第四章 論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 107

第五章 論《共產黨宣言》 121

第六章 探索《政治經濟學批判綱要》 145

第七章 馬克思論資本主義以前的各種形構 151

第八章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的因緣際會 203

【第二部】

馬克思主義

第九章　馬克思博士和維多利亞時期的批評　227

第十章　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一八八〇年到一九一四年　241

第十一章　反法西斯主義的年代，一九二九年到一九四五年　293

第十二章　葛蘭西　347

第十三章　對葛蘭西的接受　365

第十四章　一九四五年到八三年馬克思主義的影響　377

第十五章　衰退中的馬克思主義：一九八三年到二〇〇〇年　419

第十六章　馬克思和勞工：長路漫漫的世紀　433

中外文人名對照表　453

前言

這本書是我從一九五六年到二〇〇九年研究馬克思的論文結集，整體而言，它談的是卡爾・馬克思（當然也包括與馬克思密不可分的弗雷德里克・恩格斯）的思想發展及其身後的影響。本書不是傳統意義下的馬克思主義史，儘管如此，其中最主要的六章是我為義大利埃伊瑙迪出版社（Einaudi）（1978-82）的鉅著《馬克思主義史》（*Storia del Marxismo*）所寫的文章，我同時也是這本書的共同計畫人與共同編輯。不過這六章已經做了修改，甚至有部分做了大幅改動，我還補充了一章談馬克思主義在一九八三年後的衰退，光是這七章就占了本書一半以上的篇幅。此外，還有幾篇是針對學者對馬克思與馬克思主義的「接受」（reception）所做的研究；一篇是談一八九〇年代之後，馬克思主義與勞工運動的文章，這篇文章原本是一篇德文講稿，發表於林茲勞工史家國際會議（Linz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Labour Historians）；另外還有三篇是為以下著作所寫的序文：恩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共產黨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以及將馬克思在一八五〇年代完成的幾篇討論前資本主義社會形成的重要手稿集結成冊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綱要》（*Grundrisse*）。本書討論的唯一一位後馬克思／恩格斯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安東尼奧・葛蘭西。

這些文章大約有三分之二未曾以英文出版或根本未曾出版。二〇〇七年，猶太書週（Jewish Book Week）舉辦了馬克思公共論壇，為了參與這項活動，我對第一章做了大幅擴充與改寫。第十二章也是一樣。第十五章則是首次出版。

我當初寫下收錄在本書的這些論文時，腦海中針對的是哪些讀者呢？有幾章（第一、四、五、十六章，或許還有第十二章）針對的是那些單純對這類主題有興趣的人。不過，絕大多數篇章針對的還是那些對於馬克思、馬克思主義，以及對歷史脈絡與觀念的發展和影響之間的互動具有獨特興趣的讀者。雖然針對的讀者有異，但我試圖提供的想法有一點是不變的，那就是馬克思與馬克思主義的討論不能陷入黨同伐異的爭論，不能被馬克思主義者及其對手在政治與意識形態領土上插持的各式各樣與不斷更迭的旗幟所左右。過去一百三十年來，馬克思主義一直是現代世界思想曲調的主旋律，因為它動員社會力量的能力，而成為二十世紀歷史一個關鍵且（在某些時期）具決定性的理論。我希望這本書可以幫助讀者思考，馬克思主義與人類在二十一世紀會有什麼樣的未來。

艾瑞克・霍布斯邦

倫敦，二〇一一年一月

【第一部】

馬克思與恩格斯

第一章 今日的馬克思

一

二〇〇七年，猶太書週於卡爾·馬克思逝世（三月十四日）週年前不到兩個星期的時間舉行，地點離馬克思過去最常造訪倫敦的地方：大英博物館圓形閱覽室（Round Reading Room），只有幾步路的距離。賈克·阿塔里與我是立場迥異的社會主義者，卻不約而同來此向他致上敬意。然而，當你想到地點與日期，就會產生一種雙重的意外感受。我們不能說馬克思在一八八三年去世時一事無成，因為他的作品已對德國，特別是對俄國的知識分子產生影響，而由他的門徒所領導的運動正逐漸主導德國的勞工運動。但在一八八三年時，馬克思一生的努力似乎還未竟全功。他已經寫了幾部卓越的小書，而那部未完成的作品：《資本論》（*Das Kapital*），在他人生最後十年幾乎沒有任何進展。當一名訪客問起他的作品時，他苦澀地反問：「什麼作品？」自從一八四八年革命與一八六四年到七三年所謂的第一國際（First International）失敗後，馬克思的政治努力已無成功的可能。馬克思雖然大半生流亡英國，但他在當地的政治或思想

界卻未曾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然而，馬克思死後卻享有極高聲譽！在他去世後不到二十五年的時間，以他的名字為號召或受他啟迪的歐洲工人階級政黨，在實行民主選舉的國家中獲得百分之十五到四十七的選票——英國是唯一例外。一九一八年後，絕大多數工人階級政黨都成了執政黨，而不只是反對黨，這種情況一直維持到法西斯主義結束之後，然而到了這段時期，這些政黨絕大多數卻處心積慮與他們原先的啟蒙者劃清界線。這些政黨至今依然存在。與此同時，馬克思的門徒也在非民主與第三世界國家建立革命團體。在馬克思去世的七十年後，有三分之一的人類生活在由共產黨領導的政權之下，這些政府宣稱他們代表馬克思的觀念並且實現了他的願望。之後，儘管這些執政黨幾乎毫無例外地大幅轉變政策方針，卻仍有兩成以上宣稱他們堅持馬克思路線。簡言之，要說有哪位思想家在二十世紀留下無法磨滅的印記，那麼此人非馬克思莫屬。走進十九世紀巨擘卡爾．馬克思與赫伯特．斯賓塞埋骨的高門墓園（Highgate cemetery），耐人尋味的是，兩座墳塋居然彼此對望。當兩人都在世時，人們公認斯賓塞是當時的亞里斯多德，而馬克思不過是住在漢普斯特（Hampstead）矮坡上仰賴朋友資助度日的無名小卒。今日，已無人知道斯賓塞長眠此地，但老一輩來自日本與印度的朝聖者仍前來拜謁馬克思的墓塚，就連流亡海外的伊朗人與伊拉克人也堅持死後應埋葬於此受其庇蔭。

共產黨政權與廣大的共產主義政黨橫行的時代隨著蘇聯崩解劃下句點，即使是共產黨仍繼續存在的國家，如中國與印度，實際上也已放棄列寧式馬克思主義的老教條。一旦各國共黨紛紛放

棄昔日計畫，馬克思將發現自己再度陷入無人聞問的處境。共產主義自稱是馬克思唯一的繼承者，而馬克思的觀念也幾乎被等同於共產主義。即使持異議的馬克思主義者以及馬列主義者在一九五六年赫魯雪夫抨擊史達林之後建立了少數據點，但他們幾乎一定會被歸類為前共產主義的分離份子。因此，在馬克思去世一百週年後的近二十年來，嚴格來說，他已成為不值一提的過時人物。有些記者甚至認為今晚的討論是為了把馬克思從「歷史的垃圾桶」裡解救出來。然而時至今日，馬克思很可能再次引領風潮，成為二十一世紀人們所關注的思想家。

英國廣播公司（BBC）進行的民調顯示，英國收聽廣播的民眾認為馬克思是最偉大的哲學家，但對於這項結果，我認為毋須認真看待。不過，如果用Google搜尋馬克思的名字，你將發現他仍是資料條目最多的偉大思想家之一，僅次於達爾文與愛因斯坦，但遙遙領先亞當．斯密與佛洛伊德。

之所以如此，我認為有兩個原因。首先，蘇聯官方馬克思主義的結束解放了馬克思，人們不再將馬克思等同於理論上的列寧主義與實踐上的列寧主義政權。大家越來越了解可以從各種不同的角度思考馬克思對世界的看法。更重要的原因是，一九九〇年代以後浮現的全球化資本主義世界，有許多重要面向都不可思議地被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所言中。我們可以從人們的反應看出這點，一九九八年是《共產黨宣言》這部令人吃驚的小書出版一百五十週年紀念，同時也是全球經濟遭受重創的一年。諷刺的是，再度挖掘出馬克思的不是社會主義者，而是資本家：極度消沉的社會主義者沒有能力舉辦這場週年紀念活動。回想起來，有件事也讓我感到驚訝，聯合航

空（United Airline）機上雜誌的編輯找上我，這份雜誌的讀者有八成是美國商務人士。我曾寫過一篇有關《共產黨宣言》的文章；這位編輯覺得他的讀者應該會對《共產黨宣言》的相關論題感興趣，於是向我徵詢是否能使用我的文章。更讓我驚訝的還有一件事，在一場世紀之交的午餐會上，喬治．索羅斯問我對馬克思的看法。我知道我們的觀點南轅北轍，為了避免爭論，我給了一個模稜兩可的答案。但索羅斯卻說：「這個人早在一百五十年前就發現資本主義的缺失，而我們到現在才發現。」索羅斯確實注意到馬克思提到的論點。很快地，那些就我所知從來不是共產黨員的作家也開始認真檢視馬克思，而阿塔里寫的馬克思傳記與研究就是一例。阿塔里也認為馬克思的許多想法與那些致力改善今日社會的人若合符節。值得指出的是，光憑這些觀點，今日的我們就有必要好好地思考馬克思。

二〇〇八年十月，當倫敦《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刊出這樣的標題：〈動盪中的資本主義〉（'Capitalism in Convulsion'）時，無庸置疑地，馬克思又回到公眾面前。雖然全球資本主義經歷自一九三〇年代初期以來最大的一場危機，但馬克思仍無法自外於這場混亂。另一方面，我們幾乎可以確定二十一世紀的馬克思將不同於二十世紀的馬克思。

上個世紀對馬克思的看法，主要取決於三項事實。首先是國家的區別，也就是將革命排入議程的國家與未將革命排入議程的國家的區別，後者廣義來說是指北大西洋、太平洋以及其他地區的已開發國家。從第一項事實而產生了第二項事實：馬克思的傳承自然而然地分成兩派，一派是社會民主主義與修正主義，另一則是革命派，後者完全體現在俄國革命上。第三項事實使這兩派

的分歧在一九一七年後更加明顯：從一九一四年到一九四〇年代晚期，也就是我所謂的「災難的年代」（Age of Catastrophe），十九世紀的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社會在這段時期逐漸崩解。這場危機嚴重到令許多人懷疑資本主義是否還有可能恢復。資本主義不是已經注定被社會主義經濟所取代嗎？就連完全不屬於馬克思主義者的約瑟夫．熊彼得也於一九四〇年代做了這樣的預測。事實上，資本主義確實起死回生了，但再也不是過去的形式。另一方面，同一時間在蘇聯，社會主義道路似乎已無崩潰之虞。在一九二九年到一九六〇年間，人們（就連那些反對蘇聯政權政治措施的非社會主義者也如此認為）其實有理由相信，資本主義已經油盡燈枯，而蘇聯正證明它的生產力可以超邁資本主義。在蘇聯史普尼克（Sputnik）人造衛星發射那年，這些想法聽起來並不荒謬。蘇聯經濟成果變調的各種證據一直要到一九六〇年後才紛紛出爐。

這些事件及其對政策與理論的影響，完全是在馬克思與恩格斯死後才發生的。它們完全超出馬克思自身的經驗與判斷。我們對二十世紀馬克思主義的判斷並不以馬克思本人的思想為依據，而是以後世對其著作的詮釋或修正為準則。我們頂多只能主張，在一八九〇年代晚期，也就是馬克思主義遭遇第一次思想危機時，第一代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曾與馬克思或更多是與恩格斯有過接觸）已經開始討論與二十世紀相關的一些議題，特別是修正主義、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日後馬克思主義的討論有許多完全屬於二十世紀而不見於馬克思的著作，尤其是社會主義經濟可以或應該如何的討論，這個議題多半來自於一九一四到一八年大戰經濟以及戰後準革命或革命危機的經驗。

因此，所謂社會主義要比資本主義更能確保生產力的最快速發展，這種說法幾乎不可能是馬克思提出的，毋寧說是戰間期資本主義危機（inter-war capitalists crisis）面對蘇聯五年計畫時的產物。事實上，馬克思並未主張資本主義已達能力的極限而無法增加生產力，他的看法是，資本主義成長出現參差不齊的韻律，因而造成過度生產的週期性危機，這種現象遲早將與資本主義經濟模式產生齟齬而造成社會衝突，因而使資本主義難以為繼。資本主義本身無法形成下個階段的社會生產經濟。馬克思認為，這必然要由社會主義來完成。

於是不令人意外地，「社會主義」成為二十世紀辯論與評估馬克思時的核心。之所以如此，並不是因為社會主義經濟計畫充滿馬克思主義色彩（實際上完全不是如此），而是因為所有受馬克思主義啟發的黨派都接受這套計畫，其中共產主義黨派還將其付諸實行。以二十世紀的發展來看，社會主義經濟計畫已經死亡。蘇聯與其他「中央計畫經濟」（亦即理論上是無市場的、由國家擁有與控制的指令型經濟）施行的「社會主義」已經煙消雲散而且永無恢復的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的社會民主渴望一直屬於一種未來式的理想，然而即使是形式性的渴望，到了二十世紀末也遭人放棄。

在社會民主主義者心中的社會主義模式，以及共產主義政權建立的社會主義究竟帶有多少是來自馬克思的？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自己相當謹慎，他從未對社會主義的經濟內容與經濟制度提出明確陳述，也未說明共產主義社會的具體形貌，不過他曾表示共產主義社會並非藉由建構或計畫產生，而是從社會主義社會中自然發展出來。馬克思針對這個主題提出的一般性陳述，與

他在《哥達綱領批判》（*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中對德國社會民主主義份子的批評一樣，幾乎未給予後繼者明確的指引，事實上，這些一般性陳述並未對後繼者所思考的學術問題或烏托邦式實踐賦予嚴肅的思索，一切的思索都要等到革命之後才開始。我們可以說，這些思索立基於——引用著名的英國工黨黨章第一章第四項規定——「生產工具共有」的基礎上，一般認為要實現共有，必須將國內產業予以國有化。

耐人尋味的是，首位於一九〇八年提出中央集權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人並不是社會主義者，而是不屬於社會主義路線的義大利經濟學家恩里科．巴羅尼。在此之前從來沒有人想過這個問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才開始有人把私有產業收歸國有納入實際的政治考量。社會主義者於對這個問題毫無準備，而他們也無法從過去或任何人身上得到指引。

任何一種強調由社會控制的經濟模式都隱含著「計畫」概念，但馬克思並未具體說明計畫是什麼，因此當革命後蘇聯開始嘗試計畫經濟時，只能走一步算一步。理論上來說，要進行計畫經濟必須設計一套概念（例如雷昂鐵夫的投入產出分析）與提供相關的統計數據。這些想法後來被非社會主義經濟廣泛採用。在實踐上，要進行計畫經濟必須遵循同樣也是在邊做邊想中產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時經濟模式，尤其是德國模式。德國模式特別關注電力產業，而一些在政治上同情列寧的德國與美國電力公司的執行人員，向列寧提供了相關建議。戰時經濟一直是蘇聯計畫經濟的基本模式，亦即預先訂定目標——超高速的工業化，贏得戰爭，製造原子彈或把人送上月球——然後不管短期成本的多寡而將資源完全投入於實現計畫的經濟模式。這裡面完全沒有一點社

會主義的成分。朝著武斷擬定的目標努力，並且或多或少獲得一點進展，但蘇聯經濟基本上一直停留在這種武斷層次上。此外，蘇聯從未放棄讓市場符合官僚指令結構的做法，此舉使得蘇聯經濟陷入困境，儘管一九六〇年後它開始嘗試做出一些調整。

社會民主制對馬克思主義做了一些調整，一種做法是暫緩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另一種比較積極的做法是創設各種形式的混合型經濟。從社會民主政黨一直執意建立純粹社會主義經濟來看，顯示人們對於這種經濟模式仍存有一些想法。其中最有趣的觀點來自於非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如費邊社成員（Fabians）韋布夫婦，他們想透過一連串不可逆而累積性的改革使資本主義逐漸轉變為社會主義，而他們也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形貌做了一些政治探索，但卻未能考慮到經濟運作的問題。重要的馬克思主義「修正主義者」愛德華·伯恩斯坦巧妙地應付這個問題，他堅稱改革運動本身就是最重要的事物，而最終目標並無實現的可能性。事實上，絕大多數社會民主政黨在一次大戰結束成為執政黨之後便與修正主義政策妥協，他們仍讓資本主義經濟繼續運轉，只是必須滿足勞動者的一些需求。這種態度的「最佳寫照」是安東尼·克羅斯蘭的《社會主義的未來》（*The Future of Socialism*, 1956），他認為，一九四五年後當資本主義證明創造一個擁有大量公有企業（表現為國有化或其他的古典形式）的社會實屬多餘後，社會主義者唯一的任務就是確保國家財富均平分配。這一切與馬克思的想法相距甚遠，而且也不同於社會主義所主張的（或許是馬克思曾經參與的）傳統社會主義觀點，即本質上完全無市場的社會。

容我再補充一句，近來在經濟新自由主義及其批判者之間出現的針對國有與公有企業角色的

辯論，從原則來看，這並不屬於馬克思主義乃至於社會主義的辯論。這場辯論源自於一九七〇年代以來，人們企圖有系統地讓國家放棄對獲利企業活動的管制與操控，使自由放任原則的病態墮落成為經濟現實。這種做法將人類社會交給（據說）能自我調控並且使財富乃至於福利最大化的市場，而存在於這些市場之中的（據說）是理性追求利益的行動者，事實上，這種情況在任何已開發的經濟體（甚至是美國）的資本主義發展初期都找不到任何先例。這種歸謬法足以反駁意識形態者對亞當．斯密的曲解，與此相應的是極端的百分之百由國家計畫的蘇聯指令型經濟，而這則是布爾什維克（Bolsheviks）對馬克思的曲解。不令人意外地，這種與其說是貼近經濟現實不如說是貼近神學的「市場基本教義派」，最後也以失敗告終。

中央計畫國家經濟的消失，加上士氣低落的社會民主政黨已不再尋求從根本上改變社會，這些現象使得二十世紀的辯論絕大多數不具有社會主義性質。某方面來說，這些辯論早已脫離馬克思的思想脈絡，儘管如此，它們絕大部分仍受馬克思的啟迪並且仍以他的名義進行。另一方面，馬克思在三個層面仍具有巨大的影響力：他是一名經濟思想家，也是一名歷史思想家與分析家，而一般也公認馬克思是第一位以現代角度思索社會的思想家（連同涂爾幹與韋伯）。我沒有資格對身為哲學家的馬克思持續且嚴肅的重要性發表意見。當然，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看法從來就沒有因為時代的變遷而過時，他認為資本主義是人類經濟模式的一個歷史階段，它是會不斷擴張與集中、不斷產生危機與自我轉變的運作模式。

二

馬克思與二十一世紀有何關聯？蘇維埃模式的社會主義——迄今唯一建立起社會主義經濟的嘗試——已不再存在。此外，全球化有了龐大而不斷加速的進展，人類也彰顯出增加財富的能力。這不僅削弱了民族國家之經濟與社會政策的力道與規模，連帶也影響到社會民主運動主要仰賴國家政府進行急迫改革來達成的古典方針。市場基本教義派的得勢，在國家內部與地區之間產生極度的經濟不平等，而且將災難的元素帶進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循環韻律中，其中包括一九三〇年代以後出現的史無前例的全球經濟危機。

我們的生產力已能（至少有此潛力）讓絕大多數人從勉強餬口進展到享有富裕、教育與五花八門的生活商品選擇，雖然世界上絕大多數人口迄今仍無法受惠。不過，在二十世紀絕大部分的時間裡，社會主義運動與社會主義政權仍停留在勉強餬口的階段，反觀一九四五年後的二十年間，西方富國已經出現普遍富裕的社會。然而，在獲得溫飽之後，適當的糧食、衣物、住房、有給薪的工作，以及保護民眾免於生存危險的福利制度，雖然屬於生活必需品，但社會主義者並不以此為足。

有三分之一的發展是負面的。當全球經濟的劇烈擴張破壞了環境，對無限制經濟成長加以控制也迫在眉睫。在反轉或至少控制經濟對生物圈的影響與資本主義市場的必備條件之間存在著明顯衝突，後者要求持續追求最大獲利。這是資本主義的致命傷。我們現在無法知道誰的箭將為資

本主義帶來致命的一擊。

那麼，今日的我們該如何看待馬克思？他是一位為全體人類而非為部分人類思索的思想家？當然。他是哲學家？經濟分析家？是現代社會科學的創建者與引領人們理解人類歷史的嚮導？是的，阿塔里適切地強調馬克思的思想具有無所不包的普世性。馬克思的思想不是傳統意義下的「跨學科」，而是將所有學科整合為一體。阿塔里寫道：「在他之前的哲學家是以人為整體來思索人，但他卻是第一位以世界為整體來掌握世界，他的思想同時是政治的、經濟的、科學的與哲學的。」

顯而易見，馬克思的作品絕大部分早已過時，有些說法已不再為人所接受。他的著作並不是一部已完結的全集，而是像所有著名的思想作品一樣，仍處於不斷增益進展的狀態。現在已沒有人將馬克思的思想當作教條，更甭說以制度來獎掖它使其成為定於一尊的學說。馬克思對此一定會感到震驚。不過我們也反對有人截然劃分出「正確」與「不正確」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的研究方法本來就可以產生不同的結果與不同的政治視角。事實上，馬克思自己曾預言英國與荷蘭可能出現和平的權力轉移，而俄國的村落社群可能發展出社會主義。考茨基與伯恩斯坦，跟普列漢諾夫與列寧一樣，這兩派人馬都有資格（說他們沒有資格也行）稱為馬克思的傳人。因此，我對阿塔里將真實的馬克思與在他之後對其思想加以簡化或偽託的思想家，如恩格斯、考茨基與列寧做出區別的說法感到懷疑。俄國人——首批認真看待《資本論》的讀者——有理由相信馬克思理論可以讓俄國藉由西方模式的經濟發展路線從落後走向現代，無獨有偶，馬克思也懷疑以俄國村

落公社為基礎恐怕無法直接進入社會主義。或許俄國人的想法反而更接近馬克思的一般觀點。反對蘇維埃實驗的理由不在於社會主義只能在全世界進入資本主義之後才能加以建構，馬克思沒這麼說過，我們也無法確定他相信這個觀點。反對蘇維埃的理由完全出於經驗。俄國太落後，因此蘇維埃實驗只能產生一幅畫虎不成反類犬的社會主義社會樣貌，據說普列漢諾夫曾經警告，蘇聯的興起不過是一個「赤色的中華帝國」。一九一七年時，這種觀點成為所有馬克思主義者，甚至包括絕大多數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的壓倒性共識。另一方面，人們反對一八九〇年代所謂的「法律馬克思主義者」（Legal Marxists）——這些人與阿塔里的觀點相同，認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主要工作是在俄國發展出繁榮的工業資本主義——其論點也是出自經驗。自由派資本主義的俄國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在沙皇體制下出現。

不過，馬克思的分析有幾個中心特徵仍然具備有效性與關聯性。首先明顯的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莫可抵禦的全球動力，以及資本主義將在其之前所有事物（其中甚至包括資本主義賴以獲利的人類遺產，例如家庭結構）予以摧毀的能力進行的分析。其次是對資本主義從內部「矛盾」營造成長的機制進行分析——無止盡的緊張與短暫化解、經濟成長引發的危機與變遷等，這些在日益全球化的經濟裡形成經濟集中的現象。毛澤東曾經夢想一個藉由不斷革命來持續更新的社會；資本主義實現了毛的想法，它透過熊彼得（接續馬克思之後）所說的無止盡的「創造性破壞」來造成歷史變遷。馬克思相信，這段過程終將（而且也必須）導致一個極度集中的經濟，這正是阿塔里近期接受訪談時所說的：決定經濟走向的人數僅以千計，頂多一萬人。馬克思

相信，資本主義將因此遭到取代，這項預測對我來說仍具有合理性，但取代的方式將不同於馬克思的預期。

另一方面，馬克思預言資本主義的取代將由邁向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對沒收者進行沒收」來達成，但他的說法並不是以他對資本主義機制的分析為依據，而是基於幾個毫無聯繫的獨斷假定。他根據的頂多是這項預測：工業化將產生大量受雇為手工薪資工人的人口，這是當時英格蘭的現象。這種說法作為中期預測堪稱正確，但就我們所知，置於長期卻不恰當。馬克思與恩格斯在一八四〇年代之後也並未預料到資本主義產生了一批他們曾經希望出現的政治立場激進的貧窮階級。馬恩兩人顯然認為，絕大多數無產階級無論從哪一種絕對意義來說，都並未變得更貧窮。事實上，一名在一九〇〇年代參加德國社會民主黨無產階級會議的美國觀察員表示，與會同志看起來「只比窮人多擁有一兩條麵包」。另一方面，在世界不同地區與階級之間的經濟不平等明顯擴大，這種現象不一定會產生馬克思所說的對「沒收者進行沒收」的狀況。簡言之，對未來的希望影響了他的分析，而非從他的分析得出對未來的希望。

第三項特徵可以從已故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翰·希克斯爵士的話得到最佳的闡釋。他寫道：「希望按照自己的意思來敘述一般歷史進程的人，大部分都會使用馬克思主義的範疇或其修正版本，因為其他的理論很少能滿足他們的需要。」

我們無法預言二十一世紀世界的問題該如何解決，但若想解決這些問題，我們必須思考馬克思曾提出的問題，即使我們不願接受馬克思不同弟子的解答。

第二章 馬克思、恩格斯與馬克思之前的社會主義

一

馬克思與恩格斯是共產主義的相對後進者。恩格斯於一八四二年稍晚宣稱自己是共產主義者，而馬克思或許要等到一八四三年下半年，當他以更大篇幅與更複雜地討論自由主義與黑格爾哲學之後，才算是共產主義者。即使處於日耳曼這灘政治死水之中，馬恩兩人也不是首批共產主義者。在國外工作的日耳曼職工早已與有組織的共產主義運動接觸，而且產生第一個日耳曼本土共產主義理論，此即出版於一八三八年由裁縫師威爾赫姆·魏特林完成的第一部作品《現實的人類與理想的人類》（*Die Menschheit, wie sie ist und wie sie sein sollte*）。在知識分子當中，莫塞斯·赫斯早於恩格斯，而且影響恩格斯年輕時的思想。然而，日耳曼共產主義的次序問題並不重要。到了一八四〇年代初，欣欣向榮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運動，無論是在理論還是實踐上，都已經在法國、英國與美國存在一段時間。年輕的馬克思與恩格斯對這些運動知道多少？他們從這些運動學到什麼？他們的社會主義與前人以及同時代人的社會主義有什麼關係？本章將對這些問

題進行討論。

在進行討論之前，我們要簡短介紹共產主義理論的史前人物，社會主義史家經常向這些人物致敬，因為即使是革命份子也喜歡託古改制。近代社會主義不是源自柏拉圖或湯瑪斯．摩爾，更不是源自坎帕內拉，不過年輕時代的馬克思卻深受坎帕內拉的《太陽之城》（*City of the Sun*）的影響，他曾計畫將此書收錄到他與恩格斯及赫斯一同編纂但未能完成的作品〈最佳國外社會主義作家選集〉（'Library of the best foreign socialist writers'）當中[1]。這類作品對十九世紀讀者而言是具有吸引力的，因為對都市知識分子來說，共產主義理論造成的一項主要困難是共產主義社會的實際運作似乎沒有前例，而且難以落實。摩爾作品的名稱被用來形容那些想描繪未來理想社會的嘗試，在十九世紀，這種理想社會主要指的是共產主義社會：烏托邦。至少對卡貝這位烏托邦共產主義者（同時也是摩爾的崇拜者）來說，這個名稱的選擇並無錯誤。儘管如此，十九世紀初開創新猷的社會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如果我們充分加以研究，會發現這些人在提出社會批判或烏托邦時，一般而言並非根據某位年代久遠的作者，而是受到稍早某位理想國理論建構者與他們的關聯性所吸引而予以探索，之後才進一步加以運用並讚揚其理論。十八世紀烏托邦作品（不一定屬於共產主義）所引起的風潮也使得這類作品為人所熟知。

儘管人們對基督教共產主義制度熟悉的程度不一，但與其相關的無數歷史例證卻未成為近代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觀念的啟發者。早期的社會主義（如同十六世紀再洗禮派〔Anabaptists〕的後裔）受到多廣泛的理解，我們並不清楚。當然年輕的恩格斯只專注於較晚近的例子，他引用這

類社群來證明共產主義是可實踐的：震顫派（Shakers，恩格斯認為他們是「世界上第一批以財貨共有為基礎來建立社會的人群」[2]）、拉普派（Rappites）與分離派（Separatists）。從這些派別的做法來看，與其說他們啟迪了共產主義，不如說他們肯定既存的追求共產主義的欲望。

我們不可能以如此簡略的方式介紹古代宗教與哲學傳統，而這些古老傳統在近代資本主義的興起下，也開始取得或顯露一種社會批評的新潛力。此外，這些古老傳統也肯定既有的社會制度，因為一種以完全不受限制的個人主義為基礎的自由經濟社會太具革命性，與人們實際所知的任何一種社群的社會價值是有衝突的。對於當時少數受教育的人，尤其是對所有的社會主義者還有其他的社會理論家而言，這些古老傳統具體表現在哲學思想家所構成的系列或網絡上。最知名的思想家來自於自然法傳統，其源頭可上溯到古典時代。雖然一些十八世紀哲學家致力於調整這類傳統，好將自由派個人主義社會的新渴望安插進去，但其形成的哲學卻仍殘留著強烈的公社主義（communalism）色彩。在一些事例中，這類哲學甚至相信沒有私有財產的社會就某種意義而言是更「自然的」，並且認為無論如何沒有私有財產的社會在歷史上先於有私有財產的社會。這種狀況在基督教意識形態中更為清楚。登山寶訓（Sermon on the Mount）裡的基督很容易被視為「第一位社會主義者」或共產主義者。雖然早期社會主義理論家絕大多數不是基督徒，但日後許多社會主義運動成員發現這樣的思考是對他們有幫助。這些觀念體現在一系列的文本上，而這些文本針對前人的說法做出評論、補充與批評，並且構成社會理論家正式與非正式的教育內容。從這些文本可以看出「好社會」（good society）的觀念，特別是那些不以私有財產制為基礎的社

會，在這些思想傳承中至少占有邊緣的位置。卡貝的做法很容易引起人們的譏笑，他列出一長串思想家的姓名，從孔子到西斯蒙第，其間共有萊克格斯、畢達哥拉斯、蘇格拉底、柏拉圖、普魯塔克、波緒埃、洛克、愛爾維修、雷納爾與班傑明．富蘭克林。卡貝認為自己提倡的共產主義實現了這些人的基本觀念，但事實上，馬克思與恩格斯卻在《德意志意識形態》（*German Ideology*）中嘲弄他的思想系譜。[3] 儘管如此，卡貝的想法反映出針對社會錯誤所做的傳統批判與對資產階級社會錯誤所做的新批判之間確實存在著連續性；至少對知識階層來說是如此。

這些老文本與舊傳統具體表現出來的公社概念，實際上反映了某種歐洲前工業（主要是農業）社會的有力元素，甚至更明顯的是一種異國社會的公社元素，這些元素是歐洲人從十六世紀以後才開始接觸到的事物。這種異國與「原始」社會研究在西方的社會批評（尤其是十八世紀）裡扮演著重要角色，顯示當時有一股潮流將異國與原始社會理想化，並且將其與「文明」社會對立起來，無論其所採取的形式是「高貴的野蠻人」、自由的瑞士人或科西嘉農民，還是其他做法。這些研究至少與盧梭和其他十八世紀思想家一樣，認為文明也代表人類從早期比較公正、平等與慈善的狀態下開始腐化。這些研究甚至認為，私有財產制出現之前的社會（「原始共產主義」）不僅提供未來社會應該追求的模式，而且證明這種社會並非不可實現。這類思維當然也出現在十九世紀的社會主義，而且不僅限於馬克思主義。弔詭的是，它在十九世紀末的風行程度遠超過十九世紀初的幾十年，這或許與馬克思與恩格斯逐漸熟悉與鑽研原始公社制度有關。[4] 除了傅立葉這個例外，早期社會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並不傾向於回顧「原始幸福」（primitive

happiness）——就某種意義而言，這種原始幸福可以作為人類未來幸福的模式——甚至可以說是不屑一顧；儘管十六到十八世紀完美社會的空想建構最令人熟悉的模式是烏托邦小說，而這些小說聲稱其所描述的是旅行家到世界偏遠地區旅行時所遭遇的事物。在傳統與進步、原始與文明的鬥爭中，這些早期社會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一面倒地支持其中一方。即使傅立葉認為人類的原始狀態就是伊甸園，他也相信進步勢不可免。

「進步」這個詞引領我們進入近代初期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對社會進行批判的主要思想母體，亦即十八世紀（尤其是法國）啟蒙運動。至少這是恩格斯堅持的觀點。[5]他特別強調啟蒙運動提出的系統性理性主義。理性提供了一切人類行動與社會形成的基礎，而且樹立了標準，根據這項標準，「過去所有的社會與政府形式，所有由傳統傳承下來的舊觀念」，都要加以拒斥。「因此，迷信、不義、特權與壓迫將被永恆的真理、永恆的正義、以自然為根據的平等，以及人類不可讓渡的權利所取代。」[6]啟蒙運動的理性主義意味著對社會採取根本批判的取徑，邏輯上批判的對象也包括資產階級社會。然而，啟蒙運動的各種學派與潮流提供的不只是社會批評與革命變遷的一紙憲章，也提供了人類有能力改善自身狀況的信念。有人——如圖爾戈與孔多塞——甚至相信人類可以達到完美，認為人類歷史是人類進步的歷程，人類最終一定能產生最好的社會。啟蒙運動也提供了比一般理性更具體的社會判準來衡量社會。人類的自然權利不只是生命權與自由權，也包括「追求幸福的權利」。革命份子正確認識到這種權利是歷史上的新發明（聖朱斯特〔Saint-Just〕），並且將其轉變成信念，相信「幸福是社會唯一的目標」。[7]即使革命採取的

是最資產階級與最個人主義的形式，這種革命取徑仍可在適當時機激勵社會主義進行社會批判。從各方面來說，我們都不會認為傑瑞米．邊沁是社會主義者。但年輕時期的馬克思與恩格斯（或許後者更是如此）卻將邊沁視為愛爾維修的唯物主義與羅伯特．歐文之間的連結，後者「從邊沁的體系更進一步，建立了英國共產主義」，但「唯有無產階級與社會主義者……成功將邊沁的學說做出進一步的發展」。[8]事實上，馬克思與恩格斯甚至提議將邊沁——僅就威廉．戈德溫《政治正義》（*Political Justice*）的影響來說——列入他們計畫中的〈最佳國外社會主義作家選集〉。[9]

馬克思從啟蒙運動各思想學派中獲得的特定影響，例如政治經濟學與哲學，在此毋須詳論。不過，馬克思與恩格斯仍清楚了解他們的前輩——「烏托邦」社會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屬於啟蒙運動的一環。他們將社會主義傳統上溯到法國大革命之前的時代，直到哲學唯物論者霍爾巴赫與愛爾維修，以及啟蒙時代的共產主義者莫瑞里與馬伯里。除了坎帕內拉，這些是唯一幾位在他們計畫的文庫中出現的早期學者。

有位學者看似對馬克思與恩格斯沒有巨大的直接影響，但他在日後社會主義理論形成的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在此必須簡要地加以討論，這位學者就是盧梭。盧梭幾乎不能算是社會主義者，雖然他發展出最膾炙人口的論點，認為私有財產制是所有社會不平等的起源，但盧梭並未主張「好社會」必須將財產社會化，相反地，他認為必須確保財產的平等分配。雖然盧梭同意「財產制是偷竊」的說法，卻沒有針對這項日後由普魯東加以推廣的理論概念做出更詳盡的發展。「財產制是偷竊」的說法，雖然受到法國大革命吉倫特派的布里索的闡發，但這句話本身不帶有社會

主義的意涵。[10]儘管如此，我們必須提出兩項與盧梭有關的評論。首先，社會平等必須以財富共有以及由中央政府管制所有勞動力為基礎，這是盧梭論點自然延伸的結果。其次，這一點更加重要，盧梭的平等主義對於雅各賓（Jocabin）左派的政治影響是無庸置疑的，從雅各賓左派衍生出近代第一個共產主義運動。巴貝夫在辯護時，也訴諸盧梭的說法。[11]馬克思與恩格斯起初認知的共產主義是以「平等」為核心口號；[12]而盧梭正是最具影響力的「平等」理論家。一八四〇年代初期，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作品絕大多數是以法文寫成，盧梭的平等主義是這些主義的原初組成成分。盧梭的學說對古典德國哲學的影響也不容小覷。

二

先前已經提過，共產主義作為近代社會運動這段連綿不絕的歷史，是以法國大革命的左翼為起點。從巴貝夫《平等者的陰謀》（*Conspiracy of the Equals*）開始，經波那洛帝而後到一八三〇年代布朗基的革命會社，中間有直接的傳承關係；這些人激勵日耳曼地區流亡者組成「正義者同盟」（League of the Just），日後並改稱為「共產主義者同盟」（Communist League），隨後加入的馬克思與恩格斯則為同盟草擬了《共產黨宣言》。馬克思與恩格斯計畫的一八四五年文庫，從一開始就自然地出現兩個「社會主義」文獻分支：一支是巴貝夫與波那洛帝（追踵莫瑞里與馬伯里之後），他們代表公開的共產主義派別；另一支則是對法國大革命與瘋人派（Enragés，包括

社會俱樂部〔Cercle Social〕、艾伯特、賈克・胡、雷克勒）的形式平等觀點提出批評的左翼人士。但文庫對於恩格斯口中所說的「源自斯巴達的禁欲共產主義」（*Werke* 20, p. 18）沒有太多理論興趣。就連一八三〇年代與一八四〇年代的共產主義作家，在馬克思與恩格斯心中似乎還不足以稱為理論家。事實上，馬克思曾經指出，正因為早期共產主義的粗疏與片面，「使得其他社會主義學說，如傅立葉與普魯東，能獨樹一格，這並非出於偶然，而是一種必然」。[13]雖然馬克思閱讀了這些早期共產主義作家的作品——甚至包括名不見經傳的作者，如拉歐提耶（1813-82）與皮佑（1809-77）——但他顯然沒有從這些人的社會分析中得到啟發，這些社會分析主要是將階級鬥爭描述成「無產階級」及其剝削者之間的鬥爭。

然而，巴貝夫派與新巴貝夫派共產主義的意義表現在兩方面。首先，與絕大多數烏托邦社會主義理論不同的是，巴貝夫派與新巴貝夫派深刻植根於政治，他們體現的不僅是革命理論，還包括政治實踐、組織、策略與戰術學說，儘管這些學說的內容相當有限。一八三〇年代，巴貝夫派與新巴貝夫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拉彭內拉伊（1808-49）、拉歐提耶、德札米、皮佑與最重要的布朗基，他們全是活躍的革命份子。他們的做法以及他們與法國大革命歷史（馬克思對這段歷史鑽研甚深）的有機連結，使他們與馬克思思想的發展產生緊密聯繫。其次，雖然這些共產主義作家主要是一些邊緣知識分子，但一八三〇年代的共產主義運動仍吸引了數量可觀的工人。這項事實被羅倫茨・馮・史坦恩指出後，顯然打動了馬克思與恩格斯，他們日後回憶時認為，一八四〇年代的共產主義運動呈現出無產階級性格，不同於絕大多數烏托邦社會主義的中產階級性格。[14]

此外，法國人發起的運動大約在一八四〇年左右採取了「共產主義者」這個名稱[15]，而這場運動衍生出日耳曼共產主義者，其中包括馬克思與恩格斯，他們也以共產主義這個名稱來表達自己的觀點。

一八三〇年代從新巴貝夫派與法國政治革命傳統所衍生出來的共產主義，與早期工業革命資本主義的社會無產階級新經驗相結合。儘管規模不大，但共產主義卻因此與「無產階級」運動合流。共產主義觀念以無產階級經驗為直接基礎，顯然是受到英國的影響，因為當時工業工人階級已經在英國成為明顯的存在。我們因此可以理解，為什麼當時法國最重要的共產主義理論家卡貝並不是受到新巴貝夫派的啟發，而是受到一八三〇年代英格蘭經驗的影響，尤其羅伯特．歐文使他更傾向於烏托邦社會主義潮流。然而，如果一名思想家只要受到資產階級「雙重革命」——法國大革命與英國工業革命——其中一個面向的影響，就能對新生的工業與資產階級社會進行分析，那麼這就說明要分析這類事物不一定非得具備工業化的實際經驗。事實上，這類分析在英國和法國同時進行，而且構成日後馬克思與恩格斯思想發展的重要基礎。附帶一提，由於恩格斯與英國的關聯，使得馬克思派共產主義從一開始就同時受到英國與法國的思想影響，相較之下，其餘日耳曼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左派則幾乎只受到法國發展的影響。[16]

「共產主義者」一詞總是意謂著計畫。不同於「共產主義者」，「社會主義者」主要偏重在分析與批判。「社會主義者」可以用來描述對人類本性抱持某種特定觀點的人士，例如認為「社會性」或「社會本能」在人性中具有根本的重要性，而這類人士也因此抱持特定的人類社會觀點。

「社會主義者」也可以指那些相信特定的社會行動模式有可能實現或有其必要的人士，特別針對公共事務，例如認為應干涉自由市場的運作。不久，社會主義觀點便受到一群提倡平等的人（例如盧梭的追隨者）的支持與發展。這些人主張干預財產權——十八世紀義大利有一批反啟蒙人士與「社會主義者」已經提出這種觀點[17]——但他們並不認為應建立完全以集體所有制以及以生產工具管理為基礎的社會。事實上，直到十九世紀末社會主義政黨出現之前，這兩種觀點尚未完全合流，有些人甚至認為時至今日這兩股潮流仍涇渭分明。因此，從今日的角度來看，那些顯然不屬於社會主義的人士，在十九世紀末反而自稱或被稱為「社會主義者」，例如德國的「講壇社會主義者」（Kathedersozialisten），或宣稱「我們現在都是社會主義者」的英國自由黨政治人物。社會主義內容含混不清，甚至影響社會主義者對社會主義運動的看法。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與恩格斯曾將聖西門派（Saint-Simonians）這個重要流派稱為「烏托邦社會主義」，認為這些人「關心的是產業的集體管制，而非財富的合作共有」。[18]英格蘭最早使用社會主義一詞的是歐文派（1826），但他們要等到數年之後才自稱「社會主義者」，他們把自己渴望實現的社會稱為「合作」的社會。

在一個社會裡，如果「社會主義」的反義詞——即「個人主義」[19]——意指自由競爭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模式，那麼「社會主義」理所當然要像它的名稱一樣帶有計畫的意涵，而且應該充滿熱情地以協會或合作模式（co-operative model）為基礎（亦即以合作而非私有財產為基礎）將社會組織起來。社會主義一詞從一八三〇年代以來一直沒有明確定義，但或多或少還是帶有從根

本上改造社會的傾向。社會主義的支持者範圍也很廣，從社會改革者到異想天開的瘋子都有。

早期社會主義必須區分成兩個面向：批判性與計畫性。批判性有兩項元素，首先是人性與社會理論，主要源自於十八世紀各種思想潮流；其次是分析「雙重革命」產生的社會，分析時有時會採取歷史發展或「進步」觀點的框架。對馬克思與恩格斯來說，除非與政治經濟學有關（即傾向於英國而非法國思想），否則他們對批評面向興趣不大。關於這點我們稍後再詳論。計畫面向顯然對馬恩的影響較深。計畫面向也包含兩項元素：首先，人們提出各種提案，要求以合作為基礎來創造新經濟，比較極端的則以共產主義社群為基礎；其次，嘗試思索理想社會的性質與特徵，並加以實踐。馬克思與恩格斯同樣對第一項元素興趣缺缺。他們認為烏托邦主義建立社群的想法在政治上不可取，事實上也是如此。烏托邦社會主義只有在美國才成功發展成具有實際意義的運動，而且在世俗與宗教界同受歡迎。它的成功頂多說明了共產主義是可行的。至於在政治上產生影響力的協會與合作形式，順利吸引了英法的工匠與技術工人，但馬克思與恩格斯當時要不是對這方面所知甚少（例如歐文在一八三〇年代提出的「勞動交換」），就是感到不信任。恩格斯一直要等到日後回想時，才將歐文的「勞動市場」與普魯東的提案相提並論。[20]在路易．布隆極為成功的作品《勞動組織》（*Organisation du Travail*，一八三九至四八年，發行了十版）中，馬克思與恩格斯顯然未受重視，儘管他們當時確實沒什麼名氣，但他們仍對烏托邦主義提出各項批評。

另一方面，烏托邦主義者對於共產社會性質的反思，深深影響了馬克思與恩格斯，不過馬恩

對烏托邦主義者計畫的共產社會未來充滿敵意，以至於日後許多評論者都低估了這層影響。馬克思與恩格斯針對共產主義社會的具體輪廓所提出的說法，幾乎每一項都是以早先的烏托邦作品為基礎，例如城鄉差異的廢除（恩格斯說這是取材了傅立葉與歐文的說法）[21]與國家的廢除（聖西門的說法）[22]，或者是來自於對烏托邦主題所做的批判與討論。

因此，在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後期作品中，處處可見馬克思之前的社會主義的影子，但這些學說已受到雙重的扭曲。馬恩在引用前輩作品時有著高度選擇性。此外，他們晚期的成熟作品也不必然反映出這些早期社會主義者在其形成時期所帶來的衝擊。年輕的恩格斯顯然比晚年的恩格斯較不欣賞聖西門派的作品。至於從未在《反杜林論》（*Anti-Dühring*）中出現的卡貝，卻經常出現在恩格斯一八四六年之前的作品中。[23]

然而，馬克思與恩格斯仍有從一開始就相當欣賞的人物，他們認為有三位特別重要的「烏托邦」思想家：聖西門、傅立葉與歐文。恩格斯直到晚年仍秉持他在四十幾歲時的看法，對這三人推崇備至。[24]歐文與其他兩人稍有不同，原因不僅在於馬克思（馬克思幾乎不可能知道歐文，因為歐文的作品當時還沒有譯本）顯然是透過恩格斯（恩格斯相當了解英格蘭的歐文派運動）的介紹才知道。不同於聖西門與傅立葉，在一八四〇年代初，馬克思與恩格斯經常稱歐文為「共產主義者」。恩格斯當時（跟他後來的想法一樣）對於歐文以務實的企業經營精神來營造烏托邦社區特別感到印象深刻（「從專家的角度來看，他安排的各項細節確實無可挑剔」——*Werke* 20, p. 245）。歐文大肆抨擊社會改革的三大障礙：「私有財產制、宗教與當前的婚姻形式」（出處同

上），恩格斯對此亦頗有同感。此外，歐文本身是資本企業家與工廠所有者，他對工業革命資產階級社會提出的批判，其詳盡與明確是法國社會主義者所缺乏的。（一八二〇與三〇年代，歐文也吸引了大批工人階級的支持，但恩格斯似乎未提到這點，他大概只知道一八四〇年代的歐文派社會主義者）。[25]儘管如此，馬克思仍毫不猶豫地認定歐文在理論層面不如法國人。[26]馬克思寫作的理論興趣，與他日後研讀的其他英國社會主義者一樣，主要是對資本主義進行經濟分析，亦即從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前提與論證導出社會主義結論。

「在聖西門作品中，我們看到智者的思想寬度，後來一些社會主義者提出的觀念（不局限於經濟層面）早在他的作品就已開始醞釀。」[27]無疑地，恩格斯後期的看法顯示馬克思主義深受聖西門主義的影響，然而耐人尋味的是，恩格斯很少提到聖西門學派（巴札德、翁封丹等人），但畢竟是這個學派將他們開山祖師曖昧但才氣縱橫的直觀想法轉變成某種類似社會主義體系的事物。聖西門（1759-1825）對於許多重要而傑出的人物有著非比尋常的影響，這些人物並不局限於法國，還包括了法國以外（卡萊爾、彌爾、海涅、李斯特）。這是浪漫主義時代歐洲文化史的重要大事，但今日閱讀聖西門作品的人卻不易領略這一點。如果說聖西門曾提出一貫性的說法，那麼就是他曾表示，具生產力的產業必須讓社會上真正具生產力的元素轉變成社會與政治的控制者並且形塑社會的未來：這是一種工業革命理論。「實業家」（industrialists）（聖西門派創造的詞）構成人口的絕大多數，包括生產的企業家（尤其是銀行家）、科學家、科技創新者與其他知識分子，以及勞動群眾。聖西門認為實業家包括了在偶然中扮演了人才儲藏庫角色的勞動群眾，

而前面提到的其他人才都從勞動群眾中選拔產生。聖西門攻擊貧窮與社會不平等，但他反對法國大革命以個人主義為前提的自由平等原則，認為這將導致競爭與經濟無政府狀態。社會制度的目標是「讓重要機構增進無產階級的福利」，他把無產階級定義為「最大的階級」（*Organisation Sociale*, 1825）。另一方面，如果「實業家」是企業家與科技計畫者，那麼這些人不僅將反對懶散寄生的統治階級，還有聖西門早期批判的資產階級自由資本主義的無政府狀態。聖西門的說法隱含著一項前提，那就是他承認工業化與無計畫的社會是完全不相容的。

「工業階級」的出現是這段歷史的結果。聖西門的觀點有多少是他自己的創見，有多少是受他的秘書（1814-17）、歷史學家奧古斯坦．提耶里的影響，在此我們不做深論。無論如何，社會系統由財產組織模式所決定，歷史演進以生產系統的發展為基礎，而資產階級的權力則仰賴其所掌握的生產工具。聖西門似乎將法國歷史化約成階級鬥爭史，而且認為這段歷史可以追溯到法蘭克人征服高盧人之時。後繼者增益他的說法，發展成更詳細的被剝削階級歷史，為馬克思日後的研究奠定基礎：奴隸被農奴取代，而農奴名義上是自由人，實際上卻是無立錐之地的無產階級。然而，聖西門對於自身所屬時代的歷史討論得更為詳細。日後恩格斯讚美聖西門看出法國大革命是一場貴族、資產階級與無產群眾的階級鬥爭。（聖西門的追隨者延伸他的論點，認為法國大革命解放了資產階級，而現在已到了解放無產階級的時候。）

除了歷史之外，恩格斯強調聖西門還有兩項真知灼見：讓政治從屬於經濟之下，甚至吸收成為經濟的一部分，最終建立一個廢除政府的未來社會；以「管理事物」取代「統治人群」。無

論這些文字是否出自聖西門筆下，裡面的概念源自聖西門則是確然無疑。此外，還有一些概念已經成為馬克思主義與其他後起的社會主義學說的一部分，這些也都可以溯源到聖西門學派，不過或許不是明白出自聖西門本人。「人類剝削人類」是帶有聖西門色彩的文字；馬克思略微修改了一段描述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分配原則的文字：「各盡所能，按勞分配」；還有一段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引用的文字，「必須確保全人類都能自由發展自己的天賦」。簡言之，馬克思主義顯然受惠於聖西門，只是受惠的內容不易確認，因為聖西門的貢獻與其他同時代人士的貢獻經常難以區別。因此，凡是研究乃至於經歷過法國大革命的人，都有可能發現歷史上存在著階級鬥爭。事實上，馬克思認為這項發現來自於研究法國大革命的資產階級史家，而這些史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提耶里，我們先前提到，提耶里曾有一段時間與聖西門過從甚密。此外，無論我們如何界定聖西門的影響，他的影響無庸置疑。恩格斯對於聖西門的崇敬始終如一，他表示「聖西門因自己腦子裡充滿各種想法而深以為苦」，而且認為聖西門與黑格爾一樣，「是他們那個時代最百科全書式的心靈」，因此他們只能跟自己對話。[28]

成熟期的恩格斯從三個方面讚賞傅立葉：首先，傅立葉對資產階級社會，或者應該說資產階級行為，提出精采、機智與毫不留情的批評；[29]其次，他支持婦女解放；第三，他提出了辯證的歷史概念。（最後一點似乎是恩格斯自己的特點而非傅立葉。）然而傅立葉思想首次對恩格斯造成衝擊，以及對馬克思社會主義留下最深刻影響的，或許是他對勞動的分析。傅立葉對社會主義傳統所做的貢獻相當特殊。與其他社會主義者不同的是，傅立葉不信任進步，他抱持盧梭的信

念，認為人性在文明影響下容易敗壞。他也不信任工業與科技發展，但他已準備好接受與運用這些成果，而且深信歷史巨輪不可能走回頭路。此外，與其他烏托邦主義者一樣，傅立葉對於雅各賓式人民主權與民主深感懷疑。從哲學層面來說，他是一名超個人主義者，認為人性的最高目標是滿足所有個人的心理驅力與實現個人的最大愉悅。恩格斯把他對傅立葉最早的印象記錄下來[30]：「每個個人都對特定種類的工作具有某種傾向或偏好，所有個人的傾向加總起來大體上勢必構成一股充分的力量，能滿足所有人的需求。根據這項原則可以導出：如果允許所有個人依照自己的喜好去選擇，那麼所有人的需求都能獲得滿足」，傅立葉因此認為，「……完全不勞動是荒謬的，從未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他進一步申論勞動與愉悅是一體兩面，目前的社會秩序將勞動與愉悅一分為二是不合理的。」傅立葉希望建立所有人的本能與欲求都能獲得解放的烏托邦，對婦女解放的堅持（甚至公然提出激進的性解放主張）可說是這種想法的邏輯延伸（事實上或許可以說是核心）。傅立葉顯然不是早期社會主義者中唯一的女性主義者，但他的熱情投入使他的影響最為深遠，關於這點可以從聖西門派在婦女解放上逐漸走向激進看出。

馬克思或許比恩格斯更清楚地察覺到，傅立葉的勞動觀點（勞動能讓人類本能如同玩耍一樣獲得真正的滿足）與人類能力的充分發展（馬克思與恩格斯相信共產主義可以做到這點）之間具有潛在衝突。然而，廢除勞動分工（即永久的職能分化）可能造成的結果，卻可以透過傅立葉主義加以闡明（「早上打獵，下午釣魚，傍晚餵牛，晚飯後從事批評」）。[31]馬克思後來明確反駁傅立葉勞動「僅是一種玩樂，一種消遣」的概念，[32]此舉等於間接反對傅立葉自我實現等於解

放本能的說法。在傅立葉眼中，所謂生活在共產主義下的人類，指的是從所有壓迫中解脫而回歸自然的男女；但馬克思眼中的共產主義男女則不只如此。然而，當成熟期的馬克思針對勞動這種人類活動進行最嚴肅的討論時，他還是重新思考了傅立葉的學說，充分顯示傅立葉在馬克思心中的地位。至於恩格斯，他在提到傅立葉時總是加以讚揚（例如《家庭的起源》〔*Origin of the Family*〕），這不僅說明傅立葉歷久不衰的影響力，也顯示恩格斯對這位烏托邦社會主義作家的一貫認同。傅立葉也是唯一一位能讓今日讀者從他的作品中得到愉悅、啟發乃至於憤慨感受的烏托邦社會主義作家，如同一八四〇年代初一樣。

烏托邦社會主義者因此提供了對資產階級社會的批判與歷史理論的輪廓，深信社會主義是可理解的而且正是這個歷史時刻所必須的，他們也全心思索在這樣的社會裡，人類制度（包括個人的行為）應該是什麼樣子。然而，烏托邦社會主義者在理論與實踐上有所不足。他們在實踐上同時有著輕微與嚴重的弱點。講好聽一點，這些弱點混雜著各種浪漫的奇想，從具有洞察力的空想到天馬行空的奇想，從腦袋不清（總是拿腦子裡充斥太多想法當藉口未免說不過去）到古怪的儀式與近似宗教的派別。簡單地說，烏托邦社會主義的追隨者很容易陷入荒誕，正如恩格斯在年輕時對聖西門派的觀察，「一旦陷入荒誕，這個學派絕不可能在法國發展下去」。[33]馬克思與恩格斯雖然認為偉大烏托邦主義者的言行怪異是這群優秀份子的必要之惡，但他們也認為這群人不可能在社會主義改造世界的過程中扮演吃重角色，因為這群人只會越來越可笑，最後成為一群沒人理會的怪胎。

其次，這一點更加重要，烏托邦社會主義者不談政治，就連理論也是如此，因此他們並未提供改革所需的有效手段。這些人就算遁入共產主義社群之中，想藉此產生可取的結果，恐怕也不會比讓聖西門的早期學說吸引拿破崙、沙皇亞歷山大與巴黎大銀行家注意來得容易。烏托邦主義者（聖西門派是其中的例外，他們選擇的媒介是精力充沛的資本企業主，因此使他們與社會主義分道揚鑣）並不承認任何特殊階級或群體是他們的觀念媒介，即使在他們吸引工人注意的時候（恩格斯往後從歐文身上看出這點），無產階級運動也從未在他們的計畫中扮演特定角色，而他們的計畫原本應該將他們發現的昭昭真理傳達給所有應該知道的人士才對，這一點卻完全沒有做到。此外，學說的宣傳與教育也一敗塗地，恩格斯年輕時還曾經批評英國歐文派人士採取的方式太過抽象。簡言之，恩格斯從英國經驗中清楚看出，「社會主義雖然在基礎上比法國的共產主義來得深厚，但發展卻較為遲緩。社會主義必須暫時回歸法國的觀點，然後才能超越它。」[34]法國的觀點是革命與政治性的，強調無產階級鬥爭。我們將看到，馬克思與恩格斯對於早期社會主義的非烏托邦發展逐漸走向合作與互助主義，批評更是嚴厲。

烏托邦社會主義有無數的理論弱點，其中有一項最為突出：它未對私有財產制進行經濟分析，「法國社會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不僅以各種方式批評私有財產制，也以烏托邦風格『超越了』（aufgehoben）私有財產制」，[35]但他們並未將私有財產制當成資本主義體系與剝削的基礎而進行系統性的分析。馬克思受到恩格斯早期作品《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Outline of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1843-4）的激勵，[36]認定共產主義理論必須以這類經濟分析為核心。馬克思

日後提到自己的思想發展過程時表示，政治經濟學是「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Preface to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這種分析在法國「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的作品中無法得見。因此，馬克思讚揚普魯東（1809-65）而且（在《神聖家族》〔*The Holy Family*, 1845〕進一步為他辯護。馬克思在一八四二年年底閱讀普魯東的《什麼是財產？》（*What is Property?*, 1840）後，隨即讚揚他是「最一貫而敏銳的社會主義作家」。[37]然而若因此認為普魯東「影響了」馬克思或促成他思想的形成，不免過於誇大。即使在一八四四年馬克思拿自己與日耳曼裁縫共產主義者魏特林比較時提到：就某方面來說，自己在理論上的成就不如魏特林，[38]魏特林唯一真正重要之處在於（像普魯東一樣）他是個貨真價實的工人。然而，雖然馬克思認為普魯東的心智顯然不及聖西門與傅立葉，他仍認為普魯東領先他們，一如日後他說費爾巴哈走在黑格爾之前一樣；儘管往後馬克思越來越敵視普魯東與他的追隨者，他卻從未改變原先的看法。[39]這不是因為普魯東作品在經濟分析上有所貢獻，「從嚴格的政治經濟科學史來看，這部作品根本不值一提」。事實上，普魯東不是而且從未成為一名嚴謹的經濟學家。馬克思讚揚普魯東不是因為可以從他身上學到東西，而是因為他認為普魯東率先從事了「政治經濟學批判」這項核心理論任務。馬克思之所以如此不吝於推崇，主要在於普魯東不僅是一名真正的工人，而且無疑有著原創的心靈。在馬克思感受到普魯東理論缺點多於優點之前，他沒有必要進一步深化自身的經濟研究。他對普魯東的批評，全見於《哲學的貧困》（*Poverty of Philosophy*, 1847）一書中。

其他的法國社會主義者，並沒有對馬克思的思想形成造成重大的影響。

三

馬克思社會主義的三個來源，人們早已熟知，它們分別是法國社會主義、日耳曼哲學與英國政治經濟學：早在一八四四年，馬克思已從「歐洲無產階級」身上發現思想勞動的國際分工現象。[40]本章探討的馬克思思想起源，只涵蓋馬克思之前的社會主義或勞動思想，而本章處理的馬克思經濟觀念，也只涵蓋從這類社會主義觀念導出或中介的部分，或馬克思經濟分析的雛型。今日的英國社會主義其實在思想上導源於古典英國政治經濟學，而其途徑有二：透過歐文流傳的邊沁功利主義，但主要還是經由所謂的「李嘉圖社會主義者」（Ricardian socialist，其中有些原本是功利主義者）而流傳下來，其中著名的有威廉．湯普森（1775-1833）、約翰．格雷（1799-1883）、約翰．弗蘭西斯．布雷（1809-97）與湯瑪斯．霍吉斯金（1787-1869）。這些作家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為他們運用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設計出一套工人的經濟剝削理論，也因為他們主動參與社會主義（歐文派）與工人階級運動。事實上，證據顯示在一八四〇年代初期，即使是恩格斯也沒讀過太多這些人的作品，而馬克思顯然沒讀過霍吉斯金這位「前馬克思作家中最具說服力的社會主義者」，[41]一直要到一八五一年之後，馬克思才以他作為學者慣有的謹慎表達他對霍吉斯金的欣賞。[42]這些作家最終對馬克思經濟研究的貢獻，或許還比英國對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的貢獻（比社會主義更激進）更廣為人知。早在一八四三到四四年，恩格斯已經知道（他似乎是從約翰．韋德的《中產與工人階級歷史》〔*History of the Middle and Working Classes*, 1835〕中

得知）[43]，定期出現的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經濟不可避免的現象，於是他運用這項事實來批評賽伊法則（Say's Law）。

與英國左翼經濟學者的連結相比，馬克思受歐陸經濟學者的影響顯然少了許多。法國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發展與聖西門派有關，而且可能受到特立獨行的瑞士經濟學家西斯蒙第（1773-1842），尤其是康斯坦丁．佩克爾（1801-87）的影響。李希特海姆認為佩克爾「連結了聖西門主義與馬克思主義」。西斯蒙第與佩克爾是馬克思最早仔細研讀的幾名經濟學家（1844）。西斯蒙第經常被引用，而佩克爾則在《資本論》第三冊中受到討論。儘管如此，《剩餘價值理論》（*Theories on Surplus Value*）並沒有提到這兩個人，雖然馬克思曾一度考慮要討論西斯蒙第。另一方面，這本書卻提到了英國李嘉圖派社會主義者：畢竟，馬克思本人就是最後也是最偉大的李嘉圖派社會主義者。

然而，就算我們可以暫時略過馬克思認可或擴充當時左翼經濟學的部分，我們也必須簡要地思考他對左翼經濟學有何反對之處。馬克思反對他認為的那些屬於「資產階級」（《共產黨宣言》）與日後屬於「小資產階級」的做法，儘管這些做法可以幫助的並非個別的小有產者，而是在資本主義下運作的各個工人協會，甚至是用來取代資本主義的工人協會。但馬克思認為，這些做法以為藉由信用改革、貨幣操作、租金改革、禁止資本家壟斷（廢除繼承制或其他做法）就能解決資本主義問題，其實是受了誤導。這些提議在左派相當受歡迎，就連一部分社會主義運動也受影響。馬克思對西斯蒙第（馬克思敬重他是一名經濟學家）、普魯東（馬克思認為他不能算

是經濟學家）的敵視，以及對格雷的批評，均是基於此一觀點而來。當馬克思與恩格斯形成自身的共產主義觀點時，當時左翼理論的弱點並未對他們造成太大阻礙。然而，從一八四〇年代中期開始，他們逐漸發現自己必須對左翼的政治實踐投以更多的批判，然後從實踐延伸到對理論的批判。

四

日耳曼對馬克思與恩格斯的思想形成產生什麼影響？馬克思年輕時，日耳曼的經濟與政治都相當落後，當地還不存在能給予馬克思靈感的社會主義者。事實上，直到馬克思與恩格斯信仰共產主義時為止，以及從某方面來說，直到一八四八年之後為止，我們不認為日耳曼地區在此之前曾出現明確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左派，當時存在的只是一些民主派與雅各賓派人士，他們激進地反對反動派與貴族絕對主義。如《共產黨宣言》指出的，在日耳曼（不同於法國與英國），共產主義者沒有別的選擇，只能與資產階級合作對抗絕對君主制、封建地產制與小資產階級身分（die Kleinbürgerei），[44]但另一方面又要鼓吹工人清楚意識到自己與資產階級實屬對立。從政治與意識形態的立場來看，日耳曼的激進左派是向西方看齊。從一七九〇年代日耳曼出現雅各賓派開始，法國就提供他們思想模式、收容政治與思想難民的避難所，以及與進步潮流有關的資訊來源：一八四〇年初，史坦恩調查日耳曼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時，儘管原意是想批判這些學說，

但他得到的結果大體仍與一七九〇年代一樣。在此同時，一群主要由在巴黎工作的日耳曼短期雇工組成的團體，與一八三〇年代以後到法國避難的自由派人士決裂，他們基於自己的目的採納了法國工人階級的共產主義。首次清楚出現的日耳曼共產主義因此帶有革命與無產階級的雛型。[45] 無論黑格爾左派的激進年輕知識分子打算只以推動民主為目標，還是準備在政治與社會上更進一步，法國都提供他們思想模式與觀念觸媒。

在這群日耳曼短期雇工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赫斯（1812-75）。他之所以重要，不是因為他的思想成就（他不是一名思路清晰的思想家），而是因為他比其他人更早成為一名社會主義者，而且成功讓一整個世代中充滿反抗意識的知識分子青年信仰社會主義。一八四二到四五年，赫斯對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影響相當關鍵，但兩人不久就跳脫他的影響。赫斯自創的詞彙：「真正的社會主義」（True Socialism）（主要是一種聖西門主義，只是採用了費爾巴哈的語言），注定無法引起人們的共鳴。「真正的社會主義」一詞之所以還讓人有點印象，主要是因為馬克思與恩格斯曾反對這個詞（在《共產黨宣言》中），因而使它傳之久遠。同樣地，要是沒有馬克思與恩格斯為文抨擊，恐怕也沒有人記得卡爾．格林（1817-87）。赫斯的思想發展曾一度與馬克思匯流，到了一八四八年，他已經可以稱為馬克思的追隨者。然而，赫斯既不適合當思想家，也不適合當政治人物，但赫斯應該會滿意人們稱他是馬克思主義、日耳曼勞工運動，以及猶太復國運動的永遠的先行者。

如果前馬克思的日耳曼社會主義對馬克思觀念的起源沒有很大的影響——只有在年代上是重

疊的——那麼我們接下來必須把眼光轉向日耳曼非社會主義者對自由主義的批判上。就十九世紀對「社會主義」一詞的含糊定義來看，這些非社會主義批判其實潛在上也可歸類為社會主義。日耳曼思想傳統包含了一種強大的元素，那就是對十八世紀任何形式的「啟蒙運動」抱持敵視態度。因此，日耳曼思想傳統也敵視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理性主義與抽象論證——例如任何形式的邊沁派或李嘉圖派論點。這種思想傳統致力於發展有機的歷史與社會概念，並且表現在浪漫主義上，雖然這些概念乍看之下是一種好戰的反動運動，但其中衍生出來的黑格爾哲學卻也融合了啟蒙運動與浪漫主義觀點。日耳曼的政治實踐，與由此產生的日耳曼社會理論，完全受到無所不包的國家行政機構所掌控。日耳曼資產階級很晚才發展出企業家階級，整體而言，日耳曼資產階級既不要求政治主權，也不追求無限制的經濟自由主義，因為這個階級絕大部分發表意見的成員幾乎從某種角度來說都屬於國家的僕人。日耳曼自由派人士即使擔任公僕（包括教授）或企業家，也不會無條件地相信無限制的自由市場。不同於法國與英國，日耳曼作家希望結合政府計畫與社會改革來避免資本主義經濟的完全發展（典型的例子是英國），同時也避免出現廣大貧困民眾的問題。這些自由派的理論實際上已形同社會主義，舉例來說，保守的保王派人士羅德貝圖斯—雅格措夫（1805-75）曾於一八四八年短暫擔任過普魯士大臣，他在一八四〇年代針對資本主義發表了消費不足的批判，而且根據勞動價值理論提出「國家社會主義」的學說。在俾斯麥時代，羅德貝圖斯的學說被當成政令宣導，用來證明德意志帝國與任何社會民主黨人士一樣採取「社會主義」立場，同時也用來證明馬克思剽竊了這位正直保守派思想家的觀點。這項指控非常

荒謬，馬克思接觸羅德貝圖斯的作品是在一八六〇年左右，當時他的觀點早已形成，羅德貝圖斯「頂多是讓馬克思了解如何從事這項任務與如何避免大錯」。[46]這項爭議長久以來一直受到忽略。另一方面，值得一提的還有羅德貝圖斯的態度與論點對拉薩爾的國家社會主義之形成有一定的影響（這兩個人曾短暫合作）。

無庸贅言，這些非社會主義的反資本主義者不僅在馬克思社會主義[47]形成上未扮演任何角色，而且也因為明顯的保守主義傾向而與日耳曼青年左派出現激烈對抗。馬克思主義之前的歷史可以歸類為「浪漫主義」理論的部分，只有那些政治意涵最少的作品，包括恩格斯總是投以些許關注的「自然哲學」（參見《反杜林論》〔1885〕前言），以及被吸收為古典德國哲學一部分的黑格爾理論的形式。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傳統也涵蓋了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其中包括產業國有國營，這正說明了產業國有化並非社會主義的專利。

因此，日耳曼的經濟、社會與政治經驗，以及專門為解決這些問題而產生的作品，全對馬克思的思想鮮有助益。事實上，這些經驗與作品也很難造成什麼影響。不只馬克思與恩格斯這麼認為，一般的看法也是如此，因為同樣的議題在法國與英格蘭通常會具體地以政治與經濟形式表現出來，但在馬恩年輕時期的日耳曼，卻只是披上一件抽象哲學探討的外衣。然而，相對地，而且無疑就是基於這理由，這個時期德國哲學的發展卻遠比其他國家來得精采。就算哲學的發展使日耳曼人未能接觸社會的具體實相——在一八四二年秋天之前，馬克思的文章從未實際提到「無產階級」，而無產階級只能向「曼徹斯特、巴黎與里昂（Lyon）的天堂哭訴」他們的問題[48]——但

哲學至少能提供他們強大的能力從事概括並穿透眼前的事實。儘管如此，為了充分實現哲學的潛力，哲學思考必須轉變成改變世界的工具，空想的哲學必須結合對資產階級社會的真實世界進行具體的研究與分析。少了這層結合，從哲學發展（主要是黑格爾派）的政治激進化一躍而出的日耳曼社會主義，最多也只是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嘲弄的「真正的」社會主義。

哲學激進化最初採取宗教批判的形式，之後（因為這個主題在政治上相當敏感）才將矛頭指向國家，而宗教與國家向來是與哲學直接相關的兩項重要「政治」議題。在馬克思之前，有兩部偉大作品充分表現這段激進化過程，這兩本書分別是史特勞斯的《耶穌傳》（*Life of Jesus*, 1835），以及當時還明顯信仰唯物論的費爾巴哈寫的《基督教的本質》（*Wesen des Christenthums*, 1841）。費爾巴哈處於黑格爾與馬克思之間的轉折點，具有承先啟後的重要性，不過費爾巴哈的宗教批判對於馬克思與恩格斯成熟期思想的影響始終未獲得明確的評價。在激進化的關鍵時刻，日耳曼年輕的政治與哲學反叛者直接從激進與社會主義傳統汲取靈感，這些傳統是人們最熟悉、思想也最連貫的哲學唯物論學派（即十八世紀法國的哲學唯物論），它不僅上承法國大革命傳統，甚至也與法國早期的共產主義，如霍爾巴赫與愛爾維修、莫瑞里與馬伯里等人的思想有關。法國哲學發展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影響（或至少是鼓勵），與英國十七、十八世紀思想家建立的哲學傳統（直接或透過政治經濟學影響馬克思主義）如出一轍。然而，從根本來看，馬克思年輕時「正確詮釋黑格爾」的過程仍屬古典德國哲學的一環，馬克思之前的革命與社會主義傳統對他的影響少之又少，頂多只給予馬克思一種前進的方向感。

五

政治學、經濟學與哲學，法國、英國與日耳曼經驗，「烏托邦」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都在一八四〇年代馬克思集大成的過程中融合、轉變與超越。在這個歷史的關鍵時刻，這場轉變的出現並不令人意外。

大約在一八四〇年左右，歐洲歷史出現了一個新面向：「社會問題」，或者（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潛在的社會革命，這兩項事物通常表現在「無產階級」現象上。資產階級作家有系統地意識到無產階級是一種經驗與政治問題，是一種階級與運動——在最後的分析中，他們更發現無產階級是一股傾覆社會的力量。一方面，這種意識表現在有系統地研究（通常是比較性的）無產階級狀況上，如維勒梅研究法國（1840）、布雷研究法國與英國（1840）、杜克佩提歐研究各個不同的國家（1843）；另一方面，這些資產階級作家進行的歷史概括讓人聯想到馬克思的論點：

> 這就是歷史的內容：除非浮現新的對立，否則歷史的重大對立不會消失或流逝。近來，貧富之間的普遍對立逐漸惡化成一端為資本家與勞動雇主，另一端為各種工業工人的緊張關係；隨著工業人口成比例地成長，這種緊張關係形成的對立也越來越具威脅性。（art. 'Revolution' in Rotteck and Welcker, *Lexicon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XIII, 1842）[49]

我們已經看到，法國在這個時期已經興起了革命的與無產階級意識的共產主義運動。事實上，「共產主義者」與「共產主義」這兩個形容這場運動的詞彙也在一八四〇年左右開始流行。在此同時，在恩格斯密切觀察下，大規模無產階級運動：憲章運動（Chartism），也在英國達到巔峰。在此之前，西歐「烏托邦」社會主義的早期形式已經退卻到公共生活的邊緣，唯有傅立葉主義是例外，它仍在無產階級土壤中適度而持續地成長著。[50]

以不斷增長與動員的工人階級為基礎，雅各賓革命派共產主義者，以及社會主義結社的經驗與理論，兩者終於可能達成全新且規模更龐大的結合。馬克思這名黑格爾主義者不斷尋找藉由否定既有社會來轉變社會的力量，他發現這股力量就存在於無產階級身上。雖然馬克思對無產階級沒有具體認識（除了透過恩格斯），而且從未好好思索資本主義與政治經濟學的運作原理，但此時的他隨即開始研究二者。如果我們以為一八五〇年代初以前的馬克思並未認真研究經濟學，那麼這完全是錯誤的猜想。馬克思開始認真研究經濟學的時間不會晚於一八四四年。

社會理論與社會運動之所以能合而為一，主要是因為這個時期英國與法國已經發展完整的（而且顯然已經成為典範）資產階級社會正面臨一連串的勝利與危機。從政治的觀點來看，一八三〇年革命以及英國隨後於一八三二到三五年的改革，建立了一個顯然主要為自由派資產階級服務的政權，而此舉嚴重缺乏政治民主。從經濟的觀點來看，工業化已經在英國成為主導力量，而且正如火如荼在歐陸進行——但在危機與不確定的氣氛下，許多人似乎對資本主義的未來充滿懷疑。史坦恩是第一位有系統地調查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1842）的學者，他表示：

> 無疑地，在歐洲最重要的部分，政治改革與革命已經告終；社會革命已經加以取代，而且以可怕的力量與強烈的質疑凌駕於民族的所有運動之上。就在幾年前，我們今日看到的事物似乎只是個幻影。今日，社會革命視所有法律為寇讎，想壓制社會革命，使其重回原先的虛無，似乎只是白費工夫。[51]

或者如同馬克思與恩格斯幾年後說的：「一個幽靈在歐洲遊蕩，共產主義的幽靈。」因此，從歷史來看，在一八四〇年代以前，社會主義要在馬克思手上獲得轉變是不可能的。或許另一項不可能的原因在於，在主要的資產階級國家，激進的政治與工人階級運動，以及激進的社會與政治理論，兩者均深植於悠久的歷史、傳統與實踐中，因而難以解放。隨後的歷史顯示，儘管（事實上正因如此）法國本身擁有堅強的革命與結社傳統，但法國左派卻一直抗拒馬克思主義；另一方面，儘管（正因如此）英國本身成功發展出具有階級意識的運動與對剝削的批判，但當地勞工運動卻遲遲不肯接受馬克思主義，而更冥頑不靈。少了法國與英國的支持，馬克思不可能成為社會主義的集大成者；此外，先前曾經提過，馬克思與恩格斯終其一生維持著夥伴關係，而恩格斯擁有獨特的英國經驗（他是一名資本家，在曼徹斯特擁有產業，當然他的英國經驗不只如此），這層關係對馬克思來說無疑相當重要。儘管如此，或許更可能的原因是，社會主義的新階段不應該在資產階級社會的中心發展，而應該在日耳曼這個邊緣地帶立足，而且要藉由重建德國哲學無所不包的空想架構才能完成。

馬克思社會主義的實際發展不在本章的討論之列。在此我們只需重申馬克思社會主義與它的先行者之間的三項差異。首先，馬克思社會主義分析決定了社會的基礎關係（在馬克思眼中，基礎關係就是經濟關係），並以此為根據，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全面性的而不只是部分的批判。從分析的角度來看，馬克思社會主義處理的是比批評經驗表象更為深刻的事物，也就是對礙事的「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以及產生虛假意識的（歷史）原因進行分析。其次，馬克思社會主義把社會主義放在歷史演化分析的框架內，這種框架不僅解釋社會主義何以成為理論，以及理論如何落實成為運動，也解釋了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何以到最後必能產生社會主義社會。（附帶一提，早期社會主義者認為，新社會是既成事物，只需在適當時點以最終形式「根據他們偏好的模式」加以設立。相反地，馬克思的未來社會在歷史上會不斷演化，因此這種社會只能預測它的概括原則與輪廓，而不能加以設計。）第三，馬克思社會主義釐清從舊社會轉變到新社會的過渡模式：無產階級是馬克思社會主義的承載者，透過階級運動從事階級鬥爭，社會主義的目標唯有透過革命（「對沒收者進行沒收」）才能達成。社會主義因此不再是「烏托邦的」，而是「科學的」。

事實上，馬克思的轉變不僅取代而且吸收了前輩的思想學說。用黑格爾的話來說，就是馬克思「超越」（aufgehoben）了這些先驅。除了寫學術論文的人之外，絕大多數人應該都不記得這些前馬克思時代的人物，這些人要不是成為前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就是（例如某些聖西門派人士）逐漸信仰與社會主義毫無關係的意識形態。他們頂多只能像歐文與傅立葉一樣，繼續在教育

性理論家之間流傳。前馬克思時代唯一以理論家身分在社會主義運動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只有普魯東，而無政府主義者（更甭說偶爾還有法國極右派與其他反馬克思主義者）仍持續引用他的作品。就某個角度來看，這種情況對那些原創思想家（即使他們的才華不如最優秀的烏托邦主義者耀眼）似乎不太公平，他們如果在今日提出他們的觀點，想必能得到一定的重視。不過不可否認的是，今日對這些社會主義者感興趣的人，恐怕只有歷史學家了。

人們不應該因上述說法而誤以為馬克思之前的社會主義在馬克思發展出自己的觀點後就馬上消失無蹤。事實上，馬克思主義直到一八八〇年代或最早在一八七〇年代初之前，在勞工運動中仍不具影響力，甚至連名義上也是如此。想了解馬克思自身思想的歷史以及他在政治與意識形態上的爭議，我們必須回想馬克思往後的人生針對一些思潮所進行的批評、論戰或在勞工運動中不得不做的妥協，這些思潮主要來自前馬克思的激進左派及其衍生出來的觀念。無論是激進民主、雅各賓共和主義，還是在布朗基領導下殘存的新巴貝夫主義革命無產階級共產主義，這些思潮全源自於法國大革命。（新巴貝夫主義這個思潮，馬克思有時會基於政治需要與他們結盟。）這些思潮偶爾源自於（或至少受其激勵）相同的左派黑格爾主義或費爾巴哈主義，就連馬克思自己也曾受這兩種思想影響，有些俄國革命份子亦是如此，尤其是巴枯寧。但總括來說，這些思潮都是馬克思之前的社會主義的後裔與接續者。

的確，最初的烏托邦主義者消失於一八四〇年代。烏托邦主義作為一種學說與運動，在一八四〇年代初期已陷入瀕死狀態。唯一的例外是傅立葉主義，它中規中矩地發展到一八四八年革命

時期。在革命中，傅立葉主義的領袖維克多．孔西德隆發現自己扮演著一個難以預料且終必失敗的角色。另一方面，各種協會主義與合作理論也持續發展，這些理論有部分源自於烏托邦主義（歐文、布榭），有部分是以一八四〇年代較不具救世主性格的學說（布隆、普魯東）為基礎。這些理論甚至還保有（儘管做法越來越趨於低調）以合作的路線來轉變整個社會的熱忱，而合作正是這些理論的源頭。合作的烏托邦裡將勞工從資本家的剝削中解放出來的夢想，在英國被稀釋成合作式商務管理（co-operative shopkeeping）。雖然如此，如果連英國都能產生這種想法，那麼在其他國家，這種想法更有可能成功，因為這些國家的生產者合作關係仍居於支配地位。對馬克思時代絕大多數工人來說，這種做法就是社會主義；或者應該這麼說，就連在一八六〇年代，獲得工人階級支持的社會主義主張的也是組成一個獨立而排除資本家的生產者團體，由社會供給他們充足的資本使團體得以運作，並且由公共權威加以保護與鼓勵，相應地，生產者團體也對公眾負有集體責任。於是，普魯東主義與拉薩爾主義產生了政治重要性。當工人階級中具有政治意識的成員主要由工匠或具有類似工匠經驗的人組成時，會有如此發展一點也不意外。此外，成立獨立生產單位以掌控自身事務，會有這種夢想的人不僅僅只有那些還不完全算是無產階級的男性（當然女性更罕見）。某方面來說，這種原始的「工團主義」（syndicalist）願景也反映出十九世紀中葉無產階級的工廠經驗。

因此，認為馬克思之前的社會主義到了馬克思時代已完全消亡，這種想法顯然是錯的。馬克思之前的社會主義一直在普魯東派、巴枯寧派無政府主義者之間存續著，在後來的革命工團主義

者與其他人之間存續著，甚至當這些後起的派別因自身缺乏適當理論而學習馬克思的分析方式時，馬克思之前的社會主義也依然存在。然而，從一八四〇年代中期以後，我們就不能說，馬克思與在他之前的社會主義傳統有所關聯。而在馬克思深入解析普魯東（《哲學的貧困》）之後，我們也不能說，馬克思對在他之前的社會主義所做的批判，對他自己的思想形成有很大的影響。大體而言，這種批判屬於政治論戰的一部分，與他的理論發展無關。或許唯一重要的例外是《哥達綱領批判》（1875）。在這部作品中，馬克思對於德國社會民主黨毫無理由地向拉薩爾派讓步提出震撼性的抗議，他在憤怒之下做出的理論陳述，即使不是全新的看法，但無論如何之前從未公開發表過。馬克思在信貸與金融上的觀念發展，可能也與他認為有必要針對各種通貨與信貸手法進行批評有關，這些手段在普魯東派的勞工運動一直很受歡迎。然而，到了一八四〇年代中期，馬克思與恩格斯整體來說已經從前馬克思社會主義學到一切他們需要的東西。「科學的社會主義」的基礎就此奠定。

注釋：

1 見Marx-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4, note 242, p. 719。

2 Engels, *Beschreibung der in der neueren Zeit entstandenen und noch bestehenden kommunistischen Ansiedlungen*, *Werke* 2, pp. 521, 522.

3 *Werke* 3, pp. 508ff.

4 雖然馬克思認為原初財產形式是「部族的」，但在他早期作品中並未指出部族財產制代表「原始共產主義」階段。這條著名腳注在一八八〇年代被補充到《共產黨宣言》中。

5 《反杜林論》（初稿）開頭的幾句話（*Werke* 20, p. 16 腳注）是這麼說的：「無論近代社會主義與現存社會裡的階級矛盾如何息息相關，不管是有產者與無產者，還是工人與剝削者之間的矛盾，在理論形式上，近代社會主義的出現主要是針對十八世紀偉大的法國發言者提出的原則而產生的更一貫的持續與發展。近代社會主義最初的代表人物，莫瑞里（Morelly）與馬伯里（Mably），即屬於這個群體。」

6 *Werke* 20, p. 17.

7 Advielle, *Histoire de Gracchus Babeuf* (Paris, 1884), II, p. 34.

8 *The Holy Family* (*Works* IV, p. 131;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bid. p. 528).

9 *Works* IV, p. 666; Engels to Marx 17.3.1845 (*Werke* 27, p. 25). 然而，馬克思對邊沁的態度很快就不像過去那麼喜愛，不過他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仍對邊沁做出了正面評價。

10 J.P. Brissot de Warville, *Recherches philosophiques sur le droit de propriété et le vol* (1780)；參見J. Schumpeter,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NY, 1954, pp. 139-140)。

11 Advielle, op. cit., II, pp. 45, 47.

12 參見'Anti-Dühring', English edn, p. 116。

13 關於恩格斯的觀點，見*Progress of Social Reform on the Continent* (*Werke* I, pp. 484-5)，收入Owenite, *New Moral World*, 1843；關於馬克思的觀點（1843），*Werke* I, p. 344。

14 參見Engels' 1888 preface to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Werke* 21, p. 354 ff)。

15 首屆共產主義者大會於一八四〇年召開；卡貝的《為什麼我是共產主義者》（*Comment je suis communiste*）與《我的共產主義信條》（*Mon crédo communiste*）的成書時間可以追溯到一八四一年。到了一八四二年，勞倫茲·馮·斯坦在日耳曼地區廣泛流通的《今日法國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Der Sozialismus und Communismus des heutigen*

Frankreichs）中首次嘗試清楚區別這兩種現象。

16 見《德意志意識形態》（*Werke* 3, p. 488）中充滿自豪的陳述（或許成於恩格斯之手），當中提到他對「英格蘭共產主義者」的了解，相較之下，日耳曼的「真社會主義者」則對英格蘭一無所知。他列出的名單——「摩爾（More）、平等派（Levellers）、歐文、湯普森、瓦茲（Watts）、霍里歐克、哈爾尼（Harney）、摩根、薩斯威爾、鮑姆比、格里夫斯、艾德蒙斯、霍布森、斯賓思」——其有趣之處不在於裡面涵蓋的人名，而在於被排除的部分。這張名單沒有提到與成熟期的馬克思相熟的幾位「勞動經濟學家」，其中比較知名的有布雷（J. F. Bray）與湯瑪斯．哈吉斯金（Thomas Hodgskin）。相反地，他提到了現在已不為人知，但在一八四〇年代的激進左派（如恩格斯）卻無人不曉的人物，如鮑姆比（John Goodwyn Barmby, 1820-81），據說是他引進了「共產主義」一詞；格里夫斯（James Pierrepont Greaves, 1777-1842），「神聖的社會主義者」；薩斯威爾（Charles Southwell, 1814-60），與瓦茲（John Watts, 1818-87）一樣，是歐文派的「社會傳教士」；霍里歐克（G.J. Holyoake, 1817-1906），較不為人知的人物；與霍布森（Joshua Hobson, 1810-76），歐文派的活動份子，《新道德世界》（*New Moral World*）與《北方之星》（*Northern Star*）的出版商。歐文、湯普森、摩根（John Minter Morgan）、艾德蒙斯（T.R. Edmonds）與斯賓思（Thomas Spence）仍然可以在任何一部英國社會主義思想史中被找到。

17 Franco Venturi, 'Le mot "socialista"'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con. Hist., Aix, 1962; The Hague, 1965, II, pp. 825-7).

18 G. Lichtheim, *The Origins of Socialism* (NY, 1969), p. 219.

19 第一篇討論這個主題的文章，寫作者是聖西門主義者皮耶．勒魯（Pierre Leroux），文中明白點出這兩個詞：〈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De l'individualisme et du socialisme', 1835）。

20 *Anti-Dühring, Werke* 20, p. 246.

21 *Anti-Dühring, Werke* 20, pp. 272-3.

22 馬恩受惠於烏托邦主義的部分，見《共產黨宣言》（*Werke* 4, p. 491），當中列出了「未來社會的正面提案」。

23 Engels, *Progress of Social Reform, Werke* 1, p. 482；《德意志意識形態》花了相當長的篇幅為卡貝辯護，並且駁斥格林

（Grün）的錯誤說法。

24 參見計畫中的「文庫」，當時恩格斯已將這些人列入其中。

25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Werke* 2, pp. 451-2).

26 Marx, *Peuchet on Suicide* (1846) in *Works*, vol. IV, p. 597.

27 *Anti-Dühring, Werke* 20, p. 242.

28 Engels to F. Toennies, 24.1.1895 (*Werke* 39, pp. 394-5); *Anti-Dühring* (Werke 20, p. 23).

29 年輕時期的恩格斯提到，傅立葉直到晚年才對工人與工人的生活狀況多所著墨（*A Fragment of Fourier's on Trade in Werke* 2, p. 608）。

30 *Progress of Social Reform* (1843) in *Werke* 1, p. 483.

31 *German Ideology* (Werke 3, p. 33).

32 *Grundrisse* (1953, Berlin edition), pp. 505, 599.

33 *Werke* I, p. 482.

34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Werke* 2, pp. 452-3).

35 Marx, *On P.-J. Proudhon* (1865) in *Werke* 16, p. 25.

36 *Werke* 1, pp. 499-524.

37 *Communism and the Augsburger Allgemeine Zeitung* (*Rheinische Zeitung*, 1842), *Werke* 1, p. 108. *Rh. Ztg* 4.1.1843 (New MEGA I, 1, p. 417).

38 *Kritische Randglossen zu dem Artikel eines Preussen* (*Werke* 1, pp. 404-5).

39 Marx, *On P.-J. Proudhon* in *Werke* 1, p. 405.

40 *Kritische Randglossen* in *Werke* 1, p. 405.

41 W. Roll, *A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London, 1948), p. 249.

42 見 *Theorien* ü*ber den Mehrwert* III (*Werke* 26, iii, pp. 261-316)與《資本論》第一卷提到哈吉斯金的部分，當中也引

用了布雷、格雷與湯普森的作品。

43 *Umrisse einer Kritik* (*Werke* 1, p. 514). 1845年，馬克思在曼徹斯特也讀了這位作者與布雷和湯普森的書（*Grundrisse*, 1953 edn, pp. 1069, 1070）。

44 譯文「小資產階級」似乎有誤。

45 魏特林於一八三五年到一八三六年與一八三七年到一八四一年間住在巴黎，他在此閱讀了皮佑與各種共產主義刊物。

46 Schumpeter,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p. 506.

47 《共產黨宣言》中的「封建的社會主義」一節，曾討論各種類似的趨勢，但完全沒有提到日耳曼，只提到法國的正統主義者（legitimists）與迪斯雷利（Disraeli）的「青年英格蘭」（Young England）。

48 Marx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1.1.1849 (*Collected Works* vol. 8, pp. 213-25). 參見S. Avineri,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Karl Marx* (Cambridge, 1968) p. 54.

49 引自Avineri, op. cit., p. 55. 類似的引文參見J. Kuczynski, *Geschichte der Lage der Arbeiter unter dem Kapitalismus* vol. 9 (Berlin, 1960), and C. Jandtke and D. Hilger (eds), *Die Eigentumslosen* (Munich, 1965)。

50 傅立葉主義在晚期馬克思主義勞工運動中留下痕跡，例如全心投入的傅立葉主義者尤金·波提耶（Eugène Pottier），他也是《國際歌》（*Internationale*）的歌詞作者，還有奧古斯特·倍倍爾（August Bebel），最晚在一八九〇年，他出版了一本論述傅立葉的作品，*His life and Theories*。

51 引自W. Hofmann, *Ideengeschichte des sozialen Bewegung des 19. u.20.Jahrhunderts* (Berlin, 1968), p. 90。

第三章 馬克思、恩格斯與政治

本章討論馬克思與恩格斯的政治理念與觀點，亦即，他們對國家與國家制度的看法，以及他們對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政治面向抱持的觀點，如階級鬥爭、革命、組織模式、社會主義運動的戰略與戰術等等諸如此類的主題。從分析的層面來看，這些問題就某種意義來說屬於次要問題。「法律關係與國家形式無法就本身來理解……它們植根於生活的物質條件裡」，存在於「市民社會」之中，市民社會的解剖學就是政治經濟學（Prefac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決定資本主義往社會主義過渡的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內在矛盾，比較特別的是，資本主義將不可避免產生自己的掘墓人，也就是無產階級，「一個數量不斷增加的階級，而且在資本主義生產本身的過程中獲得紀律、統一與組織」（*Capital* I, chapter XXXII）。此外，雖然國家權力是階級統治的關鍵，但資本家對工人的權威「僅僅是以象徵的形式被賦予給權威的擁有者，它象徵著為了監督勞動者而必須付出的勞動。資本家不是因為他們有能力擔任政治或神權統治者（這種方式被使用在先前的生產模式上）而擁有權威」（*Werke* 1, iii, p. 888）。因此，政治與國家不需整合在基本分析中，但可以引進到往後的階段。[1]

當然，在實踐上，政治問題對積極的革命份子來說並非次要問題，而是主要問題。馬克思的

作品因此大量討論了這類政治問題。然而，馬克思討論政治的作品在性質上與他主要的理論作品大異其趣。雖然馬克思從未完成他無所不包的針對資本主義所做的經濟分析，但分析的主要內容卻散見於各長篇手稿中，這些手稿有些預定付梓，有些則已經出版。馬克思也有系統地關注了社會哲學批判，以及所謂的資產階級社會性質的哲學分析，還有一八四〇年代的共產主義。但馬克思卻未對政治進行類似有系統的理論研討。他對政治的討論幾乎完全採取新聞報導形式，探討最近期的政治由來，參與運動內部進行的討論，以及私人信件。雖然恩格斯的作品主要也是針對當前的政治進行評論，但他曾在《反杜林論》中嘗試以比較有系統的方式處理相關主題，不過有關這方面主題的作品主要都完成於馬克思死後。

馬克思與恩格斯的政治觀點（後者不像前者那麼缺乏系統）的確切性質因此經常是模糊的，尤其是那些他們不特別重視的主題，或者應該說，他們不想討論的主題，因為「最容易使人盲目的就是這種幻覺，以為存在著一種自主的國家憲法、法律系統與一切專門領域意識形態再現的歷史」（恩格斯給梅林 *Werke* 39, p. 96ff）。恩格斯晚年曾經坦承，雖然他與馬克思都正確地強調了最重要的命題，亦即，「政治、司法與其他意識形態概念都衍生自基本的經濟事實」，但他們似乎忽略了這段衍生過程的內容的形式面。這些形式面不僅適用於分析政治、法律與其他制度如意識形態，也（恩格斯曾在闡釋歷史唯物主義概念的著名信件中指出這點）適用於分析這些上層結構元素的相對自主性。馬克思與恩格斯針對這些主題提出的觀點，就已知的部分看來，顯然存在著空白，因此，馬克思與恩格斯實際的想法是什麼，或者他們可能的想法是什麼，這些仍充滿了

不確定性。

顯然，馬克思與恩格斯對於這些空白並不感到困擾，因為他們在具體的政治實踐中，如果曾覺得這類分析有其必要，那麼他們一定會將這些空白填補起來。因此，馬克思的作品從未特別指涉法律；但恩格斯若遇到適當的時機，也會毫不遲疑地針對法律簡單地提出自己的看法（與考茨基合作，1887年）。[2]我們也不難了解，馬克思與恩格斯對於這些在我們眼中看來相當明顯的理論空白，為什麼不會感到困擾而加以填補。這是因為馬克思與恩格斯寫作的時代，與他們筆下討論的時代，不僅與我們的時代大不相同，也與馬克思主義政黨發展成群眾組織或發展成重要政治力量的時代（恩格斯晚年可能跟這個時代稍有交集）有很大的差異。事實上，馬克思與恩格斯身為積極共產黨員的實際處境，與他們的馬克思主義追隨者在後期運動中領導或在政治上積極作為的處境，兩者幾乎很少有可以比擬的地方。雖然馬克思在實際政治上曾扮演重要角色（或許比恩格斯還重要），尤其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中，他擔任《新萊茵報》（*Neue Rheinische Zeitung*）的編輯，而且參與了第一國際，但這些都不同於領導或參與一個政黨，而政黨活動是第二國際的一項重要特徵。馬克思與恩格斯頂多只能給那些領導者建議；而那些政黨領導人（如倍倍爾）儘管對馬克思與恩格斯極為推崇，卻不一定接受他們的建議。馬克思與恩格斯唯一能與日後馬克思主義組織比擬的政治經驗，就是他們曾擔任過共產主義者聯盟（1847-52）的領導人。基於這個理由，一九一七年以後的列寧主義者經常會回頭提到共產主義者聯盟。馬克思與恩格斯的特定政治思維不可避免帶有他們身處的特定歷史處境的痕跡，然而他們的思維也可以完善地加以延伸與發

展，而能面對其他不同的歷史處境。

因此，我們應該將馬克思與恩格斯的思想區別成兩個部分，一個是具有特殊性的部分，另一個是具有累積性的部分。以具累積性的部分來說，這當中存在著連貫性的分析，可以藉由持續的歷史經驗來對思想進行形塑、調整與深化。比較有名的例子是國家與革命的問題，列寧曾在系統性的分析中將這兩個問題正確地連結起來。

馬克思對國家的思索，始於他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Law*, 1843），馬克思在書中嘗試對黑格爾的國家理論做出評價。這個時期的馬克思是民主主義者，但還不是共產主義者，因此他的取徑與盧梭有著類似之處。然而，如果有學生想在馬克思與盧梭之間找出直接的連結，無疑會因以下這項事實而被潑了一盆冷水，「馬克思從未指出自己隱約〔受到盧梭影響〕」，[3] 事實上，馬克思似乎還對盧梭做了錯誤詮釋。《黑格爾法哲學批判》預示馬克思往後的某些政治觀念；其中比較著名的是（雖然此時還相當模糊），國家是一種特定的生產關係形式（「私有財產」），國家是歷史的創造物，以及當民主消弭了國家與人民的區隔之後，國家最終將與「市民社會」一起消亡。然而，《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的著名之處還在於它對正統政治理論進行批判，從而形成馬克思第一次同時也是最後一次對立憲與代議制等問題進行有系統的分析。我們注意到馬克思的結論，他不僅認為立憲形式與社會內容相比是次要的——美國與普魯士（Prussia）都同樣奠基在私有財產制的社會秩序上——而且也對代議制（如議會）政府提出批判，他批評代議制只是將民主制度當成國家的「形式」部分而加以引進，卻不承認民主制度是國

家的本質。[4]馬克思預想一個民主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參與與代議不再彼此區別——「一個勞動而非議會的組織體」。馬克思日後將這句話用於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5]，不過其形式細節，無論在一八四三年還是在一八七一年，都留下了模糊的空間。

馬克思國家理論的早期共產主義形式可以概述為四點：國家的本質是政治權力，政治權力是資產階級社會內部階級對立的正式表現；在共產主義社會，政治權力將不復存在；在現今的體系下，政治權力代表的不是社會的一般利益，而是統治階級的利益；但隨著無產階級的革命勝利，在可預期的過渡時期，政治權力將不會立即消失，而是取得「無產階級組織成統治階級」的暫時形式或「無產階級專政」（雖然馬克思是在一八四八年之後才使用這個詞）。

雖然馬克思與恩格斯往後一貫地維持這些觀念，但這些觀念卻獲得廣泛的發展，尤其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國家是階級的權力，這種概念在人們見識到法國拿破崙三世的波拿巴主義（Bonapartism）以及其他「後一八四八年政權」之後開始轉變，因為這些政權無法被簡單地描述成革命資產階級的統治（詳見後述）。其次，主要在一八七〇年以後，馬克思（恩格斯尤其如此）概述了一個更具一般性的模式，認為國家的歷史起源與發展是階級社會發展的結果，而最能充分顯示這種說法的就是《家庭的起源》（1884），這本書在偶然間開啟了日後列寧的討論。隨著社會中無可化解與難以控制的階級敵對逐漸增溫，「顯然要有權力樹立於社會之上以節制衝突，避免對立逸脫到『秩序』」範圍之外，亦即，要避免階級衝突使階級與社會陷入「毫無成果的鬥爭」。[6]顯而易見，國家代表了最強大的經濟支配階級利益，該階級控制了國家，以新的手

段統治被壓迫階級。儘管如此，我們必須指出，恩格斯不僅接受（至少是消極的）國家的一般社會功能，認為國家是防止社會瓦解的機制，他也同意權力的隱藏性元素，或者說，樹立於社會之上的國家背後隱含著遂行統治的神秘共識或表面贊同。因此，成熟的馬克思國家理論要比以下這道簡單的恆等式複雜得多：國家＝壓迫的權力＝階級統治。

馬克思與恩格斯相信國家終將消亡，過渡性質的（無產階級）國家必將出現，他們也認為社會計畫與管理（至少）必能達成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第一階段，他們的想法為政治權威的未來埋下複雜的問題，而他們的後繼者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都難以解決這些問題。由於國家本身被定義為「供統治者使用的機構」，因此國家消亡之後，管理機構便以「管理事物」為名殘存下來，因而不算是國家。[7]治理人民與管理事物，這兩者的區別或許傳承自早期的社會主義思想。聖西門對此尤其熟悉。這項區別只有在某些烏托邦或非常樂觀的假定上，才超越了語義的層次，例如，認為「管理事物」這項任務在技術上較單純且較不專門，因此非專家的市民也有能力「管理事物」——列寧的理想是讓每個廚師都能治理國家。無疑地，馬克思似乎也有這種樂觀想法。[8]儘管如此，在過渡時期，治理人民——或者用恩格斯比較精確的用語來說，「國家權力對社會關係的干預」——只會漸次消失。但實際上何時開始消失與如何消失，則仍混沌不明。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的著名段落，裡面只提到國家將「自行衰亡消失」。從實際的角度來看，這種套套邏輯的形式陳述幾乎不具任何意義：這段過程始於「國家先成為整個社會的真實代表」，也就是把生產工具轉換成社會財產，而恩格斯只說，當國家代表整個社會時，國家就不再被歸類

為國家。

馬克思與恩格斯貫注不少精神在國家的消亡上，這一點相當耐人尋味。然而，有趣的不是他們進行的預測，而是他們強烈顯現出對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的渴望與概念：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們的預測與他們向來不願對不可預測的未來進行空想的習性形成強烈對比。他們在這個問題上留給後繼者的只有困惑與不確定。

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國家理論還有更加複雜的地方，必須簡短地加以介紹。從國家不僅是統治機構，而且以「領土」為基礎的角度來看（*Origin of Family, Werke* 21, p. 165），國家也在資產階級經濟發展成「國民」（資產階級經濟發展的一個單元）的過程中發揮一定功能；至少國家在類似的大型領土單元的形式中扮演著這類角色（詳見後述）。馬克思與恩格斯並未討論這些單元的未來，但他們堅持革命後的國民單元要以某種中央集權的形式來加以維持，這點毋庸置疑。雖然如此，他們的說法先是遭到伯恩斯坦質疑，而後又受到列寧反對。[9]馬克思向來是反對聯邦主義的。

馬克思的革命觀念同樣理所當然源自於他對當時重大革命經驗所做的分析，也就是一七八九年以降的法國。[10]馬克思終其一生認為，就革命形式而言，法國可以說是階級鬥爭的「古典」例證，也是歷史經驗的重要實驗室，因為所有的革命戰略與戰術都是在法國這座實驗室裡催生的。然而，從他與恩格斯開始來往的那一刻起，法國經驗就被英國廣大無產階級運動的經驗所取代，而從那時起持續數十年，英國一直是馬克思探討這項經驗的唯一重要來源。

馬克思與恩格斯都認為法國大革命的關鍵階段是雅各賓時期。雅各賓時期與資產階級國家有著曖昧不明的關係[11]，因為資產階級國家的本質是提供自由領域給資產階級／市民社會從事無政府性質的運作，然而恐怖統治（the Terror）與拿破崙卻各自以不同的方式，企圖迫使資產階級／市民社會進入國家指導的社群／國民框架之中，一方面使他們屈從於「永續革命」（permanent revolution）——馬克思首次將這個詞運用於這個脈絡（*Holy Family*, p. 130）——另方面也使他們屈從於永續征服與戰爭。真正的資產階級社會首次出現是在熱月政變（Thermidor）之後，而資產階級終於在一八三〇年革命的「立憲議會國家」中（*Repräsentativstaat*）發現了自身的有效形式：「透過『官方』來表現自身的『排他』權力，藉由『政治』來承認自身的『特定』利益。」（同上，p. 132）

然而，隨著一八四八年的迫近，雅各賓主義的另一個面向逐漸突顯。光靠這個面向就完全摧毀了封建主義殘餘，而若非這個面向，封建主義可能再存續數十年。弔詭的是，這一切全源自於對「無產階級」革命的介入，當時的無產階級尚未成熟到足以實現自身的目標。[12]即使我們今日已不將無套褲漢運動（Sansculotte movement）視為「無產階級」，但這項論點仍然意義重大，因為它引發了人民階級在資產階級革命中居於何種角色，以及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革命處於何種關係的關鍵問題。這些問題也成為《共產黨宣言》、一八四八年作品與後一八四八年討論的重要主題。它們也將持續成為馬克思與恩格斯往後的政治思考與二十世紀馬克思主義的焦點。此外，就資產階級革命來臨提供了一種建立超越資產階級統治政權的可能性來說——有雅各賓做為前例

——雅各賓主義也蘊含著這類政權（例如中央集權主義與立法權力角色）的某些政治特性。

雅各賓主義的經驗因此有助於解決過渡時期革命狀態的難題，包括「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在隨後馬克思主義討論中引發熱烈爭論的概念。馬克思首次對「無產階級專政」——這個詞是否由布朗基首創，並不是那麼重要——做出分析是一八四八年到一八四九年失敗以後的事，當時正處於一個可能出現新型態一八四八年革命的環境。之後再次提及無產階級專政主要是巴黎公社以後的事，而且與一八九〇年代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視角息息相關。雖然無產階級專政一詞一直是馬克思分析的關鍵元素[13]，但每次討論這個詞的政治背景卻不盡相同。而這也使得隨後的辯論變得撲朔迷離。

馬克思本人似乎從未以「專政」一詞來描述特定的政府制度形式，他總是描述「內容」，而未提到團體或階級統治的形式。因此對馬克思而言，資產階級「專政」可以藉由普選來進行，但沒有普選也無所謂。[14]然而在革命局勢下，當新無產階級政權為了爭取時間而必須立即採取「必要措施以充分威嚇廣大資產階級」時，[15]其統治模式將傾向於公然的獨裁。唯一被馬克思形容為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是巴黎公社，而對於這個政權的政治特性，馬克思強調的反而是獨裁的反面（即不以獨裁遂行統治）。恩格斯引用馬克思的說法，認為「如同法國大革命所展現的」，巴黎公社是以「民主共和國」為特定的政治形式。[16]然而，由於馬克思與恩格斯並未提出一個能普遍適用的無產階級專政「形式」，也未曾預測無產階級專政在各種類型的社會裡運作的可能情況，因此我們只能從他們的觀察中推論，無產階級專政應該結合了廣大群眾政治生活的民主轉變，以及

為了防止被擊敗的統治階級捲土重來而採取的措施。我們沒有權威的文字資料供我們推測馬克思與恩格斯會對二十世紀的後革命政權抱持什麼態度，但我們幾乎可以確定他們會把鞏固革命無產階級權力與防止遭受推翻視為第一要務。無產階級大軍是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先決條件。[17]

眾所周知，巴黎公社的經驗是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國家與無產階級專政思想的重要展現。舊的國家機器無法輕易接管，必須加以去除；馬克思這裡主要指的是拿破崙三世中央集權的官僚體制與軍警組織。工人階級「必須抵禦自己的代議士與官員施加的侵害」，防止「國家與國家機關」像過去的國家一樣「從社會的僕人變成社會的主人」。[18]雖然這種變化在之後的馬克思主義討論中被詮釋成用來鞏固革命與避免「舊」國家機器起死回生的危險，但他們設想的這種危險也適用在「任何」能建立自主權威的國家機器上，包括革命本身。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體制——馬克思曾在討論巴黎公社時提到這點——成為往後激辯的主題。這種體制除非由「負責的（民選）社會公僕」構成（而非由「盤踞於社會之上的團體」構成），否則不可能讓人清楚看出內部的狀態。[19]

無論無產階級專政的確切形式為何，無產階級對於被擊敗的資產階級所進行的統治，必須經歷一段不確定且長短不一的過渡時期才能獲得鞏固，使資本主義社會能逐漸轉變為共產主義社會。馬克思顯然希望政府（或者說政府造成的社會成本）能在這段時期「萎縮消失」。[20]雖然馬克思區別了「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它在長期勞動的痛苦中從資本主義社會裡出現」，以及「共產主義社會的高級階段」，此時「人們各展所長各取所需」的原則得以通行，過去的動機以及對人類能力與生產力的限制將被拋諸腦後，[21]但這兩個階段之間並不存在明確的年代分野。

由於馬克思與恩格斯絕口不提未來共產主義社會是什麼樣貌，因此任何將他們對於這個主題提出的片段或概括的觀察拼湊成一個整體的嘗試，都必須視為是一種誤導而應予以避免。馬克思對於《哥達綱領》的內容相當不滿，但他顯然不是鉅細靡遺地針對每一點提出看法，而是只重申一般性的原則。

整個後革命時代的展望被描繪成漫長、複雜，但不必然是線型與當下無法預測的發展過程。「一七八九年之前法國資產階級的一般要求或多或少已獲得確定，而在經過必要的變更之後，這些需求也成為今日無產階級的立即要求，並且或多或少成為所有以資本主義進行生產的國家的標準。然而，十八世紀革命前的法國人完全不知道（在沒有經驗的狀況下）要以什麼方式實際滿足法國資產階級的需求。」[22]即使在革命後，馬克思對巴黎公社也做了評論：「勞動奴役的經濟條件，被自由與結社勞動的經濟條件取代，這完全是時間累進的過程」，「目前『資本與土地的自然法則的自主運作』，只會在新條件發展的漫長過程中被『自由與結社勞動的社會經濟法則的自主運作』取代」，[23]就像過去奴隸經濟被封建經濟取代一樣。革命只是觸發了這段過程。

這段有關預測未來的警語，主要是基於這項事實，那就是革命的主要創造者與領導者（也就是無產階級）本身也是個發展中的階級。馬克思與恩格斯對於這個發展所抱持的觀點，其大致輪廓顯然主要以恩格斯一八四〇年代在英國的經驗為基礎，而這種觀點完全表現在《共產黨宣言》中：從地方與派系經濟鬥爭發軔的個人造反，先是不具形式，然後逐漸透過工會加以組織，演變成「階級間的全國性鬥爭」，而這種鬥爭必將是以爭奪權力為主旨的政治鬥爭。「工人做為一個

階級而組成的組織，最終必會形成政黨。」這段分析基本上是馬克思餘生一直主張的見解，期間只有因為一八四八年後資本主義趨於穩定與擴張，以及實際參與組織勞工運動的經驗而略做修改。隨著引發工人暴動的經濟危機逐漸消褪，馬克思與恩格斯對於工人在資本主義架構下藉由工會行動或獲得有利立法而鬥爭成功的可能性變得更為樂觀，[24]不過恩格斯也在一八四五年草擬了一項論點，他認為工人薪資某種程度除了取決於慣常與既有的生活水準，也取決於市場力量。[25]因此，工人階級在前革命時期的發展需要的時間遠比馬克思與恩格斯在一八四八年前希望或預期的要來得長。

要討論這些問題，很困難但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們在解讀馬克思的著作時，必須避免受到馬克思死後一百年間的馬克思主義論戰的影響。在馬克思的時代，他與恩格斯認為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將勞工運動一般化，使其轉變成階級運動，並且明白表示勞工運動的目標就是以共產主義取代資本主義，而且最需要立即採取的步驟就是從事政治運動，建立一個與有產階級黨派劃清界線的工人階級黨派，並且致力於取得政治權力。因此，工人的當務之急既不是避免從事政治活動，也不是將「經濟運動與政治活動」分開。[26]另一方面，只要黨屬於階級政黨，那麼黨的性質是次要的。[27]這裡的黨與日後的「黨」的概念不太一樣，在馬克思與恩格斯的作品中，黨的用法也沒有一貫的意義。黨這個詞在十九世紀中葉的用法相當浮泛，可以用來指特定政治觀點或理想的支持者，也可以指有組織的正式團體成員。雖然馬克思與恩格斯在一八五〇年代經常用黨來指稱共產主義者同盟、前《新萊茵報》團體或兩者的殘存份子，但馬克思也謹慎地表示，共產主義者同

盟與過去的革命組織一樣，「只是黨派歷史的一段插曲，是在社會土壤中自然形成的」，也就是說，它是「廣泛歷史意義下的黨」。[28]從這個意義來說，恩格爾自然可以把工人黨派說成是「已經存在於絕大多數國家」（1871）的政黨。[29]從一八七〇年代開始，馬克思與恩格斯顯然開始傾向與用黨來指稱某種「有組織」的政黨形式，而非簡單的派系；在他們的追隨者或受他們影響的人士組成的黨派裡，內在組織、黨的結構與紀律等問題，自然也受到人在倫敦的馬克思與恩格斯提出適當意見的影響。當沒有這類黨派存在時，恩格斯繼續用「黨」這個詞來指稱政治體的總和，表示工人階級的獨立性，而不提他們的組織；「只要它是一個獨立的工人黨派，什麼形式都不重要」。[30]對於黨的結構、組織或社會學等後世理論家關注的問題，他們興趣缺缺，只是偶爾提及。

相反地，「派系的『成規』必須避免……工人階級的一般目標與傾向源自於工人階級身處的一般條件。因此，儘管工人階級腦子裡思索的運動形式各異、或多或少出於想像，或多或少與這些條件連繫，但整體而言這些目標與傾向均存在於整個階級當中。最能了解在我們眼前開展的階級鬥爭的隱含意義是共產黨，他們絕不可能犯下支持或加強派系主義的錯誤」（1870）。[31]黨的目標是成為有組織的階級，而馬克思與恩格斯也從未悖離《共產黨宣言》的精神，那就是共產黨絕對不會背叛其他工人階級黨派，獨立成為一個政黨，或者是建立屬於自己的派系原則來形塑無產階級運動。

馬克思晚年的政治論戰全是為了替三重概念進行辯護：（一）無產階級的「政治」階級運

動；（二）革命不是一口氣移轉權力，然後就能建立某種派系的烏托邦，相反地，革命是一個關鍵時刻，它開啟的是一段複雜而無法輕易預測的過渡時期；（三）必須維持政治權威體制，一個「革命的與短暫的國家形式」。[32]馬克思極力反對無政府主義者，因為後者全盤否定他這三個概念。

因此，在馬克思的作品中尋找後世爭論的內容（如改革派與革命派之間的論戰）完全是徒勞，以馬克思主義運動內部的左右派之爭來解讀馬克思的作品也毫無意義。以這種方式來詮釋馬克思，結果只是反映了馬克思主義本身的歷史，而且是馬克思主義後期的歷史。馬克思關注的不是勞工黨派是改革派還是革命派，他也不在乎這些詞的意義。馬克思不認為工人每天在資本主義下進行鬥爭以改善他們的條件，與培養政治意識促使社會主義社會取代資本主義社會，以及為了達成這個目的所進行的政治行動之間，在原則上存在著任何衝突。對他而言，真正的重點是如何克服各種妨礙無產階級黨派發展的幼稚病，這些不成熟的弊病包括：讓各黨派接受各種民主激進主義（以及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影響，或者把這些黨派視為各種烏托邦或實現社會主義的妙方，更重要的是，使這些黨派遠離經濟與政治鬥爭的必然連結。企圖分辨馬克思在國際或任何勞工運動中屬於「右派」或「左派」、「溫和派」或「激進派」，完全是一種時代倒錯。因此討論馬克思在什麼時候不再是一名革命者與成為一名漸進主義者，完全是離題而愚蠢。

實際的權力轉移乃至於隨後的社會轉變會採取什麼形式，取決於無產階級及其運動發展的程度，它反映了資本主義發展以及資本主義本身藉由實踐而學習與成熟的過程達到何種階段。當然，這也受到當時的社會經濟與政治的處境影響。馬克思並未明白表示必須等到無產階級成為

多數，以及階級極化已到了更高階段，因此他顯然認為在革命之後，階級鬥爭仍應該持續，只不過應該採取「最理性而人道的方式」。[33]在革命之前以及在革命後的一段不確定時期裡，無產階級應該從事政治活動並且擔任階級聯盟的核心與領導者，無產階級的優勢在於（基於它的歷史地位），即使身為少數，無產階級仍是「唯一具有社會主動性的階級」。我們可以這麼說，馬克思從實際的分析中認定唯一的「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是巴黎公社）必定可以藉由「社會所有階級組成」的人民陣線，在工人的領導與霸權下，「不以剝削其他人勞動為生」之下順利獲得成功。[34]然而，這些是具體評估的問題。這些說法只是確認了馬克思與恩格斯並不仰賴歷史力量的自主運作，而是仰賴歷史限制下的政治行動。馬克思與恩格斯在他們人生的各個階段，在分析局勢時心裡總是抱持著行動的概念。因此，我們應該考察馬克思與恩格斯對變動中的局勢做了什麼樣的評估。

我們可以把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分析分成三個發展階段：從一八四〇年代中期到一八五〇年代中期；接下來的二十五年，工人階級的持久勝利似乎已不再是急迫的議程；恩格斯的晚年，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中無產階級群眾黨派的興起，為過渡時期開啟了全新的視角。此外，針對早期分析進行的調整依然有效。我們往後會專門針對馬克思與恩格斯策略的國際面向進行分析。

「一八四八年」視角基於兩項假定，第一項假定（後來證明是正確的）認為舊政權的危機將導致廣泛的社會革命，第二項假定（後來證明是錯誤的）認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將導致無產階級的勝利，正如一八四八年革命的結果。這個時期真正的工人階級（姑且不論它的定義）在人口

中仍屬少數，英國是唯一的例外，然而讓恩格斯意外的是，英國並未發生革命。不僅如此，工人階級尚未成熟而且缺乏組織。因此，無產階級革命的未來仰賴兩種可能。首先，如果（如馬克思所預見的，某方面來說預示了列寧的出現）日耳曼資產階級沒有能力而且不願意自行發動革命，那麼由共產主義知識分子領導的萌芽中的無產階級將會奪取資產階級的領導地位；[35]其次，（法國）由雅各賓派發動的資產階級革命的激進化可以持續下去。

第一種可能顯然脫離現實。第二種可能在一八四八年革命失敗後似乎仍有希望。無產階級在這場由階級聯盟（從左傾人士到自由派資產階級）發起的革命中扮演次要但重要的角色。在這場革命中，隨時都有激進化的可能，例如溫和派認為革命發展至此已然足夠，但激進派則希望擴大革命，他們提出各種「（至少一部分）符合廣大人民利益」的要求。[36]在法國大革命中，激進化只幫助鞏固了溫和資產階級的勝利成果。然而，資本主義時代（如一八四八年到一八四九年的巴黎）階級對立的潛在極化，一邊是如今已團結起來的反動資產階級統治團體，另一邊則是由無產階級領導的非資產階級人民陣線，此時資產階級的失敗可能會讓「不斷從失敗中站起的無產階級成為決定性的要素」。這種回顧法國大革命的歷史論述因路易．拿破崙的成功而失去意義。[37]顯然馬克思過度強調革命政治發展中的某個特定動力，但歐陸的工人階級（包括巴黎人）在資本主義經濟中的發展卻仍不夠充分。

因此，無產階級的主要任務是讓下一場革命激進化，一旦自由派資產階級投向「秩序黨」*的陣營，那麼立場激進的「民主政黨」將可在革命中成為勝利者。這種「維持革命永續」的想

法，成為一八五〇年共產主義者同盟的重要標語[38]，也成為短命的馬克思派與布朗基派聯盟的基礎。社會的階層化是無產階級主要的壓力來源，因此成為無產階級對抗的對象。儘管無產階級試圖取代小資產階級民主人士成為革命聯盟的領導者，但無產階級畢竟屬於少數，因此必須拉攏盟友才有成功的可能。順帶一提，在一八四八年革命期間，馬克思與恩格斯跟絕大多數左翼份子一樣，低估了鄉間革命派乃至於激進派的潛力，他們向來對這些人興趣缺缺。直到革命失敗之後，或許是在恩格斯的主張下（他在一八五〇年寫的《農民戰爭》〔*Peasant War*〕已經顯示他對這個主題極感興趣），馬克思開始預見到，至少在日耳曼地區，「再版的農民戰爭」可以支持無產階級革命（1856）。他所設想的革命發展是複雜的，或許還是漫長的。甚至難以預測何時能產生「無產階級專政」。然而，馬克思的基本模式卻是由最初的自由派階段，或多或少迅速地經由激進民主的過程過渡到無產階級領導的階段。

一八五七年的世界資本主義危機未能在任何國家引發革命，但馬克思與恩格斯仍舊希望（事實上是預期）出現新的修正版一八四八年革命。之後，二十年過去了，馬克思與恩格斯開始覺得近期內已無成功產生無產階級革命的可能，不過恩格斯比馬克思稍微樂觀一點，他還保持著年輕人的開朗心態。當然，他們對巴黎公社並未抱持太大期許，在它短暫存活的期間，他們也避免發表任何樂觀的陳述。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經濟在世界的快速發展，尤其是西歐與美國的工業化，

---

* 譯注：即法國第二共和時期的保王黨與保守黨。

在各個國家製造出數量龐大的無產階級。成長中的力量、階級意識與勞工運動組織成為馬克思與恩格斯希望的來源。但我們不能因此認定他們的政治視角出現根本性的變化。我們已經看到，真正的革命（就權力轉移乃至於需要運用暴力的意義來說）可能在漫長的工人階級發展過程的任何階段發生，而革命可能開啟漫長的後革命過渡過程。權力移轉的發生延後到工人階級與資本主義發展的後期階段，無疑將影響隨後過渡時期的性質，然而，雖然延後可能讓急欲行動的革命份子感到沮喪，但它幾乎不會改變預測過程的本質。儘管如此，馬克思與恩格斯這個時期的政治策略雖然想為任何可能的結果訂定計畫，但他們已不認為無產階級成功奪權可能發生或近在眼前。

群眾社會主義政黨在一些經濟發展國家大有進展，尤其在一八九〇年後，首次為直接掌權的無產階級政府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創造可能。這段發展發生在馬克思死後，因此我們不知道他做何感想，不過從一些跡象顯示，他的反應很可能不像恩格斯那樣僵化與「正統」。[39]然而馬克思去世之後，許多人急欲將馬克思與德國無產階級組成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相連結，因此這只能做為空想的題材。有證據顯示，倍倍爾曾說服恩格斯相信，現在已有可能進行直接的權力過渡，先前主張在未曾發生資產階級革命的國家，必須先有「中介的激進資產階級階段」[40]的說法，如今已可略過不提。無論如何，此後工人階級已不再是少數人（走運的話還能居於廣大革命聯盟的頂端），而且逐漸成長為擁有廣大階層的多數，除了組織成群眾政黨外，也能召集其他階層以工人階級政黨為核心建立聯盟。在新局勢與英國（依然相當獨特）的情況間存在著差異，英國的無產階級在最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中形成多數，而且取得「一定程度的成熟與普遍性」，但是——馬

克思幾乎未曾對此進行探討——卻未能發展出相應的政治階級運動。[41]在群眾社會主義政黨可能實現「多數人革命」的情況下，恩格斯寫下了最後的作品。不過就某種程度來說，這部作品是對當時（德國）特有的局勢所做的回應。

現在，恩格斯必須試著適應新歷史局勢的三種特徵。在德國，史無前例的新型態群眾社會主義工人階級黨派，以及逐漸成為普遍、單一與全國性的「社會民主」黨派，在左翼已無競爭對手。這些黨派之所以能夠發展，而且在一八九〇年後成為普遍現象，主要歸功於合法性、立憲政治與投票權的擴大。相反地，傳統觀念的革命前景此時也出現很大的變化（國際變化之後再作詳論）。第二國際時期社會主義者的辯論與爭議反映的問題與這些變化有關。恩格斯只參與了早期階段的討論，在他死後，論戰也開始白熱化。事實上，恩格斯可能從未真的理解新局勢的意義。儘管如此，他的意見卻清楚連繫著這些意義，協助形塑了這些意義，而且因為無法將這些意義與分歧的潮流串連起來而引發熱烈的辯論。

其中特別引起爭議的是恩格斯堅稱普選制隱含著新的可能，而且他放棄了昔日的起義觀點——這兩種觀點都清楚出現在他最後的作品，也就是他於一八九五年為馬克思《法蘭西階級鬥爭》（*Class Struggles in France*）新寫的序文中。這兩種觀點的結合是引爆爭議的關鍵：恩格斯認為德國資產階級與政府「對工人黨派合法行動的恐懼更甚於非法行動，對選舉成功的恐懼更甚於暴動」。[42]然而事實上，儘管恩格斯最後的作品模稜兩可，但我們顯然不能將他的作品解讀成贊同或暗示日後德國與其他社會民主人士的守法與選舉幻覺。

恩格斯放棄昔日的起義希望，不只是基於技術上的理由，也因為階級對立的現象變得更明顯。階級對立雖然使群眾政黨得以形成，卻也使起義更難發起，因為各階層的人口已不像過去那樣同聲一氣。因此，反動現在反而能得到更多中產階級的支持：「『人民』將因此分裂，過去一八四八年極具影響力的強大槓桿因而消失。」[43]然而，恩格斯不願——即使在德國——放棄武裝對峙的念頭，而且以他慣有的過度樂觀預言德國將在一八九八年到一九〇四年間發生革命。[44]事實上，恩格斯在一八九五年提出的觀點並無新意，以當時情勢來說，像社會民主黨這樣的黨派利用自身的合法地位反而能獲得最大的利益。就算出現暴力與武裝對峙，那麼也不太可能由起義份子發起，而是來自於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人士。這與一八七〇年代馬克思提出的觀點一脈相承，[45]他曾提到一些未對社會主義全國政府選舉設下立憲障礙的國家。馬克思認為當時的革命鬥爭（如法國大革命與美國南北戰爭）是「具有正當性」的政府與反革命「叛徒」之間的戰鬥。我們沒有理由認為恩格斯反對馬克思當時提出的觀點，也就是「偉大運動的誕生必須流血」。[46]恩格斯顯然不認為自己已放棄革命，他只是針對不同的局勢調整革命戰略與戰術，就像他與馬克思這輩子做的一樣。群眾社會民主黨派的成長並未導致某種形式的對立，反而使運動整合到既有的體制中，這種情況使恩格斯分析不再為人所信。如果他遭受批評，那是因為他低估了這種可能性。

另一方面，恩格斯敏銳地發現機會主義的危險——「為了現在而犧牲運動的未來」[47]——而且盡其所能地保護黨派使其免於誘惑，他回顧並且努力將主要學說與經驗體系化（這些體系後來被稱為「馬克思主義」），強調「社會主義科學」的必要性，[48]堅持社會主義的進展必須以無產階

級為核心基礎，[49]尤其他還設下限制，如果逾越，那麼為了獲得選舉支持而締結的政治聯盟、妥協與政綱的讓步都是不允許的。[50]然而事實上——未能如恩格斯所願——這只讓（尤其在德國政黨身上）理論教條與實際政治操作之間的裂痕擴大。我們現在可以看到，恩格斯晚年的悲劇在於，他對運動的具體處境做的明晰、實際與饒富洞察力的評論，非但未能影響運動的實踐，反而使一般理論與運動漸行漸遠。他的預言不幸言中：「這一切的結果會是什麼，黨到了抉擇的時刻大概只會突然不知所措，許多需要決定的事仍不清楚也不確定，因為這些事從未好好討論過？」[51]

無論工人階級運動的前景如何，在一八四八年的失敗之後，資產階級政治突如其來的轉變使奪權的政治條件變得更加複雜。在曾經歷資產階級「理想」政權革命的國家裡，立憲議會國家要不是無法實現，就是（如法國）為了建立新波拿巴主義而遭到揚棄。簡言之，資產階級革命在一八四八年失敗，意外形成了一些政權，這些政權的性質或許比資產階級國家的問題更令馬克思感興趣：這些政權顯然為資產階級服務，但資產階級卻不是以階級的身分直接代表政權。[52]這就引發了廣泛的問題——這些問題至今仍受到重視——統治階級與中央集權體制的關係是什麼，中央集權體制最早是由絕對君主制發展起來，資產階級革命予以加強，使「國內的資產階級團結起來」，而這也成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但這個體制也一直保留著不受一切階級（包括資產階級）干擾的自主性。[53]（因此才出現了這樣一個論點，那就是勝利的無產階級不能只是接管國家機器，而是必須搗毀國家機器。）這種階級與國家、經濟與「政治菁英」合一的觀點明顯預示了二十世紀的發展。因此馬克思嘗試為法國波拿巴主義提供特定的社會基礎，就這個例子來說就是

後革命的小資產階級農民，亦即，一個「無法以自己的名字主張自己的階級利益的階級……他們無法代表自己，所以就被別人所代表。他們的代表必須同時擔任他們的主子，他們的權威，擔任毫無權力限制的政府，保護他們免受其他階級的侵犯，並且為他們帶來雨水與陽光」。[54]這也預示了往後煽動式民粹主義、法西斯主義等等形式的出現。

這種統治形式為什麼成為主流，馬克思與恩格斯並未做出清楚分析。馬克思認為，資產階級民主政府已耗盡了可能，而波拿巴主義體系——抵禦無產階級的最後堡壘，因此也是無產階級革命前最後的統治形式[55]——顯然是一場錯誤。恩格斯最後以更一般的形式來說明這種波拿巴主義或絕對主義政權的「階級平衡」理論（主要見於他的《家庭的起源》），他的論點是以馬克思從法國經驗歸結出來的想法為基礎。從《霧月十八日》（*18th Brumaire*）精密分析了一八四九年到一八五一年「秩序黨」的恐懼與內部分裂「在對抗社會其他階級的鬥爭中摧毀了自身政權、議會政權的一切條件」，到簡單陳述政權立基於「兩個敵對的社會階級陷入了疲乏與無能」。[56]另一方面，恩格斯——他在理論上通常比較溫和，也比較帶有經驗性——認為波拿巴主義被資產階級接受是因為它不在意（或者說是「沒有能力」）直接統治這件事。[57]對於嘲笑波拿巴主義是「資產階級的宗教」的俾斯麥，恩格斯認為這個階級可以（像在英國一樣）讓貴族寡頭依照自己的利益來領導政府，或者在無法做到寡頭的情況下以「波拿巴主義半獨裁制」充當「正常的」政府形式。這個耐人尋味的暗示直到日後才獲得進一步的發揮，特別是談到資產階級與貴族共存的現象時，[58]不過這個說法本質上來說是一個相當偶然的觀察。在此同時，一八七〇年後，馬克思與恩

格斯主張（或者說是重新回到）應強調典型資產階級政權立憲議會性格。

但是，資產階級革命的舊視角將會如何？在一八四八年革命輕易遭到擊敗與舊政權重新建立的國家中，這些舊視角是否會因為「不斷革命」而走向激進或遭到超越？就某個意義來說，革命的爆發，本身就意謂著革命產生的問題「必定」已獲得解決：「與空想的革命任務不同，真實〔亦即歷史〕的革命任務總是在革命中獲得解決」。[59]以一八四八年革命來說，這些任務是被「革命的遺囑執行者路易．拿破崙、加富爾與俾斯麥」所解決。雖然馬克思與恩格斯了解這一點，甚至歡迎此事的發生（儘管五味雜陳），但他們卻無法充分體認俾斯麥統一德國的這項「歷史進步」的成就。因此，反動力量採取的「歷史進步」步驟，可能與碰巧與其為敵的左翼政治同盟的支持相衝突。事實上，這種現象就發生在普法戰爭期間，當時李卜克內西與倍倍爾基於反俾斯麥的立場（支持者主要是前一八四八年左翼份子）而反對這場戰爭，反觀馬克思與恩格斯則私底下傾向於支持這場戰爭。[60]支持「歷史進步的成就」卻不管由誰來實現這項成就，除非是「事後」肯定，否則這種做法隱含著危險。（馬克思對拿破崙三世的厭惡與輕視，使他免於在義大利統一上陷入類似的兩難。）

然而，值得認真思考的是，我們該如何評價高層（例如俾斯麥）對資產階級所做的讓步，這些讓步有時甚至被形容成「由上而下的革命」。[61]恩格斯（馬克思對於這個主題少有著墨）雖然認為這些讓步屬於歷史必然，但他卻很晚才同意這些做法並不是暫時的措施。就算俾斯麥沒有被迫採取往資產階級靠攏的解決方案，德國資產階級「也會再次被迫擔負起它的政治責任，也就是

反對當前的體制，因此到最後一定會再度出現進展」。[62]從歷史來看，恩格斯是對的，因為在往後七十五年間，俾斯麥的妥協與容克（Junker）權力的確遭到掃除，只是過程跟他想的不一樣。然而就短期而言——以及就他們的一般國家理論來說——馬克思與恩格斯不完全同意一八四九年到一八七一年的妥協方案（對絕大多數歐洲資產階級來說）實質上等同於另一場一八四八年革命，更甭說是它的小型替代品。這些方案並未要求更多的權力或建立更完整與明確的資產階級國家——恩格斯自己如此暗示。

在這些條件下，人們仍持續為「資產階級民主」而奮鬥，但少了先前資產階級革命的內容。雖然這場鬥爭（主導權逐漸落入工人階級之手）取得了權利，並且大大有助於群眾工人階級黨派的動員與組織，但沒有確實的證據顯示恩格斯晚年曾認為民主共和國，也就是「資產階級統治的邏輯形式」，將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衝突趨於極化乃至於爆發鬥爭的形式。[63]民主共和國裡的階級鬥爭性格與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關係（或與其類型相同的事物）仍然曖昧不明。簡言之，我們必須坦承，在已開發與穩定的資本主義中，政治結構的問題與資產階級國家的功能並未在馬克思與恩格斯的作品——這些作品主要以一八四九年後已開發國家的歷史經驗為基礎——獲得有系統的探討。但這無損於他們見解與看法的傑出，而且從許多方面來看，他們的觀點均極為深刻。

然而，探討馬克思與恩格斯的政治分析卻不考慮他們的國際面向，就如同演出《奧賽羅》（*Othello*）卻假裝這齣戲的場景不是發生在威尼斯一樣。革命對馬克思與恩格斯來說本質上就是

一個國際現象，而非只是幾個國家轉變的總和。他們的策略本質上也是國際的。當馬克思在第一國際就職演說中呼籲工人階級窺破國際政治謎團並且積極地參與其中時，他完全是認真的。

國際政策與策略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為列國體系的存在（這一點影響了革命的存續），更因為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必然影響各獨立社會政治單元的形成（馬克思在提到這一點時，幾乎是把「社會」與「國家」當成可互換的詞彙）。[64]資本主義創造的世界，雖然逐漸融合為一體，但基本上是「由世界各國彼此依存構成的」（《共產黨宣言》）。此外，革命的命運取決於國際關係體系，因為歷史、地理、力量與發展不一使每個國家的革命都要仰賴他國的鼻息，或爭取他國的共鳴。

馬克思與恩格斯對於資本主義在幾個獨立（「國家」）單元發展的看法，不能與他們對當時所謂的「民族原則」與今日的「民族主義」的看法混為一談。雖然馬克思與恩格斯起初緊密連繫著具有濃厚民族主義的共和派民主左派，因為這是一八四八年之前與期間無論是一國之內還是國際之間唯一有力的左派，但他們不認為民族主義與民族自決是目的本身，正如他們不認為民主共和國是目的本身一樣。[65]許多馬克思與恩格斯的追隨者因為不夠留意而在無產階級社會主義者與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民主人士之間畫了一道界線。眾所周知，恩格斯從未喪失他在年輕時抱持的日耳曼民族主義以及相應的民族偏見，特別是對斯拉夫人。[66]（馬克思比較少受這種情緒影響。）雖然恩格斯相信德國統一帶有進步性格，或者在戰爭中支持德國贏得勝利，但他這麼做並不是基於日耳曼民族主義，儘管他確實因身為德國人而感到高興。馬克思與恩格斯大半生都認為

法國是革命的決定性力量，而非他們的祖國。俄國向來是他們攻擊與輕視的對象，然而當俄國可能發生革命時，他們對俄國的態度便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因此，馬克思與恩格斯遭到批評的地方不在於他們在政治或理論上的不連貫，而是他們低估了民族主義在他們那個世紀的政治力量，也未能適當地分析這種現象。他們並不特別看重國家，也並不特別看重任何民族的自決。恩格斯以他慣有的現實主義表示：「歐洲沒有一個國家不是由不同的民族處於相同的政府之下……而且很可能將一直維持這樣的狀態。」[67]馬克思與恩格斯認識到資本主義社會是藉由將地方與地區利益歸併到更大單元的利益之下而獲得發展——或許從《共產黨宣言》開始，他們就預期資本主義社會最終將形成一個單一的世界社會。他們從既有的歷史視角認識到歷史過程與歷史進步是透過「民族」的形成而達成，而基於這一點，他們反對聯邦主義者提案「取代偉大民族的統一，民族的統一如果最初是藉由武力達成的，那麼時至今日它已成為社會生產的一個強有力的要素」。[68]起初，馬克思與恩格斯承認而且贊同先進布爾喬亞民族基於類似理由征服亞洲與拉丁美洲這些落後地區。他們因此也接受許多比較小的民族沒有理由獨立存在，有些甚至無法繼續成為一個民族；他們顯然完全沒注意到當時一些顯而易見的相反過程，例如捷克人。恩格斯向伯恩斯坦解釋說，[69]個人情感是次要的，雖然它們有時會與政治判斷（如恩格斯對捷克人的評論）一致，但它們會留下不適切的空間給民族偏見與（往後將會出現）列寧所說的「偉大的民族沙文主義」。

另一方面，身為革命者，馬克思與恩格斯支持的是那些客觀上有利於革命的民族（無論大

小），而反對那些客觀上站在反動面的民族。他們原則上對國家政策也是抱持相同的態度。因此，他們留給後繼者的主要遺產是個堅定的原則：民族與民族解放運動本身不是目的，它們只是世界革命的過程、利益與策略的一個環節。在其他方面，馬克思與恩格斯留下了一連串問題，更甭提還有一些否定的看法，社會主義者試圖以解釋的方式來扭轉這些否定見解，並且企圖為馬克思與恩格斯批評為非歷史、落後與注定失敗的民族建立運動。除了基本原則，往後的馬克思主義者很少能從馬克思與恩格斯的作品中找到任何可以建構「民族問題」理論的內容。之所以如此，不只是因為帝國主義時代的歷史環境有了很大的變化，也因為馬克思與恩格斯對民族現象的分析一直失之片面。

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國際革命策略分成三個主要階段：一八四八年之前與一八四八年到一八七一年，從一八七一年到恩格斯去世。

未來無產階級革命的決定性舞台，就位在資產階級革命與先進資本主義發展的地區，也就是法國、英國、日耳曼以及人們可以想見的美國。馬克思與恩格斯對於比較小的以及在政治不那麼具決定性的「先進」國家不感興趣，只是附帶提及，直到這些國家開始發展出社會主義運動，他們才開始對這些國家的事務發表評論。在一八四〇年代，人們合理預期這個地區將發生革命，而實際上也確實發生了，不過正如馬克思的認識，[70]英國注定不會參與這場革命。然而另一方面，當時除了英國，並不存在真正的無產階級或無產階級運動。

一八四八年後的世代，快速工業化不僅產生不斷增長的工人階級與無產階級運動，也使「先

進」地區的社會革命前景日漸黯淡。資本主義是穩定的。在這段時期，馬克思與恩格斯只能希望國內政治緊張與國際衝突的結合也許能產生有利革命發生的局勢，就像一八七〇年到一八七一年的法國一樣。然而，在這個時期的末尾，再次出現全球性的資本主義危機，局勢因而丕變。首先，群眾工人階級絕大多數在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下，改變了「先進」國家國內發展的前景。其次，社會革命的新元素在已開發資本主義社會的邊緣出現，如愛爾蘭與俄國。馬克思首次注意到這兩個國家是在一八六〇年代晚期。（首次明確提到俄國可能發生革命是在一八七〇年。）[71]愛爾蘭在菲尼安主義（Fenianism）崩潰之後，就不在馬克思的計算中扮演主要角色，[72]反觀俄國卻日漸重要：俄國的革命是「西方工人革命的信號燈，使東西方能遙相呼應」（1882）。[73]俄國革命的主要意義當然在於它對已開發國家局勢造成的轉變上。

革命視角的變化使馬克思與恩格斯對戰爭的態度出現重大轉折。他們原則上不是和平主義者，一如他們原則上不是共和派民主人士或民族主義者一樣。他們知道戰爭是克勞塞維茨所說的「遂行政治的其他手段」，因此他們一直不認為光憑經濟因素就能引發戰爭，從他們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出這點。[74]簡言之，在前兩個階段，馬克思與恩格斯預期戰爭能直接有助於他們實現理想，而在他們的估算中，希望戰爭扮演著主要、有時是決定性的角色。從一八七〇年代晚期開始——轉捩點出現在一八七九年到一八八〇年[75]——他們認為一般性的戰爭在短期內會成為推動運動的阻礙。此外，恩格斯晚年逐漸深信他預言的可能擴延全球的新戰爭具有恐怖的性格。他預測「只有一個確定的結果：聞所未聞的大規模屠殺，歐洲遭到史無前例的破壞，最後整個世界體系

崩潰」（1886）。[76]他預期這類戰爭會因為無產階級政黨的勝利而結束，但由於戰爭並非贏取革命的必要之物，因此他自然希望「能避免一切可能的屠殺」（1885）。[77]

有兩個理由可以說明為什麼戰爭一開始是革命策略完整而必要的部分，包括馬克思與恩格斯也這麼想。首先，推翻俄國是必要的，俄國是歐洲反動勢力的主要堡壘，是想維持現狀的保守派的保護者與復辟者。這個階段的俄國並無從內部顛覆的可能，唯有西緣的波蘭有機可乘，因此這裡的革命運動一直是馬克思恩格斯國際戰略的重點。除非革命演變成一場解放俄國的歐戰，否則革命無法成功，而後再藉由東歐諸帝國的解體來擴大革命的範圍。一八五一年，恩格斯寫道，一八四八年革命曾擴展到了華沙（Warsaw）、德布勒岑（Debreczen）與布加勒斯特（Bucharest）；下一場革命勢必要延伸到聖彼得堡與君士坦丁堡。[78]戰爭必定會波及英國，它一直是俄國在東方的競爭對手，並且阻礙俄國對歐洲的宰制。戰爭將會大大地削弱穩定的資本主義英國對世界市場的支配，甚至可能讓憲章運動者掌握權力。[79]俄國的失敗是讓一切獲得進展的核心國際條件。馬克思一直想著有朝一日能與英國外交大臣帕莫斯頓一決雌雄，但英國不願破壞歐洲的權力平衡而拒絕開戰，使他難掩沮喪。因為在無法產生革命之下（或即使產生一場革命），如果沒有英國的介入，對抗俄國的大規模歐戰不可能發生。相反地，當俄國革命可能發生時，戰爭就不再是先進國家發生革命不可或缺的條件，雖然恩格斯終其一生未能看見俄國發生革命，但晚年的他再度認為俄國是反動勢力的最後堡壘。

其次，戰爭是統一與激進化歐洲革命的唯一方式——一七九〇年代法國革命戰爭提供了先

例。一個革命的法國，也就是在內外傳統上回歸雅各賓主義的法國，是對抗沙皇主義名正言順的軍事聯盟領袖，因為法國不僅率先發起了歐洲革命，而且擁有數量最多的革命軍隊。這個希望也在一八四八年落空，雖然法國一直在馬克思與恩格斯心中占有關鍵地位，但他們兩人始終低估了第二帝國的穩定與成就，而且還預期它即將傾覆——從一八六〇年代之後，法國就不再扮演過去所承擔的歐洲革命的核心角色。

然而，如果戰爭在一八四八年被視為歐洲革命的邏輯結果與延伸，同時也是歐洲革命成功的條件，那麼在往後二十年間，戰爭也被視為能攪亂現狀的重要希望，可以造成國家內部的緊張。但藉由經濟危機而引發戰爭的期望，在一八五七年徹底破滅。[80]從此以後，馬克思或恩格斯再也沒有認真想過短期內能出現經濟危機，即使在一八九一年也是如此。[81]他們的估計是對的：這個時期的戰爭具有預期的效果，只不過不是馬克思與恩格斯想像的那樣，因為除了法國，這些戰爭並未在歐洲國家導致任何革命，而法國的國際角色，如我們所見，也已經改變。因此，如我們先前提過的，馬克思與恩格斯逐漸被迫要在既有強權的國際政策上選邊站，要不是資產階級，就是反動派。

當然，只要馬克思與恩格斯無法影響拿破崙三世、俾斯麥或其他政治人物的政策，而社會主義與勞工運動的訴求又不被政府採納，那麼這些想法都只能算是紙上談兵。此外，雖然「歷史進步」政策相當清楚——俄國受到反對；在美國南北戰爭中，北方得到支持擊敗南方——但歐洲局勢的複雜留下許多想像與辯論的空間。我們無法明確看出馬克思與恩格斯對一八五九年義大利戰

爭的態度是否比拉薩爾來得正確，[82]但就實踐來看兩者在當時都無足輕重。當群眾社會主義黨派覺得自己必須支持某個資產階級國家對抗另一個資產階級國家時，這種辯論的政治意涵便更形嚴肅。恩格斯晚年（乃至於馬克思晚年）逐漸放棄國際戰爭可以促成革命的想法，因為他們發現戰爭只會讓「各國沙文主義重新抬頭」[83]，統治階級將獲得鞏固而正在成長中的無產階級運動將遭到削弱。

一八四八年後的革命前景之所以黯淡，主要原因在於這個時期的英國成為資本主義穩定的堡壘，而俄國則成為反動勢力的屏障。「俄國與英國實際上是歐洲體系的兩大基石。」[84]長期而言，英國只有在對世界經濟的壟斷無以為繼時才有可能產生無產階級運動，而這種現象出現在一八八〇年代，恩格斯在幾篇文章中對此做了分析並表示歡迎。即使到了一八九〇年代，當俄國革命的前景開始削弱體系的其中一塊基石，而英國對世界的壟斷結束又削弱另一塊基石時，恩格斯對於英國無產階級運動仍抱持相當謹慎的看法。[85]短期而言，馬克思希望「加快英國社會革命的腳步」，他認為這是第一國際最重要的任務——這種想法並非不切實際，因為「英國是唯一（工人階級）革命的物質條件已達到一定成熟度的國家」[86]——而且可以經由愛爾蘭來完成。愛爾蘭使英國工人沿著種族界線分裂，使英國工人基於共同利害而剝削其他種族，並且為英國土地寡頭政治提供經濟基礎，而寡頭政治的推翻是英國獲得進展的第一步。[87]農業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可以成為引發先進帝國內部革命的關鍵元素，這項發現預示了列寧時代的馬克思主義發展。而馬克思理所當然地聯想到其他的新發現，也就是農業俄國的革命潛力。[88]

在馬克思（或精確地說是恩格斯的）最後階段的策略中，國際局勢因為全球資本主義的長期蕭條、英國世界壟斷的衰退、德國與美國持續的工業進展以及俄國發生革命的可能性大增而有了根本的差異。此外，恩格斯以其先知般的敏銳與軍事知識觀察到，從一八一五年以來，這是第一次他感受到世界大戰正在逼近。儘管如此，如我們所見，國際的權力政策現在在馬克思與恩格斯的盤算中扮演著較不重要也較為負面的角色。他們認為國際權力鬥爭對於成長中的社會主義黨派，與其說是助力，不如說是一種障礙。

就某個意義來說，恩格斯對國際政治的興趣逐漸集中在勞工運動上。而在他晚年的時候，勞工運動又再度以國際工人協會的形式組織起來。因為每一場運動可以鞏固、推動其他運動，但也可能牽制其他運動。這個觀點可以很清楚地從他的作品看出，不過我們不該過度解讀恩格斯對一八九〇年代與一八四八年前局勢所做的比較。[89]此外，人們很自然會認為社會主義的命運決定在歐洲（在美國沒有強大運動的情況下）以及歐陸主要強權（現在包括俄國）的運動上（在英國沒有強大運動的情況下）。無論運動有多受歡迎，恩格斯並不重視斯堪地納維亞與低地國的運動，尤其對巴爾幹半島的運動隻字不提，而且傾向於把殖民國家的任何運動視為無關宏旨的餘興節目或都市發展的結果。除了堅定重申「勝利的無產階級不可能強加任何種類的『幸福』在任何外族身上而能獲得自身的勝利」（同上，p. 358）這項原則外，恩格斯幾乎未曾嚴肅思考殖民解放的問題。[90]事實上，恩格斯對這些問題的輕視實在令人驚訝，他才剛去世不久，這些問題就被提交到國際左派面前，引發了帝國主義的大辯論。一八八二年，恩格斯對伯恩斯坦說：「我們必須致

力於解放西歐無產階級，其他的目標都應該排在這件事情之後。」[91]

與一八四八年之前不同的是，在無產階級進展的核心地區，國際運動現在成了國家黨派的一環，而且必須如此。[92]這引發了如何協調運作與如何處理個別運動中特定國家主張與假定的衝突問題。有些問題可以技巧性地以適當做法將其無限延後到未來再討論，例如最終民族自決的問題，[93]但俄國與奧匈帝國的社會主義者要比恩格斯更清楚有些問題無法用拖延的方式來處理。恩格斯死後不到一年，考茨基就坦承馬克思對於波蘭人、東方問題以及捷克人抱持的「老立場」行不通。[94]此外，各種運動在力量與戰略重要性上的不均等也引起微小但難以處理的困難。因此，法國人傳統上認為他們扛起了「擔任世界解放者的使命，因此他們有權利擔任國際運動的領頭羊」。[95]但法國已不再處於能承擔這種角色的地位，而且法國人的運動分裂、混亂，受到小資產階級激進共和派或其他歧出元素的滲透，其表現令人失望。此外，法國人也不願聆聽馬克思與恩格斯的說法。[96]恩格斯甚至在某個時候認為，奧國運動可以取代法國，擔任「先鋒」的角色。

與法國相反，德國運動的驚人成長，加上與馬克思及恩格斯的緊密聯繫，使德國運動明顯成為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主力。[97]雖然恩格斯不認為其他運動均應交由某個領導政黨來指揮，除非是在需要立即行動的時候，[98]但顯而易見，最有助於世界社會主義利益的莫過於德國運動的進步。這個觀點不只在德國社會主義者圈內流傳，早在第三國際歷史的初期階段就已經有許多人抱持這種看法。另一方面，一八九〇年代初恩格斯提出的另一個觀點卻未被其他國家所接受，他認為如果發生歐戰，德國擊敗法俄同盟會是比較可取的結果，[99]不過恩格斯認為俄國與法國在戰

敗後將產生革命可能，這點卻獲得列寧認同。我們沒有理由設想如果恩格斯在一九一四年時還活著，他會有何看法，而且我們也沒有根據認為屆時他的看法會與一八九〇年代一樣。有可能絕大多數社會主義黨派會決定支持自己的政府，即使德國黨派早已無法訴諸恩格斯的權威。儘管如此，恩格斯在國際關係上，尤其在戰爭與和平上留給國際工人協會的遺產依然是曖昧不明的。

我們如何總結馬克思與恩格斯在一般政治觀念上留給後繼者什麼樣的遺產？首先，馬恩強調政治從屬於歷史發展。社會主義的勝利是一種歷史必然，馬克思總結這段過程時，在《資本論》第一卷用一句名言來表示資本主義積累的歷史趨勢，他預言「剝奪者遭到剝奪」。[100]社會主義在政治上的努力並未創造出「工人階級的反叛，一個數量不斷增加的階級，而且在資本主義生產本身的過程中獲得紀律、統一與組織」；工人階級是從資本主義中發展起來的。根本來說，社會主義政治努力的前景取決於資本主義發展抵達的階段，無論是在全球還是特定國家，因此馬克思主義對這類局勢的分析便構成社會主義政治策略的必要基礎。政治深埋於歷史中，馬克思的分析顯示，如果不以歷史為基礎，政治將變得毫無力量；相反地，如果從歷史尋求養料，工人階級運動將所向披靡。

其次，儘管如此，政治仍具有關鍵地位，因為終將勝利的工人階級必須而且將在政治上組織起來（意即組成「政黨」），他們的目標是政治權力的轉移，而緊隨其後的是過渡時期的無產階級國家權威體系。政治行動因此是無產階級歷史角色的本質。無產階級「透過」政治進行運作，亦即，在歷史設定的範圍內從事選擇、決定與有意識的行動。或許，在馬克思與恩格斯一生

中，以及在第二國際時代，用來區別馬克思與其他大多數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除了那些走雅各賓傳統路線的人）以及「純」工會或合作社運動的主要判準，在於馬克思相信政治在革命之前、期間與之後一直扮演著核心的角色。也許這麼說可能過於強調馬克思與普魯東派及巴枯寧派無政府主義者的爭論，但無疑地，這層差異確實具有重要意義。因為在後革命時代，這種態度的意義不是學理上的，他們必須讓無產階級政黨在資本主義下涉入各種政治活動。

第三，馬克思與恩格斯認為，政治本質上是國家（做為統治階級的代表）內部的階級鬥爭，除非是在某個特殊的歷史關頭，例如階級獲得平衡之時。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哲學上主張唯物主義，反對唯心主義，因此他們一貫批評國家立於階級之上，國家代表全社會的共同利益（他們只同意消極性的意義，那就是國家可以保護社會免於崩潰）或國家無涉階級的觀點。國家是階級社會的歷史現象，但當階級社會表現成國家的形式時，它代表的是階級統治——雖然不一定會以令人不安的「統治階級執行委員會」的簡化形式出現。這種情況不僅限制無產階級政黨參與資產階級國家的政治生活，也限制無產階級政黨理應取得的政治權力。無產階級運動因此既要在資產階級政治的範圍內進行鬥爭，也要在範圍外從事爭取。由於權力被定義為國家的主要內容，因此我們不難假定（雖然馬克思與恩格斯沒有這麼做），在政治以及一切與國家有關的討論中，權力是唯一重要的爭議點。

第四，過渡時期的無產階級國家，無論其功能為何，都必須去除人民與政府的區隔，政府不是由一群特殊的統治者組成的。有人說，無產階級國家必須是「民主的」，但這裡的「民主」不

等同於我們一般認為的特定制度形式，亦即政府等同於定期選舉的議員代表組成的大會，因為馬克思反對這種東西。儘管如此，在不等同於特定制度的意義下，我們還是會聯想到盧梭的某些面向，而這就是這裡所說的「民主」。對於馬克思後繼者來說，這是他留給後人遺產中最困難的部分，因為——其中的理由已超越本章討論的範圍——所有實際依照馬克思路線實踐的社會主義，到目前為止會發現自己的行動只是鞏固了一個獨立的國家體制（而且是非社會主義的政權），但馬克思主義者仍不願放棄馬克思執著的期望，他們認為這是發展新社會的核心面向。

最後，而且就某種程度來說應該是刻意的，馬克思與恩格斯在政治思想上留給後繼者一些空白或曖昧不明的空間。由於革命前政治與立憲結構的實際形式，只有在馬恩對運動的發展伸出援手或加以阻止時才與馬恩產生關聯，因此馬恩幾乎未對這些結構提出系統性的關注，頂多是隨意對各項具體事例與狀況提出評論而已。由於馬恩拒絕空想即將來臨的社會主義社會細節，也不願推測革命後過渡時期的內容，他們因此留給後繼者非常簡略的一般原則，讓他們利用這些原則來面對困難。因此，對於經濟社會化或為訂定計畫而做的種種安排等問題，他們並未提供任何具體而實際的指引。此外，還有一些主題他們完全未提供任何指引，不管是一般的、模稜兩可的還是過時的都沒有，因為他們從不認為有思考這些問題的必要。

然而必須強調的不是日後馬克思主義者能否從創立者的遺產中推導出細節，也不是他們能否自己想出一套方法，而是這些遺產本身高度的原創性。馬克思與恩格斯反對——一貫地、強硬地與不斷爭論地——的是當時革命左派的傳統取徑，包括在他們之前所有的社會主義者，[101]而這種

取徑仍未喪失它們的吸引力。馬克思與恩格斯反對有些人採取簡單的二分法，後者試圖以好的社會取代壞的社會，以理性取代非理性，以白取代黑。馬恩反對左派不同派別提出的各種先驗的計畫模式，他們不是沒有提到當每個派別提出這類模式時——其中有些包括了最精心設計的烏托邦藍圖——這些模式彼此間鮮少意見一致。馬恩也反對當時出現的一種規劃固定操作模式的傾向——例如，規定明確的革命變化形式，宣稱與自己不同的做法都不具正當性；對於政治行動，不是完全否定，就是完全仰賴等等。馬恩反對無歷史的唯意志論。

與此相反，馬克思與恩格斯堅持將運動的行動置於歷史發展的脈絡中。想辨識未來的樣貌與行動的任務，必須發掘出這些事物賴以產生的社會發展過程，而我們唯有身處於某種發展階段，才能得到這種發現。如果這使得未來的願景完全受限於少數粗略的結構原則，並且排除了空想式的預測，那麼它便給予了社會主義希望一種歷史不可避免的確定性。從具體政治行動的角度來看，要決定何者必要而可能（無論是全球性的還是僅限於特定地區與國家），都需要對歷史發展與具體局勢進行分析。因此政治行動被歷史變遷的框架所局限，但歷史變遷卻不仰賴政治行動。不可避免地，這使得共產主義者的政治任務變得既模稜兩可又複雜。

這些政治任務是模稜兩可的，因為馬克思分析所提出的一般原則太概括而無法在需要的時候提供明確的政策指引。在面對革命問題以及隨後往社會主義過渡的過程時尤其如此。幾個世代的評註者仔細閱讀文本，希望能找到有關「無產階級專政」的清楚陳述，卻徒勞無功，因為創立者主要關注的是這類時代之所以出現的歷史必然性。這些政治任務是複雜的，因為馬克思與恩格斯

對於政治行動與組織的「形式」（相對於它們的「內容」）的態度，以及對於這些行動與組織在形式制度下運作的看法，很大一部分決定於他們所處的具體局勢中，因此我們無法將他們的說法化約成「永久不變」的法則。在任何特定時刻與任何特定國家或地區，馬克思的政治分析都可以被表述為一套政治建議（例如，一八五〇年的大會演說），卻無法理所當然地適用在與政治分析發表當時情況不同的局勢裡——如恩格斯晚年評論馬克思《法蘭西階級鬥爭》指出的。後馬克思面對的處境不可避免與馬克思生存的處境不同，儘管兩者之間存在著類似性，但我們還是可以針對馬克思面對的處境與日後尋求他的指引的馬克思主義者面臨的處境進行歷史分析，因而找出其中的差異。這種狀況使人幾乎不可能從這些經典作品推導出任何類似戰略與戰術指導手冊的東西，甚至更危險的是把這些作品當成先例，儘管已經有人這麼做了。馬克思可以學習的地方是他面對分析與行動時所運用的方法，而不是從經典文本中找出現成的教訓。

馬克思顯然希望他的追隨者學習到這一點。然而，要將馬克思的觀念轉變成可以用來鼓舞群眾運動、黨派與有組織的政治團體的事物，不可避免將產生雷德勒所說的，「想讓群眾參與運動，就必須殘酷地對待每個偉大的觀念，以一般人慣有的化約將其簡化成某種固定的格式」。[102] 行動的指引很容易淪為教條。這對馬克思理論並無影響，但對馬恩政治思想領域的理論與運動卻造成傷害。它預示馬克思主義未來的發展，或許這是不可避免的，也或許不是。它顯示馬克思與恩格斯思想衍生的結果，從創立者的文本成為經典乃至於獲得正典地位後更是如此。但它無法代表馬克思與恩格斯的思想與作品，頂多說明了他們兩人某段時間的做法。

注釋：

1　的確，《資本論》的原初計畫是想以最後三「卷」來處理國家、對外貿易與世界市場（Rosdolsky, *Zur Entstechungsgeschichte des Marxschen 'Kapital'* I (Frankfurt, 1968) chapter2）。但處理國家的部分似乎只打算討論「不同國家形式與社會的不同經濟結構之間的關係」（Marx to Kugelmann, *Werke* 30, p. 639）。

2　參見特定引文的闕漏，Paschukanis, *Marxism and the General Theory of Law*(Frence edn., EDI Paris, 1970)，這部作品嘗試建構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國家法律理論。

3　L. Colletti, *From Rousseau to Lenin*, (NY, 1972), pp. 187-8. 第一部仔細考察盧梭與馬克思之間關聯的作品是G. della Volpe, *Rousseau e Marx* (Rome, 1957)。

4　*Werke* 1, p. 321.

5　*Werke* 1, p. 323; Colletti, op. cit., pp. 185-6.

6　*Origin of the Family*, Marx-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26, p. 29.

7　*Anti-Dühring*, Marx-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49, pp. 34-6.

8　見*First Draft of Civil War in France* (*Werke* 17, p. 544)：「我們要移除這種幻覺，以為管理與政治領導是一種秘密，以為這些超驗的才能只掌握在受過訓練的階級之手……這個騙局已被巴黎公社戳破，公社的組織者全是些單純的工人，他們擔負起巴黎的防務，起兵與波拿巴的手下作戰，他們確保了這座大城的日常供給，也填補了政府、警察與行政人員的空缺。」

9　Lenin, *State and Revolution*, III, 4.

10　In Kreuznach and Paris, 1843-4.

11　見*Holy Family*, *Werke* 2, pp. 127-31。

12　*Die moralisierende Kritik*, *Werke* 4, pp. 338-9. 關於這個觀念的起源，見H. Förder, *Marx und Engels am Vorabend der Revolution* (Berlin, 1960) and W. Markov, *Jacques Roux und Karl Marx* (Sitzungsberichte der deutschen Akad.

D. Wissenschaften zu Berlin, Klasse füu Philos., Geschichte, Staats-, Rechts- u. Wirtschaftswissenschaften, Jg 1965, Berlin 1965)。

13 關鍵的說法見馬克思寫給Weydemeyer的信，一八五二年三月五日（*Werke* 28, pp. 507-8）與*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aramme*（*Werke* 19, p. 28）。

14 參見Wilhelm Mautner, *Zur Geschichte des Begriffes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Grünberg's Archiv), pp. 280-3.

15 馬克思寫給Nieuwenhuis的信，一八八一年二月二十二日（*Werke* 35, p. 161）。

16 *Critique of the Erfurt Programme*, 1891, (*Werke* 22, p. 235).

17 馬克思在第一國際第七次年會發表演說（1871），in *Werke* 17, p. 433。

18 Engels, preface to Marx, *Civil War 1891*, in *Werke* 22, p. 197-8.

19 Marx, *Civil War*, Draft II, in *Werke* 17, p. 597.

20 Marx, *Gotha Programme*, in *Werke* 19, p. 19：「行政的一般成本，不能直接歸類為生產。〔社會成本的〕這個部分，相對於今日的社會來說，從一開始就明顯受到縮減，而且將隨著新社會的發展而不斷減少。」

21 Marx, *Gotha Programme*, ibid., p. 21.

22 馬克思寫給Nieuwenhuis的信，一八八一年二月二十二日，in *Werke* 35, pp. 160-1。

23 Marx，*Civil War*，draft I, in *Werke* 17, p. 546.

24 第一國際成立演說（*Werke* 16, p. 11）。

25 見第四章與Marx, *Value, Price and Profit*(*Werke* 16, pp. 147-9)。

26 一八七一年第一國際倫敦代表會議，(*Werke* 17, pp. 421-2); Notes for Engels' Speech, ibid., pp. 416-17。

27 馬克思寫給Bolte的信，一八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Werke* 33, p. 332）。

28 馬克思寫給Freiligrath的信，一八六〇年（*Werke* 30, pp. 490, 495）。

29 *Werke* 17, p. 416.

30 寫給Sorge的信，一八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寫給Nieuwenhuis的信，一八八七年一月十一日（*Werke* 36, pp.

579, 593）。

31 寫給P. and L. Lafargue的信（*Werke* 32, p. 671）。

32 Marx, *Der politische Indifferentismus* (*Werke* 18, p. 300).

33 *Civil War*, Draft I (*Werke* 17, pp. 544-6).

34 *Civil War*, text and Draft I (*Werke* 17, pp. 341, 549-54).

35 更清楚的說法見G. Lichtheim, *Marxism* (1964 edn), pp. 56-7，不過我不同意作者將一八五〇年前後的馬克思主義做出根本區別。

36 Engels, Introduction to *Class Struggles in France*, 1891 (*Werke*22, p. 513-14).

37 L. Perini (ed.), *Karl Marx, Rivoluzione e Reazione in Francia 1848-1850*, (Turin, 1976), Introduzione LIV，相當敏銳地分析了Marx's *Class Struggles in France* and in the *18th Brumaire*中不同的歷史論述。

38 Address of the Central Council (*Werke* 7, pp. 244-54).

39 比較他與恩格斯對俄國農民的態度（drafts and letter to Zasulich, *Werke* 19, pp. 421-35），以及對照他在革命後極為關切對農民與社會中間階層的支持（*Civil War*, draft I, *Werke* 17, pp. 549-54）與恩格斯漫不經心地否定具煽動性的反動份子有掌握農民與小手工業者的可能（*Die Bauernfrage in Frankreich und Deutschland, 1894, Werke* 22, pp. 485-505）。我們很難想像《霧月十八日》的作者會認為小農與獨立手工業者還沒做好自己即將消亡的準備：「這些人是反閃主義者。讓他們去投靠那些承諾要保留他們的小事業的人吧。」（*Werke* 22, p. 499.）

40 倍倍爾寫給恩格斯的信，一八八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in August Bebel's *Briefwechsel mit Friedrich Engels*, ed. W. Blumenberg (Hague, 1965), p. 188-9. 也可見L. Longinotti, *Friedrich Engels e la 'rivoluzione di maggioranze'* (*Studi Storici* XV, 4, 1974, p. 821).

41 *Knofidentielle Mitteilung, 1870* (*Werke* 16, pp. 414-15). 這裡恩格斯的分析較為深入。早在一八五八年，他對英國壟斷世界造成的「資產階級無產階級」，曾簡略地提出一些看法，這些觀點預示了他在一八八〇年代與一八九〇年代的分析主線（參見*England in 1845 and 1886*, *Werke* 21, pp. 191-7）；and introduction to *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c (*Werke* 22, pp. 309-10)。

42 Introduction to *Class Struggles* (*Werke* 22, p. 519).

43 Introduction to *Class Struggles* (*Werke* 22, p. 521).

44 寫給R. Fischer的信，一八九五年三月八日（*Werke* 39, pp. 424-6）；Introduction to *Class Struggles* (*Werke* 22, pp. 521-2); 給Laura Lafargue (*Werke* 38, p. 545)。

45 海牙會議演說（*Werke* 18, p. 160）。Engels, preface to the English edition of *Capital*。

46 Marx, 'Konspekt der Debatten über das Sozialistengesetz, 1878' in *Briefe and Bebel, Liebknecht, Kautsky und Andre* (Moscow-Leningrad, 1933)I, p. 516; interview with *New York Tribune*, 1878 (*Werke* 34, p. 515).

47 *Critique of the Erfurt Programme*, draft 1891 (*Werke* 22, pp. 227-40, esp. pp. 234-5).

48 寫給倍倍爾的信，一八九一年（*Werke* 38, p. 94），提到黨反對他出版*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

49 見*The Future Italian Revolution*, 1894 (*Werke* 22, pp. 440, 441)：「一場運動如果不是我們代表的階級的運動，那麼我們沒有任何必要直接參與這場運動。」

50 尤其見*The Future Italian Revolution* (*Werke* 22, pp. 439-42), *The Peasant Question in France and Germany* (*Werke* 22, pp. 483-505)。

51 *Critique of Erfurt*, draft (*Werke* 22, p. 234).

52 關於馬克思對波拿巴主義的態度（主要陳述在《霧月十八日》，其論點續見於*Civil War*），參見M. Rubel, *Karl Marx dvant le Bonapartisme* (The Hague, 1960)。

53 *18th Brumaire* VII (*Werke* 8, pp. 196-7).

54 *18th Brumaire* VII (*Werke* 8, pp. 198-9).

55 *18th Brumaire*(*Werke* 8, pp. 196-7); *Civil War*, Draft II (*Werke* 17, pp. 336-8).

56 *18th Brumaire* VII (*Werke* 8, pp. 176-85).寫給Lafargue的信，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Werke* 31, p. 536）：比較詳盡的說法，見Engels, 'The Real causes of the relative inactivity of the French proletarians last December' (1852)

(*Werke* 8, pp. 224-7)。

57 寫給馬克思的信，一八六六年四月十三日（*Werke* 31, p. 208）。

58 「這似乎是一個歷史發展的定則，沒有任何一個歐洲國家的資產階級——在長期的歷史中——能夠像中世紀封建貴族一樣獨享政治權力」（introduction to English Edition of *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 in *Werke* 22, p. 307）。

59 恩格斯寫給考茨基的信，一八八二年二月七日（*Werke* 35, p. 269）。

60 恩格斯寫給馬克思的信，一八七〇年八月十五日，馬克思寫給恩格斯的信，一八七〇年八月十七日（*Werke* 33, pp. 39-44）。

61 *Nachwort zu 'Soziales aus Russland'* (*Werke* 22, p. 433).

62 寫給倍倍爾的信，一八八六年九月十三—十四日（*Werke* 36, p. 526）。關於這個問題，見E. Wangermann, introduction to *The Role of Force in History* (London, 1968)。

63 恩格斯寫給伯恩斯坦的信，一八八三年八月二十七日，一八八四年三月二十四日（*Werke* 36, pp. 54-5, 128）。當然，恩格斯可能稍微思索了未來革命的樣貌：參見，寫給倍倍爾的信，一八八四年十二月十一—十二日（*Werke* 36, pp. 252-3）。

64 參見S. F. Bloom, *The World of Nations*, p. 17ff。

65 Engels in *Neue Rh. Z.* 一八四八年八月三十一日；也可見恩格斯寫給伯恩斯坦的信，一八八四年三月二十四日（*Werke* 35, p. 128）。

66 參見Roman Rosdolsky, *Friedrich Engels und das Problem der 'Geschichtslosen Völker'* (Sonderdruck aus Archiv f. Sozialgeschichte 4/1964, Hanover)。

67 'Was hat die Arbeiterfrage mit Polen zu tun?' 1866 (*Werke* 16, p. 157).

68 Marx, *Civil War in France* (*Werke* 17, p. 341).

69 恩格斯寫給伯恩斯坦的信，上面談起保加利亞人，一八八二年八月二十七日（*Werke* 35, pp. 280-2）。

70 *N. Rh. Z.* 一八四九年一月一日（*Werke* 6, pp. 149-50）。

71 馬克思寫給Paul與Laura Lafargue的信，一八七〇年五月三日（*Werke* 19, p. 296）。

72 恩格斯寫給伯恩斯坦的信，一八八二年六月二十六日（*Werke* 35, pp. 337-9）。

73 俄文版《共產黨宣言》前言（*Werke* 19, p. 286）。

74 參見E.H. Carr, 'The Marxist Attitude to War', in *History of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III (London, 1953), pp. 549-66.

75 恩格斯寫給馬克思的信，一八七九年九月九日，馬克思寫給Danielson的信，一八八〇年九月十二日（*Werke* 34, pp. 105, 464）；恩格斯寫給Bebel的信，一八七九年十二月十六日（*Werke* 34, p. 431）；恩格斯寫給倍倍爾的信，一八八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Werke* 35, p. 416）。

76 恩格斯寫給倍倍爾的信，一八八六年九月十三日（*Werke* 36, p. 525）。

77 寫給倍倍爾的信，一八八五年十一月十七日（*Werke* 36, p. 391）。

78 引自Gustav Mayer, *Friedrich Engels* (Hague, 934), II, p. 47。

79 Marx in *N. Rh. Z.*，一八四九年十一月一日。

80 關於他們對即將來臨的革命的期許，馬克思寫給恩格斯的信「不早於一八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一八五七年十一月十五日，馬克思寫給恩格斯的信，一八五七年十二月八日（*Werke* 29, pp. 76, 78, 212, 225）。

81 參見 *On the Brussels Congress and the Situation in Europe* (*Werke* 22, p. 243)。

82 辯論的摘要見Gustav Mayer, op. cit., II, pp. 81-93。

83 恩格斯寫給Lafargue的信，一八八九年三月二十四日（*Werke* 37, p. 171）。

84 馬克思寫給Paul and Laura Lafargue的信，一八七〇年三月五日（*Werke* 32, p. 659）。

85 Preface to English edition (1892) of *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 (*Werke* 22, pp. 310-11).

86 馬克思寫給Meyer and Vogt的信，一八七〇年四月九日（*Werke* 32, pp. 667-9）。

87 馬克思寫給Kugelmann的信，一八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Werke* 32, p. 638）。更完整的資訊：General Council to Federal Council of Suisse Romande，一八七〇年一月一日（*Werke* 16, pp. 386-9）。

88 馬克思寫給P. and L. Lafargue的信，一八七〇年三月五日（*Werke* 32, p. 659）。

89 例如寫給阿德勒的信，一八九三年十月十一日（*Werke* 39, p. 134ff）。

90 寫給伯恩斯坦的信中提到埃及，一八八二年八月九日；寫給考茨基的信，一八八二年九月十二日（*Werke* 35, pp. 349, 357-8）。

91 寫給伯恩斯坦的信，一八八二年二月二十二—二十五日（*Werke* 35, pp. 279-280）。

92 寫給考茨基的信，一八八二年八月七日（*Werke* 35, pp. 269-70）。

93 例如，關於亞爾薩斯與俄國和波蘭之間的爭議地區：寫給查蘇利奇的信，一八九〇年四月三日（*Werke* 37, p. 374）。

94 G. Haupt, M. Lowy, C. Weill, *Les Marxistes et la Question Nationale* (Paris, 1974), p. 21.

95 恩格斯寫給考茨基的信，一八八二年二月七日（*Werke* 35, p. 270）。

96 給阿德勒的信，一八九四年七月十七日（*Werke* 39, p. 271ff）。關於鮮少與法國人接觸，除了Lafargue，見書信冊，in *Marx-Engels, Verzeichnis* I, pp. 581-684。

97 給阿德勒的信，一八九三年十月十一日（*Werke* 35, p. 136）。

98 給考茨基的信，一八八二年二月七日（*Werke* 35, p. 270）。

99 給倍爾的信，一八九一年九月二十九日—十月一日（*Werke* 38, pp. 159-63）；*Der Sozialismus in Deutchland*（*Werke* 22, p. 247）。

100 *Capital* I, chapter XXXII.

101 這尤其清楚地顯示在《反杜林論》中，特別是分別出版的部分，*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

102 引自E. Weissel, *Die Ohnmacht des Sieges* (Vienna, 1976), p. 117。

第四章 論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

我們經常忘記，恩格斯是在二十四歲那年完成了《英國工人階級狀況》。這項寫作任務交給他來執行可說再合適不過。恩格斯來自萊因蘭（Rhineland）巴爾門（Barmen）一個富有的棉紡織業家族，這個家族的事業經營得有聲有色，甚至能在曼徹斯特這個工業資本主義經濟中心設立分公司，也就是厄爾門與恩格斯（Ermen & Engels）公司。恩格斯年輕時看見早期工業資本主義在他周遭帶來的恐怖景象，對於家族狹隘而自以為是的虔信主義不以為然。到了一八三〇年代晚期，他與當時許多年輕人一樣成為進步派的青年日耳曼知識分子。恩格斯與年紀略長的馬克思都成了「黑格爾左派份子」——黑格爾哲學是當時普魯士首都柏林高等教育的主流——而後逐漸傾向共產主義，並且開始在各種期刊上發表文章與作品，此時已有許多日耳曼左派份子紛紛提出對社會的批判。不久，恩格斯便自稱為共產主義者。恩格斯有一段時間定居英格蘭，這是出自他自己的想法還是他父親的決定，我們不得而知。或許兩人都有此念頭，只是理由不同：老恩格斯希望熱衷革命的兒子遠離日耳曼的動盪不安，就此定下來心來成為一名生意人；小恩格斯則想前往近代資本主義中心，藉此接近英國無產階級的偉大運動，此刻的他已認為英國無產階級是近代世界的關鍵革命力量。

一八四二年秋，恩格斯前往英格蘭，他在途中首次結識馬克思，之後在當地生活近兩年的時間，除了觀察、研究外，還發展自己的理念。[1]到了一八四四年上半年，恩格斯顯然已開始撰寫《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不過作品絕大部分完成於一八四四年到一八四五年的冬季。一八四五年夏，最後部分終於在萊比錫完成，除了前言外，還有一篇獻給「英國工人階級」的獻辭（以英文寫成）。[2]這本書以英文出版，之後作者稍事修改，並且增添了頗有份量的前言，分別是一八八七年的美國版前言與一八九二年的英國版前言。因此，這部談論早期工業英國的傑作居然花了半個世紀的時間才抵達它所談論的國家。然而從此之後，工業革命成了每個學生耳熟能詳的詞彙，即使是只聞其名而不解其義。

恩格斯想寫一本有關勞動階級狀況的作品，這個念頭並非由他首創。在一八三〇年代，凡是聰明的觀察者都會發現，歐洲經濟發展先進的區域，面臨的社會問題不只是「窮人」，而是一個史無前例的階級，即無產階級。一八三〇與四〇年代是資本主義與工人階級運動發展的關鍵時期，整個西歐充斥著討論工人階級狀況的書籍、小冊子與論文。恩格斯的作品是這類研究中最傑出的一部，不過維勒梅的《棉花、羊毛與絲織工廠雇工的身體與精神狀況研究》（*Tableau de l'Etat Physique et Moral des Ouvriers employés dans les Manufactures de Coton, de Laine et de Soie*, 1840）也是一部值得注意的社會調查大作。此外，我們也可以清楚看出，無產階級問題不只是地方或國內問題，它也是跨國性的問題。布雷比較了英國與法國的狀況（《法國與英國勞動階級的貧困狀況》〔*La misère des classes laborieuses en France et en Angleterre*, 1840〕），而杜克佩提歐於

一八四三年收集了有關全歐年輕工人狀況的資料。因此，恩格斯的作品絕非孤立的文字著述現象，而這也使一些反馬克思主義者周而復始地指控他剽竊抄襲或作品毫無新意。[3]

然而，恩格斯的作品與當時和他明顯類似的作品有幾點不同之處。首先，恩格斯自己正確地指出，不管在英國還是其他國家，這是第一本以工人階級做為一個整體，而不只是針對特定的人群與產業而寫的書。其次，而且是更重要的一點，這本書不只是工人階級狀況的調查，它也是工業資本主義演進、工業化的社會衝擊及其政治與社會影響的一般分析——包括勞工運動的崛起。事實上，這部作品是首次在具體的社會研究運用了大量的馬克思主義方法，或許也是第一部馬克思或恩格斯這兩名馬克思主義創立者認為價值足以永久流傳的作品。[4]然而，恩格斯在一八九二年版的前言中表明，他這部作品不能代表成熟的馬克思主義，而是「馬克思主義萌芽發展的一個階段」。至於成熟而充分陳述的詮釋我們必須去看馬克思的《資本論》。

論證與分析

《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開始簡述工業革命轉變了英國社會，而且創造（這是它的主要結果）出無產階級（第一到二章）。這部作品是恩格斯最早完成的開創性傑作，它或許也是最早有系統地以工業革命概念為基礎進行分析的重量級作品。工業革命在當時仍是嶄新而帶有試驗性的觀念，是一八二〇年代英法兩國社會主義者進行討論時創造出來的詞彙。恩格斯在描述這項轉變的

歷史時，並不認為這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現象。而恩格斯這部作品雖然仍然有用，但已被後期比較完整的作品取代。

從社會的層面來看，恩格斯認為工業革命造成的轉變是個巨大的集中化與極化過程，它創造出數量越來越多的無產階級以及數量越來越少但財富越來越多的資產階級，這兩個階級又身處於一個越來越城市化的社會裡。資本主義式工業主義的興起摧毀了小商業生產者、農民與小資產階級，而這些中間階層的衰亡，剝奪了工人成為小師傅的機會，使他們完全局限在無產階級行列。工人因此成為「人口中一個明確的階級，然而在過去，這個階級只是通往中產階級的過渡階段」。工人因此發展出階級意識——恩格斯自己並未使用這個詞彙——與勞工運動。這是恩格斯的另一項重要成就。列寧說：「他是第一位說出無產階級『不只是』一個受苦的階級的人；精確地說，無產階級令人可恥的經濟處境，無可抵擋地驅使無產階級向前邁進，使它為自身最終的解放而鬥爭。」[5]

然而，這個集中化、極化與城市化的過程並非出於偶然。大規模機械化產業要求更多的資本投資，它的勞動分工需要累積大量的無產階級。這類大型生產單位即使建立在鄉間，也會吸引社群圍繞著它們，如此將產生剩餘的勞動力，於是薪資降低，其他實業家則受到吸引前來。就這樣，工業村落成長為城市，而城市又繼續擴大，因為城市為實業家提供了經濟優勢。雖然產業傾向於從高薪資的城市移向低薪資的鄉村，但這個遷徙過程卻為鄉村植入城市主義的種子。

因此對恩格斯來說，大城市是資本主義最典型的地點，他在第三章討論了這點。在城市裡，

不受限制的剝削與競爭以最赤裸裸的形式出現：「每個地方，一方面充滿野蠻的冷漠與嚴酷的自私，另一方面則是無法形容的悲慘，到處都是社會戰爭，每個人的房子都成了堡壘要塞，每個地方的掠奪者在法律保護下進行搶掠」。在這種無政府狀態下，沒有生存與生產工具的人遭到擊敗，淪為僅能糊口的勞動力，或者在失業的狀況下挨餓。更糟的是，在生活充滿不安全感的狀況下，工人的未來完全是未知與動盪。事實上，工人的未來受到資本主義競爭法則的宰制，恩格斯在第四章討論了這點。

工人薪資在最低生存線與最高值之間波動。最低生存線——恩格斯在這方面並未形成嚴謹的概念——由工人之間的競爭決定，但不會低於獲得最基本溫飽的程度，因為低於此線工人就沒有力氣工作了；最高值由資本家之間的競爭決定，這種狀況只出現在勞工缺乏的時候。平均薪資通常會比最低薪資略高一些：薪資的高低取決於工人平常或必需的生活水準。但某些勞工，特別是在工業部門，需要能力較佳的工人，因此他們的平均薪資會高於其餘工人，不過這種高水準的薪資有部分反映了城市裡較高的生活成本。（較高的城市與工業薪資水準，有助於擴大工人階級，吸引鄉村與外國——愛爾蘭人——移民前來。）然而，工人之間的競爭卻創造出永久性的「剩餘人口」——馬克思日後稱之為工業預備軍——這批人口拉低了整體的薪資標準。

儘管整體經濟不斷擴張，但剩餘人口拉低薪資的現象依然存在。經濟的擴張得益於兩點，首先是科技進步造成產品價格下跌，需求因此增加，原先失業的工人再度被新產業吸收，其次是英國工業世界的壟斷。人口成長，生產增加，對勞工的需求也增加。儘管如此，「剩餘人口」依然

存在，因為景氣榮枯仍週期性地循環不已。恩格斯最早發現景氣循環是資本主義的必要成分，而他也最早提出精確的循環週期。[6]能認識到預備軍是資本主義與貿易循環的長期核心成分，顯示此時在理論上已出現兩項較為重要的進展。由於資本主義是在波動中運作，它「勢必」擁有常設的工人預備軍，除非是遇上了景氣高峰期。預備軍有一部分來自於無產階級，有一部分來自於潛在的無產階級——鄉村居民、愛爾蘭移民、從事的職業缺乏經濟活力的民眾。

資本主義產生的是哪種工人階級？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如何，這些物質條件會產生什麼樣的個人與集體行為？恩格斯在書中以大部分的篇幅（第三章，第五到第十一章）描述與分析這些問題，並且為社會科學帶來最成熟的貢獻，同時對資本主義工業化與城市化的社會衝擊做出分析，他的研究在許多方面至今仍無法超越。這部分的內容必須仔細地加以閱讀與了解。恩格斯的論點可以簡述如下。資本主義強行將新無產階級——通常由具有前工業背景的移民組成——引進到社會地獄中，讓他們在這裡遭受折磨，領取過低薪資或挨餓，任由他們在貧民窟裡腐爛。這些人不僅受到非人競爭力量的忽略、輕視與壓迫，也受到資產階級的荼毒，他們把無產階級當成東西，而非人類，把他們當成「勞動」或「手」，而非活生生的人（第十二章）。在資產階級法律支持下，資本家得以施加工廠紀律在工人身上，只要工人不聽話，不是罰款就是入獄，資本家愛怎麼樣就怎麼樣。資產階級歧視無產階級，除了以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對付他們，而且將一八三四年馬爾薩斯式「新濟貧法」的苛酷加諸在無產階級身上。然而，這種有系統的非人化過程也使工人未受到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與幻覺影響——例如，資產階級的利己主義、宗教與道德。進步的

工業化與城市化力量迫使工人從自己身處的社會處境中學到教訓，使他們聚集在一起，工人因此察覺到自己的力量。「工人與工業連結得越緊密，思想就越先進。」（然而，恩格斯也觀察到大量遷徙造成的激進化效果，例如愛爾蘭人。）

工人們以不同的方式面對自己的處境。有些人屈服了，任由自己的道德敗壞：然而，酗酒、賣淫、犯罪與揮霍的增加是一種「社會」現象，是資本主義造成的，這不能用個人的軟弱與無能來解釋。另一些人則是被動接受自己的命運，盡可能讓自己成為值得尊敬的守法公民，他們對公共事務毫無興趣，因此實際上等於協助了中產階級拉緊捆綁工人的鎖鏈。但真正的人性與尊嚴只能在對抗資產階級以及工人狀況不可避免產生的勞工運動中尋得。

勞工運動經歷了不同階段。個人的反叛——犯罪——是一個階段，毀壞機器是另一個階段，不過兩種都不是普遍現象。工會與罷工是勞工運動最早採取的一般形式。它們的重要性不在於它們是否有效，而在於它們能讓工人學習團結與階級意識。憲章運動的政治運動標誌著更高層次的發展。與這些運動同時發展的還有中產階級思想家的社會主義理論，恩格斯認為，這些思想家直到一八四四年為止，絕大部分仍未參與勞工運動，而他們的理論也只能吸引少數最好的工人注意。然而，隨著資本主義危機不斷擴大，勞工運動勢必要朝社會主義發展才行。

如恩格斯在一八四四年發現的，這場危機不可避免朝兩個方向發展。一個是美國（或可能是德國）的競爭將終結英國的工業壟斷，並且加劇革命情勢，另一個是社會在持續極化下，將使當時已在全國居於多數的工人了解到自己力量，並進一步攫取權力。（有趣的是，恩格斯的論點並

不強調無產階級絕對而長期的貧窮化。）然而，從工人無可忍受的狀況與經濟危機來看，很可能在這些趨勢成形之前，革命就已爆發。而恩格斯預測革命會發生在往後兩次經濟衰退之間，也就是在一八四六年到四七年與一八五〇年代中期之間。

儘管作品還不成熟，但恩格斯的科學成就卻令人矚目。他的缺點主要是因為他還年輕，而且就某個程度來說，也有點歷史簡化。他犯的某些錯誤，其實有充分的歷史理由。恩格斯撰寫《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時候，資本主義正處於首次遭受重大世俗危機的最嚴峻時期，而他抵達英國時，幾乎正值十九世紀最災難性的經濟下跌的最糟時期，即一八四一年到一八四二年。在這種狀況下，認為一八四〇年代是資本主義即將嚥氣而革命即將爆發的年代，並非完全不切實際。而且也不是只有恩格斯這麼想。

我們現在知道這不是資本主義最後的危機，而是重大擴張期的序幕，原因有幾個，首先是資本財產業的龐大發展，如鐵路與鋼鐵業，而非前階段的紡織業；其次是在未開發國家進一步擴展資本主義活動；第三是擊敗既有的農業利益；第四是發現嶄新而有效的方法來剝削工人階級，而工人階級也附帶地讓實質收入獲得大幅增長。我們也知道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危機——恩格斯極為準確地言中——並未對英國造成影響。這主要是因為發展不均的結果，而恩格斯幾乎未能預見這一點。在歐陸，相應的經濟發展階段在一八四六年到四八年達到最嚴峻的階段，在英國，同等的狀況出現在一八四一年到四二年。到了一八四八年，新擴張時代已然展開，它最初的特徵是一八四四年到四七年強勁的「鐵路景氣」。在英國，可以與一八四八年革命相提並論的是一八四二年

的憲章運動總罷工。這場經濟危機在歐陸引發一連串的革命，在英國卻只是打斷了一段快速恢復時期。恩格斯的運氣不佳，他在寫作時剛好身處於經濟情勢撲朔迷離的時期。即使到了今日，統計學家仍對於英國資本主義的黃金維多利亞景氣時期與「淒涼年代」之間的分界線（介於一八四二年到一八四八年間）如何明確劃定爭論不休。因此我們沒有理由指責恩格斯未能清楚看出其中的轉折。

公正的讀者會認為恩格斯作品的缺點是免不了的，而他們會更留意這本書帶來的貢獻。這些成就不只來自於恩格斯個人的才華，也來自於他的共產主義。共產主義給了他經濟、社會與歷史的洞見，使他的觀點明顯優於同時代的資本主義信徒。恩格斯顯示要成為優秀的社會科學家，首先必須擺脫資產階級社會的幻覺。

恩格斯對一八四四年英國的描述

恩格斯對一八四四年英國工人階級的描述有多可靠而周延？隨後的研究是否證實他的說法？我們對這本書歷史價值的判斷，主要取決於這些問題的答案。恩格斯經常受到批評，從一八四〇年代，胡伯與希爾德布朗德同意他的事實，但認為他的詮釋太陰鬱，到冷戰年代，編輯認為「歷史學家不再視恩格斯的書為權威作品，能提供一八四〇年代英國社會的寶貴圖象」。[7]第一個觀點還站得住腳，第二個觀點則完全是胡扯。

恩格斯的描述是以第一手的觀察與其他可得的資料為基礎。他顯然對工業城蘭開夏（Lancashire）很熟悉，特別是曼徹斯特地區，他也曾造訪約克夏（Yorkshire）幾座工業城鎮——里茲（Leeds）、布拉德福德（Bradford）、雪菲爾德（Sheffield）——而且在倫敦待了幾個星期。沒有人嚴肅表示恩格斯對自己看見的一切做了錯誤表述。在描述性的章節中，顯然第三、五、七、九與十二章的大部分內容是根據第一手觀察，而這類觀察所得顯然也啟發了其他章節。不要忘了，恩格斯（不同於絕大多數其他的外國訪客）不只是觀光客，而是一名曼徹斯特商人。他認識當地商人，他自己是一名共產主義者，他認識憲章運動人士與早期的社會主義者並且與他們共事。此外，他也對工人階級生活有第一手的認識——不只是透過他與愛爾蘭女工瑪麗．伯恩斯及其親戚和朋友的關係。恩格斯的作品因此是我們了解當時英國工業生活的重要一手史料。

至於恩格斯作品的其他部分，以及用來印證他的描述的證據，在這方面，恩格斯仰賴的是其他的資訊以及書面資料，在引用支持資本主義的資料時，他也仔細考慮這類資料帶有的政治立場。（參看他在前言的最後一段話。）雖然不是完全詳盡，但他的作品是優秀而充分的。儘管他的作品確實在謄寫時出現了一些錯誤脫漏（恩格斯後來改正了一些），而且在資料使用上經常是摘錄而不是完整引用，但若因此指控他主觀選取與錯誤引用資料也說不過去。敵視他的編輯只能在這本大部頭作品中找到少許他們認為「表述錯誤」的例子，而且絕大多數的指控要不是瑣碎就是搞錯。[8]他的確沒有使用一些可得的資料，但這些資料對資本主義的批評其實更為尖刻。從各方面合理的標準來看，《英國工人階級狀況》都是一部優秀的紀實作品，充分掌握了各項證據。

有人認為恩格斯不必要地渲染無產階級的悲慘狀況或未能正視英國資產階級慈善的一面，這些指控無疑是錯的。細心的讀者會發現，有些論點毫無根據可言，這些說法包括恩格斯把所有工人描述成貧困或挨餓，他們的生活水準僅能糊口，無產階級清一色全是窮人，還有一些極端陳述其實都是沒看過他的作品的批評者把自己說的話歸到他的身上。恩格斯不否認工人階級狀況已經獲得改善（參看第三章末尾的摘要）。他沒有將資產階級形容成一批黑心之人（見第十二章末尾的大段腳注）。他憎惡資產階級代表的以及驅使資產階級如此行動的事物，但他並未天真地憎惡與好人相對的壞人。他批判的是資本主義的無人性，是資本主義使剝削者集體地變成「道德淪喪的階級，因自私而陷入無可救藥的腐敗，乃至於連自身的人性也一併捐棄」。

批評者反對恩格斯通常只是因為他們不願接受他的事實。當時，凡是從國外來到英國的人，無論他是不是共產主義者，都會感受到令人震驚的恐怖，許多體面的資產階級自由派人士對於他們看到的現象所採取的措辭就跟恩格斯一樣激動——只是少了他的分析。

「文明創造了它的奇蹟」，托克維爾提到曼徹斯特時寫道：「而文明人卻倒退到接近野蠻的狀態。」

「我活著的每一天」，美國人亨利．柯曼寫道：「我都感謝上天，我不是生在英格蘭的窮人家庭。」

除了恩格斯以外，我們可以找到許多針對實業家一切以實利是尚的嚴厲批評。

事實上，直到今日，恩格斯的作品仍與一八四五年一樣，是討論當時工人階級最好的一本

書。往後的歷史學家如此認為，並且持續至今，除了近來有一群批評家基於意識形態的愛憎而對此書多所批評。恩格斯的說法絕非定論，因為一百二十五年來的研究已經為我們增添許多工人階級狀況的知識，特別是恩格斯未能親身體驗的部分。這本書象徵了那個時代。對每個十九世紀史家與每個對工人階級運動感興趣的人來說，沒有任何一本書能取代它的地位。《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仍將是一部不可或缺的作品，它代表為人性解放奮鬥的里程碑。

注釋：

1 除了《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外，他在英格蘭的主要成果還有《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Umrisse zu einer Kritik der Nationaloekonomie*），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分析的一篇早期但不完整的概要，並且為歐陸各家報社撰寫與英格蘭相關的文章，以及為歐文的《新道德世界》撰寫有關歐陸發展的文章。

2 *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 Nach eigener Anschauung und authentischen Quellen von Friedrich Engels. Leipzig. Durck und Verlag von Otto Wigand. 1845. 德文版的第二版於一八九二年發行。標準版是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section I, vol. 4, pp. 5-286), Berlin 1932，文字脫漏與誤植都已經更正。本書使用的基本英文版是一八九二年的英國版。完整的英文版是W. O. Henderson and W. H. Chaloner (Oxfrod, 1958)，恩格斯提及的都已做了核對與必要的修正，增添了補充的資料，文本也加以重譯。遺憾的是，譯文不完全可靠，而編輯也對恩格斯的作品有著強烈的成見。

3 主要來自布雷。關於這項指控的討論與反駁，見Gustav Mayer, *Friedrich Engels* vol. I (Hague, 1934), p. 195，部分是基於布雷的觀點與恩格斯並無相同之處，另一部分是基於更無懈可擊的理由，沒有證據顯示恩格斯從英格蘭返國

之前就已經看過布雷的書。

4 恩格斯認為，在《共產黨宣言》之前的作品中，值得再版的有馬克思的《論費爾巴哈》（*Theses on Feuerbach*）與《哲學的貧困》（1847）。恩格斯的作品是否出現得更早是可以討論的，因為我們不知道在一八四五年春天馬克思是否已經草擬了他的大作《論費爾巴哈》。但馬克思在三月十五日之前應該還未完成，而在這一天，恩格斯已經為自己作品的前言署名。

5 引自'Frederick Engels'，寫於一八九五年。見*Marx-Engels-Marxism* (London, 1935), p. 37。

6 在這裡，恩格斯可能得益於西斯蒙帝的觀點，而且更多來自於約翰·韋德（John Wade）《中產階級與工人階級史》（*History of the Middle and Working Classes*, 1833），恩格斯在準備寫作時曾使用這本書。韋德認為一次循環為期約五到七年，恩格斯採取了這個說法，不過日後卻改採十年為期的觀點。

7 V. A. Huber (*Janus*, 1845 II, p. 387); Bruno Hilderbrand (*Nationalaekonomie d. Gegenwart u. Zukunft*, Frankfurt, 1848); Henderson and Chaloner (eds), *Engels'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Oxford, 1958, p.xxxi). 關於當時日耳曼對恩格斯作品的反應，見J. Kuczynski, *Die Geschichte der Lage der Arbeiter unter dem Kapitalismus* vol. 8 (Berlin, 1960)，裡面重刊了幾篇評論。

8 關於這些指控的討論，見E. J. Hobsbawm, *Labouring Men* (London, 1962), chapter 6。

第五章 論《共產黨宣言》*

一

一八四七年春，馬克思與恩格斯同意加入所謂的正義者同盟（League of the Just），這是從先成立的流亡者同盟（League of Outlaws）脫離出來的組織，也是一八三〇年代日耳曼職工（絕大多數是裁縫與木工）在法國革命風潮影響下於巴黎成立的革命秘密組織，而此時組織主要仍是由這些流放海外的工匠激進分子組成。同盟方面深受馬克思與恩格斯「批判的共產主義」的吸引，因此提議刊行由馬、恩兩人草擬的宣言作為同盟的政策文獻，希望透過他們的路線讓組織現代化。一八四七年夏，同盟大幅重組，改名為共產主義者同盟（League of the Communists），約定組織宗旨是「推翻資產階級，實現無產階級統治，打倒建立在階級矛盾之上的舊社會，建立無階級或無私有財產的新社會」。[1]共產主義者同盟第二次大會於一八四七年十一月到十二月間

---

* 本章是一九九八年《共產黨宣言》一百五十週年紀念版的序論。

在倫敦舉行，會中正式通過同盟宗旨與新規約，並且邀請馬克思與恩格斯草擬新宣言，以闡明同盟的目標與政策。

雖然馬克思與恩格斯一起草擬，而且這份宣言顯然代表兩人共同的觀點，但最後的文字卻幾乎是由馬克思獨力完成——執委會必須不斷地催促他，因為當時的馬克思跟日後一樣，如果不訂個期限催他，恐怕他永遠完成不了。初稿的不存在或許顯示宣言是在倉促下寫成的。[2] 完成的文件共二十三頁，題為《共產黨宣言》（*Manifesto of the Community Party*，一八七二年後以*TheCommunist Manifesto*之名通行於世）。這個宣言「出版於一八四八年二月」，印行的地點是倫敦市利物浦街四十六號的工人教育協會（Workers' Educational Association，比較熟知的名稱是Communistischer Arbeiterbildungsverein，這個組織一直維持到一九一四年）辦公室。

這本小冊子顯然是法國大革命《人權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Citizen*）以來最具影響力的政治作品。而它的運氣也不錯，在發行之後的一到兩個星期，就爆發了一八四八年革命，這場革命就像森林大火一樣，從巴黎延燒到歐陸各地。雖然《共產黨宣言》的視野完全是國際性的——第一版滿懷期望地（但錯誤地）宣稱英文、法文、義大利文、法蘭德斯文與荷蘭文版即將問世——但它最初的影響完全局限在德文圈。共產主義者同盟雖小，卻在日耳曼革命中扮演著絕非不重要的角色，特別是由馬克思擔任編輯的同盟機關報《新萊茵報》（*Neue Rheinische Zeitung*，一八四八至四九年）。《共產黨宣言》的第一版在幾個月內重印了三次，在《德意志倫敦報》（*Deutche Londoner Zeitung*）連載，一八四八年四月到五月間重新排版與校對成三十頁，

但在一八四八年革命失敗後很快就消聲匿跡。當馬克思於一八四九年在英格蘭安頓下來，開始他終身流亡的歲月時，《共產黨宣言》變得乏人問津，致使馬克思懷疑是否需要在他幾乎已無讀者的倫敦雜誌《新萊茵報，政治經濟專刊》的最後一期（一八五〇年十一月）重刊《宣言》的第三章（〈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論述〉）。

沒有人想得到《宣言》會在一八五〇年代與一八六〇年代初有不凡的表現，一個小而新的版本由倫敦一名日耳曼移民出版商自行出版，時間或許是一八六四年，另一個小版本則是於一八六六年在柏林出版，這是首次在日耳曼境內發行的《宣言》。從一八四八年到一八六八年，似乎沒有任何譯本問世，除了瑞典文譯本，可能出版於一八四八年年底，還有一八五〇年的英文譯本，它在《宣言》的目錄學歷史上之所以重要，只是因為譯者似乎曾向馬克思或更有可能向恩格斯請教（因為她住在蘭開夏）。這兩個版本都未留下任何痕跡。到了一八六〇年代中期，馬克思在此之前寫下的任何作品都已不再重印。

馬克思在國際工人協會（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即所謂的「第一國際」，一八六四至七二年）的聲望，以及在德國，兩個重要工人階級政黨的出現（這兩個政黨都是由前共產主義者同盟成員建立的，而這些成員都對馬克思有很高的評價），都促使人們重新燃起了對《宣言》以及馬克思其他作品的興趣。尤其馬克思對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做出了極具說服力的辯護（以《法蘭西內戰》〔*The Civil War in France*〕為人所熟知），這使他在新聞界享有國際顛覆活動領導者的惡名，飽受各國政府忌憚。更明確的是，一八七二年三月，德

國社會民主黨（Germ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領袖李卜克內西、倍倍爾與赫普納接受叛國罪審判，也意外讓更多人知道《宣言》。檢察官朗讀《宣言》文字，使其成為法院的正式紀錄，因此使社會民主黨人第一次有機會合法地出版它，並且把《宣言》當成訴訟文書的一部分而大量印行。《宣言》出版於一八四八年之前，顯然它需要更新與解釋性的評論，馬克思與恩格斯於是寫下了序言，往後隨著《宣言》新版的出現，新的序言也將不斷地加添上去。[3]基於法律理由，這篇序言在當時無法廣為流通，但事實上一八七二年版（以一八六六年版為基礎）成為往後所有版本的基礎。在此同時，從一八七一年到一八七三年，《宣言》至少有九個版本以六種語言問世。

往後四十年，《共產黨宣言》征服了世界，新（社會主義）勞工政黨的興起——一八八〇年代，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快速增長——使《宣言》廣為風行。但這些政黨都未以共產黨自稱，直到十月革命之後，俄國布爾什維克才讓自己冠上了共產黨的稱號，而《共產黨宣言》的名稱仍維持不變。早在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之前，《宣言》已經出現了三十餘種語言與數百種版本，包括三個日文版與一個中文版。儘管如此，《宣言》的主要影響地區仍是歐洲的核心地帶，從西邊的法國延伸到東邊的俄國。不令人意外地，最多的版本是俄文（七十種），加上沙皇帝國境內的三十五種以上的語言：波蘭文有十一種版本，意第緒文（Yiddish）有七種版本，芬蘭文有六種版本，烏克蘭文有五種版本，喬治亞文有四種版本，亞美尼亞文有兩種版本。德文有五十五種版本，加上哈布斯堡帝國境內的語言，如匈牙利文有九種版本，捷克文有八種版本（另外克羅埃西亞文有三種版本，斯洛伐克文與斯洛文尼亞文各有一種版本）；英文有三十四種版本（包括美

國，美國最早的譯本出現在一八七一年）；法文有二十六種版本；義大利文有十一種版本——最早的譯本直到一八八九年才出現。[4]《宣言》對西南歐的影響較小：西班牙文有六種版本（包括拉丁美洲版），葡萄牙文有一種版本。它對東南歐的影響也不大：保加利亞文有七種版本，塞爾維亞文有四種版本，羅馬尼亞文有四種版本，拉迪諾文（Ladino）有一種版本，很可能是在薩羅尼加（Salonica）出版。在北歐的表現則還可以，丹麥文有六種版本，瑞典文有五種，挪威文有兩種。[5]

地理分布的不均，反映的不只是社會主義運動發展的不均，以及馬克思自身影響力（必須將其與其他革命意識形態如無政府主義區別開來）的深淺，它也提醒我們，社會民主與勞工政黨的規模與權力，和《宣言》的流通之間，並無明顯的關聯性。因此，到了一九〇五年時，德國社會民主黨（Germ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有數十萬名黨員，選票有數百萬，但它印行新版《宣言》時數量卻不過兩三千冊。社會民主黨的一八九一年《埃爾福特綱領》（*Erfurt Programme*）印行了十二萬冊，但從一八九五年到一九〇五年這十一年間，社會民主黨印行《宣言》數量卻不超過一萬六千冊。一九〇五年，就連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刊物《新時代》（*Die Neue Zeit*）印量也有六千四百冊。[6]群眾馬克思主義社會民主黨的一般黨員，不一定清楚《宣言》的內容。相反地，前革命時期的七十種俄文版反映的是組織的結合，這些組織在大多數時間裡都是非法的，它們的成員總數不可能超過數千人。同樣地，三十四種英文版是由散布於盎格魯撒克遜世界的馬克思主義黨派出版的，而閱讀者通常也只局限於這些人，他們代表的是當時存在的勞工與社會主義黨

派的左翼。在這種環境下，「同志的成分是否純正往往可以從他在《宣言》中做的記號多寡來判斷」。[7]簡言之，《宣言》的讀者雖然有一部分是屬於新興的社會主義勞工政黨與勞工運動，但絕大部分幾乎不能作為他們所屬黨派的代表例證。他們是一群對運動背後的理論懷抱著特殊興趣的男女。至今也許仍是如此。

這種情況在十月革命後有了變化，至少在共產主義黨派是如此。不同於第二國際（一八八九至一九一四年）的群眾黨派，第三國際（一九一九至四三年）希望所有的成員都能理解或至少略微認識馬克思主義理論。能幹的政治領袖但對寫書毫無興趣，與考茨基這類「理論家」，廣為人知受人尊敬但從來不是參與實務的政策決定者，這兩種人的截然二分逐漸消失。在列寧之後，所有的領導人現在也必須身兼重要理論家的角色，因為所有的政策都要依據馬克思主義分析來取得合法性，或者更常見的是引用「經典」作為權威：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與經過一段適當過程後包括進來的史達林。馬克思與恩格斯作品的出版與流傳對運動的重要性要比在第二國際時期來得高。這些作品可以從簡單的小文章開始，在這方面最早進行的可能是德國威瑪共和國時期的《共產主義基礎書籍》（*Elementarbücher des Kommunismus*），與經過適當選擇的讀本，例如極有價值的《馬克思與恩格斯書信選》（*Selected Correspondence of Marx and Engels*）與兩冊（日後三冊）《馬克思與恩格斯選集》（*Selected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到《全集》（*Collected Works*）的準備——這些全由蘇聯共產黨（基於那些目的）無限制地支持編纂，而且通常在蘇聯出版時會以各種語言版本問世。

《共產黨宣言》從這個新局勢中獲得三個好處。它的流通量無疑大為增加。一九三二年，美國與英國共產黨的官方出版社出版的廉價版本，數量達到「數十萬冊」，「或許是英文版出現以來數量最多的版本」。[8]《宣言》不再只是歷史遺跡，而與當前的政治息息相關。由於有大國自稱是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代表者，《宣言》在政治科學裡的地位因此隨之水漲船高，成為大學（在二次大戰後快速擴張）課程的一部分。到了一九六〇與七〇年代，大學裡出現了大批帶著極大熱情從學術知識角度來研究《宣言》的人士。

蘇聯在二次大戰之後一躍成為世界兩大超強之一，成為眾多共產主義國家與附庸國的領袖。西方的共產主義黨派（德國除外），在戰後的發展遠遜戰前。雖然冷戰已經展開，但在紀念《宣言》問世百年的活動中，熱衷出版《宣言》的不只是共產主義或其他馬克思主義編輯，事實上，出版數量最多的反而是與政治無關的出版商，再搭配上卓越學術人士寫的導論。簡單地說，《宣言》不再只是馬克思主義的經典，它已經是一部政治經典。

即便蘇聯共產主義結束，世界各地馬克思主義政黨和運動衰微，《宣言》作為政治經典的地位仍屹立不搖。在沒有檢查制度的國家裡，只要有好的書店或好的圖書館，更甭說利用網路，每個人都能讀到《宣言》。新版本的目標因此不是讓這部令人震撼的大師作品為人所知，更不是重新回顧過去百年的學說爭議，爭論誰才是這部馬克思主義奠基作品的「正確」詮釋。它的目的應該是提醒我們，《宣言》仍然有很多話要向二十一世紀的我們訴說。

二

《宣言》有什麼話要說？

當然，《宣言》是在某個歷史時刻寫下的文件。有些內容幾乎是文件剛完成的那一刻就已經過時——例如，《宣言》建議日耳曼共產主義者實施某些戰術，然而不管是一八四八年革命還是之後，共產主義者都沒有採行。如果讀者離寫作之時已隔了一段時間，那麼顯然過時的內容會更多。基佐與梅特涅早已從政府退休，遁入歷史課本內，沙皇也已不存（不過教宗還在）。至於〈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論述〉的討論，馬克思與恩格斯在一八七二年時坦承，這一章已經過時。

更重要的是，隨著時光流逝，《宣言》的用語也與讀者的用語產生極大的差異。舉例來說，馬克思有一句話經常被人拿出來談，他說，資產階級社會的進展解救了「脫離了鄉居生活的蒙昧狀態（idiocy）」。無疑地，馬克思與當時的城市人一樣，對於農村生活充滿了鄙視與無知，然而實際上，這句耐人尋味的德文（'dem Idiotismus des Landlebens entrissen'）仔細分析起來指的並不是「蒙昧」，而是指農村民眾「視野的狹隘」或「孤立於廣大社會之外」。它呼應的是希臘文idiotes的原始意義——idiot或idiocy今日的意義就是從idiotes衍生出來的——指的是「只關心自己的私事，對整個社群漠不關心的人」。一八四〇年代之後的數十年間，從事運動的成員不像馬克思那樣受過古典學問的陶冶，因此他的遣詞用字往往原義完全喪失而遭到誤解。

這種現象在政治語彙上更明顯。有些詞彙，例如「等級」（estate）、「民主」（democracy）

與「民族／民族的」（nation/national），要不是無法運用在今日的政治上，就是已經完全喪失一八四〇年代政治或哲學論述裡使用的意義。舉個明顯的例子，《宣言》提到的共產黨，與現代民主政治的政黨根本毫無關係，也不是指列寧共產主義的「前衛黨」，更不能等同於蘇聯與中國的國家政黨。這些政黨形式在當時根本不存在。當時的「黨」本質上指的是一種意見或政策的傾向或潮流，不過馬克思與恩格斯也認為，一旦這些傾向或潮流在階級運動中獲得表達，就能發展出某種組織。因此在第四章才區別出「現存各工人黨派……比方說英國的憲章運動黨和美國的土地改革黨」以及其他尚未組織起來的民眾。[9]從《宣言》可以清楚看出，馬克思與恩格斯在這個階段指的共產黨並不是一種組織，也未嘗試建立組織，更甭說想建立一個能與其他組織區別的有特定綱領的組織。[10]附帶一提，《宣言》原本寫作的對象是共產主義者同盟，結果文中居然完全沒提到它。

此外，《宣言》顯然不只是特定歷史處境的成品，它也代表馬克思想發展的一個階段——相對不成熟的階段。這一點可以從《宣言》的經濟面向明顯看出。雖然馬克思從一八四三年起開始認真地研讀政治經濟學，但他一直要等到一八四八年革命後流亡英國之時，以及到了一八五〇年夏天得以進入大英博物館博覽眾書之後，他才真正發展出《資本論》裡的經濟分析。因此，我們在《宣言》裡還看不到無產階級出售自己的「勞動」（labour）給資本家，以及無產階級出售自己的「勞動力」（labour power，這是馬克思剩餘價值與剝削理論的核心）之間的區別。成熟時期的馬克思也不可能認為商品「勞動」的價格就是商品的生產成本，亦即，就是維持工人生存的生

理最低成本。簡言之，馬克思撰寫《宣言》時並不是一名馬克思派經濟學家，而是一名共產主義的李嘉圖學派人士。

然而，雖然馬克思與恩格斯提醒讀者《宣言》是一份歷史文件，在許多方面都已過時，但他們仍然提倡與資助一八四八年《宣言》的出版，只做了些許修正與澄清。[11]馬克思與恩格斯了解《宣言》仍是一份重要的分析陳述，可以用來區別他們的共產主義與其他創造更好社會的計畫。這項分析本質上是歷史的。它的核心是顯示社會的歷史發展，特別是資產階級社會。該社會取代了先前的社會，徹底改革了世界，但過程中必然也創造出條件，使自己不可避免遭到取代。與馬克思派經濟學不同，這種作為分析基礎的「歷史唯物主義概念」在一八四〇年代中期已經是相當成熟的論述，而日後也一直維持不變。[12]從這方面來看，《宣言》已是明確的馬克思主義文獻。它具體顯示了歷史願景，不過它的輪廓仍需以更充分的分析加以補充。

三

對於首次閱讀的讀者來說，《宣言》會留給他們什麼印象？新讀者很難不被這本小冊子裡熱情的信念、精簡的陳述、兼具知性與美感的文字力量所震懾。彷彿受到突發的靈感引導似的，這些寶石般的句子自然而然轉換成令人難忘的名言錦句，連遠離政治辯論的人也耳熟能詳：從文章一開始的「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遊蕩」，到文末的「除了枷鎖，無產階級沒

有什麼可以失去的。他們贏到的將是一整個世界。」[13]《宣言》的風格也迥異於十九世紀的德文寫作，它以簡短而邏輯環環相扣的段落寫成，每一段由一到五行構成，兩百多個段落之中只有五個段落的行數在十五行以上。無論如何，《宣言》是一篇具有近乎聖經力量的政治說詞。簡言之，你很難抗拒《宣言》的文學說服力。[14]

然而，《宣言》還有一個能令當時讀者印象深刻的特質，那就是它對「資產社會」的革命性格與影響下了非凡的診斷。馬克思承認與宣告他所憎惡的社會做出了不起的成就與具有驚人的活力，這令後世站在資本主義陣營對抗紅色威脅的批評家感到驚訝，然而這並不是《宣言》值得注意的地方。真正的重點是，馬克思於一八四八年以簡短、陰鬱的方式描述資本主義轉變世界的現象，似乎正反映著二十一世紀初的世界。耐人尋味的是，由兩名分別為二十八歲與三十歲的革命分子提出的在政治上脫離現實的樂觀主義，卻成了《宣言》能傳之久遠的重要力量。雖然「共產主義的幽靈」確實糾纏著政治人物，雖然歐洲正經歷一段重大的經濟與社會危機，而且即將爆發歐洲歷史上最大的遍及整個歐陸的革命，我們仍沒有適當的理由相信《宣言》的信念，認為推翻資本主義的時刻就要來臨（「德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只會成為緊接而來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序曲」）。相反地，我們現在知道，資本主義將泰然自若地迎接第一個在全球凱旋進展的時代。

有兩件事賦予了《宣言》力量。首先是《宣言》的願景，即使在資本主義如旭日東升的初始階段，它就預言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已非永久而穩定的「歷史之終結」，而是人類史的一個暫時階段，就像資本主義取代的社會一樣，資本主義也會被另一種社會取代（除非——《宣言》這

句話很少有人提及——它的創立者「參與鬥爭的各個階級玉石俱焚」）。其次是《宣言》承認資本主義發展必要的「長期」歷史趨勢。資本主義經濟的革命潛力已經是明顯的；馬克思與恩格斯並未主張只有自己看出了這一點。從法國大革命以降，他們觀察到的一些趨勢已明顯帶來重大影響——舉例來說，「原先有著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以及不同稅制的各自獨立、或僅僅鬆散聯繫的各地區」逐漸衰微，「一個具備統一政府、統一法典、統一民族階級利益、統一國境，以及統一關稅」的民族國家取而代之。儘管如此，到了一八四〇年代晚期，「資產階級」已實現的事物卻不像《宣言》預期的那麼浮誇。畢竟，在一八五〇年，世界生產的鋼鐵不超過七萬一千噸（幾乎有七成是英國生產），鋪設的鐵路少於兩萬四千英里（三分之二是英美鋪設）。歷史學家不難顯示，即使在英國，工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恩格斯從一八四四年起就特定地使用這個詞彙）[15]在一八五〇年代之前仍無法創造一個工業的乃至於以城市為主的國家。馬克思與恩格斯描述的不是一八四八年資本主義已經轉變的世界，而是預言理論上世界將如何地被資本主義轉變。

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這類轉變已大量發生的世界裡，即使已到了西曆第三個千禧年，《宣言》的讀者無疑仍察覺得到它還在不斷加速前進。某方面來說，我們比我們與《宣言》出版之間的世代更能清楚看到《宣言》預測的力量。生產全球化，「賦予每個國家的生產和消費一種世界主義的性格」，這些只有到了二戰後的運輸與通訊革命之後才得以實現。直到一九七〇年代為止，工業化絕大部分仍局限在發源地區。有些馬克思主義學派甚至認為，資本主義，至少就其

帝國主義形式來說，並未「讓所有設法救亡圖存的國家採取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資本主義本質上是不朽的，它甚至會在所謂的第三世界創造「低度開發」（underdevelopment）。由於人類有三分之一生活在蘇聯共黨經濟裡，因此資本主義似乎永遠不可能成功讓所有國家「變成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無法「根據自己的形象創造了世界」。同樣地，在一九六〇年代之前，《宣言》宣稱的資本主義將導致家庭的毀滅，這種情況似乎沒有得到證實，即使在先進的西方國家，今日約有半數兒童是由單親媽媽產下或養育的，而大城市有一半的家戶（households）是由單身者構成的。

簡言之，《宣言》在一八四八年可能只能讓那些將信將疑的讀者以為是一份革命文宣，頂多是份略有點可信度的預言，如今讀來則像是簡要地描述資本主義在新千禧年開始時的特徵。一八四〇年代，還有哪些文獻能做到這一點呢？

四

然而，如果我們對於《宣言》能敏銳預言未來龐大的全球化資本主義而感到印象深刻，那麼《宣言》另一項預測的失敗則同樣令人吃驚。現在已可以明顯看出，資產階級並未從無產階級中生產出「自己的掘墓人」。「資產階級的敗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證明不是「同樣指日可待」。《宣言》在〈資產者與無產者〉一章中做的分析，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結果，這種情況在一百

五十多年後吸引了比十九世紀更多的人對此進行解釋。

馬克思與恩格斯認為資本主義必然會讓絕大多數在這種經濟裡謀生的人們，轉變成仰賴兜售自己以換取工資或薪水才能維持生計的男女，這種看法並無疑義。儘管今日有些技術上屬於受薪階級的人士（例如企業執行者），其所得絕不能算是無產階級，但不可否認資本主義確實有此傾向。問題也不是出在馬克思與恩格斯相信絕大多數工人人口構成了「工業」勞動力。英國的受薪手工工人（wage-paid manual workers）占了人口的絕大多數，這在當時是屬於特例。《宣言》完成後的一百多年間，工業生產發展仍需要大量而不斷成長的手工工人源源不斷地投入。顯然，現代資本密集高科技生產已非如此，這種發展是《宣言》難以慮及的。然而事實上，馬克思在其更成熟的經濟研究裡已經預見到未來可能發展出勞動日益減少的經濟，至少在後資本主義時代是如此。[16]即使在老牌的工業資本主義經濟裡，製造業雇用的人員比例直到一九七〇年代為止依然維持穩定。美國是例外，其雇用人員比例的衰退要比各國早一點。事實上，除了極少數國家，如英國、比利時與美國，一九七〇年時工業工人在已工業化與正在工業化的國家裡占總就業人口比例恐怕還比過去更高。

無論如何，《宣言》預想的資本主義遭到推翻，並不是仰賴就業人口的「絕大多數」先轉變成無產階級，而是立基於以下的假定：在資本主義經濟中，無產階級的處境既是如此，一旦被組織成必要的政治階級運動，就能登高一呼，糾合其他心存不滿的階級，發起「絕大多數人參與的、為著絕大多數人利益的獨立運動」以獲取政治權力。因此，無產階級將「得朝成為民族的領

導階級努力，得把自身組織成一個民族」。[17]

由於資本主義並未遭到推翻，因此我們很容易對《宣言》的預測嗤之以鼻。然而，雖然在一八四八年時看起來完全不可能，但絕大多數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卻因為有組織的政治運動而逐漸轉變。這些政治運動以具有階級意識的工人階級為基礎，不過在此之前卻很少出現在英國以外的國家。勞工與社會主義政黨於一八八〇年代在「已開發」世界大部分地區出現，並且在他們熱心推動的民主普選制下成為國內的群眾政黨。在一次大戰期間與之後，有一支「無產階級政黨」走上布爾什維克的革命道路，另一支則成為民主資本主義的永久支柱。布爾什維克那支在歐洲已經無足輕重，那類的政黨或也被併入了社會民主黨。社會民主黨派，如倍倍爾乃至於艾德禮（Clement Attlee）的時代所理解的，在一九九〇年代打著一場無望獲勝的戰鬥。然而，到了二十世紀末，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派的後裔，有時還冠著原初的黨名，幾乎在所有西歐國家（除了西班牙與德國）均取得執政的地位。過去社會民主政黨在西班牙與德國都曾執政，未來他們當然有可能再度上台。

簡言之，有問題的不是《宣言》預測以工人階級為基礎的政治運動（他們有時仍冠上階級的名稱，例如英國、荷蘭、挪威與澳洲工黨）能扮演核心角色。而是這個論點：「在所有和資產階級對立的階級之中，唯獨無產階級才是真正的革命階級。」無產階級不可避免的命運，就隱含在資本主義的本質與發展中，無產階級終將推翻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的敗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同樣指日可待。」

即使在惡名昭彰的「饑餓四〇年代」，使勞工不可避免陷入貧困的機制也未盡可信；[18]除非是基於這樣的假定（但在當時聽來也不合理），即資本主義正處於最終的危機時刻，「立即」會遭到推翻。這種機制具有雙重性質。貧困化除了影響工人運動，也證明資產階級「無法繼續統治，是因為它甚至不能讓自己的奴隸維持最低的生活水平，是因為它讓自己的奴隸淪落到必須由它來餵養，而不是由奴隸來餵養它」。因此，勞動非但無法提供獲利以作為資本主義引擎需要的燃料，反而將其耗盡。但是，如果照《宣言》說的資本主義擁有如此龐大的經濟潛力，那麼為什麼資本主義不可避免地無法為絕大多數工人階級（無論他們多悲慘）提供生計，或者換句話說，無法提供他們福利制度？為什麼「貧困〔就嚴格意義來說〕甚至發展得比人口與財富都要來得迅速」？[19]如果資本主義還有很長的壽命——這在一八四八年後很快就變得非常明顯——那麼貧困不必然會發生，事實上也沒有發生。

《宣言》對「資產階級社會」歷史發展抱持的願景——包括資產階級社會產生的工人階級——不必然導致這樣的結論，即無產階級將推翻資本主義，並且因此開啟共產主義的發展道路，因為願景與結論並非源於相同的分析。共產主義的目標——早在馬克思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前即已確定——不是源於對資本主義的本質與發展所做的分析，而是源於一個關於人性與人類命運的哲學甚或是末世論的觀點。馬克思始終存有一種基礎觀念，認為無產階級是一個階級，它不可能在解放自己的同時，卻沒有連同整個社會一同解放，這種觀念最早是以「哲學推論的樣貌出現，而不是實際觀察得到的結果」。[20]如李希特海姆所言：「無產階級在馬克思的作品中首次出現，是

為了實現德國哲學目標而需要的社會力」，馬克思在一八四三年到一八四四年正是這麼想。[21]

在這個時期，馬克思眼中的無產階級不過是「德國興起的工業發展的結果」，因此無產階級才具有解放的力量。無產階級不同於傳統社會貧窮群眾，他們是「社會劇烈瓦解」的子嗣，它的存在「宣告了存在至今的社會秩序的瓦解」。馬克思對勞工運動的了解更少，雖然他知道許多法國大革命的歷史。恩格斯後來成為他的夥伴，帶給他「工業革命」的概念，使他了解實際存在於英國的資本主義經濟的動力，以及初步的經濟分析，[22]而這些知識也使馬克思開始預測未來的社會革命。馬克思於一八四〇年代初曾在英國生活與工作，因此認識了許多工人階級，正是這些工人階級促成了社會革命。馬克思與恩格斯對「無產階級」與共產主義的切入途徑是互補的。他們對階級鬥爭是歷史的發動機的概念也是如此，馬克思的想法主要源於對法國大革命時代的探討，恩格斯的想法則源於後拿破崙時代英國社會運動的經驗。因此當他們發現彼此（用恩格斯的話來說）「在所有理論領域意見一致」時，一點也不感到意外。[23]恩格斯帶給馬克思能顯示資本主義經濟運作之波動與自我顛覆本質的模式元素——尤其是經濟危機理論的概觀[24]——以及有關英國工人階級運動的興起及其在英國扮演的革命角色的經驗資料。

一八四〇年代，社會正瀕臨革命的說法並非毫無道理。工人階級，無論再怎麼不成熟，也將領導革命，這類預言也有其合理之處。畢竟，在《宣言》出版的幾個星期之內，巴黎工人運動就推翻了法國王政，並且在半個歐洲打響了革命的旗號。儘管如此，資本主義發展傾向於產生本質上帶有「革命性」的無產階級，這種論點無法從資本主義發展本質的分析中推導出來。它是這種

發展的可能結果，但不一定是唯一可能的結果。更難以證明的是，無產階級成功推翻資本主義必然能開啟共產主義發展之路。（《宣言》的說法如出一轍，它認為之後可以開啟一段非常漸進改變的過程。）[25] 馬克思對無產階級抱持的期盼——無產階級的本質使它注定要推翻資本主義，解放所有人類，並且終結階級社會——說明他把自己的希望與對資本主義的分析混為一談，但這絕非分析必然能導出的結論。

《宣言》對資本主義的分析無疑將導出——特別是馬克思對經濟集中做的分析進一步延伸了《宣言》的論述，不過在一八四八年還很少談到這些——較為一般且較不明確的結論，也就是資本主義發展本身即具有自我毀滅性質。資本主義勢必會發展到一個階段——時至今日已不只馬克思主義者同意這一點——屆時「有著獨特生產、交換，與財產關係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一個曾經創造出如此巨大的生產及交換工具的社會，現在卻如同一個巫師，他在從幽冥之地召喚出魔鬼後，發現自己竟然控制不了它……資產階級社會的條件太過狹窄了，容納不了它自身創造出的財富。」

由此得出的結論並非完全不合理，那就是「人與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係，除了冷酷的『現金交易』之外，再沒其他的聯繫」為基礎的市場體系，這種剝削與「無止盡的積累」的系統，其內在固有的「矛盾」是永遠無法化解的；到了某個階段，在經歷了一連串的轉變與重構之後，這個本質上帶有自我顛覆性質的體系，將發展出一種無法再稱之為資本主義的狀態。或者我們可以引用馬克思晚期的說法，當「生產工具集中化與勞動社會化終於達到一個階段，使它們無

法與自身的資本主義外殼相容時」，則「外殼會炸成碎片」。[26]資本主義以後的狀態該怎麼稱呼並不重要。然而，隨著世界經濟爆炸對世界環境的影響日益顯著，我們必須趕緊改弦易轍，在全球的尺度下，將私人的奪占轉變成社會性的管理。

這種「後資本主義社會」要與傳統的社會主義模式相容是極不可能的，更甭說要與「實際存在的」蘇聯時代社會主義搭配。未來能採取什麼形式，以及能如何具體化馬克思與恩格斯共產主義的人文主義價值，將必須仰賴政治行動，唯有政治行動才能造成改變。如《宣言》所言，如此才能塑造歷史變遷。

五

在馬克思的觀點中，無論我們如何描述「外殼會炸成碎片」的歷史時刻，政治都將是其中的核心元素。《宣言》主要被解讀成一份昭告歷史之必然性的文件，事實上，《宣言》的力量主要來自它傳達給讀者的信心，即相信資本主義不可避免將被自己的掘墓人埋葬，而且就是現在，而非在歷史上更早的時代，人類解放的條件將要實現。然而，與人們普遍認為的相反，《宣言》相信歷史變遷是透過人創造自己的歷史而產生，從這點來看，《宣言》的史觀並非決定論的。墳墓的挖掘仍需透過人的行動才能實現。

從決定論的觀點來解讀《宣言》確實不無可能。有人認為，恩格斯理所當然比馬克思更傾向

於決定論，在馬克思死後，他的想法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與馬克思主義勞工運動有著重要影響。然而，雖然恩格斯初期的草稿可以作為證據，[27] 但實際上我們卻不能用恩格斯的想法來解讀《宣言》。當《宣言》離開了歷史分析領域而進入到現在時，它就成為一份關於選擇的文件，在政治上只有些許的機會，確定性則更談不上。「現在」必須透過政治行動才能抵達不可預測的未來，到那時，「隨著歷史的演變」，會有「一種新組織，在那裡，因為每個人皆可自由發展，所以所有人也皆可自由發展。」

透過社會實踐，透過集體行動來完成歷史轉型是《宣言》的核心。《宣言》認為無產階級的發展是「糾合成階級，進而組織政黨」。「由無產階級掌握政權」（「打贏民主的戰爭」）是「工人革命的第一步」，而社會的未來決定於新政權隨後的政治行動（「無產階級將如何利用其政治大權」）。對「政治」的投入是歷史上用來區別馬克思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一項標準，同時也使馬克思社會主義不同於其他社會主義者後繼者，對於後者，《宣言》曾明確指責他們反對一切政治活動的態度。早在列寧之前，馬克思理論關注的已不只是「歷史的教訓」，也包括「必須做的事」。不可否認，二十世紀的蘇聯經驗告訴我們，或許在根本不可能成功的歷史條件下，不做「必須做的事」會比較好。但這個教訓也許也能從思考《宣言》的意涵中獲得。

此外，《宣言》也是一份預想到失敗之到來的文件——在《宣言》諸多特質中，這一點同樣引人注目。《宣言》希望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是「整體社會得到革命性的改造」，然而如我們所見，《宣言》卻未排除另一項選擇：「各個階級玉石俱焚。」

許多年後，另一名馬克思派分子以不同的方式將其表達為社會主義與野蠻之間的選擇。哪一項將會勝出，這個問題必須留待二十一世紀來回答。

注釋：

1 關於共產主義者同盟，最完整的介紹是Martin Hundt, *Geschichte des Bundes der Kommunisten 1836-52* (Frankfurt am Main, 1993)；關於《共產黨宣言》的背景，見Gareth Stedman Jone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Penguin Classics, 2000)。關於原始版本，見Wolfgang Meiser, *Das 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vom Februar 1848*; 'Zur Entstehung und Ueberlieferung der ersten Ausgabe' in *MEGA Studien*, 1996, vol. 1, pp. 66-107。

2 我們只發現兩件與初稿有關的物品——撰寫第三章的計畫，以及一張草稿頁。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6, pp. 576-7。

3 撰寫者一生曾寫過的序言如下：(1)一八七二年德文版（第二版）序言；(2)一八八二年俄文版（第二版）序言——這是最早的俄文版本，巴枯寧翻譯，出版於一八六九年，可以理解當時並未得到馬克思或恩格斯的祝福；(3)一八八三年德文版（第三版）序言；(4)一八八八年英文版序言；(5)一八九〇年德文版（第四版）序言；(6)一八九二年波蘭文版序言；與(7)一八九三年義大利文版序言，〈致義大利讀者〉。

4 Paolo Favilli, *Storia del marxismo italiano: Dalle origini alla grande guerra* (Milan, 1996), pp. 252-4.

5 這些珍貴的數據來自於Bert Andréas, *Le Manifeste Communiste de Marx et Engels. Histoire de Bibliographie 1848-1918* (Milan, 1963)。

6 數據來自於社會民主黨*Parteitage*的年報。然而，這裡少了一八九九年與一九〇〇年理論刊物的出版數量紀錄。

7 Robert R. LaMonte, 'The New Intellectuals', in *New Review* II, 1914，引自Paul Buhle, *Marxism in the USA: From 1870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 1987), p. 56。

8 Hal Draper, *The Annotated Communist Manifesto* (Center for Socialist History, Berkeley, 1984), p. 64.

9 這一章一開始德文是這麼說的「das Verhältniss der Kommunisten zu den bereits konstituierten Arbeiterparteien... also den Chartisten」等等。一八八七年正式的英文翻譯經過恩格斯的修正，稍微減輕了中間的對比。

10 「共產黨人不是與其他工人階級政黨對立的特殊政黨……他們不提出任何屬於自身的黨派原則，來形塑與鑄造無產階級運動。」（第二章）。

11 最著名的是——這一段話被列寧特別強調——一八七二年序言裡說的，巴黎公社已然顯示「工人階級無法輕易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且運用它來達成自己的目的」。馬克思死後，恩格斯增添了一個腳注，用來修正第一章的第一句話，把史前社會排除在階級鬥爭的普世範圍之外。然而，無論是馬克思還是恩格斯，似乎都不打算針對《宣言》裡的經濟部分進行評論或修改。馬克思與恩格斯是否曾想更充分地「修改與補充」《宣言》（一八八三年德文版序言）容有疑問，但絕不是因為馬克思的死才使重寫不可能實現。

12 比較《宣言》第二章的文字（「人的思想、視野、觀念，簡言之，人的意識，都會隨著他的物質環境條件、他的社會關係與他的社會生活的改變而改變，這難道需要深刻的洞察力才能理解嗎？」）與〈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相應的文字：「不是人類意識決定人類的存在，相反地，是人類的社會存在決定人類的意識。」

13 雖然這是恩格斯同意的英文版本，但嚴格來說並非正確的譯文：「Mögen die herrschenden Klassen vor einer kommunistischen Revolution zittern. Die Proletarier haben nichts *in ihr*〔'in it'，意即'in the revolution'：我的強調〕zu verlieren als ihre Ketten。

14 關於風格的分析，見S. S. Prawer, *Karl Marx and World Literature* (Oxford, NY, Melbourne, 1978), pp. 148-9。我所知道的《宣言》譯文並未具有德文原文的文學力量。

15 見*Die Lage England. Das 18. Jahrhundert* (*Werke* 1, pp. 566-8)。

16 相關例子的討論見'Fixed capital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ductive resources of society' in the 1857-8 manuscripts, *Collected Works* vol. 29 (London, 1987), pp. 80-99。

17 原文德文是這麼寫的，「sich zur nationalen Klassen erheben」，這句話帶有黑格爾的思想意涵，恩格斯授權的英文譯本做了修正，或許是因為他覺得若不這麼做一八八〇年代的讀者無法理解。

18 貧困（pauperism）與poverty不見得相同。德文Pauper（「貧困者……受慈善團體捐助或公共救濟度日的人」——*Chambers' Twentieth Century Dictionary*）與Pauperismus（「貧困的狀態」——同前引書）是從英文慣用語借用的說法。

19 弔詭的是，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提出的論點，今日卻有資本家與自由市場政府廣泛引用來證明，一個國家的經濟，即使其國民生產毛額每數十年就能增長一倍，如果他們不廢除所得移轉制度（福利國家等等）——在貧困時期實施，由賺錢的人來維持無法賺錢的人的生活——那麼遲早會破產。

20 Leszek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vol. 1, *The Founders* (Oxford, 1978), p. 130.

21 G. Lichtheim, *Marxism* (London, 1964), p. 45.

22 出版為*Outlines of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1844 (*Collected Works* vol. 3, pp. 418-43)。

23 *On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League* in *Collected Works* vol. 26 (London, 1990), p. 318.

24 *Outlines of a Critique* (*Collected Works* vol. 3, p. 433ff). 這似乎源於激進的英國作家，特別是John Wade, *History of the Middle and Working Classes* (London, 1833, p. 428)，恩格斯曾在談論各種影響提到他。

25 從恩格斯兩份堪為《宣言》初稿的陳述更能清楚看出這一點，*Manifesto: Draft of a Communism Confession of Faith* (*Collected Works* vol. 6, p. 102) and *Principles of Communism* (ibid., p. 350)。

26 From 'Historical Tendency of Capitalist Accumulation' in *Capital* vol. I (*Collected Works* vol. 35, p. 750).

27 G. Lichtheim, *Marxism*, pp. 58-60.

第六章 探索《政治經濟學批判綱要》*

《政治經濟學批判綱要》（以下簡稱《綱要》）在馬克思全集中的地位及其命運，就許多方面來看均相當獨特。首先，《綱要》是馬克思成熟期作品中，唯一在馬克思死後超過半世紀以上的時間未被馬克思主義者知悉的作品；事實上，在這批手稿被編纂成書（日後冠上現在這個書名）之後，幾乎有一個世紀的時間沒有人知道這部作品。無論人們如何爭論《綱要》的重要性，這部在一八五七年到五八年完成的作品，顯然是撰寫《資本論》的思想努力的一部分，它代表了馬克思成熟期的思想，顯示此時的馬克思已不只是一名經濟學家。因此，《綱要》不同於另一部在馬克思死後加以編纂而後收錄到全集中的作品，一九三一年《早期作品集》(*Fruehschriften*)。馬克思一八四〇年代初期的作品在其理論發展上的確切地位一直充滿爭議（有人持正面評價，也有人提出負面看法），但談到一八五七年到五八年作品的成熟度，大家卻毫無異議。

其次，有點令人驚訝的是，出版《綱要》完整本的地方，居然是最不利於開展馬克思研究與

---

* 本章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綱要》第一部英譯本的導論。本章引用的是原初版本的頁碼（Lawrence & Wishart, 1964）。

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地方，即史達林大權在握時的蘇聯與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即使到了更晚的時期，馬克思與恩格斯作品的出版仍需經過政治當局的許可，負責處理馬恩作品外國版本的編輯，更有理由詳加查問。我們仍不清楚出版的障礙是如何克服的，包括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Marx-Engels Institute）遭到整肅，而研究所的創始人與所長甚至遭到撤換乃至於謀殺，或從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九年負責手稿事宜的保羅．威勒是如何活過一九三六年到三八年的恐怖時期。或許，《綱要》之所以能夠出版是因為當時的高層並不是很清楚這部大部頭而困難的作品到底能做什麼。然而，他們還是對《綱要》的確切地位感到懷疑，尤其史達林認為這些手稿絕對不比三大冊的《資本論》更能反映馬克思成熟時期的立場與觀點。《綱要》一直要到一九六八到六九年才出現完整的俄文譯本，而不管是一九三九年到四一年的（莫斯科）德文版初版，還是一九五三年的（柏林）再版版本，兩者都未收錄到（不全的）蘇聯版馬克思與恩格斯選集中——通常以首字母縮寫表示為MEGA——或成為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一部分。然而，與一八四四年《早期作品集》不同，《早期作品集》在MEGA（1932）首次出現後，就在官方的馬克思全集中消失，但《綱要》卻實際在蘇聯出版，即使在史達林的巔峰時期也未受到影響。

第三個獨特之處，在於一八五七年到五八年手稿的地位長期以來妾身未明，它反映在一九三〇年代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所不斷變動的論文名稱上。這些手稿一直要到即將付梓之前，才被冠上《綱要》之名。事實上，這些手稿與已出版的《資本論》（由馬克思撰寫，恩格斯整理）以及作為《資本論》第四冊的《剩餘價值論》（由考茨基根據馬克思一八六一年到六三年

筆記編纂而成）之間關係的確切本質，至今仍有爭論。考茨基曾經仔細閱讀過這些手稿，但似乎不知道該怎麼處理。他曾在自己的評論雜誌《新時代》（*Die Neue Zeit*）裡收錄其中兩篇文章，而後就不置可否。這兩篇文章分別是簡短而幾乎沒有任何影響力的〈巴斯提亞與凱瑞〉（Bastiat and Carey, 1904），以及所謂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綱要導言〉（Introduc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1903），這篇文章從未完成，因此並未於一八五九年連同《政治經濟學批判綱要》一同出版。它成為想把馬克思主義詮釋延伸到正統說法以外之人的早期文獻，例如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導言〉的撰寫時間或許是《綱要》至今被討論最多的一個部分，不過近年來也有評論者懷疑〈導言〉與《綱要》是否同屬一部作品。其他手稿並未出版，實際上也不為評論者所知，直到一九二三年里雅札諾夫與他的同事在莫斯科發現了影印本，他們將文章整理排序，計畫將其收錄在MEGA中。如果這本書確實按照計畫在一九三一年出版，那麼它可能帶來什麼影響，值得讓人深思。這些文章實際出版的日期在一九三九年年底，以及一九四一年希特勒入侵蘇聯後的一個星期，這意謂著直到一九五三年這本書在東柏林再版前，西方幾乎完全不知道有這部作品。雖然一九四八年後有少數複本運到美國進行分析，但在一九六七年到六八年之前都未曾出版。進行分析的是偉大的《綱要》先驅詮釋者羅曼．羅斯多爾斯基（1898-1965），他在奧什維茨（Auschwitz）與其他集中營裡存活下來，後來到了美國。這批最初的德文版作品被送到前線做為反德軍的煽動材料，而後又送到集中營做為戰俘的閱讀資料，我們很難相信這麼做能獲得什麼理論或實踐目標。

為什麼一九三九年與一九四一年重印的完整版本——這個版本成為公認的《綱要》手稿初版珍本——會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出版的前幾年於一九五三年在東德出版，而且兩者刻意分開？原因我們不清楚，不過有人提出了一些看似合理的說法。直到一九六〇年代，《綱要》一直未成為馬克思研究中一個重要標的，除了一個例外。這個例外就是《綱要》裡的一節，〈資本主義生產前的形式〉（'Forms that precede capitalist production'），這篇文章首次獨立成冊是在一九三八年以俄文印行（比它略早的是一篇討論金錢的文章），而後是一九四七年日文版，一九五二年德文版。然後很快被譯為匈牙利文、日文與義大利文（1953-4），而且顯然在英語世界的馬克思主義史家圈子裡廣受討論。英譯本連同解釋性的導論（1964）不久就譯為西班牙文在阿根廷與佛朗哥西班牙（1966-7）出版。這篇文章大概特別能引起馬克思主義史家與社會人類學家的興趣，此外，它也與受到熱烈討論的馬克思主義對第三世界社會的分析有著特定的關聯性，這些因素有助於解釋為什麼這篇文章會在完整的《綱要》受到重視之前就廣泛流通。這篇文章也有助於人們理解「亞細亞生產模式」論戰，這類爭論因為魏特夫《東方專制主義》（*Oriental Despotism*, 1957）這類作品的出現而在西方再次引發激辯。

一八五七年到五八年手稿的「接受史」（Rezeptionsgeschichte）實際發軔於一九五六年危機之後，在已非鐵板一塊的共產黨內外，有許多人開始致力於讓馬克思主義從蘇聯正統教條的約束衣中解放出來。一八四四年作品與一八五七年到五八年手稿雖然不屬於「經典」全集，但毫無疑問是馬克思的作品，因此仍被共產黨內部視為具正當性的能打入經典封閉地位的作品。幾乎在此

同時，國際上發現的葛蘭西作品——他的作品首次在蘇聯出版是在一九五七年到五九年——也具有相同功能。一些非官方的自由譯本的出現，例如法國人文出版社（French Editions Anthropos, 1968）的改革主義者，以及《新左派評論》（*New Left Review*）贊助的馬丁．尼可勞斯，顯示《綱要》有走向異端的潛力。在共產黨外，《綱要》可以為不屬於共產黨但同樣無可質疑的馬克思主義進行合理化，但這個特點一直要到一九六〇年代學生暴動時才在政治上產生重要性，不過，有一些親近法蘭克福傳統的德國學者早在一九五〇年代就已經對此有所認識，只不過他們不處於政治活動的脈絡裡，例如李希特海姆與年輕的哈伯瑪斯。在快速擴張的大學，學生激進化也提供了比過去預期更多的讀者來閱讀這些極為困難的文本。但對於像企鵝圖書（Penguin Books）這種商業出版社來說，卻尚未做好出版《綱要》的準備，儘管它大可將這本書排入「佩利肯馬克思文庫」（Pelican Marx Library）中。在此同時，蘇聯也勉為其難地承認《綱要》是馬克思作品的必要部分，並且於一九六八年到六九年將其收錄到上一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裡，不過它的發行量比《資本論》少得多。匈牙利與捷克斯洛伐克也尾隨其後出版了《綱要》，而中國在毛時代結束後也跟進了。

因此，要區分出《綱要》的論戰與論戰得以產生的政治背景並不是那麼容易。在一九七〇年代，當論戰白熱化之時，討論圈也蒙受世代或文化的損失，許多曾做出劃時代貢獻與擁有高深學識的先驅世代馬克思文獻學者（主要分布在中歐與東歐）紛紛離世，如里雅札諾夫與羅斯多爾斯基。有些嚴謹的研究其實來自於年輕一輩的托羅茨基派知識分子，他們的基礎建立在先前對一八

五七年到五八年手稿在馬克思思想發展中的地位所做的分析，更具體來說則是這些手稿在日後成為《資本論》主體的一般計畫中所居的地位。然而，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論戰也可能由法國的路易・阿圖塞與義大利的安東尼奧・內格里這類作家發起，他們對馬克思主義文獻沒有充分的認識。往後論戰又由年輕男女接手進行，他們很可能對作品所知不多，或沒有能力（也許這只是因為語言的隔閡）對過去的爭論做出判斷。

《綱要》出現的時代，馬克思主義黨派與運動在全球場景中仍是個不起眼的角色，與《綱要》的學說、策略、方法與目標有關的辯論，也不必然成為討論馬克思、恩格斯及其追隨者作品所需的思考架構。然而《綱要》出現的時代，也是世界已經證明馬克思對資本主義體系的操作模式具有真知灼見的時代。或許，此時正是大好良機，讓我們不用受限於從赫魯雪夫清算史達林開始到戈巴契夫下台為止左翼政治的權宜思考。《綱要》就各方面來看都是極難懂的文本，然而仔細閱讀將帶給你極大的收獲，它提供的是完整的思路，相較之下，《資本論》只是它的一環，而它也是一篇獨特的導論，能讓我們領略馬克思成熟期的方法論。《綱要》包含了分析與洞察，例如科技問題，馬克思對科技的看法使他在討論資本主義時能超邁十九世紀的局限，展望一個不需要大量勞工從事生產、全面自動化、可以從事休閒以及在這種狀況下異化開始轉變的社會。《綱要》是唯一一部超越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暗示共產主義未來的作品。簡言之，這本書可以正確地形容為「最豐富地呈現了馬克思思想」。

第七章 馬克思論資本主義以前的各種形構

一

在一八五七到五八年，馬克思在準備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和《資本論》時撰寫了大量手稿。一九三九年到四一年在莫斯科出版，書名為《政治經濟學批判綱要》（*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雖然部分文摘已經在一九〇三到〇四年出現在《新時代》（*Neue Zeit*）。由於出版的時間和地點的緣故，它一直乏人問津，直到一九五二年在柏林出版部分內容的抽印本，一九五三年則在柏林出版整部作品。一九五三年的德文版一直是唯一可取得的版本。所以說，《政治經濟學批判綱要》屬於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未發表的大量手稿，直到一九三〇年，才成為初步研究的資料。* 其中大部分手稿，例如以下會大量討論到的《一八四四年經濟學

---

* 本章另見於：Pre-Capitalist Economic Foundations (Lawrence & Wishart, London, 1964)，作為《政治經濟學批判綱要》其中一節的導論。本章引用頁碼都是出自該版本。（譯按：《馬克思恩格斯文集》卷八中的《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構》中譯不具參考價值，不擬引用。霍氏採用的英譯問題非常大，文中引言為中譯者從德文自行翻譯。）

哲學手稿》，都屬於青年時期的馬克思及馬克思主義。可是，《政治經濟學批判綱要》則屬於他的成熟期。它們是在英國密集研究的成果，顯然代表在一八六〇年初期撰寫《資本論》不久前的思想階段，如前所述，它們是《資本論》的預備工作。所以說，《政治經濟學批判綱要》是成熟期的馬克思在走向大眾前的最後主要作品。

既然如此，我們很訝異它們居然乏人問津。尤其是其中題為〈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構〉（Formen, die der Kapitalistischen Produktion vorhergehen）的幾節，於其中，馬克思試圖解決前資本主義的歷史演化的問題。這些並不是不重要的或隨興的筆記而已。正如馬思思很自豪地寫信給拉薩爾（一八五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時所說的，《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構》不只代表「十五年研究的結果，可以說是我一生最好的歲月」，它們更突顯馬克思最才華橫溢而深刻的時期，從各個方面去看，都是《政治經濟學批判》波瀾壯闊的序言不可或缺的補編，該書在不久後即寫成，並且闡述了歷史唯物論的雛型。我們可以不加思索地說，大部份馬克思主義歷史的討論，無論是一九四一年以前幾乎所有的討論，以及（很遺憾地）其後的許多討論，幾乎沒有將《政治經濟學批判綱要》考慮進去，所以我們必須以它的觀點重新思考那些討論。

然而，它之所以無人聞問，有若干顯而易見的理由。一如馬克思對拉薩爾所說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綱要》「是專題著作，在許多很不同的時期裡寫成的，是我用來澄清問題的，而不是出版的」。讀者不僅必須對馬克思的思想語彙如數家珍——也就是他的整個思想演化，尤其是黑格爾主義——在個人思想的陳述上總是一筆帶過，有時候甚至不得其門而入，它們經常只是散見各

處的粗略旁注，雖然馬克思一看就懂，對我們而言，卻經常很模稜兩可。任何試圖去翻譯手稿、甚或研究或詮釋它的人們都會知道，有時候，某些有如神諭一般的段落，我們很難完全沒有疑義地指出它們意指為何。

即使馬克思不厭其煩地把他的意思說清楚講明白，它們仍然絕非老嫗能解的東西，因為他的分析總是以相當高的概括性去陳述，也就是說，用非常抽象的語詞。馬克思最在乎的——正如《政治經濟學批判》前言所說的——是界定**所有**社會變遷的一般性機制：生產的社會關係的形式，它對應於生產物質力的特定發展階段；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週期性的發展；「社會革命的各個時期」，在其中，生產關係會再度適應生產力的程度。這個一般性的分析並不蘊含著任何關於特定歷史時期或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陳述。於是，在前言裡甚至不曾出現「階級」一語，因為階級只是生產的社會關係在特殊歷史時期（儘管歷時甚久）裡的個例。而唯一真正談到歷史形式和時期的地方，只有關於「社會經濟形式的演進的各個時期」相當簡略的、未加證明或解釋的列舉——也就是「亞洲、古代、封建時代和近代的資產階級」，最後一種則是生產的社會演進的最後一個「敵對性」形式。

相較於《政治經濟學批判》前言，《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構》更一般化，也更有特定性，儘管它們也不是狹義的「歷史」（我們必須開宗明義地指出這點）。其中一個面向是，該手稿想要在社會演化的分析或是任何主題的合理理論裡呈現任何**每一個**辯證性格。它嘗試要掌握，也的確真的掌握了那些思想體系、普遍性以及首尾一貫的內在邏輯的種種性質，科學家們經常稱之

為「美」或「優雅」的東西，它利用黑格爾的辯證法去探討那些性質，儘管其基礎是唯物論的，而不是唯心論的。

於是我們馬上轉到第二個面向。《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構》嘗試就歷史最一般性的形式去表述它的**內容**。這個內容就是**演進**。無論是否認歷史演進的存在的人，或是主張（經常只是基於馬克思不成熟時期的作品）馬克思的思想只是解放人類的倫理訴求，在這裡都會發現他們站不住腳。對於馬克思而言，進步是可以客觀定義的東西，它同時會指出有利的方向。馬克思主義相信所有人類的自然發展終究會得到勝利，它的立論基礎不在於馬克思自己一廂情願的想法，而在於他假設為正確的分析，指出歷史發展最終會引領人類走到那裡。

馬克思的人本主義，當然還有他的社會和經濟演化理論，其客觀基礎在於他將人類視為社會性動物去分析。人，或者更好說是人們會從事**勞動**，也就是說，在日常事務上，呼吸，尋找食物、棲所、愛等等，他們會創造且複製他們的存在。他們在大自然**裡頭**為之，為了這個目的而取自大自然（最後也有意識地改變了自然）。人和自然的這種互動就是（也會產生）社會演化。取自大自然，或是決定要利用一點大自然（包括他自己的身體），在一般的說法裡，的確可以說是占用，因此它最初只是勞動的一個面向。它就表現在**所有權**的概念裡（它和**私有**財產的歷史特例完全是兩回事）。馬克思說，最初，「勞動者及其勞動的客觀條件的關係，是所有權的關係；這是勞動和它的物質（sachliche）前提的自然統一。」（p. 67）作為一個社會性的動物，人發展了合作以及**社會分工**（也就是功能的專化），生產**多過於**個人及其所屬共同體生存維繫所需的生

產，不僅是合作和社會分工的可能性前提，後者也會提高生產過剩的機會。生產過剩以及社會分工的存在，使得**交易**成為可能。可是起初生產和交易的對象只是**使用**，也就是生產者及其共同體的生存維繫。這些是理論建構的主要分析性基礎，而它們其實都是從作為某種社會性動物的人的原始概念延伸或推論出來的。[1]

歷程的演進可見之於人類逐漸從自然解放出來，逐漸支配自然。人擺脫原始人類在謀生時既有的環境，擺脫從動物演化到人類族群時所產生的原始而自然的（或如馬克思所說的「天然的」〔naturwüchsig〕）關係，因而不僅改變了生產力，也改變了生產關係。而後者正是《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構》所要探討的。一方面，人因為勞動的專化——尤其是**交易**——而踏入的種種關係，會越來越明確而繁複，直到**貨幣**的發明以及隨之而起的**商品生產**和交易提供了以前無法想像的種種程序（包括資本積累）的基礎。（這個歷程，儘管在一開頭就提到〔p. 67〕，卻不是它的主要論旨。）另一方面，當人越來越遠離和大自然的「天然的」或自然演化而成的原始關係，勞動和所有權的雙重關係就會逐漸瓦解。那是「自由勞工逐漸脫離他的實現的客觀條件，脫離勞動工具（Arbeitsmittel）以及勞動原料……因此，尤其是勞工脫離作為其自然的實驗室的大地。」（p. 67）

在資本主義下，它最終明朗化，工人被化約為僅僅是勞動力，反之，所有權也被化約為對於和勞動完全脫節的生產工具的控制，而在生產的過程中，使用（沒有直接相關性）和交易以及積累（生產的直接目標）也完全無關。這個歷程及其各種可能的不同類型，正是馬克思所要分析的。儘管表現演化的種種個別階段的社會和經濟的種種形式非常重要，可是他在乎的是整個過

程，橫跨好幾個世紀、好幾個大陸。所以說，他的架構只就廣義而言才稱得上是歷時性的，而例如說從一個階段如何過渡到另一個階段，並不是他的主要考量，除非是要用它們來說明長期的蛻變。

但是，人自其原始的、自然的生產條件解放出來的這個歷程，同時也是人的**個體化**的歷程。「唯有經由歷史的歷程，人類才能夠個體化（vereinzelt sich）。他最初只是顯現為一個種屬的存有者、部落的存有者、群居動物……交易本身是這個個體化的主要手段。它使得群居動物成為多餘的，因而瓦解它。」（p. 96）它自動地蘊含著個人和他原本所屬的共同體的關係發生了蛻變。以前的共同體變質為非人化的社會機制，其中資本主義是極端的例子，儘管它使個體化成為可能，卻對個人漠不關心甚至仇視他。然而這個歷程仍然是人類眾多無限可能性之一。馬克思在一個洋溢著希望和光輝的段落裡說（pp. 84-85）：

> 相對於認為生產是人的目的、而財富是生產的目的的近代世界，古代的觀念顯得崇高許多，他們認為人始終是生產的目的，儘管其定義侷限於民族、宗教或政治的觀點。可是其實，在褪去狹隘的資產主義形式以後，所有權豈不是無異於在無所不在的交易裡產生的個人需求、能力、享受和生產力等等的普遍性質？它豈不是人類對於自然力的支配的全面發展，包括所謂的自然以及他自己的本性？它豈不是人類的創造性稟賦的絕對開展？它的前提不外乎先前的歷史演化，它代表了這個演化的全體，也就是所有人類的力量本身的演化，

> 那是不能以先前的尺度去衡量的，是目的本身。人類豈不是不以任何特定的形式自我複製，而是生產出他的全體性？人類豈不是不再因循過去的東西，而在絕對的變化運動當中？在資產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裡，以及它所對應的生產時期裡，人類內在的完全開展表現為完全的空洞化；這個普遍的對象化則表現為完全的異化，而所有侷限性的、片面性的目的的破滅，則表現為目的本身為了一個相當外在的目的而自我犧牲。（譯按：霍氏本處引文有闕漏誤植。）

即使是以非人化且顯然矛盾的形式，自由的個體發展的人本主義理想仍然比先前任何歷史階段更加近在眼前。它只待從馬克思簡略描述的人類社會的前歷史階段過渡到人類支配他的命運的時代，也就是共產主義的時代。

因此，馬克思的願景是個絕妙的統一性力量。他的社會和經濟發展的模型（不同於黑格爾）可以應用在歷史裡，以產生豐碩而有原創性的結論，而不只是同語反覆而已；但是它同時也可以說是關於人性若干基本的、甚至是定理性的述句裡面種種邏輯可能性的展現——勞動和所有權的矛盾以及分工的辯證性開展。[2]它是事實的模型，但是從稍微不同的角度去看，**同一個的**模型卻也提供我們價值判斷。馬克思的理論的多面向性，使得除了無知的或有偏見的人以外，大家都知道要尊重且讚揚馬克思是個思想家，即使他們並不同意他。同時，尤其是因為馬克思從來不為了門外漢的讀者的需求而讓步，無疑地使這段文字更加晦澀難懂。

我們必須特別提到關於這個複雜性的一個例子：馬克思始終拒絕將不同的學術領域區隔開來。別人倒是不妨代勞。於是晚期的熊彼得，最博學深思的馬克思批評者之一，試圖區分作為社會學家的馬克思以及作為經濟學家的馬克思，我們當然也可以輕易地再區分出作為歷史學家的馬克思。可是這樣機械性的區分會有誤導，而且和馬克思的方法完全背道而馳。只有資產階級學院派經濟學家才會想要明確區分靜態和動態的分析，試圖在靜態系統裡注入某些「動態化」元素，而將靜態分析變成動態分析，就像學院派的經濟學家想出整齊劃一的「經濟成長」的模型，偏好以方程式表示，並把所有扞格不入的東西都劃歸到「社會學家」的領域。而學院派的社會學家也做類似的區分，只是在科學興趣的層次上比較低，而歷史學家更等而下之。然而這不是馬克思的方法。生產的社會關係（也就是廣義的社會組織）以及和它的層次對應的物質力量是不可分的。「社會的經濟結構是由這些生產關係的總體構成的。」（Preface, *Werke*, 13, P. 8）經濟發展不能簡化成「經濟成長」；更不能簡化為孤立因素的變異，例如生產力或是資本積累率，就像現代俗不可耐的經濟學家習慣主張說，如果投資百分之五的國民收入，就可以創造成長。[3]這個問題只能就特定的歷史時期和特定的社會結構去討論。他關於資本主義以前的各種生產模式的討論是個精采的例子，剛好證明了，把歷史唯物論視為對於歷史的**經濟學的**（甚或是**社會學的**）詮釋，是多麼荒謬的事。[4]

然而就算我們確知不可以從我們現代的學術專門化角度把馬克思分割成若干截面，仍然可能很難掌握他的思想的統一性，部分是因為如果只側重體系的清楚闡述，我們只能依序討論它的不

同面向，而不能同時掌握它們，其次也是因為科學研究和驗證的工作在某個階段必然會使我們做相同的事。這就是為什麼恩格斯以清楚闡述為目標的著作，會讓人覺得是馬克思思想的過度簡化或稀釋。某些後來的馬克思主義的闡述，例如史達林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就顯得往而不返。反過來說，如果只是想要強調馬克思的辯證統一性和相互依存性，可能只會得出關於辯證法含糊其詞的泛泛之論，或者是主張說，上層結構不是由下層結構機械性地或立竿見影地決定的，而是對於它的反應，有時甚或會支配它。這樣的說法或許有其教育價值，並且要我們提防對於馬克思主義種種過度簡化的觀點（恩格斯在寫給布洛赫的著名書信裡就提到它們），但是其實對我們無甚幫助。正如恩格斯對布洛赫所說的[5]，有個恰當的方法可以避免這些難題。也就是「從原典去研究它，而不假借二手文獻」。職是之故，《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構》值得我們仔細品味且讚嘆地研究它，讀者在裡頭可以溯游從之，了解馬克思**真正在想什麼**。

許多讀者對於一個面向會很有興趣：馬克思關於歷史發展時期的討論，那構成《政治經濟學批判》前言裡簡短表列的背景。它本身就是個很複雜的題目，我們必須先了解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歷史及歷史演化的思考的發展，以及他們的歷史分期或區分在其後的馬克思主義的討論裡起起落落的命運。

這些人類演進的時期的經典說法，出現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前言裡，而《政治經濟學批判綱要》則是它的初步手稿。「概括地說，亞洲的、古代的、封建的、近代的資產階級生產方式，可以稱為社會的經濟形式的種種演進時期。」他據以推論出這個觀點的分析，以及它所蘊含

的經濟演化的理論模型，並沒有在前言裡討論到，雖然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若干段落以及《資本論》（尤其是第三卷），可以說是它的一部分，或者說如果沒有它就無從了解。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構》幾乎都在探討這個問題。因此，如果要了解馬克思一般性的思路，或是他關於歷史演化問題的研究進路，尤其是分類，它們都是基本的讀物。

這並不意味著我們不得不接受馬克思在前言或是《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構》裡所提到的歷史時期的表列。我們以下會看到，他最忠實的信徒們，對於馬克思的思想，很少像對於這個表列的修正那麼徹底，他們的證明方式也不一定相同，而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其後的歲月裡對它也不是那麼滿意。這個表列，以及在《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構》裡的後續討論，並不是理論的推論，而是觀察的結果。歷史唯物論的一般性理論，只要有前後相續的生產形式就行了。而不必有任何特定的形式，或許也不會有任何特別的預定順序。[6] 馬克思綜觀實際的歷史紀錄，以為他可以劃分出若干社會的和經濟的形式，以及某種前後順序。可是就算他的觀察有誤，或者它們是基於片面的、因而可能誤導的資訊，歷史唯物論的一般性理論依舊不受影響。如今我們一致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資本主義以前的種種時期的觀察，相較於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的描述和分析，其研究基礎遠遠沒有那麼完備。馬克思將精力集中在資本主義的研究上，他在探討歷史的其他部分時，其詳盡程度則各自不同，只要足以解釋資本主義的起源和發展就夠了。他和恩格斯在歷史方面都是博覽群籍的業餘愛好者，而他們的天才和理論使得他們比同儕更能夠善用他們閱讀的東西。但是他們只能依據手邊可取得的文獻，相較於現在可以說遠遠不足。因此，約略

審視一下馬克思和恩格斯所知道的歷史以及他們還無法知道的，對我們會很有幫助。我不是說他們的知識**不足以**讓他們鋪陳關於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的理論。其實應該很足夠了。認為只是皓首窮經就可以增長理解，那是學者們的職業病。那只是在充實他們的書房而已。回過頭來說，認識馬克思的歷史分析的事實基礎，對於如何去理解它顯然很有幫助。

就古典時期（希臘羅馬）的歷史而言，馬克思和恩格斯手邊的資料幾乎和一個只依賴文獻的現代學生一樣充裕，雖然對於古典時期研究造成革命性改變的大量考古證據以及銘文，在《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構》寫成時仍然無緣得見，也沒有莎草紙文獻。（施利曼直到一八七〇年才在特洛伊開始他的挖掘工作，而蒙森的《拉丁銘文集》〔*Corpus Inscriptionum Latinarum*〕直到一八六三年才出版。）他們都受過古典教育，通曉拉丁文和希臘文。而且我們也知道，諸如約南德斯、阿米安、瑪策廉、卡西奧多魯斯以及歐洛修斯相當艱澀的文獻，他們也很熟悉。[7]另一方面，無論是他們的古典教育或是手邊的資料，都無法給予他們關於埃及和古代中東的重要知識。而事實上馬克思和恩格斯也沒有研究在這個時期裡的這個區域。即使偶爾提及，也幾乎聊勝於無，雖然這不意味著馬克思和恩格斯[8]真的忽略它的歷史問題。

在東方歷史的領域裡，他們的情況又完全不同。沒有證據顯示馬克思或恩格斯在一八四八年以前曾經思考或閱讀很多關於這個主題的東西。他們所知道的東方歷史很可能僅止於黑格爾的《歷史哲學講演錄》（而且沒有什麼啟發性），以及當時受教育的日耳曼人可能熟悉的資料。在流亡英國時期，一八五〇年代的政治發展，尤其是馬克思的經濟學研究，讓他們的知識迅速轉

變。在一八五〇年代初期，馬克思自己顯然從他一再研讀的古典經濟學家的作品裡汲取某些關於印度的知識（他在一八五一年閱讀彌爾的《政治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亞當・斯密、理查・瓊斯的《政治經濟學導論講演錄》〔*An Introductory Lecture on Political Economy*〕）。[9]一八五三年，他開始在《紐約每日論壇報》（*New York Daily Tribune*）發表關於中國（六月十四日）和印度（六月二十五日）的文章。在這一年裡，他和恩格斯顯然潛心研究東方的歷史問題，恩格斯甚至為此學了波斯文。[10]他們在一八五三年初夏的通信裡提到了佛斯特牧師的《阿拉伯歷史地理》（*Historical Geography of Arabia*）、貝尼爾的《貝尼爾遊記》（*Voyages de François Bernier*）東方學家威廉・瓊斯爵士，以及關於印度的國會報告、史丹福・拉佛的《爪哇史》（*History of Java*）。[11]我們可以合理假設，在這幾個月裡，馬克思首度成熟形構他關於亞洲社會的理論。它們顯然不僅僅是以粗略的研究為基礎。

另一方面，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西歐封建制度的研究則似乎另闢蹊徑。馬克思很了解當時關於中世紀農業史的研究，主要是韓森、梅曾和毛瑞的作品[12]，在《資本論》第一卷裡已經引用過他們，但是其實沒有太多跡象顯示他在這個時期認真關注中世紀農業或農奴的演變問題。（那些引文主要是和東歐當時的農奴制有關，特別是羅馬尼亞。）直到《資本論》第一卷出版**以後**（也就是在累積《資本論》第二卷、第三卷的大量手稿以後），這兩個朋友才開始探討這個問題，尤其是從一八六八年開始，馬克思開始認真研究毛瑞，後來他和恩格斯將毛瑞的作品視為他們在這領域的知識基礎。[13]不過馬克思自己的興趣似乎是在毛瑞和其他人關於原始農民社會的觀點，

而不在於農奴制，雖然恩格斯自始即對此很感興趣，並且以毛瑞為基礎開展他在《馬克》（*die Mark*）裡的說法（1882）。兩個人在一八八二年最後的幾封信裡，也談到農奴制的歷史演變。[14] 當馬克思漸漸專注於俄羅斯的問題時，直到晚年，他對於這個主題的興趣似乎有增無減。在《資本論》第三卷裡有幾節談到租稅的轉變問題，卻沒有跡象顯示他曾經仔細研究關於西方封建農業的文獻。

對於中世紀資產階級的起源以及封建時代的貿易和金融的問題，正如《資本論》第三卷所顯示的，馬克思的興趣濃厚許多。他顯然不只是研究關於西方中世紀的一般性作品，甚至就當時文獻所及，研讀了關於中世紀物價（梭羅．羅傑斯）、中世紀銀行、貨幣和中世紀貿易的專門性作品。[15] 當然，在馬克思於一八五〇年到六〇年代創作最密集的時期，這些主題的研究剛剛萌芽，所以他關於農業史和商業史的資料來源應該是過期很久的。[16]

一般而言，恩格斯對西方世界的興趣，尤其是中世紀日耳曼，比馬克思活潑許多。他研讀關於早期日耳曼和愛爾蘭歷史的大量史稿，包括第一手文獻和地方誌，他很清楚，語言學的證據固然重要，考古學也不容忽視（尤其是馬克思在一八六〇年代特別提到的北歐作品），他也和現代學者一樣，很清楚諸如聖哲曼（St. Germain）的修道院長伊爾米諾的多聯畫屏之類的經濟學文獻的重要性。然而我們不免仍舊會覺得，他和馬克思一樣，真正的興趣與其說是在莊園制度的發展，不如說是古代農民社會。

就原始共有制社會而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歷史觀點大抵上因為研究兩個作者的作品而有所

改變：格奧爾格．毛瑞，他試圖證明日耳曼史裡有個階段存在著共產制度，另外特別是路易斯．摩根，他的《古代社會》（*Ancient Society*, 1877）為他們關於共有制的分析提供了基礎。恩格斯的《馬克》（1882）是以前者為基礎，而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則明顯受惠於前者。他們認為毛瑞的作品（如我們所見，在一八六八年對這兩個朋友開始產生重大影響）在某個意義下，讓學術擺脫了對法國大革命反動的浪漫的中世紀主義（romantic medievalism）。（他們自己對這種浪漫主義嗤之以鼻，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他們比較不重視西方封建制度歷史。）就像毛瑞一樣，他們越過中世紀，回顧人類歷史的原始時期，似乎和社會學潮流若合符節，雖然這些日耳曼學者本身並不是社會學家。[17]當然，摩根生長自烏托邦社會學家的環境，而且顯然勾勒出原始社會和未來社會的研究之間的關係。他的作品甫出，馬克思就拜讀過了，也注意到它的結論和他自己的相似性，因而欣然採用它，並且以嚴謹的學術誠實向他致謝，這是馬克思作為學者的一貫特色。而馬克思在其晚期作品大量使用的第三個文獻來源，則是卷帙浩繁的俄羅斯作品，尤其是科瓦列夫斯基。

所以說，在寫作《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構》時，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原始社會只有很概略的認識。它沒有關於部落社會的嚴謹的知識基礎，因為現代人類學在當時仍然在嬰兒期，儘管有普列斯考特的作品（馬克思在一八五一年拜讀，而且顯然在《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構》裡使用它），我們對於哥倫布以前的美洲文明的知識還是很有限。在摩根以前，他們關於美洲的大部分看法部分是基於古代的作者，部分是基於東方的文獻，但主要還是基於中世紀早期歐

洲的資料，或是歐洲殘存的共有制的研究。其中斯拉夫和東歐扮演重要的角色，因為那些傳統的力量一直吸引著學者的注意力。四個基本類型的區分，東方（印度）、希臘羅馬、日耳曼和斯拉夫（p. 95），也和他們在一八五〇年代的知識相符。

至於資本主義的發展歷史，馬克思在一八五〇年代末期已經駸駸然成為專家，其基礎與其說是當時寥寥無幾的經濟史文獻，不如說是他如數家珍的大量經濟學理論作品。無論如何，他在這方面的知識可以說很熟諳了。我們只要瀏覽一下《資本論》大部分的版本所列的參考書目就可見一斑。當然，以現代的標準而言，一八五〇年到六〇年代的資料仍然是嚴重不足，但是我們不能因此就貶低它，尤其是當嗅覺敏銳的馬克思引用它的時候。所以或許有人會說，我們關於十六世紀物價飆升以及美洲金條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的知識，直到一九二九年甚或更晚，才被承認為確定的記錄基礎。我們很容易忽略，在馬克思去世以前，至少出現過一本關於這個問題的基礎研究作品[18]，我們更容易忘記，這個問題在更早以前就廣為人知，所以馬克思才會在《政治經濟學批判》裡鞭辟入裡地討論它。[19]更不用說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後的作品裡對於這個領域念茲在茲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歷史知識大致上如此。我們可以總結如下：在史前、原始共有制社會、在哥倫布以前的美洲，以及幾乎不存在的非洲方面，他們的知識相當薄弱（至少是在《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構》的寫作時期）。關於古代和中世紀中東也無甚可觀之處，關於亞洲某些地方，尤其是印度，情況就好多了，不過不包括日本。他們對希臘羅馬時代以及歐洲中世紀的歷史很熟悉，雖然馬克思對這個時期的興趣有所偏頗（恩格斯沒有那麼明顯）。他對資本主義興起

的時期如數家珍。當然，兩個人在歷史方面都是很用功的學生。然而在馬克思一生中的兩個時期裡，他特別潛心研究工業革命以前或歐洲以外的社會的歷史：一八五〇年代，也就在撰寫《政治經濟學批判》以前的時期，以及一八七〇年代，在《資本論》第一卷出版以後，並用繼續創作第二卷和第三卷的時期，馬克思似乎回歸到歷史研究，尤其是東歐以及原始社會；或許是和他對於俄羅斯革命的可能性的興趣有關。

二

接下來我們要探討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歷史分期以及演化的看法的演變。第一個時期裡最好的研究作品就是一八四五年到四六年的《德意志意識型態》，書中採取的觀點是（當然不是全新的），社會分工的各個階段和所有權的各個形式相對應。第一個階段是共產制，對應於「未開化的生產時期，人民漁獵、牧牛或至多農耕為生。」[20] 在這個階段裡，社會結構是以親族群及其內部分工的發展和演變為基礎。這個親族群（「家族」）習慣會從內部發展出族長和其他成員的區別，甚至隨著人口和需求的增加，以及外部關係的成長，無論是因為戰爭或以物易物，而發展出奴隸制度。社會分工的第一次進展，始自將工業和商業從農業勞動區分開來，因而導致城鄉對立的區分。它反過來催生了所有權關係的第二個歷史時期，「古代共產和城邦財產制」。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它源自部落的結盟（經由協議或征服）而形成城市，而奴隸制則繼續存在。共有的城

邦所有權（包括公民對城市奴隸的所有權）是主要的所有權形式，但是私有財產漸漸出現，儘管起初仍然從屬於共有制度。隨著最初的私有動產以及其後的私有不動產的興起，該社會秩序以及「自由公民」的地位也跟著沒落，他們相對於奴隸的地位，原本是奠基於他們作為部落成員的集體位階。

至此，社會分工已經相當繁複。不僅有城鄉區分，甚至有代表城市和鄉村的利益的城邦的區分，而在同一個城市裡，更有工業和海外貿易的區分；當然也有自由人和奴隸的區分。羅馬社會是該演變階段的最終發展。[21]它的基礎是城市，而它也始終沒能超越其限制。

所有權的第三種歷史形式，「封建或階級所有權」[22]，在年代上緊跟其後，雖然在《德意志意識型態》裡並沒有暗示它們之間的邏輯關係，而只是瓦解的羅馬制度以及戰勝的部落（日耳曼）制度混合的前後相續和影響。封建制度顯然是原始共產制的**另一種**演變，它的條件是沒有任何城市的興起，因為在廣袤的地區裡的人口密度很低。區域的**大小**似乎是重要關鍵，因為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封建制度的發展始自更廣大的地區，肇始自對羅馬的征戰以及其後農業的傳布。」[23]在這些情況下，社會組織的起點是在鄉間而非城市。而它的基礎則再次是共產制度——它其實已經轉變成封建領主們的集體財產，以日耳曼部落的征服者的軍事組織為後盾。封建貴族階級和被剝削的階級對立，建立它的社會層級，並且擁兵自重，而被剝削的階級不再是奴隸，而變成了農奴。在此同時，城鎮裡也有類似的區分。在那裡，基本的所有權形式是個人的私人勞動，但是由於各式各樣的因素，防衛的需要、競爭以及周圍城郊封建組織的影響，產生了類似的

社會組織：由工匠師傅或商人組成的行會，它最終和臨時傭工以及學徒起衝突。而農奴的勞動以及學徒和臨時傭工小規模的工藝掙得的地產，在這個階段裡被形容為封建制度下的「主要所有權形式」（Hauptreigentum）。分工相對地未開化，但是主要表現在涇渭分明的各種「階級」區隔，在鄉間是王室、貴族、教士和農民，在城市裡則是師傅、臨時傭工、學徒，以及由日工組成的「庶民」組成的。這個幅員廣闊的體系，需要更大的政治組織，以因應地主貴族和城市的需要：也就是封建王朝，它也因而變成了舉世皆然的制度。

然而，從封建制度到資本主義的轉型，是封建制度演變的一個產物。[24]它從城市裡開始，因為城鄉區隔是表現在社會分工裡的基本元素，而且是從文明的誕生到十九世紀的恆常元素。在中東再度興起的城市，其內部發展出生產和交易的分工，那不是從古代殘存下來的。它為遠距交易以及不同城市間的接續分工（生產的專業化）。市民抵禦封建領主，以及城市間的互動，從個別城鎮的市民團體裡產生了市民的**階級**。「當資產階級存在的條件興起時，它就漸漸發展起來，在分工以後，又分裂為兩個部分，最終吸收所有存在的所有權階級（在此同時，大多數的無財產者和少部分擁有財產者發展出一個新階級，也就是無產階級），以至於所有存在的所有權都轉變成商業或工業的資本。」馬克思又說：「首先，它吸收了直接屬於國家的那些勞動分支，接著則是或多或少帶有意識型態的各個階級。」[25]

只要交易沒有跨足全球，而且不是以大規模工業為基礎，靠這些發展而促成的技術進步仍然不是很穩固。這些技術以地方或區域為基礎，可能因為蠻族入侵或戰爭而毀於一旦，而地方性

的進步也不需要普及化。（附帶一提，《德意志意識型態》於此觸及了歷史沒落和倒退的重要問題。）因此，資本主義的關鍵發展，正是全球市場的興起。

城鎮間的分工的第一個結果，就是獨立於行會之外的手工工廠的興起，它們以外國貿易（發軔自義大利和法蘭德斯地區）或是內銷市場（例如法國和英國）為基礎。此外它們也奠基於人口密度的成長，尤其是鄉村，以及行會內外的資本的逐漸集中。在這些手工工廠當中，紡織（由於它依賴機器的使用，無論多麼粗糙）是最重要的。手工工廠的成長也提供了封建制度下的農民出走的機會，他們流竄到城市裡，但是因為行會的排他性而漸漸被城市拒絕在外。這些勞動力的來源，部分是以前封建制度下的僕役和軍人，部分是因為農業技術的進步以及以畜牧取代耕作而被淘汰的人口。

隨著手工工廠的興起，民族國家開始相互競爭，重商主義（隨著它的貿易戰爭、關稅和禁令）也提升到國家等級。在手工工廠裡頭，資本家和勞工的關係越來越緊密。美洲新大陸的發現，以及印度航線的征服，促使貿易的大幅擴張，而海外產品的大量進口，尤其是金條，撼動了封建土地所有權和勞動階級的地位。階級關係、征服、殖民的接續變化，「以及市場擴大為逐漸成型的全球市場」[26]，開啟了歷史發展的新頁。

我們於此沒有必要繼續闡述，只要附帶一提，《德意志意識型態》提到在工業發達以前的另外兩個發展時期，也就是十七世紀中葉及其降至十八世紀末，並且認為英國工業發展的成就要歸功於他們在十七世紀的貿易和手工工廠的集中化，漸漸創造出「一個有利於他們國家的相對性的

世界市場，也為他們的產品創造需求，那些需求是當時的工業生產力所無法滿足的」。[27]

這個分析顯然是《共產黨宣言》裡的歷史敘事章節的基礎。它的歷史基礎相當薄弱：希臘羅馬時代（主要是羅馬）以及西歐和中歐。它只承認三種階級社會：古代奴隸社會、封建制度以及資產階級社會。它似乎暗示著，前兩者是從原始共產社會演變出來的**不同**路線，而第二條路只是踩在第一條路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至於前者是如何瓦解的，並沒有提出解釋的機制，儘管在分析當中可能有所暗示。而資產階級社會則被認為是從封建社會的夾縫裡產生的。它的成長被形容為完全是在城市裡（至少在開端）產生的，它和農業的封建制度的關係主要是在於從以前的農奴那裡獲得它的原始人口以及它的增援。文中並沒有認真探索為城市和手工工廠提供勞動力的過剩人口的來源問題，關於這點的評論太過簡略而無甚分析價值。它只能被視為關於歷史發展相當粗疏而暫時性的假設，儘管其中某些附帶的評論有暗示性，有些則很精采。

馬克思在寫作《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構》時的思想時期要繁複周延得多，當然也有更豐富多元的歷史研究為其基礎，而不再限於歐洲。歷史時期表的主要更新部分是在「亞洲」或「東方」體系，在著名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前言裡被採用。

大抵而言，從原始共產體系演變出三到四條路線，每一條路線都代表一種在它裡頭既有的或內隱的社會分工形式：東方、古代、日耳曼（馬克思當然不限定任何一個民族）以及有點曖昧不清的斯拉夫，他對此著墨不多，但是和東方有些親緣關係（pp. 88, 97）。它們之間有個重要的區別，是在體系裡抵制或有利於歷史演變。一八四五年到四六年的模型則鮮少觸及該問題，雖然

如前所見，馬克思的歷史發展觀絕不僅僅是單系演變的，他也不認為那僅僅是演進的紀錄。可是在一八五七年到五八年，他的討論則有長足的進步。

以往人們關於東方體系的討論總是忽略了《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構》，那是因為他們主要基於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書信以及馬克思關於印度的論文（都在一八五三年）[28]，和早期外國觀察者的觀點一樣，都認為那裡「沒有土地所有權」。他們認為那是由於情況特殊，而需要例外的集中化，也就是在不利於耕作的地區，需要有公共工程和灌溉系統。然而在接下來的討論裡，馬克思顯然認為，該體系的基本特色在於鄉村自治體內部的「手工工廠和農業的自給自足的統一體」，它「在自身包含了所有再製和生產過剩的條件」（pp. 70, 83），因而比其他體系更加頑固地抗拒崩解以及經濟演變（p. 83）。在「東方專制政治」裡，理論上的財產制的闕如，掩蓋了作為其基礎的「部落或村莊財產制」（pp. 69-71）。這樣的體系可能是地方分權或中央集權的，在形式上可能是「更專制或更民主的」，而且有各式各樣的組織方式。比較小的共同體單位是比較大的單位的一部分，他們或許會奉獻一部分剩餘產物，以支付「（更大的）共同體的支出，例如戰爭、宗教崇拜等等」，以及經濟上的必要作為，例如灌溉以及交通的維護，它們會由更高階的共同體去完成，「凌駕於小村莊之上的專制政府」。然而，剩餘產物的異化包含了「原始意義下的**自治權**」的種子，而封建制度（農奴制）可能就是從它發展出來的。村莊的「封閉」性質意味著城市幾乎不屬於經濟範圍裡，其興起只在「其地點特別有利於對外貿易，或者是統治者及其官員交換他們的勞動收入（剩餘產物），他們用以作為勞動資源去花費」（p. 71）。所以

說，亞洲體系還不是個階級社會，或者就算是個階級社會，也是最原始的形式。馬克思顯然認為墨西哥和秘魯社會是同一個種屬，塞爾特社會亦然，雖然因為其他人征服該部落和村莊而變得更複雜，或許也更繁瑣（pp. 70, 88）。我要說，它並不排除繼續演變，但是我承認那是很奢侈的事；只要它能夠依賴於由部落或村莊自給自足的基本經濟體給予或被勒索的剩餘產物。

從原始社會產生的第二個體系，「更動態的歷史生活的產物」（p. 71），產生了**城市**，並且因而產生了**古代**的模型，一個開疆闢土的、動態的、變動不居的社會（pp. 71-7與其他各處）；「城市及其附屬的領土（Landmark）是個經濟整體」（p. 79）。在其已開展的形式裡（但是馬克思謹慎地堅持那必須先經歷很長的過程，也堅持它的複雜性），它的特色是作為動產的奴隸。但是它也有其種種經濟限制，必須被更有彈性的、更有生產價值的利用形式取代，也就是依附於地主的農民，**封建制度**，它則會被**資本主義**給取代。

第三種類型，作為其基本單位，既不是鄉村，也不是城市，而是「個別的家庭，形成獨立的生產中心（作為婦女家庭副業的手工工廠等等）」（p. 79）這些個別的家庭彼此多少有些往來（假如他們屬於相同的部落），並且偶爾會「為了戰爭、宗教、法律糾紛的調解等等」（p. 80）而聚會，或是為了個別的自給自足的家庭如何使用村莊裡的牧場或狩獵區的問題。這個基本單位因此更寬鬆，也可能比村莊更「個人主義」。這就是馬克思所謂的**日耳曼**類型，雖然他顯然不特指任何民族。[29] 既然**古代**和**日耳曼**類型有別於**東方**類型，我們可以推論說，馬克思認為**日耳曼**類型可能比東方類型更動態，而且它其實不無可能。[30] 馬克思對於這個類型的評論非常簡略而吊人胃

口，但是我們知道他和恩格斯並不排除從原始社會直接過渡到封建制度的可能性，例如日耳曼部落。

城鄉區分（或農業和非農業生產的區分）是馬克思在一八四五年到四六年的分析裡最根本的元素，在《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構》依然舉足輕重，可是它的基礎更廣泛，它的闡釋也更優雅：

> 古代歷史是城市的歷史，不過是奠基於農業和土地所有權的城市；亞洲歷史是一種城鄉沒有分化的統一體（真正的大城市只能被視為諸侯的駐地，是在原有的經濟結構上重新孕育出來的）；中世紀（日耳曼時期）的歷史地點是始於鄉村，它的開展則肇始自城鄉的對立；近代歷史則是鄉村的城市化，而不是如古代一樣的城市農村化（pp. 77-8）。

然而，儘管這些不同的社會分工形式都是共產社會瓦解的各種形式，它們顯然被表示成**前後相續的**歷史階段（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前言裡，雖然在《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構》裡沒有特別提及）。就字面意義而言，它明顯有誤，因為不只是亞洲的生產形式和其他所有形式並存，在《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構》或它處都不曾暗示說古代形式是從它演變出來的。因此我們應該說，馬克思的意思並不是指年代上的前後相續，甚或說一個體系從先前的體系演變出來（雖然資本主義和封建制度的確如此），他指的是更概括性的意義下的演變。如前所見，「唯有經

由歷史的歷程，人類才能夠個體化（vereinzelt sich selbst）。他最初只是顯現為一個種屬的存有者、部落的存有者、群居動物。」人類漸次的個體化的種種不同形式，意味著原始的統一體的瓦解，對應於不同的歷史階段。每個階段都代表著脫離「某種特殊形式的部落共同體的原始統一體，以及在性質上相對應的財產制，或者是和作為自然存有者（Naturdaseins）的生產的客觀條件的關係」。（p. 94）換言之，它們代表私有財產的演變。

馬克思區分四種分析性的演變階段，雖然和年代無關。第一個階段是直接共有財產，就像東方的形式，以及斯拉夫體系的變形，它們都不能說是完全成形的階級社會。第二個階段是持續作對已經是「對立」（也就是階級）的體系的共有財產，例如古代和日耳曼形式。第三個階段與其說始自（如果我們從馬克思的論證推論）封建制度，不如說是手工業的興起，獨立的工匠（組織成行會）代表更個人的形式，無論是支配生產工具或是消費，讓他可以既生產且生活。馬克思在這裡所指的似乎是工匠生產的某種自主權，因為他刻意排除古代東方的手工工廠，而沒有說明理由。第四個階段是無產階級興起的階段；也就是說，剝削不再是對人（奴隸或農奴）的粗糙利用，而是「勞力」的利用。「就資本而言，工人並不構成生產條件，只有勞力才是。如果機器可以做得來，甚或是水或風，那會更好。資本所利用的，並不是工人，而是他的勞力——而且不是直接的，而是經由交易。」（p. 99）

儘管馬克思的思想艱澀難懂，儘管他的注解太過簡略而難以捉摸，這個分析似乎符合以下歷史階段的架構。東方形式（斯拉夫）在歷史上最接近人類起源，因為它在更為繁複的社會上層結

構裡保存了具有功能的原始共同體（鄉村），而且有尚未充分開展的階級體系。（當然我們可以說，馬克思在寫作時，他觀察到這兩個體系因為全球市場的衝擊而正在瓦解，它們的特性也因而在消失當中。）古代和日耳曼體系雖然也是基本的體系，也就是說，不是**衍生**自東方體系，它們代表著從原始共產制度演變出來的更複雜的形式；但是「日耳曼體系」本身並沒有形成一個特殊的社會經濟形式。它形成的是和中世紀城鎮（工藝生產興起的地方）接軌的封建制度的社會經濟形式。接著，在中世紀出現的這個組合，形成了第三個階段。從封建制度產生的資產階級社會則是第四個階段。雖然裡頭說，亞洲、古代、封建和資產階級的形式是個「演進」，但是並不蘊含著任何直線性的單純歷史觀，也不是很單純地認為歷史就是進步。它只是說，在決定性的層面上，每個體系都是進一步脫離人類的原始狀態。

三

接下來要思考的是這些體系的內在動力：它們的興衰究竟何以致之？對於東方體系而言，這個問題比較單純，它的特性使它抗拒分裂和經濟演變，直到資本主義外來力量的摧殘。至於該階段裡的斯拉夫體系，馬克思幾乎隻字未提，使得我們也沒有著力之處。另一方面，他關於古代和封建體系的內在矛盾的觀點就非常複雜，並且招致某些困難的問題。

奴隸制度是古代體系的主要特色，但是相較於單純地認為奴隸制度限制經濟演變，因而造成

自己的瓦解，馬克思對其內在矛盾的看法則複雜許多。我們必須順便一提，他的分析基礎似乎是地中海西側的羅馬，而不是希臘。羅馬始自農民的村莊，雖然它的組織是城市化的。古代歷史是「奠基於農業和土地所有權的城市的歷史」（p. 77）。它不是完全平等的共同體，因為部落的發展結合通婚和征服，傾向於產生社會位階有高有低的親族團體，但是羅馬公民基本上都是地主，「城鎮的延續是所有自給自足的農民成員的複製，他們的剩餘時間不多不少屬於市鎮、戰爭的勞動等等」（p. 74）。戰爭是市鎮的首要事務，因為對它的唯一威脅就是其他企圖開疆拓土的共同體，而在人口增加時，保障公民土地的唯一方法就是以武力占有該土地（p. 71）。但是這種農民共同體類似戰爭和擴張領土的傾向會導致構成其基礎的農民性質的崩解。在一定程度上，奴隸制度、土地所有權的集中、交易、貨幣經濟、征服等等，都和這個共同體的基奠相容。踰越了這個程度，它們就必定導致崩解，也必定阻礙社會或個人的演變（p. 83-84）。因此，在奴隸制度經濟開展**以前**，古代的社會組織形式是相當有限的，因此生產力的發展不是也不可能是首要事務。「我們不曾看到古代世界曾經探究哪種土地所有權的形式是最有生產力的，可以創造最大財富的……他們總是探究哪一種所有權的方式可以創造出最好的公民。財富作為目的本身，只出現在少數經商的人們身上，即壟斷通路者，他們躲在古代世界的縫隙裡，就像中世紀社會的猶太人。」（p. 84）

因此，有兩個因素會漸漸破壞它。第一個因素是共同體內部的社會分化，古代共有和私人的土地所有權的怪異組合對此毫無招架之力。個別的公民有可能**失去**他的所有權，也就是他的公民

基礎。經濟發展越快速，這個情況越容易發生：因此古代對貿易和手工工廠總是懷有疑慮，最好是給自由民、扈從或外邦人去從事，而公民也相信和外邦人做買賣，意圖交易剩餘產物等等，是很危險的事。其次，當然他們有奴隸制度。因為他們有必要限制公民權（和土地所有權是同樣一回事）給征服者的族群成員，被征服者自然而然地就會成為奴隸或農奴。「因此，奴隸制度和農奴制度只是以部落制度為基礎的所有權的進一步發展。」（p. 91）因此，「共同體的保存蘊含著它所依賴的條件的毀滅，因而轉向它的對立面」（p. 93）。最初由所有公民代表的「團體」，變成由貴族代表，他們一直是大地主，而和窮人以及奴隸對立，此外也由與非公民以及奴隸對立的公民代表。馬克思於此對於奴隸制度經濟的真正經濟矛盾隻字不提。就《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構》裡相當概括性的分析層次而言，那些矛盾只是古代社會的根本矛盾的個殊面向。他也沒有討論為什麼在古代發展出來的是奴隸制度而不是農奴制度。我們或許會猜想，那是因為在古代地中海的生產力程度以及生產的社會關係的複雜性的緣故。

所以說，古代形式的崩解其實就隱藏在它的社會經濟性格裡。不同於其他提高生產力的「新的勞動形式和組合」（p. 93），它為什麼**不可免地**導致封建制度，似乎沒有一個合乎邏輯的理由。另一方面，從古代形式直接過渡到資本主義，也是不可能的事。

當我們來到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確**是從它演變出來的），問題變得複雜許多，因為馬克思幾乎沒告訴我們什麼。相較於古代形式裡的矛盾，在《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構》裡，我們看不到關於封建制度的內在矛盾的任何概述。裡頭也沒有（像奴隸制度一樣）任何關於農奴制的

真正討論。的確，這兩種生產關係經常被相提並論，有時候被視為「宰割和臣服的關係」，而和自由勞工的地位相反。[31]在一八五七年到五八年，正如一八四五年到四六年，他認為資本主義自其衍生出來的封建社會，其內部的元素正是**城市**，更確切地說，是城市的商人和工匠（pp. 97-8, 100）。所有權藉由生產的手段而從它的共同體基礎解放出來，就像中世紀的手工藝一樣，它為「勞動」擺脫「生產的客觀條件」奠定了基礎。在土地所有權以外，「從事勞動的所有權人」（der arbeitende Eigentümer）的形式，也就是勞動在手工藝和城市方面的演變，它「不再是土地所有權的偶性（Akzident），也不從屬於它」（p. 100），這樣的發展提供了資本主義的演變基礎。

他並沒有討論到農業封建制度在該歷程中的角色，但是看起來應該是相當否定性的。它原本應該是讓農民脫離土地，讓僕役脫離領主，好讓他們轉為雇傭勞工。無論那是藉由隸農關係（Hörigkeit）、私有財產、自耕農或佃農的所有權或各種扈從關係（Klientel）的瓦解，都沒有差別。重點是它們都再也不能阻礙人們轉變為至少是潛在的自由勞工。

然而，儘管《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構》沒有討論到（但是在《資本論》第三卷則有提及），農奴制度和其他類似的從屬關係在許多重要的經濟層面上和奴隸制度都有所差異。農奴雖然受領主控制，事實上是經濟獨立的生產者，可是奴隸卻不是。[32]把領主從農奴制度裡拿開，剩下的是小規模的商品生產，可是把殖民和奴隸分開（除非他們去做別的事），就沒有任何經濟可言。「因此要件是人身依賴的條件、任何形式的人身不自由、如附屬品一般地依附於土地，以及字面意義下的隸農身分。」（*Capital* III, p. 841）因為在農奴制度的情況下，農奴不僅生產領主以

任何形式利用的剩餘勞力，他也可以為自己積累收益。因為，基於種種理由，在經濟上原始而未開發的體系裡，例如封建制度，剩餘勞力傾向維持一個習慣的不變程度，而既然「（農奴）勞動力的使用絕不限於農業，也包括鄉村家庭手工工廠，於是有了某種經濟演變的可能性……。」（*Capital* III, pp. 844-5）

馬克思對於農奴制度的種種層面的討論並沒有比奴隸制度的內在矛盾更多，因為在《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構》裡，他的工作不是概述它們的「經濟史」。況且，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樣（雖然此處以更概括的形式），他並不想探討資本主義以前各個體系的內在動力，而只關心它們是否能解釋資本主義的先決條件。[33]他的興趣只在於兩個否定性的問題：為什麼除了封建制度以外，從其他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經濟形式，無法產生「勞動」和「資本」？為什麼農業形式的封建制度可以讓它們出現，而不會對它們的產生構成基本障礙？

這也說明了他的研究裡有若干明顯的裂隙。在一八四五年到四六年，他完全沒有討論到封建制度農業特殊的操作模式，也沒有討論封建城市和鄉村的特殊關係，或者為什麼從後者會產生前者。另一方面，他暗示說歐洲封建制度是**獨一無二的**，因為該體系的任何其他形式都沒有產生中世紀城市，而它對馬克思的資本主義演變理論是很重要的。在歐洲（或日本，馬克思從來沒有仔細討論過）以外，封建制度是很普遍的生產模式，可是我們沒辦法在馬克思的理論裡找到某個發展的「普遍法則」，以解釋它演變成資本主義的傾向。

在《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構》裡討論到的，是「日耳曼體系」，也就是很原始共產制

度很特殊的子分類，因而傾向於演變出很特殊的社會結構類型。如前所見，它的關鍵在於經濟上自給自足的家族單位分散各地，而和古代農民城鎮相反：「每個個別的家庭都包含了完整的經濟，形成獨立的生產中心（作為婦女家庭副業的手工工廠等等）。在古代世界，城市及其附屬的領土（Landmark）是個經濟整體，而在日耳曼世界，個別的家園就是經濟整體。」（p. 79）它的生存保障在於它和部落裡其他類似的家園的關係，這個關係表現在偶爾會為了戰爭、宗教、糾紛的調解而聚會，以及為了共同的安全問題。（p. 80）他們也會有共有的財產，例如牧場或狩獵區等等，每個個人都可以使用，而不像古代社會，只有作為團體的代表才能使用。我們可以將羅馬的社會組織的理想比擬為牛津或劍橋學院，其成員都是土地和建築的共同所有人，只因為他們形成一個團體，但是他們不能以個人的名義去「擁有」它或其中一部分。因此，日耳曼體系可以比喻為合作住屋，每個人擁有自己的樓房，因為他屬於該團體，並且和其他成員持續合作，可是他的個人所有權很明確地存在。這種寬鬆的共同體形式，暗示著經濟個體化的更大潛能，使得「日耳曼體系」（經由封建制度）成為資產階級社會的直系祖先。

這個體系如何演變成封建制度，他並沒有討論，雖然從內在和外在的社會分化（戰爭和征服的結果）的種種可能性已經有跡可尋。我們可以大膽猜測，馬克思很重視軍事組織（因為無論在日耳曼或古代的體系裡，戰爭是「所有自然形成（naturwüchsig）的共同體」最早的任務，也就是保衛和取得它的所有權（p. 89）。它當然是對於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的解釋的推論，也就是族系關係源自條頓民族部落裡的外邦人軍事領導權的轉變。我們沒有理由認為

馬克思有不同意見。

那麼封建制度的內在矛盾又是什麼呢？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家越來越重視這個問題，例如在一九五〇年代初期，多布的《資本主義發展之研究》（*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所引起的國際間熱烈的討論，以及不久後關於蘇聯的「封建制度的基本經濟法則」的辯論。無論討論的成果如何（第一個問題的討論成果似乎比第二個問題好得多），他們顯然因為沒有探討馬克思自己關於這個主題的觀點而停滯不前。馬克思有可能會同意多布的看法，認為封建制度沒落的原因是「封建制度作為生產體系的無效率，加上統治階級對於獲利的需求增加」（*Studies*, p. 42），雖然馬克思似乎更強調封建統治階級的要求沒有彈性，以及他們墨守成規地堅持那些要求。[34]他也可能會贊同希爾頓的看法，認為「租稅的爭奪是封建社會的『原動力』」[35]，雖然他幾乎很確定會反對波爾什涅夫過度簡化的觀點，認為被剝削的群眾的抗爭才是原動力。但是重點是，馬克思並沒有在他們之前如此推論，在《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構》當然也沒有。

如果說討論者當中有哪個人踵繼他的思路的話，那應該是保羅．斯威濟，他主張說（仿效馬克思），封建制度是為使用而生產的體系[36]，於此經濟形式裡，「從生產的性質本身不會產生對於剩餘勞動無節制的渴求」（*Capital* I, p. 219, chapter X, Section 2）。因此，解體的主要因素是貿易的成長，尤其是經由封建制度的鄉村以及在其邊緣發展出來的城市之間衝突和互動的結果（*Transition*, pp. 2, 7-12）。這個推論很類似《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構》裡的論證路線。

對馬克思而言，要解釋為什麼會從封建制度裡發展出資本主義，必須將三個現象結合起來：

首先是如前所見的鄉村的社會結構。它在某個時間點上讓農民「自由」；其次是城市手工業的發展，它以手工業的形式生產出專業的、獨立的、非農業的商品；第三個現象則是由交易和使用衍生的貨幣財富的積累（馬克思對最後這點的看法非常明確）（pp. 107-8）。這樣的貨幣積累的形式，「屬於資產主義經濟的前史」（p. 113）；而它們還不是資本。它們的存在甚或它們的明顯優勢，並不會自動產生資本主義的發展，否則「古代羅馬、拜占庭等等，也應該會隨著自由勞動和資本而終結它們的歷史」（p. 109）。但是它們是不可或缺的元素。

同樣不可或缺的，是城市手工業的元素。馬克思對此的評論非常簡約晦澀而又引經據典，但是他的分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他尤其強調手工業技術、尊嚴和組織的所有元素。[37]中世紀手工業形式的主要重要性似乎是在於，藉由發展出「作為與手工業有關的技術的、成為財產（而不僅是財產的來源）的勞動本身」（p. 104），促使了勞動和其他生產條件的潛在區隔，表現出比共有制更高度的個體化，而形成了自由勞工的範疇。它同時也發展出特殊的技能及其工具。但是在手工業行會階段，「工具仍然和活勞動（lebendige Arbeit）緊密結合在一起，使得工具沒有真正的流通」（p. 108）。然而，儘管它**自身**無法產生勞動市場，生產和貨幣的交易的發展若要創造出勞動市場，其前提必須是「城市**手工業勞動**（Gewerbfleiß），它並不奠基於資本和雇傭勞動，而是奠基於行會裡的勞動組織等等」（p. 112）。

但是這一切都需要可能會解體的農村結構。因為如果沒有「將整個農村納入不以使用價值、而以交易價值為目的的生產裡」（p. 116），就不可能發展出資本主義。它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對

於手工業既蔑視又疑慮的古代世界儘管也產生了某種「城市手工業勞動」，卻無法產生大規模的工業（同前揭）。封建制度的農村結構，除了作為其基底的「日耳曼體系」的特性以外，究竟是什麼使它有解體的可能，我們沒有看到任何解釋。況且，在馬克思對此的論證脈絡裡，他的確不需要多作證明。他其實附帶談到交易經濟成長的種種影響。（pp. 112-113）「這個（勞工被剝奪客觀的生產條件，生活用品、原料、工具）分裂的過程部分是在沒有（貨幣）的情況下發生的」（p. 113）。最概括性的解釋（pp. 114 ff）則暗示說，資本最初的產生是很零散或**個別的**（馬克思的加強語氣），與舊有的生產形式**並存**（馬克思的加強語氣），但是漸漸到處破壞它們。

為國外市場從事生產的手工工廠最初是奠基在遠距的交易上，而且是在這類交易的各個中心，而且不是侵入城市手工業勞動，而是技術要求最低的、最不受行會控制的農村副業交易，例如紡紗和織布，儘管在城市部分也有直接和航海以及造船有關的手工業。另一方面，隨著農村人口轉變成自由的臨時工人，在鄉間也出現佃農。所有這些手工工廠都需要預先存在大量的市場。農奴制度的解體，以及手工工廠的興起，將所有生產的部門轉變成資本主義的部門，而在城市裡，在行會以外的臨時工人等階級，為無產階級的產生提供了一個元素（pp. 114-17）。[38]

農村副業交易的解體，創造了基於以手工工廠和工業生產取代以前的農村消費品的**國內**資本市場。「一個歷程，它很自然地（von selbst）產生自勞工和土地以及對於生產條件的所有權（儘管只是附屬的形式）的分裂。」（p. 118）城市手工業轉變成工業則晚一點發生，因為它需要生產手段的大幅進步，才能從事工廠生產。而馬克思特別探討資本主義以前的形式的手稿就此戛然而

止，並未討論到資本主義發展的各個階段。

四

接下來我們必須探討馬克思和恩格斯後續的思考和研究讓他們如何大幅修正、擴大並且延伸《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構》裡的概括性觀點。

在原始共產制度的研究領域尤其明顯。當然，在《資本論》出版以後（1867），馬克思的歷史興趣幾乎都在這個社會發展的階段，相較於一八五七年到五八年，他從一八七三年開始對於毛瑞、摩根以及大量的俄羅斯文獻的研究，為他的研究提供了更堅實的基礎。除了在《資本論》第三卷的農業取向以外，還有兩個理由可以解釋他的興趣焦點。首先，俄羅斯革命運動的發展逐漸促使馬克思和恩格斯將歐洲革命的希望寄託在俄羅斯身上。（對於馬克思的荒誕誤解莫過於主張說他認為只有西方先進工業國家才會發生革命。）[39]向馬克思請益的俄國革命家們對於鄉村共同體在基本理論上的地位莫衷一是，他想當然耳地對此問題著墨比較多。

有趣的是，他有點出人意料地贊同俄國民粹派的看法，認為鄉村共同體可以提供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基礎，而不必先經過資本主義發展的解體。這個觀點並不是從馬克思早期的歷史觀自然地演繹得到的，也不被俄羅斯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在這個問題上和民粹派對立）或其後的馬克思主義者接受，最後也被證明是站不住腳的。馬克思在為它構思理論證明時的困難[40]，或許反映些

許進退維谷的感覺。在多年後討論相同的問題時，相較於恩格斯流暢而精闢地堅守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並且支持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的立場，形成強烈的對比。[41]不過它帶我們來到馬克思漸漸重視原始共產制度的第二個理由。（對於想要放棄馬克思的革命實踐而又喜歡其理論的人們而言，主張說晚期的馬克思失去了青年馬克思的革命味道，總是最常見的批評。）早期馬克思認為，西方資本主義，作為一種非人性的、但是在歷史上是個進步的力量，將會對於停滯不前的資本主義以前的經濟造成衝擊，他有可能對這種非人性越來越感到駭異。我們知道他一直很欣賞原始共同體所體現的肯定性的社會價值，無論它在形式上有多麼落後。在一八五七年到五八年以後，無論是在《資本論》第三卷[42]或其後的俄羅斯討論[43]裡，他越來越強調原始共同體的可行性、它用以對抗歷史解體的力量，甚至它不需要前期的破壞就能發展出更高形式的經濟的能力（儘管只是在俄國民粹派的討論脈絡裡提及的）。[44]於此我不打算像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那樣[45]，詳細解說馬克思的原始演變的概要，尤其是農村。然而我必須就其作品提出兩點重要的評論。首先，階級制度以前的社會形成它自身一個漫長而複雜的歷史時期，有它自己的發展歷史和法則，及其各式各樣的社會經濟組織，現在馬克思則傾向於整個稱為「古代形式」或「類型」。[46]它顯然包含了四個原始共產制度的變項，就像在《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構》裡羅列的。它也可能包括「亞洲形式」（我們知道那是已發展出來的社會經濟形式當中最原始的），也可以解釋恩格斯的《反杜林論》以及《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在有系統地探討該主題時，這個形式為什麼顯然消失了。[47]馬克思和恩格斯或許也想到某種共產制度解體的中介歷史階段，不同

類型的統治階級或許就由此產生。

其次，「古代的」社會演變的分析和《德意志意識型態》以及《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構》裡概要性的分析在各方面都相當一致。它只是更詳細地敷衍它們，就像在《德意志意識型態》[48]裡簡單提到的人類繁衍以及家庭的重要性，擴充為《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摩根的看法），而原始共有財產的摘要分析也被充實且修正為查蘇利奇手稿的農村解體的各個階段（科瓦列夫斯基之類的學者的觀點，他剛好也受馬克思的影響）。

馬克思主義的創建者繼續研究的第二個領域是封建時期。那是恩格斯的最愛，而不是馬克思的。[49]他的許多作品探討封建制度的起源，和馬克思關於原始共產形式的研究部分相同。不過，恩格斯的興趣和馬克思有一點不同。他或許沒有那麼重視原始共同體的存廢，而比較關心封建制度的興衰。他對於農奴制農業的動態發展的興趣比馬克思顯著得多。我們所看到的馬克思晚期關於這些問題的分析，其實都是恩格斯的說法。其次，在恩格斯的作品裡，政治和軍事的元素扮演重要的角色。最後一點是，他著重於中世紀的日耳曼（有一兩則附錄談到愛爾蘭，則是和他個人淵源有關），而且無疑比馬克思更重視民族的興起以及它在歷史發展裡的功能。有些明顯的差異只是因為恩格斯的分析不像馬克思那麼概括性；這也是為什麼初次接觸馬克思主義的人會覺得它比較易懂而有啟發性。然而，儘管他們不是連體雙胞胎，而且（恩格斯也承認）馬克思是更偉大的思想家，然而對於現代在馬克思和恩格斯之間習慣做的比較（一般會貶低恩格斯），我們要有所保留。像馬克思和恩格斯這樣親密共事了四十多年，而在理論上能夠沒有什麼重大的歧見，我

們會推測說他們一定知道彼此在想什麼。無疑的，如果是由馬克思來寫《反杜林論》（在他生前出版），那麼應該會大異其趣，或許會有某些嶄新而深刻的主張。但是我們完全沒有理由認為他對其內容會有歧見。恩格斯在馬克思去世以後的作品亦復如是。

恩格斯對於封建制度發展的分析（僅僅從歐洲的觀點）試圖填補一八五七年到五八年極為全球化的分析留下來的若干缺口。他先是建立了古代世界的沒落和封建制度的興起的邏輯關係，雖然事實上後者是由蠻族的入侵建立在前者的廢墟上的。在古代，大規模農業的唯一可能形式是奴隸的大領主形式，但是在一段時間以後，它變得很不經濟，於是再度被小規模農業取代，成為「唯一有利可圖（lohnende）的形式」[50]。所以說，古代農業已經是在走向中世紀農業的半路上。小規模耕作是封建制度農業的主要形式，它在「運作上」並不在乎有些農民是自由的，有些則對領主負有各種義務。在城市裡也充斥著擁有生產工具者同樣小規模的生產類型。[51]儘管它在某些情況下是比較經濟的生產形式，早期封建時代經濟生活的全面倒退，地方盛行自給自足而劃地自限，只有少量的剩餘產品才會出售或轉讓。儘管它保證任何領土體系（基於對於龐大地產以及所有農夫的控制所需）「必定產生大量統治的領土以及依附他們的小農民」，它也避免古代的奴隸制度或當時的大規模農奴制度的農業對於龐大地產的剝削；查里曼帝國的「莊園」的失敗即為明證。唯一的例外是修道院，它們是「異常的社會團體」，以獨身為基礎，因此他們大異其趣的經濟表現只能以例外視之。[52]

儘管該分析明顯低估了中世紀盛期以信徒領地的農業，它卻極為精準地將大地產區分為社

會、政治和金融的單位以及**生產**的單位，也很精闢地強調封建制度當中農民農業相對於領地農業的優勢。然而，對於隸農制度和封建領主的起源它則是懸而未決。恩格斯自己的解釋傾向於社會、政治和軍事方面，而不是經濟層面的。條頓族的自由農民因為長年戰爭的蹂躪而困苦勞頓，而且由於王室權力積弱不振，只能托庇於貴族或教會。[53]實際上，那是因為以氏族為基礎社會組織形式無法管理或控制它陸續征服獲得的大型政治結構：這些結構因而直接蘊含著階級和國家的起源。[54]如此簡單陳述的假設不是很充足，但是階級源自社會結構的衝突（而不只是源自原始的經濟決定論）的推論卻很重要。它構成一八五七年到五八年的手稿關於奴隸制度的思考路線。

封建制度的沒落則是取決於手工業和貿易的興起，以及城鄉的區分和衝突。在農業發展方面，它表現在封建領主對於只能經由購買獲得的消費財（以及武器或裝備）的需求增加。[55]在農業的技術條件停滯不前的情況下，只能以粗放農業，也就是開墾新土地，建立新農村，才能從農民那裡榨取剩餘生產。但是那蘊含著「和殖民者的友善協議，無論是隸農或自由民」。由於原始的領主形式裡沒有密集開發的誘因，農民固定的負擔反而有越來越輕的趨勢，因此農民的自由有顯著的提升，尤其是在十三世紀以後。（可想而知，恩格斯於此再次忽略了中世紀盛期的領地市集農業以及十四世紀的「封建制度危機」，因而有點過度簡化而扭曲了他的想像。）

但是從十五世紀開始，相反的趨勢盛行起來，領主讓自由民重新成為農奴，農民的土地也成了他們自己的地產。那不只是因為（至少在德國如此）領主的需求增加而必須不斷出售自己的地產，王室權力的擴張，也剝奪了貴族的其他收入來源，例如攔路搶劫或勒索。[56]於是封建制度最

後成為以農奴制度為基礎的大規模農業的再興。以及對應於（源自）資本主義的成長的農民的徵用。「隨著以農奴的勞動服務為基礎的大規模農業（landwirtschaftlichen Grossbetrieb）的階段，農村的資本主義時代宣告來臨。」

對於封建制度沒落的這個描述不是很有說服力，雖然相較於原始馬克思主義的封建制度分析已經有長足的進步，也就是試圖提出且解釋封建制度農業的動態發展，尤其是領主和依附的農民的關係。那當然是因為恩格斯（在談到《馬克》的寫作時）特別強調勞動服務的種種運動，並且指出馬克思以前在這個問題上的錯誤。[57]他援引了當時成果豐碩的中世紀農業史的分析（大抵上以毛瑞為基礎）。另一方面，我們必須注意的是，這個研究領域似乎不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興趣。相較於探討封建社會起源的作品，恩格斯關於這個問題的作品總是簡短而粗略[58]。他的論證絕對不能說是完整的。他沒有充分或直接地解釋為什麼在中世紀早期很不經濟的大規模農業，在中世紀末期以農奴為基礎，又變成有經濟效益的。更讓人訝異的是（根據恩格斯對於考古學所發現的從古代到中世紀的科技發展的強烈興趣）[59]，他不曾將該分析應用在西歐或中歐以外的地方，除了暗示性的評論原始農業共同體的存在，無論是直接或間接的隸農形式（Hörigkeit），正如俄羅斯或愛爾蘭[60]，以及評論（早於《馬克》裡的討論）說，在東歐，農民再度成為農奴，是因為農產品出口市場的增加，以及相對應的生產成長。[61]整個來說，恩格斯似乎無意改變他和馬克思多年前建構的從封建制度過渡到資本主義的概括性描述。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關於「資本主義以前的各種形式」的歷史，並沒有其他重大的偏

離，雖然他們完成了關於十六世紀以來的歷史的重要作品，尤其是現代歷史部分。因此我們只要再簡單討論他們晚期如何思考社會發展階段的兩個層面問題。《政治經濟學批判》前言裡羅列的種種形式，他們堅持到什麼程度？他們曾經思考或重新思考其他哪些概括性的社會經濟發展元素？

如前所見，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傾向於在比較大規模的社會分類裡繼續區分或暗示子分類、子階段以及過渡時期，尤其是在階級制度以前的社會。但是整個列表並沒有太大的改變，除非我們把「亞洲模式」幾乎形式性的轉移納入社會的「古代類型」。至少對馬克思而言，他並不想放棄亞洲模式（甚至想要替斯拉夫模式平反）；並且刻意拒絕將它重新歸類在封建形式裡。科瓦列夫斯基認為，希臘羅馬封建制度的四個判準，有三個可以在印度看到，因此它應該被歸類為封建形式，馬克思不同意他的看法，指出說「科瓦列夫斯基忘記了農奴制度，它在印度並沒有那麼重要。（再說，封建領主的**個別角色不只是保護**不自由的農民，也包括自由農民……它在印度並不重要，除了臥各夫〔wakuf，宗教公產〕以外。）我們在印度也沒有看到在羅馬和日耳曼封建制度裡很常見的『土壤之詩』。在印度，土地從來沒有非貴族階級（平民、佃農）很熟悉的那種**高貴**。」[62]恩格斯對於領地和原始共同體的基礎的可能組合比較有興趣，他似乎沒有那麼斷定，雖然他刻意將東方排除在封建制度以外[63]，如前所見，他一點也不想將他對於農業封建制度的分析延伸到歐洲以外。這並不是說，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農業封建制度和中世紀城市的特別組合只有在歐洲才看得到。

另一方面，在晚期的作品裡，有許多段落對於生產的社會關係的概念暗示著耐人尋味的闡釋。此處似乎又是恩格斯發起的。他如是談到農奴制度（在一八八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給馬克思的信裡，或許是順著馬克思的話題）：「農奴制度和隸農制度當然不是中世紀封建制度特有的形式，它幾乎在各地發生，當征服者要當地居民為他們開墾土地。」他又提到雇傭勞工說：「最早的資本家就遇到某種形式的雇傭勞工。但是他們把它當作附屬的、例外的、臨時的，或是過渡階段。」[64]由某些關係決定的種種生產模式，以及存在於各個時期或社會經濟背景的關係的「種種形式」，它們的區分早已蘊藏在馬克思早期思想裡。在討論貨幣和商業行為時特別明顯。它非常重要，因為它可以幫助我們駁斥某些幼稚的論證，例如主張說資本主義不是新東西，因為在埃及就已經有商業，或是中世紀采邑用貨幣支付他們的莊稼收成，但是它讓我們注意到，數量上必然有限的基本社會關係，會被人們在無數的情況下「發明」或「再發明」，而生產的所有貨幣模式（或許除了資本主義以外）都是由它們的各種組合構成的複合物。

五

最後，我們不妨簡單綜觀馬克思主義者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去世以後關於主要的社會經濟形式的討論。從許多方面去看，它一直很不足，雖然它有個優點，就是從來不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是具體的最終真理。其實，那些作品一直在大幅地修訂。然而，這個修訂的過程很奇怪地既

沒有系統性也沒有計畫性，討論的理論層次讓人失望，而其主題也顯然治絲益棼。

我們可以注意兩個趨勢。第一個趨勢暗示著對於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的大幅簡化，將主要的社會經濟形式化約為單一的階梯，所有人類會都必須拾級而上，只是速度有所不同，最後都會攻頂。[65]從政治和外交的觀點，它有其優點，因為社會在過去歷史發展的快慢方面的內在趨勢，對它而言再也沒有差別，而且它也讓特殊的國家找不到藉口說他們是一般性歷史法則的例外[66]，但是它顯然沒有科學上的優勢，也和馬克思的看法有所出入。再說，它在政治上很沒有必要，因為無論它們過去的歷史發展有什麼差異，馬克思主義者總是堅持認為，所有民族，無論是什麼種族和歷史背景，都有相同的能力去成就現代文明，只要它們能夠自由地追求那些成就。

直線發展的觀點也會進而探討每個形式的「基本法則」，解釋它們如何轉型到下一個更高的形式。對於從全世界公認的原始共產階段到階級社會的轉型，以及資本主義迥然不同的發展，馬克思和恩格斯（尤其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已經暗示了這種概括性機制。他們努力探索封建制度[67]甚至是奴隸制度階段[68]是否有類似的「概括性法則」。一般認為他們不是很成功，即使是最終一致同意的公式，似乎也只不過是定義而已。他們無法在封建制度和奴隸社會裡找到公認的「概括性法則」，這其實是很重要的事。

第二個趨勢部分是從第一個趨勢推論出來，但是它們也有部分的衝突。它導致對於馬克思的種種社會經濟形式列舉的修正，刪去「亞洲形式」，限縮「古代」的範圍，相對應地擴大「封建制度」的範圍。「亞洲形式」的刪除約莫是在一九二〇年代末期到三〇年代末期，在史達林的

《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1938）裡再也沒有提到它，雖然有些馬克思主義者（主要是英語系的）在其後很久仍然會提到。[69]由於馬克思的特色是拒絕歷史演變，刪掉它了以後，可以產生一個更符合普世性而直線性的詮釋的簡單架構。但是它也刪除了認為東方社會基本上是「不變的」或無歷史的那種謬誤。人們一直認為，「馬克思自己關於印度所說的話，不能說是符合事實」，雖然他們也認為「（印度歷史）的理論基礎仍然符合馬克思主義」[70]。「古代」形式的限縮，並沒有提出重大的政治問題或（表面上）招致政治辯論。那只是因為學者們沒辦法在世界各地都找到奴隸制度階段，也沒有辦法找到足以在古代的古典社會（比馬克思自己的模式更簡單）盛行的簡單的奴隸經濟模式，[71]。蘇聯官方科學不再堅持有一個奴隸社會的普世階段。[72]

「封建制度」的範圍則擴大，以填補這些變化的空缺，那些受影響的社會都無法重新歸類為資本主義或是原始共產制度或「古代」形式（就像我們印象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傾向會做的），甚至部分放棄原來被歸類為原始共產制度以及資本主義早期發展的社會。因為現在我們看到，以前籠統稱為「部落」的社會裡（非洲的許多地區）的階級劃分已經相當進步。而在時間表的另一端，將正式的「資產階級革命」以前的所有社會都歸類為「封建制度」的傾向也甚囂塵上，尤其是英國。[73]但是「封建制度」並不只是個剩餘範疇。自從早期後馬克思主義時代以來，人們一直試著將某種原始的或原型的封建制度視為階級社會的一般性形式（雖然不一定是舉世皆然的），源自原始共產制度的解體。[74]（從原始共產制度到封建制度的直接過渡，當然也可見於馬克思和恩格斯）。據稱，從此原型的封建制度，會開展出各種其他形式，包括歐洲（以及日本）類型的

成熟的封建制度。另一方面，從各種沒有那麼先進、卻仍然是高度開發的形式倒退到封建制度，就像是從羅馬帝國到部落式的條頓人王國，始終是必須考慮的。歐文．拉鐵摩爾甚至「主張實驗性地從革命性的以及復辟的（反革命的）封建主義去思考」，要我們記得部落社會在和其他更發達的社會互動時短暫的封建化的可能性。[75]

所有各種趨勢的最終結果，都會產生「封建制度」的龐大範疇，它橫亙各大洲、跨越數千年，從奈及利亞的酋長國到一七八八年的法國，從西班牙征服阿茲提克社會那一刻所看到的趨勢，到十九世紀沙皇的俄國。的確，它們都可以放在如此概括性的類別下面，而且有其分析的價值。同時，由於沒有大量的子分類、子類型以及個別歷史階段的分析，這個概括性的概念有變得太笨重的危險。他們嘗試了各種子分類，例如「半封建」，但是到目前為止，馬克思主義者對於封建制度的界定，並沒有太多的進步。

前面提到的兩個趨勢的組合，產生了意外的難題。因此想要以若干既定的類別去界定每個社會或時期，難免會產生界限劃分上的爭議，就像我們要把動態的概念嵌進靜態的概念裡一樣。因此，在中國，關於從奴隸制度過渡到封建制度的年代問題，有許多爭論，「因為整個鬥爭跨越了好幾個世紀……生活的不同社會和經濟模式，在『幅員廣闊的中國裡，曾經暫時地共存』。」[76]在西方國家，類似的難題也讓人們認真討論從十四世紀到十八世紀的性格。[77]這些討論至少提出了關於生產的社會關係的不同「形式」如何夾雜和共存的問題，雖然它們並不像馬克思主義者的其他討論那麼重要。[78]

然而，隨著貶史達林運動，以及《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構》的部分影響，馬克思主義者的討論開始樂意回頭探討若干觀點，它們也在過去幾十年來漸漸被接受。他們似乎是在許多國家各自獨立回頭探討的，無論是社會主義國家或非社會主義國家，包括法國、東德、匈牙利、英國、印度、日本和埃及[79]。他們有的探討關於歷史分期的一般性問題，例如一九六二在《今日馬克思主義》（*Marxism Today*）期刊上的辯論，有的討論資本主義以前各種社會經濟形式的問題，有的則討論很讓人困擾而現在重新開放的「亞洲形式」的問題。[80]

凡此種種，都顯然是想要擺脫一九五〇年中期的世代國際馬克思運動的歷史發展，該發展在許多領域裡對於馬克思的討論層次無疑有負面影響。馬克思原本探究歷史演變的問題的方法，在某個方面來看，一直被簡化和改變，而《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構》的出版雖然提醒人們說他的方法其實是很深刻而複雜的，但是並沒有辦法糾正這個趨勢。馬克思原本的社會經濟形式的列舉被改變，但是他們沒有提出讓人滿意的替代方案。馬克思和恩格斯卓越的、但是不完備的而且試驗性的討論，一直被人們探索和補充，但是他們的分析最成果豐碩的部分卻始終被忽視。

由此而論，馬克思主義對於歷史演變的觀點，尤其是歷史發展的主要階段，更是需要去澄清。細心的研究《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構》並不意味著要接受馬克思的結論，但對此會很有幫助，而且是不可或缺的部分。

注釋：

1 恩格斯關於人類從猴子演化出來的解釋，以及人類和其他靈長類的差異，見他在一八七六年的手稿「從猴子變成人類的努力」（*Dialectics of Nature*, *Werke* 20, pp. 444-55）。

2 馬克思，不同於黑格爾，不可以或有必要以抽象和先驗的方式去解釋他的理論。如同馬克思在該思想的重要時期裡的其他作品一樣卓越、深刻而動人，見《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論「政治經濟的方法」關於該方法的價值的討論（*Werke* 13, pp. 631-9）。

3 馬克思很清楚這種簡單化的可能性及其實用性，儘管他不認為很重要。因此他認為研究生產力的歷史成長，或許可以突顯亞當斯密關於停滯的和成長的經濟的直覺印象在科學上的重要性。見《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論（*Werke* 1, p. 618）。

4 馬克思主義的卓越批判者也承認這點。於是李希特海姆（G. Lichtheim）正確地指出，馬克斯．韋伯的社會學理論（關於宗教、資本主義或東方社會）並沒有辦法取代馬克思。他的理論都被馬克思預見了，或者可以嵌入後者的框架裡。見：*Marxism* (1961), p. 385; 'Marx and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St Anthony's Papers*, 14, 1963), p. 106。

5 馬克思致布洛赫（Joseph Bloch）（21.9.1890）見：*Collected Works* vol. 49, pp. 33-7。

6 顯然有若干限制：一個建立在一個需要蒸汽機的技術層次上的社會經濟形式，有可能比不需要該技術的形式提早出現。

7 *Marx und Engels zur Deutschen Geschicht* (Berlin, 1953), I, pp. 88, 616, 49.

8 見：恩格斯致馬克思（18.5.1853）；關於巴比倫王國的起源，見：恩格斯致馬克思（6.6.1853）。

9 Karl Marx, *Chronik Seines Lebens*, pp. 96, 103, 107, 110, 139.

10 恩格斯致馬克思（6.6.1853）。

11 五月十八日到六月十四日的書信。其他馬克思在一八五三年三月到十二月期間提到的東方世界的研究文獻，有：G. Campbell, *Modern India* (1852), J. Child, *Treatise on the East India Trade* (1681), J. von Hammer, *Geschichte des*

osmanischen Reiches (1835), James Mill, *History of India* (1826), Thomas Mun, *A Discourse on Trade, from England into the East Indies* (1621), J. Pollexfen, *England and East India...* (1697), Saltykow, *Lettre sue l'Indé* (1848)。

12 G. Hanssen, *Die Aufhebung der Leibeigenschaft und die Umgestaltung der gutsherrlich-bäuerlichen Verhältnisse überhaupt in den Herzogthümern Schleswig und Holstein* (St Petersberg, 1861); August Meitzen, *Der Boden und die landwirtschaftlichen Verhältnisse des preussischen Staates* (Berlin, 1866); G. von Maurer, *Einleitung zur Geschichte der Mark, Hof, Dorf, und Stadtverfassung und der öffentlichen Gewalt* (Munich, 1854); *Geschichte der Fronhöfem* etc., 4 vols. (Erlangen, 1862-3).

13 馬克思致恩格斯（14.3.1868）；恩格斯致馬克思（25.3.1868）；馬克思致查蘇利奇（8.3.1881）；恩格斯致倍倍爾（Bebel）（23.9.1882）。

14 恩格斯致馬克思（15.12.1882）；馬克思致恩格斯（16.12.1882）。

15 梭羅·羅傑斯在《資本論》第一卷（Torr edn, p. 692n）時期被譽為「關於物價的第一本真實歷史」。《資本論》第三卷大量引用：K. D. Huellmann, *Städtewesen des Mittelalters* (Bonn, 1826-9)。

16 例如：Huellmann, VIncard, *Histoire du Travail... en France* (1845); Kindlinge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Hörigkeit* (1818)。

17 恩格斯致馬克思（25.3.1868）。

18 A. Soetbeer, *Edelmetall-Produktion und Wertverhältnis zwischen Gold u. Silber seit der Entdeckung Amerikas...* (Gotha, 1879)。恩格斯知道這本書。

19 Marx-Engels, *Werke* 13 (Berlin, 1961), pp. 135-9。剛好預見了現代對於以純粹貨幣關係去解釋物價上漲問題的批評。

20 *Werke* 3, p. 22.

21 *Werke* 3, pp. 22-3.

22 「ständisch」一詞沒有合適的英譯，中世紀的「estate」現在有混淆的困擾。

23 *Werke* 3, p. 24；完整的論證，見：pp. 24-5。

24 *Werke* 3, pp. 50-61.

25 *Werke* 3, pp. 53-4.

26 *Werke* 3, pp. 56-7.

27 *Werke* 3, p. 59.

28 主要見：馬克思致恩格斯（2.6.1853）；恩格斯致馬克思（6.6.1853）；馬克思致恩格斯（14.6.1853）。

29 這個名字的消失，或許是由於其後在研究專家的文獻時，馬克思懷疑他關於早期日耳曼的認知是否正確。

30 關於共同體的以及單一家庭的聚落的不同傾向，另見：G. C. Homans, 'The Rural Sociology of Medieval England', *Past and Present*, 4, 1953。

31 見：pp. 87, 89, 99。《資本論》第一卷的用法一般也是如此：（Berlin, 1956 edn）pp. 357, 6645, 84, 873, 885, 886, 937。

32 *Capital*, III, p. 841.

33 即使是在《資本論》第三卷，他最詳盡地討論封建制度農業，也否認他想分析不同的歷史形式裡的地產問題。見：Chapter 37, pp. 662, 842。

34 *Capital*, III, pp. 843-5 (chapter XLVII, section II).

35 P. M. Sweezy, M. H. Dobb, H. K. Takahashi, R. H. Hilton, C. Hill, *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London, 1954), p. 70.

36 馬克思主義者並不全然拒絕它，雖然我們不能誤以為那就是說使用價值的生產的體系有時候也是自然經濟的體系。

37 書中會提到「würdiges Zunftwesen」（可敬的行會體系）、「一半是工藝的、一半是為了自己而從事的勞動」、「städtischer Gewerbefleiss」（城市手工業），都是有情緒性的而且讚美的意味。

38 馬克思於此低估了城市手工業分化為實質的雇員和雇傭工的趨勢。

39 一八七〇年末期，恩格斯談到他們對於俄國革命的希望，一八九四年時，甚至認為「俄國革命可能給西方國家的工人革命一個信號，所以兩者是互補的」（*Werke* 18, p. 668）。另見：馬克思致索爾格（Sorge）（27.9.1877）；馬克

思致伯恩斯坦（22.2.1882）。

40 見致查蘇利奇的信（1881）。該信的四份手稿都有留存，其中三份收錄於：*Werke* 19, pp. 384-406。

41 Nachwort (1894) zu 'Soziales aus Russland' (*Werke* 18, pp. 663-4).

42 *Capital* III, pp. 365-6.

43 例如：給查蘇利希的回信的手稿：*Werke* 19, pp. 387, 388, 402, 404。

44 李希特海姆正確指出（*Marxism*, p. 98）厭惡資本主義和偏好殘存的原始共產的傾向，但是他說一八五八年的馬克思對此持完全否定的觀點，那就有些問題了。主張說共產主義是在更高的層次上重新創造原始共產主義的社會德行，是社會主義最早的傳統觀念。傅立葉說：「天才必須去發現獲致那種原始幸福的種種路徑，將它適用在現代工業的情況裡」（引自：J. Talmon, *Political Messianism*, London, 1960, p. 127）。關於早期馬克思的看法，見一八四二年的馬克思於 *Das philosophische Manifest der historischen Rechtsschule*, (*Werke* 1, p. 78)：「十八世紀流行的幻想將自然狀態視為人類本性的真實狀態。人們喜歡從自己的眼裡去看人的理念，因此創造出『自然人』來，捕鳥人一身羽毛顯露了他們的幼稚。在十八世紀末期，他們以為原始民族有原始的智慧，到處都聽得到捕鳥人模仿伊洛郭族或印地安人的歌曲，以為這樣就可以抓到鳥。凡此種種怪異行徑，它們的觀念基礎倒是對的，也就是說，粗俗的狀態是描繪真實狀態的幼稚畫作，就像是荷蘭畫風一樣。」見：馬克思致恩格斯（25.3.1868），論毛瑞的歷史作品。

45 這是馬克思很想寫的作品，而且準備了大量的注釋，恩格斯也盡可能以它們為基礎。見一八八四年第一版序言（*Werke* 21, p. 27）。

46 給查蘇利奇的回信的手稿（*Werke* 19, pp. 384-406）。

47 「奴隸制度是最早的剝削形式，是屬於古代的；接踵而至的則是中世紀的農奴制度，然後是近代的雇傭工。它們是三個主要的文明階段的三個主要僕役形式。」（*Origin*, in *Werke* 21, p. 170）文中顯然沒有要把馬克思所謂的「亞洲」形式納入這三個項目裡。它屬於「文明」的史前時代，因而被刪除。

48 Werke 3, pp. 29-30.

49 關於中世紀的日耳曼和愛爾蘭歷史，《反杜林論》、《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和《日耳曼農民戰爭》是主要出版作品，不過是在手稿和注釋裡（大多不完整）。見：*Werke* 16, pp. 459-500; *Werke* 19, pp. 425-521; *Werke* 21, pp. 392-401。

50 《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Werke* 21, pp. 144）。

51 《反杜林論》（*Werke* 20, pp. 164, 220, 618）。

52 《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Werke* 21, pp. 148-9）。

53 同前揭：pp. 146-8。

54 同前揭：pp. 146, 164；《馬克》（*Werke* 19, pp. 324-5）。

55 《馬克》（*Werke* 19, pp. 326-7）。論城市的機構，恩格斯的手稿：*Über den Verfall des Feudalismus und das Aufkommen der Bourgeoisie* (*Werke* 21, p. 392)。

56 《馬克》（*Werke* 19, pp. 326-7）。

57 恩格斯致馬克思（15.12.1882, 16.12.1882）。

58 《馬克》只是順便處理封建制度農業運動，原本是《反杜林論》八到十頁的附錄，而未出版的《論封建制度的沒落和資產階級的興起》（*Über den Verfall des Feudalismus und das Aufkommen der Bourgeoisie*）則是新版的《日耳曼的農民戰爭》序言的注釋。

59 見：《論日耳曼的古代史》（*Zur Urgeschichte der Deutschen*）（*Werke* 19, esp. pp. 450-60）。

60 《反杜林論》序言注釋（*Werke* 20, pp. 587-8）。

61 同前揭：p. 588。

62 引自：L. S. Gamayunov, R. A. Ulyanovsky, 'The Work of the Russian Sociologist M. M. Kovalevsky... and K. Marx's criticism of the work', XXV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 (Moscow, 1960), p. 8。

63 《反杜林論》（*Werke* 20, p. 164）。

64 《反杜林論》（*Werke* 20, p. 252）。

65 「每個民族基本上都是走一樣的路……根據確定的法則，社會發展經過各種社會經濟形式相續不斷的置換。」O. Kuusinen (ed.), *Fundamentals of Marxism-Leninism* (London, 1961), p. 153。

66 擔心助長「亞洲例外論」以及打壓對於西方帝國主義影響的堅定反對力量，或許是一九三〇年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以後放棄馬克思的「亞洲形式」的決定性因素。比較一九三一年的列寧格勒討論，見：K. A. Wittfogel, *Asiatic Despotism* (1957), pp. 402-4。中國共產黨在此之前的幾年也獨立地走相同的路線。它的觀點似乎很標準化且直線性的，見毛澤東：*Selected Works,* III (London, 1954), pp. 74-7。

67 一九五〇年早期的蘇維埃討論，見：*Voprosi Istoriti,* 6, 1953; 2, 1954; 2, 4 and 5, 1955。西方關於封建制度的過渡的討論部分談到類似的主題，見：*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G. Lefebvre, *La Pensée,* 65, 1956; G. Procacci, Società, 1, 1955。

68 見：Guenther and Schrot, *Problème théoriques de la société esclavagiste, in Recherches Internationales à la lumière de marxisme* (Paris) 2, May-June 1957。

69 例如：E.M.S. Namboodiripa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Kerala* (Bambay, 1956), pp. 11-12。

70 D. D. Kosambi,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dian History* (Bombay, 1956), pp. 112。

71 見：Recherches Internationales, loc. Cit., (1957)。

72 E. Zhukov, 'The Periodization of World History',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Congress, Stockholm,* 1960; Rapports I, pp. 74-88, esp. p. 77。

73 試比較：'State and Revolution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Communist Review,* July 1948。然而該觀點一直遭受批評，尤其是：J.J. Kuczyniski (*Geschichte d. Lage d. Arbeiter unter dem Kapitalismus,* vol. 22, chapters. 1-2)。

74 試比較：Bogdanov, *Short Course of Economic Scienc,* 1987, revised 1919 (London, 1927)：更繁複的形式，見：K. A. Wittfogel, *Geschichte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Vienna, 1924)。

75 O. Lattimore, 'Feudalism in History', *Past and Present,* 12, 1957.

76 E. Zhukov, op. cit., p. 78.

77 *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78 比較：*Zur Periodisierung des Feudalismus und Kapitalismus in der Geschichtlichen Entdeckung der U.S.S.R.,* Berlin, 1952。

79 *Asiaticus, Il modo di produzione Asiatico* (*Rinascita,* Rome, 5 October 1963, p. 14).

80 *Recherches Internationales* 37 (May-June 1963)。探討封建制度，收錄了對立的兩極看法。關於古代社會，見以下作者的辯論：Welskopf, *Die Produktionsverhälnisse im Alten Orient und in der griechrömischen Antike,* Berlin, 1957; Guenther and Schrot, *Ztschr. F. Geschichtswissenschaft,* 1957; *Wissensch. Ztschr. D. Karl-Marx-Univ.,* Leipzig, 1963。關於東方社會，見：F. Tökei, *Sur le mode de production asiatique,* Paris, Centre d'Etudes et de Recherches Marxistes, 1964。

第八章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的因緣際會

一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在從它們裡頭汲取靈感的社會主義和共產黨陣營當中，已經擁有「經典」的位階，自從一九一七年以來，在越來越多的國家裡，它們成為意識型態的基礎，甚或成為在俗世裡類似神學的東西。自從恩格斯死後，許多（或者說大部分的）馬克思主義的討論都著重於文本注釋、思辨和詮釋，或者為了是否可以修正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作品裡的觀點而辯論。但是這些作品原本並不是出版完整的兩部全集。再者，在一九二〇年以前，也沒有人想到要出版他們的全集，直到雅札諾夫在莫斯科主編著名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Marx-Engels-Gesamtausgabe*）（以縮寫「MEGA」著稱）。德文原版仍然不完整，雖然在俄羅斯的編輯工作持續下去，但是沒有原本計畫的版本那麼完整。其他地方也各自試圖出版完整版本，尤其是法國的亞弗烈・科斯特版（*Alfred Costes Editeur*）。一九五六年東德的版本相當充實（一般稱為Werke），但是也不能算是完整版，它是其他語言的類似版本的基礎。其中企圖最大的（更加充

實的）版本，應該是一九七五年到二〇〇四年的英語版（*Collected Works*）。

經過漫長的籌備，分別由蘇聯和東德的「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學院」贊助，於一九七五年出版了新版《全集》（*Gesamtausgabe*）。這兩個國家的解體使得該版本由意識型態的模式轉為學術模式：整個權責轉移到阿姆斯特丹社會史國際研究所裡的國際馬克思恩格斯基金會（Internationale Marx-Engels Stiftung），它從一九三三年開始，一直保存著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真實檔案資料；該計畫的實務工作也轉交給柏林和布蘭登堡科學院以及若干國家的研究中心。該計畫預計出版一百二十冊，當然幾乎是低估了，因為還要將讀書筆記、注釋和眉批都收錄進去。到了二十一世紀初，已經出版了五十四冊，預計在二〇三〇年全部出版。

因此，對於馬克思主義大部分的歷史而言，辯論始終是以各種不同的馬克思和恩格斯選集為基礎。要理解該歷史，我們有必要粗略地審視這些作品的因緣際會。

如果我們略去一八四〇年到五〇年龐大的報導作品，在馬克思生前發表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就沒有那麼多。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以前，大抵上都是馬克思的文章（以及少數恩格斯的），也就是在他們有體系的合作以前（《德法年報》〔*Deutsche-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恩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1845）；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神聖家族》（*Die Heilige Familie*）（1845）；馬克思和普魯東的論戰，《哲學的貧困》（*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1847）；《共產黨宣言》（1848）；以及一八四〇年末期的若干講演和論文。除了《共產黨宣言》以外，以上作品在馬克思生前不曾重新出版。在一八四八年到四九年的挫敗

（被驅逐出境）以後，馬克思從國外在一份發行量很可憐的德國雜誌發表了對於革命及其影響的著名分析，也就是現在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原來的題目是《霧月十八日》（*Der 18te Brumaire des Louis Napoleon*）。他在一八六九年重刊該作品。恩格斯的《日耳曼農民戰爭》（*Der deutsche Bauernkrieg*）（1850），也是從國外投稿德國雜誌的（不像現在所謂的《日耳曼革命與反革命》（*Revolution und Konterrevolution in Deutschland*），它也是以馬克思的名字在《紐約論壇報》刊登），並且在馬克思生前重新出版。扣除報紙和政治論辯，馬克思後來的出版作品，實際上就只有：《政治經濟學批判》（1859），沒有再版；《資本論》第一卷（1867），它的歷史前面曾經概述；以及許多為「國際工人聯合會」寫作的文章，其中最有名的是《成立宣言》（*Inaugural Address*, 1864）和《法蘭西內戰》（*The Civil in France*, 1871）。後者曾經在若干場合裡重刊。恩格斯出版了很多小冊，主要是談論軍人和政治問題，但是在一八七〇年代，隨著《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Herr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 1878）（即《反杜林論》），他開始筆耕不輟，經由那些作品，國際社會主義運動才認識到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以外的思想。然而它們大部分都是在馬克思死後的時期發表的。

所以說，在一八七八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已知且出版的作品集相當單薄，因為早期的作品都絕版了。大抵上有《共產黨宣言》，在一八七〇年初期才廣為人知；《資本論》，翻譯為俄文和法文；以及《法蘭西內戰》，讓馬克思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不過，在一八六七年到一八七五年間，馬克思首次出版他的作品集。

從馬克思去世（1883）到恩格斯去世（1895）期間，發生了雙重轉變。首先，隨著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興起，人們對於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的興趣也在加速當中。在那十二年裡，根據安德烈的說法，《共產黨宣言》以十五種語言出版了七十五種版本。[1]有趣的是，在沙皇帝國的俄文版本比原始的德文版本還要多。其次，大量的經典有系統地以原始語言出版，主要是由恩格斯出版。其中包括：（一）、絕版很久、而恩格斯想要強調其重要性的作品的重印（一般都會加上新的導論）；（二）、馬克思未出版或未完成的作品的首度出版；（三）、恩格斯的新作，裡頭有時候加入馬克思未完成的文本，例如「論費爾巴哈」，試圖給馬克思學說一個融貫而完整的印象。於是，就第一點而言，恩格斯以小冊子的形式重新出版了馬克思的《雇傭勞動與資本》、《哲學的貧困》、《霧月十八日》、《法蘭西內戰》、《法蘭西階級鬥爭》、他自己的《工人階級的狀況》，以及他在一八七〇年代的作品。而就第二點而言，主要的作品是《資本論》第二、三卷，以及《哥達綱領批判》。在第三點裡的主要作品則是《反杜林論》，數度再版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是摘錄自比較大部頭的作品《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以及《費爾巴哈》（1888），此外更有許多關於當時的政治論辯的作品。除了《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以外，這些作品並沒有大量發行。不過它們一直都沒有絕版，也構成了恩格斯考慮的他和馬克思的全集的主體，雖然如果他仍然在世的話，他應該會收錄更多的文本，例如《剩餘價值理論》（它後來收錄在考茨基的版本），以及他一直想出版的《日耳曼農民戰爭》的修訂版。

除了若干例外，例如原本以英文出版的作品（恩格斯死後不久，有些作品由伊蓮諾·馬克

思重新發行），它們都是十九世紀末期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文本，包括其他語言的譯本。主要是恩格斯編輯的選集，也可以說是資料彙編。所以說，我們現在看到的《資本論》的版本形式並不是馬克思自己的構想，而是恩格斯越俎代庖的。我們都知道，最後三卷是恩格斯（以及後來的考茨基）從馬克思不完整的草稿彙編而成的。然而，第一卷其實也是由恩格斯定稿的，而不是馬克思，因為標準版（一八九〇年德文第四版）是由恩格斯根據馬克思在上一版（第二版）的校訂而修正的，那是馬克思為了一八七二年到七五年的法文版所做的更動，某些手寫的附註，以及不重要的技術問題。（的確，馬克思在一八七二年由自己修訂的版本裡，對於一八六七年的第一版重寫了好幾節。）於是，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者，就是奠基於這些主要經典，但是他們的理論家和領袖，尤其是在德國的，只有少數人親自接觸過晚年的恩格斯，無論是經由對話或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才公開的大量通信。我們要注意的是，那是「已完成」的理論作品的全集，恩格斯自己的作品也是意圖填補馬克思留下來的空缺，並且讓早期的出版重新問世。所以說，他編輯《資本論》的目標，當然不是要重構馬克思經濟思想生前的未竟理路和開展。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人們才對於《資本論》的緣起和開展認真從事歷史重建，而至今仍未完成。恩格斯的目標是要為他的朋友的主要作品編輯一個「定本」，至於早期手稿就顯得多餘了。

他自己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概說，尤其是相當暢銷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是想要讓走群眾路線的新的社會黨員更能了解整個理論內容。在那段期間，社會主義運動的許多理論家和領袖也紛紛對於馬克思理論撰寫大眾化的概說。例如法國的狄維、義大利的卡菲洛、英國

的艾夫林，都出版《資本論》的概說，而考茨基則出版他的《馬克思的經濟學說》（*Karl Marx' ökonomische Lehren*）。以上只是該類型的若干作品。的確，新的社會主義運動主要的教育和宣傳工作，似乎著重於這類作品的出版和傳播，而不是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的作品。例如說，在一九〇五年以前的德國，《共產黨宣言》每一版的平均印量只有兩千到三千本，雖然後來的印量有增加的趨勢（資料來源：社會民主黨的《黨員大會》〔*Parteitage*〕）。相較之下，考茨基的《社會革命》（*Die Soziale Revolution*）（第一部）在一九〇三年每一版的印量是七千本，而一九〇五年則是兩萬一千五百本；倍倍爾的《基督宗教和社會主義》（*Christenthum und Sozialismus*）在一八九八年到一九〇二年間銷售了三萬七千本，一九〇三年則賣了兩萬本；而共產黨的《埃爾福特綱領》（Erfurt Programme, 1891）則銷售了十二萬冊。

這不是說有理論傾向的社會主義者現在不讀經典作品。它當然迅速翻譯成許多語言的譯本。一八九〇年代的義大利知識分子對於馬克思主義興趣特別濃厚，在一九〇〇年就有了恩格斯編輯的全集（除了《資本論》後面幾卷），而齊柯提編輯的馬克思、恩格斯和拉薩爾的《義大利文集》（*Scritti italiani*）也收錄更多的作品。[2]一九一三年的英文譯本，主要是由芝加哥查爾斯．柯爾出版社（Charles Kerr）出版的，儘管翻譯得很差，直到一九三〇年中期，並沒有什麼增訂。

中歐、東歐以及義大利對馬克思主義有興趣的知識分子，對於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作品自然是引領期盼。德國的社民黨擁有創立者們的《馬克思恩格斯遺著》（*Nachlass*），並不想出版他們的全集，的確考慮到出版全集或是重新出版比較挑釁或在政治上不合時宜的作品可能惹來的麻

煩。然而，馬克思主義的學者們，例如德國的考茨基和梅林、俄國的雅札諾夫，認為應該就馬克思和恩格斯已發表的作品編輯一個比恩格斯當時認為有直接必要性的選集更完整的版本。於是，梅林的《馬克思恩格斯遺著選》（*Aus dem literarischen Nachlass von Marx und Engels*）重新出版了一八四〇年代的作品，而雅札諾夫則重出了好幾冊的一八五二年到六二年間的作品。

在一九一四年以前，他們未發表的作品有個重要的突破，也就是一九一三年出版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書信集。考茨基間或在社民黨的理論期刊《新時代》（*Neue Zeit*）裡發表不少文稿選輯，尤其是馬克思致庫格曼醫師（1902），以及現代收錄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綱要》裡的片簡（1903-04），例如《政治經濟學批判》不完整的導論。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某些國家、以該國語言或是提到那些國家的書信，有時候也會在當地發表，雖然它們很少翻譯為其他語言。

一九一四年，列寧為百科全書寫了一篇關於馬克思的文章，經常以《馬克思學說》為題重新出版，從文中列舉的參考書目，可以看到當時出版了哪些經典作品。俄羅斯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對經典最孜孜矻矻的學生，如果有哪一個文本是他們不知道的，那麼它在國際運動裡一定也沒有人聽說過。

二

俄國大革命對於經典作品的出版和普及有以下的改變。首先，它使得馬克思經典研究的中心

轉移到一個編輯世代，他們既沒有親炙恩格斯，更無緣見到馬克思，例如伯恩斯坦、考茨基和梅林。於是，這個新團隊再也不受恩格斯對於經典的個人意見或是權變策略的問題（無論是和個人或是當代政治有關）的影響，那些因素顯然影響到以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遺著管理人。共產黨運動成為馬克思主義出版品的中心，是這個決裂的主要原因，因為共產主義的編輯（尤其是俄國）認為（有時候很有道理），德國社民黨對於文本的刪修是一種「騎牆派」的扭曲。其次，革命也為布爾什維克派開路，他們現在擁有蘇維埃的資源，可以實現他們出版整個經典作品的目標，也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他們招致了許多技術上的問題。茲舉其中兩個問題為例。馬克思已出版的作品不是很嚴謹（恩格斯的作品沒有那麼嚴重），從各種不完整而暫時性的草稿，到許多讀書筆記和眉批。人們很難區分哪些是「作品」，哪些是隨手抄下來的附記和手稿。新成立的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在強悍的馬克思專家雅札諾夫的領導下，將某些作品從實際上的「全集」裡剔除，雖然它們被發表在同樣包羅萬象的期刊《馬克思恩格斯檔案》裡。直到一九七〇年代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它們才被納入「所有」作品的彙編裡，其次，儘管社民黨的（一九三三年移交阿姆斯特丹的「社會史國際研究所」）馬克思恩格斯的《遺著》裡有卷帙浩繁的草稿，他們的書信卻非常分散，因此不可能有一個全集版，因為大部分的書信我們不知道要歸類在哪裡。實際上，自從大約一九二〇年以來，馬克思和恩格斯有許多書信陸續各自出版，有時候是由收信人或他們的遺著保管人，但是例如和拉法格大量而重要的書信集，則是直到一九五〇年代才出版。既然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直都不完整，這些問題也就沒有那麼迫在眉睫，不過還是要注意。以從前馬克思檔案中心（尤其是社民黨）為基礎的馬克思作品的後續出版，也必須注意這點。雖然莫斯科的研究所試圖將所有可能的作品收錄在他們的全集版（唯一在籌備當中的版本）裡，他們其實只能取得大量檔案的影印本，原稿仍然在西方國家手裡。

於是，在一九二〇年代，我們看到經典作品的出版方興未艾。兩種不同的文獻同時大量發行：未出版的手稿以及馬克思和恩格斯和其他第三者的書信。然而，政治事件很快就成了出版和詮釋的阻礙，那是一九一四年以前料想不到的事。納粹黨在一九三三年的選舉大勝，瓦解了西方（德國）的馬克思研究中心，也大幅延宕了以它們為基礎的詮釋回響。例如說，古斯塔夫·麥耶的恩格斯傳記，一部曠世不朽的學術作品，直到一九三四年才以境外方式出版荷蘭版，一九四五年以後西德年輕的馬克思主義者對它幾乎一無所知，直到一九七〇年才聲名大噪。馬克思文本的新版本不只是複製「馬克思主義的珍本」（借用一九二〇年代的一個書系名稱）[3]，它們本身難免也會成為珍本。在俄國，史達林的崛起使得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解體，尤其是解聘所長雅札諾夫並且殺死他，德文版的全集出版也宣告終止，可是儘管整肅的悲劇性衝擊，並沒有影響到繼續編輯的工作。其次，更嚴重的是，所謂正統史達林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詮釋的甚囂塵上，也就是一九三八年的《蘇聯共產黨簡史》（*History of the CPSU(b): A Short Course*）的官方發行，使得馬克思自己的某些作品也成了異端，因而使得它們難以出版。尤其是一八四〇年代早期的作品。[4]最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也對馬克思的作品造成嚴重的後果。一九三九年到四一年在莫斯科

出版《政治經濟學批判綱要》相當精采的版本，可是始終不為人知（雖然有一兩本傳到美國），直到一九五三年才在東柏林重印。

一九一七年以後經典作品的出版所遭遇的第三種改變，是它們普及化的方式。如前所述，一九一四年以前走群眾路線的社會民主政黨，並沒有積極鼓勵他們的黨員鑽研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或許除了《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以及《共產黨宣言》以外。《資本論》第一卷的確經常再版，從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二二年，在德國就再版十次，但是大家是否真的都在讀，則是一個問號。許多購買它的人或許只是想要擺在書架上，這生動地說明了馬克思已經證明了社會主義在學術上是不可或缺的。許多小政黨，無論是不是由知識分子、幹部或忠誠的軍人組成的馬克思主義團體，他們對於成員的要求自然要高一些。於是，從一八四八年到一九一八年間，《共產黨宣言》在英國就為了英美世界相對少數的馬克思主義團體和政黨發行了三十四版，在法國有二十六版，至於擁有大黨的德語區國家，則有五十五版。

另一方面，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也非常關心其成員的教育，再也不只是依賴於教條式的概說。於是，真正的經典的選擇和普及化，成為重要的課題。人們漸漸傾向於以經典的權威去支持政治論辯，那已經構成馬克思主義的一部分傳統，尤其是俄國，如此一來，更鼓勵經典的傳播，雖然在共產主義運動陣營裡，對於列寧和史達林的經典訴求顯然比馬克思和恩格斯更頻繁。這類經典的普及性無疑地改變了世界各地馬克思研究者的境況，雖然在一九三三和一九四四年間，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被許可出版的地區大幅縮減。

在至今未出版的主要手稿當中，一八四〇年代的手稿在一九三〇年代以前就開始發揮它們的影響力。《德意志意識型態》和《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於一九三二年出版，雖然完整的翻譯姍姍來遲。我們不打算於此討論它們的重要性，只是要附帶說明一下，一九四五年以來許多馬克思主義的討論，都著手詮釋這些早期作品，反之，一九三二年以前的馬克思主義的討論，則對它們置若罔聞。未出版的主要手稿當中的第二部分，則是《資本論》的初稿。如前所見，大量的手稿，也就是一八五七年到五八年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綱要》，更是始終不為人知，因為它第一次大量發行是在一九五三年，而直到一九六〇年代才首度翻譯成其他語言（而且品質不佳）。到了一九六〇年代，它才成為國際馬克思主義論辯的主要基礎，即使在那個年代，最初討論的焦點也不是整部作品，而是草稿裡和歷史有關的段落，它被獨立出來，以《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構》（*Formen, die der kapitalistischen Produktion vorhergehen*, Berlin, 1952）為書名出版，幾年內就陸續出現其他譯本（一九五三年到五四年譯為義大利文；一九六四年譯為英文）。這個文本的出現再度使得當時大部分不重視它的馬克思主義者必須整個重新思考馬克思的作品。和《資本論》有關而且沒有收錄在最終版本裡的初稿，其中有幾節也漸漸經常單獨出版，也就是預定為第一卷第六章的段落，「直接生產過程的結果」（*Resultate des unmittelbaren Produktionsprozesses*），雖然在一九三三年刊登在《馬克思恩格斯檔案》（*Arkhiv K. Marksa i F. Engel'sa*），但是直到一九六〇年代末期才認真討論，在一九七六年才翻譯為英文。其中有些資料一直沒有被出版。

未出版的手稿的第三個主要部分，也就是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Dialektik der Natur）出

版的時間比較早，和恩格斯的其他手稿一起刊登在《馬克思恩格斯檔案》（192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沒有收錄它們（或者原本預計要收錄），可能是如雅札諾夫所說的，恩格斯在一八七〇年撰寫的關於自然科學的討論，其實都只是些陳腔濫調。不過，和馬克思的「科學」取向有關的作品，在俄國很早以前就很流行，而在史達林時期重新被發掘出來。於是，《自然辯證法》在一九三〇年代名噪一時，史達林在一九三八年的《蘇聯共產黨簡史》也曾經引用。[5]在當時人數快速成長的馬克思主義科學家當中，該文本有它的影響力。

至於馬克思和恩格斯與第三者的書信，或許是馬克思未出版的材料當中除了札記以外份量最多的部分，在一九一四年以前發表的比較少，部分是在期刊裡，部分是收錄在個別的書信集裡，例如《索爾格書簡》（*Briefe und Auszüge aus Briefen von Joh. Phil. Becker, Jos. Dietzgen, Friedrich Engels, Karl Marx u. A. an F. A. Sorge und Andere*, Stuttgart, 1906）。一九一七年以後，陸續出版了類似的書信集，尤其是致伯恩斯坦（一九二四年俄文版；一九二五年德文版），以及與倍倍爾、李卜克內西、考茨基等人的書信（一九三二年俄文版；一九三三年德文版，於列寧格勒），但是直到一九三四年到四六年的俄文版（*Sochineniya*, XXV-XXIX），或者是一九五六年到六八年德文版的《馬克思恩格斯文集》裡，才有完整的書信全集出版。如前所述，一直到一九五〇年代末期，才有些特別重要的書信集出版，而且都不算完整。然而，一九三三年間莫斯科研究所的資料裡包括了大量的書信，主要是經由一九三三年初期《書信選》（*Selected Correspondence*）的翻譯和選輯才普及的。

不過，關於這些書信的「官方」出版，我們要提到一點。它們與其說是書信（除了馬克思和恩格斯之間的書信往來），不如說是經典作品的一部分。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書信通常不會收錄在共產黨官方彙編的書信集裡，雖然有些特別的版本，主要是由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的對象或是他們的遺著管理人（考茨基、維克多．阿德勒）出版的，他們將雙方的書信都收錄進去。恩格斯和拉法格的書信（1956-9）或許是由共產黨出版的第一部收錄雙方書信的作品，因而開啟了對於馬克思和恩格斯該方面的文本研究的新階段。再者，在一九七〇年代以前，人們習慣讓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書信（他們彼此的以及和第三者的書信）散見於個別的書信集，也使得對於書信的嚴格編年研究很不方便。

三

如前所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更完整的出版和翻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有長足的進步，尤其是後史達林時期。到了一九七〇年初期，我們可以說，儘管沒有能夠發現更多的手稿和書信，可是許多已知的作品紛紛以原文出版，雖說沒有很普及。其中陸續加入了相當不完整的初稿，例如讀書筆記、眉批等等，人們也漸漸習慣視其為「作品」而出版。或許更重要的是，越來越多的人們試圖分析和詮釋那些材料，以發現馬克思自己的思路，尤其是他沒有出版的手稿所探討的主題，例如馬克思的《民族學筆記》（*Ethnological Notebooks*, ed. L. Krader, Assen, 1972）。

對於馬克思的文本研究而言，它可以視為嶄新而前景看好的階段的開端。馬克思的草稿和異本也是如此，例如《法蘭西內戰》的初稿，以及一八八一年著名的「給查蘇利奇的回信」。的確，這樣的發展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其中若干更重要的新文本，例如《政治經濟學批判綱要》，它們本身就是草稿，而不是準備要出版的。在日本重新出版《資本論》第一卷原本的第一章（一八六七年的版本）（馬克思在後來的版本大幅改寫第一章），文本的異本研究也因而成果豐碩。

我們可以說，自從一九六〇年代以來，馬克思的學者漸漸傾向於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並沒有一個「定本」可以闡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而是一個不斷開展的思考的**歷程**。他們也漸漸放棄以下的觀點，也就是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是整個馬克思主義實質上無法區分的構成要件，他們也開始探討這兩個終身夥伴之間的差別甚或歧異。他們對於差異的誇張詮釋，並不是我們於此要關心的問題。自從一九五〇年代中期以來，馬克思主義作為形式教條系統的漸漸式微，當然鼓舞了馬克思文本研究的新趨勢，雖然他們終究也在最新出版的比較陌生的馬克思作品裡，為「馬克思主義」的另一個教條版本找尋文本權威。

四

一九五六年以後教條式馬克思主義的式微，各個馬克思主義專政的國家以及他們一條鞭式的馬克思主義教義，他們之間的歧異漸漸擴大。而在其他世界裡，多元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團體和

路線卻能夠共存。在一九五六年以前，這樣的歧異幾乎不存在。一九一四年以前的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雖然開展了對教義的正統詮釋，以對抗右翼的「修正主義者」，以及左翼的無政府主義和工聯主義者，但是仍然無法如願地防堵他們。德國社民黨裡沒有人會覺得修正主義領袖伯恩斯坦在一九一三年編輯馬克思恩格斯的書信集有什麼不妥，雖然列寧在他的編輯原則裡看出「機會主義」的主張。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的馬克思主義在一九二〇年代是共存的，但是隨著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的建立，經典出版的中心漸漸轉移到共產黨陣營。順便一提，現在仍然如此。儘管一九六〇年代開始出版分庭抗禮的經典作品版本（法國的魯貝爾、德國的考茨基），標準版本仍然是以莫斯科為基礎的那些作品（以及一九四五年後的東柏林），所有人（包括許多譯者）都不作他想：第一版和第二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以及《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Marx-Engels-Werke, MEW）。一九三三年以後，基於務實的目的，蘇聯內外的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都和共產黨聯合陣線，因為共產主義運動的各種分離主義和異端並沒有擁有太多的支持者。社會民主黨裡的馬克思主義（即將撇開一九三三年到三四年以後德國和奧地利政黨的分崩離析不談）也漸漸式微，並且公開批判權威的正統。一九四五年以後，除了少數例外，這些政黨再也不認為自己是馬克思主義，雖然它們在歷史淵源上或許是。只有在回顧的時候，而且是從一九六〇年到七〇年代的馬克思主義的多元主義觀點去看，才能夠認識到兩次大戰之間馬克思主義文獻的多元性格，人們（尤其是一九六〇年代中期的德國）也有體系地出版或重印該時期的作品。

所以說，大約有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時間，世界各地的共產黨的馬克思主義，和蘇聯的馬克

思主義並沒有實質的差別；至於沒有讓那樣的差異浮上檯面。一九五六年以後，這個情況漸漸改變，而且在加速改變當中。隨著蘇聯和中國的決裂，正統學說不僅一分為二，沒有主政的共產黨也漸漸面臨支持度更高的其他馬克思主義團體的競爭，至少是在知識分子圈內（也就是馬克思文本的讀者們），而在若干西方國家的共產黨裡，容許內部理論討論的自由，至少是就馬克思學說而言。有些國家以馬克思主義為官方學說，它和政府的關係密切，並且動輒搬出「馬克思怎麼說」的單一說法，有些國家則不再如此，這些國家之間的歧異越來越大。檢驗這個歧異的一個方便的辦法，那就是研究創立者的傳記。在第一種國家裡，他們的傳記就算沒有完全被神化，至少也都不願意談到不利於他們的形象的生活和行為面向。（這不是什麼新的傳統；德國一九一四年以前的正統馬克思傳記裡的第一個時期就很明顯，正如一九一八年出版的梅林的半官方傳記，甚或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書信集》裡的刪除部分。）在第二種國家裡，馬克思主義者和馬克思的傳記，會公開探討創立者的生平事實，即使該主題不是很吸引人。自從一九五六年以來，如此的歧異漸漸成為馬克思主義歷史的特徵，包括馬克思的文本。

我們還要概觀一下經典作品的傳布問題。我們要注意「一條鞭式的」共產主義正統的時期，那也是個有系統地普及創立者的實際文本的時期。它採取四種形式：出版馬克思和恩格斯各自的作品；出版選集或全集；出版特殊主題的文摘；以及以經典（或語錄）為基礎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彙編或概要。不消說，該「時期」的「經典」包括馬克思和恩格斯、列寧以及其後的史達林。然而，除了普列漢諾夫以外，一九二〇年代以後沒有其他馬克思主義的作家在國際上躋身「經典」

之列。

以規模比較小的系列個別出版的作品，其系列名稱像是「共產主義基本叢刊」（Les Eléments du Communisme）或「馬克思主義小型圖書館」（Piccola Biblioteca Marxista）（可能是仿傚一九三三年德國首創的「共產主義基本叢刊」〔Elementarbücher des Kommunismus〕的模式），收錄了《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價值、價格和利潤》、《雇傭勞動與資本》、《法蘭西內戰》，以及相關主題的論集，例如在一九三〇年代出版馬克思和恩格斯與無政府主義者的論戰。更大部頭的作品一般會以標準格式出版，其系列名稱像是「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圖書館」（The Marxist-Leninist Library）或「馬克思主義經典」（Classici del Marxismo）。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的英國，它的目錄可以說明該系列的內容，包括（扣除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外的作品）《反杜林論》、《費爾巴哈》、《致庫格曼醫師書簡》、《法蘭西階級鬥爭》、《日耳曼革命與反革命》，恩格斯的《論住宅問題》（*Zur Wohnungsfrage*）、《哲學的貧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書信選》、《哥達綱領批判》、恩格斯的《論資本論第一卷》（*Konspekt über ‚Das Kapital' von Karl Marx. Erster Band*），以及刪節版的《德意志意識型態》。《資本論》第一卷現在通常會出版完整版，不再像社會民主黨時期流行的刪節版或文摘形式。一九三〇年代末期以前，並沒有人試圖出版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選集》，但是莫斯科印製了這樣的選集，分上下兩冊（後來變成三冊），主要在戰後以各種語言發行。在俄國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以後，沒有任何共產黨試圖出版全集，直到《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Marx-Engels-Werke, MEW, 1956-

68）的出現。直到一九六〇年代，法國版才開始籌劃，一九七二年才有義大利文版，一九七五年才開始出版英文版，無疑是因為翻譯工程浩大而艱難。義大利共黨領袖陶里亞蒂自己就曾經將若干作品譯為義大利文，可見馬克思主義文本的散布有多麼重要。

馬克思主義文本就各種主題彙編而成的論集，在一九三〇年代似乎開始流行，無論是以俄國或是某個地方為基礎的選集：馬克思和恩格斯論英國、馬克思和恩格斯論藝術和文學、論印度、中國、西班牙等等。至於概要，最權威的版本當屬《蘇聯共產黨簡史》第四章第二節，史達林把自己也加進去。該作品影響甚巨，尤其是在當地語言的經典版本很少的國家，不只是因為共產黨員有研究它的壓力，更因為它簡單流暢的文體使它成為效果最好的教材。對於一九三八年到五六年的馬克思主義者，甚或一九四五年以後的東歐，它的影響可以說無遠弗屆。

在一九五〇年代，特別是大量學生和知識分子對馬克思主義產生興趣，在共產黨以外也有各式各樣的馬克思主義或是「馬克思主義同情者」（Marxisant）的運動興起，使得經典文本的散布不再是蘇聯和共產黨的壟斷事業。漸漸的，商業出版也加入該市場，無論是否有馬克思主義者或他們的同情者的推動。左傾的或「前衛的」出版商的數量和多元性日益增加。當然，它多少反映了人們普遍接受馬克思的著作的「經典」地位，而且是就一般意義而言，而不只是在政治上的，認為它是一般有教養和文化的讀者們都必須讀的作品，不管他們的意識型態是什麼。正因為如此，法國「七星文庫」（La Pléiade）出版他的作品，正如「英國大眾圖書館」（British Everyman's Library）早就出版了他的《資本論》。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新興趣不再侷限於傳統上

的大眾化作品。於是，在一九六〇年代，諸如《黑格爾法哲學批判》（*Zur Kritik der Hegelschen Rechtsphilosophie*）、《神聖家族》、馬克思的博士論文、一八四四年的手稿以及《德意志意識型態》，即使在某些馬克思研究比較落後的國家，例如西班牙，也都有發行。有些作品也不再是由共產黨贊助翻譯，例如《政治經濟學批判綱要》的法文（1967-68）、西班牙文（1973）、英文（1973）和義大利文（1968-70）譯本。

最後我們要談一談馬克思經典的地理分布。在十月革命以前，某些基本的文本早已經有許多翻譯。從一八四八年到一九一八年，《共產黨宣言》就有大約三十國語言的翻譯，甚至包括三個日文版本以及一個中文版本，雖然考茨基的《馬克思的經濟學說》實際上是中國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基礎。更完整地分析《共產黨宣言》的因緣際會，請見本書第五章。其次，早在恩格斯去世以前，《資本論》第一卷就已經被翻譯成歐洲大部分主要語言的版本（德文、俄文、法文、丹麥文、義大利文、英文、荷蘭文和波蘭文），雖然西班牙文版只是節譯的。在十月革命以前，它也被譯為保加利亞語（1910）、捷克語（1913-15）、愛沙尼亞語（1910-14）、芬蘭語（1913）以及意第緒語（1917）。在西歐，若干進度落後的國家也急起直追：例如挪威文（1930-31）（可能是因為人們會說丹麥文，使得翻譯沒有那麼必要）以及第一本葡萄牙文節譯版（1962）。在兩次大戰中間，《資本論》在東南歐可以說洛陽紙貴，分別譯為匈牙利語（1921）、希臘文（1927）、和塞爾維亞語（1933-34），雖然都是節譯本。除了烏克蘭語（1925）以外，人們並沒有試圖將它譯為蘇聯的各種語言。獨立的拉脫維亞（1920）出版當地的版本，是對於沙皇時期

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遲來的回響。在該時期裡，《資本論》同樣首度滲透到歐洲以外的世界（美國除外），有阿根廷版（1918）、日文版（1920）中文版（1930-3）以及阿拉伯文版（1939）。因此我們不妨說，這個滲透和俄國大革命的效應關係密切。

在戰後數十年間，共產黨專政的國家將《資本論》大規模地翻譯為各種語言。（羅馬尼亞語〔1947〕、馬其頓語〔1953〕、斯洛伐克語〔1955〕、韓語〔1955-6〕、斯洛文尼亞語〔1961〕、越南語〔1961-2〕、古巴的西班牙語〔1962〕。）耐人尋味的是，直到一九五二年以後，它才有系統地被翻譯為蘇聯各種語言（白俄羅斯語、亞美尼亞語、喬治亞語、烏茲別克、亞塞拜然語、立陶宛語、烏戈爾語、土庫曼語以及哈薩克語）。《資本論》另一個重要的語言延伸，則是在獨立後的印度，在一九五〇到六〇年代，計有馬拉地語、北印度語和孟加拉語。

某些國際性語言的廣大幅員（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語、伊斯蘭世界的阿拉伯語、英語和法語）讓人們忽略馬克思文本的實際地理分布；然而我們可以說，即使到了一九七〇年代，在大多數歐洲以外的非社會主義國家裡，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仍然不普及，除了拉丁美洲以外。這些文本是如何發行和普及的，我們沒辦法於此探究，但是我們可以說，如果沒有政府的禁令，在世界各地的學校和大學，以及受教育的民眾，應該比以前更有機會接觸到它。在這些圈子以外的人們閱讀和購買的普及程度如何，我們不得而知。要回答這個問題，需要有詳盡的調查，目前應該還沒有人這麼做。

注釋：

1 Bert Andréas, *Le Manifeste Communiste de Marx et Engels: Histoire et Bibliographie 1848-1918* (Milan, 1963).

2 R. Michels, *Die italienische Literatur über den Marxismus* (*Archiv f. Sozialwissenschaft u. Sozialpolitik* 25ii, 1907, pp. 525-72).

3 *Neudrucke marxistischer Seltenheiten* (Verlag Rudolf Liebing, Leipzig).

4 直到一九六〇年代，東德版的《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MEW），儘管沒有真的拒絕出版這些作品，卻將它們和主要系列區隔開來，並不列入全集的冊數。

5 在那部影響深遠的作品裡，引用了馬克思和恩格斯以下的作品：《反杜林論》、《資本論》、《共產黨宣言》、《政治經濟學批判》（前言）、《自然辨證法》、《費爾巴哈》、《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哲學的貧困》、《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雇傭勞動與資本》、以及恩格斯的一兩封信和若干序言。

【第二部】

馬克思主義

第九章 馬克思博士和維多利亞時期的批評

自從馬克思主義崛起為一種知識力量，每隔不到一年，在英美世界裡甚至不到一週，就有人想要駁斥它。由它引起的駁斥和辯護的文章越來越無趣，因為都是在炒冷飯。馬克思的作品儘管汗牛充棟，但是他的研究領域相當有限；在技術上對於它們不太可能發表太多有創意的批評，而且大部分的批評早就提出來了。相反的，馬克思主義的辯護者則很難不斷地說同樣的事情，儘管換不同的說法。他們只有經由兩種方式去推陳出新：不再評論馬克思本人，而是評論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並且根據最新的批評去檢視馬克思的思想。但是就算是這兩種可能性也都很有限。

那麼為什麼學者們還在吵嚷不休呢？當然雙方陣營的宣傳者會那麼做，他們並不那麼關心原創性。各種觀念只有在抓住群眾的時候才有其力量，而正如廣告商所承認的，那需要如咒語一般的不斷重複。無論是認為馬克思是個偉人，他的學說有政治上的優點，或是持相反的論調，這個方法同樣有效。然而另一個理由則純粹是出於無知。那是寫書文章的人們的可悲幻想，以為付梓的文字可以千古傳誦不絕。惜哉鮮少如此。大部分作品在出版的幾個禮拜到幾年以後就進入休眠期，偶爾會被研究的學生喚醒，不過也只是一樣短暫的時間。它們大部分以英語評論者不懂的語言書寫。但是就算它們不是，也總是和英國資產階級對於馬克思最初的批評一樣被世人遺忘。

但是他們的作品不僅可以解釋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觀念史，也可以解釋對於馬克思的批評的概括性演變。

我們最先注意到的是他們的語調，和當時流行的說法迥然不同。於是，崔佛羅帕教授幾年前寫了一篇文章評論《馬克思主義和歷史研究》（*Marxism and the Study of History*）[1]，他的語調就是那個讓人沮喪的年代裡反馬克思主義者的典型。他花了很長的篇幅提出完全站不住腳的命題，認為馬克思對於歷史並沒有原創性的貢獻，除了「掃除其他思想家已經提出的觀念，將它們合併到一個粗製濫造的獨斷哲學裡」，說他的歷史詮釋對於過去毫無用處，也完全沒辦法用來預測未來，他對於博學深思的歷史學家們也沒有任何重要的影響，而那些自稱馬克思主義者，要不是言必稱「馬克思和列寧所謂的『資產階級』社會史」，就是「一群頭腦遲鈍的訓詁學者，忙著評論彼此的注釋」。簡言之，他們一般都主張說，馬克思的學術聲望被過分誇大，因為「馬克思主義對於歷史的詮釋完全禁不起學術的考驗，只有蘇聯政權支持它且非理性地證成它」。

維多利亞時期對馬克思的批評作品，現代大部分已經不為人知了；對於正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我們而言，那是一個警訊。但是我們只要探究一下，就會發現事實並非如此。英國作家的情緒是出了名的不動如山。沒有任何反資本主義運動可以挑戰他們，對於資本主義的表現的質疑也很少會讓他們感到困擾；一八五〇年代和八〇年代期間，幾乎找不到任何在英國出生的公民會自稱是社會主義者，更不用說是馬克思主義者了。因此，駁斥馬克思主義的任務既不是迫在眉睫，也沒有現實的重要性。正如考夫曼牧師（他或許是我們第一個關於馬克思主義的非馬克思主義者「專

家」）說的，幸好馬克思是個從來沒有將他的學說付諸實踐的理論家。[2]根據革命的標準，他比無政府主義者更加無害，因此有時候被拿來和那些好勇鬥狠的人作對比；布羅德瑞克[3]的評論對他比較友善，而皇后學院的葛拉罕對他就不假辭色，認為無政府主義者有「一個方法和邏輯……那是馬克思和海因德曼學派的敵對革命黨所欠缺的」。[4]所以說，資產階級的讀者在接觸他的作品時總是一派輕鬆，或者是像考夫曼牧師那樣，以基督教的寬恕精神去看他，那是我們這一代所沒有的：「馬克思在哲學上是黑格爾學派，和宗教的神職人員是死對頭。但是在對他的作品提出意見時，我們不應該對那個人心存偏見。」[5]馬克思顯然很感謝他的恭維，因為他藉由不明場合的「相互認識」，讓考夫曼在後來的書裡修正對他的看法。[6]

就像波納沾沾自喜的說法[7]，英國關於馬克思主義的評論顯露出心平氣和而公正的精神，那是德國在探討該主題時所欠缺的。他們很少指摘馬克思的動機、他的原創性或學術上的正直。關於他的生平和作品的探討主要是說明式的，如果有什麼微詞之處，那應該是因為作者們在閱讀和理解上還不足夠，而不是因為他們在說明裡夾雜了什麼指控。不可否認的，他們的說明經常有所闕漏。在克卡普的《社會主義史》（*History of Socialism*, 1900）以前，我懷疑關於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學說有任何堪用的非社會主義者的概說。但是讀者倒是可以期待讀到關於馬克思是誰以及作者對他的定位的事實性說明。

讀者也可以讀到對他的才華幾乎一致同意的讚許。彌爾納在一八八二年的懷特禮拜堂講演裡[8]就曾經公開讚美他。一八八二年，貝爾佛認為將他和亨利．喬治的觀念相提並論是很荒謬的

事，「無論是就他們的聰明才智、思想的一致性、對一般的論理的掌握、尤其是經濟方面的論理」。[9]英國早期最尖銳的「專家」約翰・雷伊[10]，也同樣認真地探討馬克思。隱約有進步主義傾向的美國教授理察・伊利，他的作品《法國和德國的社會主義》（*French and German Socialism*）於一八八三年在英國出版，他認為將《資本論》「和李嘉圖等量齊觀」是正確的判斷，而且「關係馬克思的才華是毫無異議的」。道森[11]總結了大部分的意見，除了討厭的杜林以外（馬克思的批評者們企圖為他平反未果），他說，「無論我們如何看待他的學說，沒有人會質疑《資本論》的每一頁裡所展現的卓越的創意、罕見的洞察力、縝密的論證，以及尖刻的辯論……」*

如果我們想起早期的評論者其實並不想完全駁斥馬克思，對於他們異口同聲的讚譽就不會那麼訝異了。其原因在於他們有些人認為他的理論可以用來對抗自由放任理論；其次，他們也看不出他的整個理論有什麼革命的暗示；又或者是他們願意真正心平氣和地公正論斷他，他們甚至原則上願意師法馬克思。除了一個例外：勞動的價值理論，或更精確地說，馬克思對於獲利和利息的流行論證的批評。他們針對這些觀點大肆抨擊，或許是因為在「勞動是所有價值的來源」裡頭蘊含的道德指控影響到的不是資本主義的忠實信徒，而是對於資本主義的沒落和傾覆的預測。若是如此，他們是為了他的思想裡「馬克思主義」元素比較少的部分而批評他，而且在馬克思以前的社會學們就曾經提出了，更不用說是李嘉圖，雖然形式上比較粗糙。無論如何，價值理論被認為是「日耳曼以及所有近代社會學家的主要支柱」[12]，一旦它倒塌了，整個批評就站不住腳。

然而，除了這點以外，馬克思顯然有其他貢獻，尤其是批評當時仍然很流行的粗糙的馬爾薩

斯主義（Malthusianism）的失業理論。他關於人口以及「勞動後備軍」的觀點不僅不曾遭受批評（像雷伊一樣），有時候甚至被學者們無異議地引用或部分採用，例如經濟史先驅康寧漢副主教[13]（他早在一八七九年就讀過《資本論》）[14]，以及另一個經濟學家威廉·司馬特，他以其經濟史作品著稱於世（*Factory Industry and Socialism*, Glasgow, 1887）。同樣的，馬克思關於勞動和機器的區分也得到一致的贊同，例如一八八七年《圖書館》（*Athenaeum*）對於《資本論》的評論者。霍布森（*Evolution of Modern Capitalism*, 1894）顯然深深受到影響：他引用馬克思的地方都是在探討這些主題。但是就算是更正統而敵對的作家，例如尼克森[15]就曾經說過，他對於這點以及相關主題的探討「既博學又周延，而且很值得閱讀」。再者，他在工資和經濟集中化方面的觀點也不容小覷。再說，某些評論家很不想全盤否定馬克思，以至於司馬特在一八八七年撰文評論《資本論》時特別鼓勵那些研究《資本論》而厭惡價值理論批判的讀者們，說它「對於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都有很重要的價值」。[16]

在為印度大學生編寫基本教材時，普羅提洛很中肯地總結了非馬克思主義者對他的看法；由於些微的無知而且反映當時的觀點而非個別的研究，對馬克思反而更有利。他們提到三個重點：價值理論、失業理論以及馬克思作為歷史學家的成就，他率先指出，「當前資本主義社會

---

* 在一九三八年版的《資本論》第一卷托爾的附錄裡，讀者可以看到若干類似的意見；但是她顯然只參照一小部分的文獻而已。

的經濟結構是從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生長出來的」。[17]的確，作為歷史學家的馬克思有他重大的影響，特別是對於以歷史方法探討其主題的經濟學家們。（然而英國對經濟學不熟悉的歷史學家對他仍然無動於衷，他們始終死抱著純粹憲法的、政治的、外交的和軍事的歷史的斷爛朝報不放。）除了近來的作家以外，讀過馬克思的人們對於他的影響並沒有太大的爭議。法克斯威爾，一八八〇年代最尖銳的反馬克思主義學者，說他是「對英國影響最大的」經濟學家之一，也讓該時期的「歷史感」有長足的進步[18]。即使是那些反對「《資本論》裡瘋狂而在我看來大錯特錯的價值理論」的人們，也覺得必須對於其中關於歷史的章節另眼相看。[19]由於馬克思的刺激，很少人會懷疑說，「我們會看到有一大段歷史必須依據他的觀點重寫」[20]，他們顯然忽視崔佛羅帕的證明說，該刺激不是出自馬克思，而是亞當．斯密、休姆、托克維爾或庫朗熱。鮑桑葵[21]也不懷疑「經濟史觀或唯物史觀」和「馬克思的名字關係密切」，雖然「巴克爾和勒普列的許多論點也主張它」。波納雖然特別否認歷史唯物論是馬克思首創的（他理所當然地引證說哈靈頓才是先驅）[22]，可是他以前沒有聽過以下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論點，那讓他非常驚豔：「宗教改革是基於經濟因素，三十年戰爭的時間長度也是基於經濟因素，十字軍東征是基於封建時代的領土擴張欲望，家庭的演變也是基於經濟因素，而笛卡兒將動物視為機器，也和手工業系統的成長關係密切。」[23]

他對英國經濟史家的影響當然是最明顯的，其中只有羅傑斯可以說是完全無動於衷的。如前所見，劍橋的康寧漢在一八七〇年代就讀過馬克思而且深有同感。牛津的學者（或許是因為在當

地的黑格爾主義者當中日耳曼傳統最濃厚的地方）早在英國有馬克思主義團體以前，他們就知道他了，雖然湯恩比對於他的歷史的附帶批評（*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剛好是錯誤的。[24]喬治·安溫或許是當時最讓人印象深刻的英國經濟史家，他從馬克思那裡發掘他的主題，或者至少是想要駁斥他。但是他並不懷疑說，「馬克思想要探究正確的史觀。正統的歷史學家忽略了人類發展裡所有重要的因素。」[25]

對於他身為探討資本主義的歷史學家的成就，也沒有太多的異議。（《圖書館》的評論者認為他關於早期歷史的觀點「並不充分而且很膚淺」，但是他們一般都忽略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大部分的思想摘要在當時尚未廣泛流傳。）即使是對於他的思想範圍最廣也最敵對的批評，也就是弗林特的《社會主義》（*Socialism*）（一八九五年出版，主要寫成於一八九〇年到九一年），他也承認說：「作為歷史理論家，馬克思的非凡成就在於他對於資本主義時代的分析和詮釋，我們必須承認他付出許多心血，即使人們認為他的分析複雜但不精確，他的詮釋有創意但不符合事實。」[26]

在英國有很多人像弗林特一樣，既不信任「論證過於繁複瑣碎的趨勢」[27]，也承認馬克思作為探討資本主義的歷史學家的貢獻，尤其十九世紀的資本主義。現在人們習慣懷疑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學者地位、學術誠實和出處的引用[28]，可是當時幾乎不在意這些批評，因為馬克思所抨擊的邪惡太過真實了。就像許多人一樣，考夫曼說，「儘管他僅僅對我們呈現當前社會生活的黑暗面，我們不能因此指控他是歪曲事實。」[29]李維林·斯密覺得，「儘管馬克思所表現的景象太黑暗了，但是他苦心孤詣地提醒我們現代工業更悲慘的面向，我們對它閉上眼睛是沒有用的。」[30]尼

克森[31]認為他的論述在某些方面太誇張了，但是「某些邪惡罄竹難書而不得不誇張一點」。[31]即使是對於他的學術誠實的最嚴厲指控，也不敢說馬克思是在危言聳聽，他們至多只是說，儘管真相是很黑暗的，馬克思沒有注意到其中仍然有「一線光明」[32]

早期資產階級對馬克思的批評裡，真的完全沒有現代那種歇斯底里的焦慮語調嗎？沒有。自從在英國出現了受馬克思主義啟發的社會主義運動，也跟著出現了近代對馬克思的批評，他們試圖懷疑和駁斥他，而不願意理解他。有些批評是從歐陸翻譯為英文：尤其是一八八〇年代中期。敵對的歐陸作品陸續翻譯出版，拉弗雷的《當前社會主義》（*Socialism Today*, 1885）、謝弗勒的《社會主義的本質》（*Quintessence of Socialism*, 1889）。此外本土的反馬克思主義也開始萌芽，尤其是在經濟學重鎮的劍橋。對於馬克思的學術地位最早的嚴厲批判是在一八八五年由劍橋的兩位教授提出的（坦納和卡雷），而牛津的李維林．斯密（在當時沒有那麼「反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就沒有那麼聲嚴色厲，他只是在幾年後提到，馬克思的「藍書的引言非常重要而發人深省，雖然可信度不高」。[33]劍橋的批評耐人尋味的地方不是在它的內容，而在於誹謗的語氣：諸如《資本論》的「胡亂拼湊的代數表示法」，或是「幾乎無法無天的輕率引證，使我們不得不懷疑他的其他作品也是如此」[34]，說明了（至少在經濟學的主題上）他們不只是在學術上對他不以為然而已。其實，讓坦納和卡雷生氣的地方，不只是他的引證而已，他們固然受不了「刻意的歪曲……尤其是不必要的歪曲」（因為事實已經夠黑暗了），更厭惡他「對於資本家的整個態度的不公正」。[35]資本主義者比馬克思所想的要溫和許多；他對他們並不公平；所以我們也要對他不

公平。這似乎是批評者的態度的基礎。

大約在同時，劍橋的法克斯威爾提出我們現在耳熟能詳的說法，馬克思是個擅長說廢話的怪胎，只能吸引不成熟的知識分子；他是一個可以和亨利．喬治相提並論的人（儘管貝爾佛期期以為不可）：「《資本論》是設計好給那些附庸風雅的人看的，讓他們對於窮苦百姓的處境義憤填膺，卻沒有足夠的耐心和冷靜去探究真正貧窮的原因，也沒有足夠的訓練去察覺到江湖郎中口若懸河的藥方有多麼虛有其表。」[36] 附庸風雅、沒有足夠的耐心和冷靜、虛有其表、口若懸河：批評者的辭彙堆砌著情緒性的語調。由於法克斯威爾（經由奧地利人門格），英國也和德國一樣，批評起馬克思的原創性，認為他剽竊了湯普生、哈基斯金、普魯東、羅白塔以及其他批評者信手拈來的作者。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Principle of Economics*, 1890）在一處注釋裡也提到這點，雖然他引述的門格對於馬克思缺少原創性的批評在第四版（1898）就刪掉了。他們認為，羅白塔和馬克思（兩人經常被人們相提並論）「總是誇大或直接推論自以前經濟學家的學說」[37]，或者認為在他以前的思想家，例如羅白塔[38]或孔德[39]，他們關於歷史的說法比馬克思更早提出也更完備，這些批評在我們看來很眼熟。馬歇爾是劍橋最偉大的經濟學家，他顯然很討厭馬克思，卻又喜歡拐彎抹角。* 但是整個來說，反馬克思主義在十九世紀基本上仍然是少數，而下一代的批評也傾向於馬歇爾式的膚淺嘲諷，而沒有大規模的指摘。因為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江河日下，而不

* 以下的附釋將詳細討論他的觀點。

需要人們多費唇舌。

奇怪的是，比起歇斯底里的批判，心平氣和的批評馬克思竟然更有效果。威克斯提於一八八四年十月在社會主義刊物《當前》（*To-Day*）發表的〈資本論批評〉（Das Kapital – a criticism），讓人最為印象深刻。文中充滿同情和禮貌，並且讚許它是「偉大的作品」，馬克思探討價值的那幾個「嘆為觀止的章節」，「偉大的邏輯學家」，威克斯提甚至說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後半部分是「極為重要的貢獻」。但是，無論我們現在如何思考價值理論純粹邊際主義的方法，比起法克斯威爾或弗林特的情緒性謾罵，威克斯提的文章更能夠讓社會主義者誤以為馬克思的價值理論和社會主義的經濟學證成無關。威克斯提在漢普斯提（Hampstead）的一個討論團體裡，和哀奇沃思（另一個避免情緒性誹謗的邊際主義者）*、蕭伯納、韋布、華勒斯、奧利偉以及其他作家一起討論《資本論》，寫成《費邊社會主義論文集》（*Fabian Essays in Socialism*）的許多文章。如果說，西季威克在幾年後會說到馬克思的「胡言亂語……我認為英國讀者幾乎不必浪費時間去檢驗它，正如英國社會主義的濟濟多士和它保持距離一樣」[40]，那不是因為西季威克的嘲諷使然，而是因為威克斯提的論證，抑或是因為英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沒有能力為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和它的批評者抗辯。勞工仍然信奉馬克思主義，並且背棄勞工教育協會，因為它沒有宣揚馬克思主義，但是直到許多事件證明馬克思的批評者對自己的理論的自信是站不住腳的，馬克思的主義才得以重拾其學術地位。而它也不太可能再度在學院裡銷聲匿跡。

附釋：馬歇爾和馬克思

馬歇爾起初對馬克思似乎沒有什麼明顯的觀點。他只有在《工業經濟學》（*Economics of Industry*, 1879）裡提到馬克思，而且沒有特別的好惡，即使是在《經濟學原理》裡（p. 138），就對於資本主義的危害而言，亨利．喬治比馬克思讓他更擔心。他在《經濟學原理》提到馬克思的地方如下：（一）對於他的「武斷的學說」的批評，認為資本只是「給它的所有權人掠奪和剝削別人的機會」（p. 138）。（從一八九五年的第三版以後，他重新改寫這段話。）（二）經濟學家應該避免「禁欲」一詞，而應該選擇諸如「服侍」的語詞，因為（至少我如是詮釋此處加注的理由）「馬克思及其門徒很喜歡思考財富的積累，它源自羅斯柴爾德男爵的禁欲。」（p. 290）（這段話從第三版起就從索引被刪掉，雖然正文還保留著。）（三）羅白塔和馬克思的觀點並不是原創的，例如主張說「利息的支付是強奪勞動」，而且被批評是循環論證，雖然「裹著馬克思最喜歡的黑格爾主義的神秘語詞」（pp. 619-20）。（在第二版〔1891〕裡，他試圖以馬克思關於剝削的學說摘要取代早先對它的嘲諷。）（四）為李嘉圖辯護，反駁人們指責他是個勞動價值論者，那不只是馬克思的主張，也包括孤陋寡聞的非馬克思主義者。（在其後幾版裡，這個辯護幾經修

---

* 奇沃思不曾認真研究馬克思，似乎和劍橋的經濟家們一樣討厭馬克思（*Collected Papers*, III, p. 237ff., 1920）。可是我們並沒有證據說他在十九世紀曾經公開提出那樣的看法。

正。）我們都知道馬歇爾非常崇拜，很想為他洗刷掉社會主義理論家的始祖的汙名，正如其他經濟學家準備做的，例如法克斯威爾。但是要證明李嘉圖不是公認的勞動論者，那是很複雜的事。我們不只注意到，馬歇爾提到馬克思的地方不只是批判性的或敵對的（他那個時代還沒有佛洛伊德，他唯一讚許馬克思的地方是他的善良），也注意到他並沒有如人們所預期的或是聲譽卓著的經濟學者那樣，仔細地研究馬克思的作品，以作為他批評的基礎。

注釋：

1 *Problems of Communism* V (1956).
2 M. Kaufmann, *Utopias from Sir Thomas More to Karl Marx* (1879), p. 241.
3 *Nineteenth Century* (April 1884), p. 639.
4 W. Graham, *The Social Problem* (1886), p. 423.
5 M. Kaufmann, *Socialism* (1874), p. 165.
6 見：Kaufmann's chapter in *Subjects of the Day: Socialism, Labour and Capital* (1890-1), p. 44。
7 J. Bonar, *Philosophy and Political Economy* (1893), p. 354.
8 *National Review* (1931), p. 477.
9 *Report of the Industrial Remuneration Conference* (1885), p. 344.
10 *Contemporary Socialism* (1884), reprinting earlier articles.
11 W.H. Dawson, *German Socialism and Ferdinand Lassalle* (1888), pp. 96-7.

12 William Graham, *Socialism* (1890), p. 139.

13 Archdeacon Cunningham, *Politics and Economics* (1885), p. 102.

14 Cunningham, 'The Progress of Socialism in England' *Contemp. Rev.*, (January 1879), p. 247.

15 J. Shield Nicholson,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I (1893), p. 105.

16 William Smart, *Factory Industry and Socialism* (n.d.), p. 1.

17 M. Prothero, *Political Economy* (1895), p. 43.

18 H.S.Foxwell, 'The Economic Movement in England', *Q. Jnl. Econ.* (1888), pp. 89, 100.

19 Shield Nicholson, op. cit., p. 370.

20 Kirkup, *History of Socialism* (1900), p. 159.

21 B. Bosanquet, *The Philosophical Theory of the State* (1899), p. 28.

22 Bonar, op. cit., p. 358.

23 同前揭‥ p. 367。

24 湯恩比不同意馬克思的觀點認為一七六〇年左右小地主階級就消失了（1908 edn., p. 38）。可是後來人們的觀點支持馬克思而不是湯恩比。

25 George Unwin, *Studies in Economic History* (1927), pp. xxiii, lxvi.

26 Robert Flint, *Socialism* (1895), p. 138.

27 Robert Flint in *Athenaeum* (1887).

28 比較‥ *Capitalism and the Historians* and critiques by W.H. Chaloner and W.O. Henderson。

29 Kaufmann, *Utopias*, p. 225.

30 Llewellyn-Smith, *Economic Aspects of State Socialism* (1887), p. 77.

31 Shield Nicholson, op. cit., p. 370.

32 J.R. Tanner and F.S. Carey, *Comments on the use of the Blue Books made by Karl Marx in Chapter XV of Capital* (Cambridge Economic Club, May Term, 1885).

33 Llewellyn-Smith, *Two Lectures on the Books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Birmingham and Leicester, 1888), p. 146.

34 Tanner and Carey, op. cit., pp. 4, 12.

35 同前揭：p. 12。

36 Foxwell, op. cit., p. 99.

37 Flint, *Socialism*, p. 136.

38 E.C.K. Gonner, *Rodbertus* (1899).

39 Flint, loc. cit..

40 *Econ. Jnl.* V, p. 343.

第十章 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一八八〇年到一九一四年

一

馬克思主義的每一段歷史一般是由排除法去定義它們的主題。它們的範圍是由那些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人們界定的，無論是純理論的馬克思主義者或是態度明確的反馬克思主義者，基於意識型態和政治的理由，都想要盡可能擴大它們的範疇。即使是心胸最開闊的歷史學家，也會明確區分「馬克思主義者」和「非馬克思主義者」，他們的注意力總是僅止於前者，雖然也想盡可能擴大他們的範圍。而他們的確有此必要，因為如果沒有這樣的區分，或是就不值得或者沒辦法特別書寫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然而他們也傾向於特別就馬克思理論的發展和內部爭辯去書寫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因而忽略了一個很重要但或許不容易界定的馬克思主義的外圍領域。但是現代史的歷史學家，既完全不同於馬克思主義運動的研究，就不可能對它視若無睹。「達爾文主義」的歷史不能侷限於信奉達爾文學說的人甚或一般生物學家的歷史。即使只是附帶一提，他們也不能不考慮到達爾文主義觀念、隱喻甚或習慣用語，它們已經成了知識圈的一部分，雖然他們從來沒有

想到加拉巴哥群島上有什麼野生動物，也不清楚現代遺傳學對於天擇論的修正。同樣的，佛洛伊德的影響也遠遠超過各個分歧和相互衝突的精神分析學派，有些人甚至完全沒有讀過創始者的隻字片語。就像達爾文和佛洛伊德一樣，馬克思也是現代世界的大眾文化對其名字和觀念耳熟能詳的少數思想家之一。馬克思主義對於大眾文化的影響，大約是在第二國際時期就讓人感受到了。這也是本章要探討的主題。

一八八〇年到九〇年期間和馬克思的名字有關的勞工和社會主義者運動的急遽擴張，無論在運動的內部或外界，難免會拉抬他的理論（或是附會之說）的影響力。在社會主義者內部，「馬克思主義」和其他左翼的意識型態分庭抗禮，有時候甚至獨占鰲頭（至少在官方）。而在外界，由於「社會問題」和社會主義運動的不斷挑戰而產生的衝擊，使人們注意馬克思的觀念，他的名字漸漸和他們劃上等號，而他的創意和博學多聞也讓人刮目相看。儘管人們在論戰裡經常將馬克思批判得體無完膚，認為和以前的社會學家以及對於資本主義的批評相較之下，他的學說了無新意，甚至有剽竊之嫌，但是認真的非馬克思主義者不太可能會犯這麼基本的錯誤。[1]他的分析總是多少能夠補非馬克思主義者的分析之不足，當一八八〇年代的英國經濟學家明白了正統的馬爾薩斯失業理論的捉襟見肘，對於馬克思的「勞動後備軍」的觀點一般都會正面看待。[2]當然，相較於英國，在某些國家裡，受馬克思主義啟發的工人運動風起雲湧，如此雲淡風輕的方法顯然不可行。他們更迫切需要的，是發動學術界大軍去駁斥他，或至少了解他的訴求本質。因此，至少在德國和奧地利，一八九〇年中期和末期出現的重量級學術作品，都以此為標的：波姆巴威克的

《馬克思體系的終結》（*Das Ende des Marxschen System*, 1896）、史塔姆勒的《唯物史觀的經濟和法律》（*Wirtschaft und Recht nach materialistischer Geschichtsauffassung*）以及赫克納的《勞工問題》（*Die Arbeiterfrage*, 1896）[3]。

馬克思主義對於工人和社會主義運動以外的另一個影響形式，則是經由馬克思主義的同路人或前馬克思主義者。自從一八九〇年末期的「馬克思主義危機」以後，他們的人數越來越多，在那個時期裡，我們看到似曾相識的馬克思主義現象的誕生，那是民眾的政治和知識開展的一個臨時階段。我們也知道，經歷過該階段的人們很難不受那個經驗影響。我們只消提幾個名字，例如義大利的克羅齊、俄國的斯特魯維、貝德葉夫和杜岡巴拉諾夫斯基、德國的松巴特和密歇爾斯，或者（沒有那麼學術性的）英國的蕭伯納，就可以感受到在一八八〇年代到九〇年代，第一代的前馬克思主義者對於大眾文化和學術界舉足輕重的影響。除了前馬克思主義者以外，我們也必須提到越來越多和正統馬克思主義分道揚鑣（儘管仍然藕斷絲連）的人們，例如許多德國「修正主義的」知識分子，以及那些雖然不是馬克思主義、卻因為被歸類為左派社會主義者而對馬克思的某些觀念很有興趣的人們。

馬克思主義的這些散播方式大多出現於工人和社會運動在該時期方興未艾的地方，也就是大部分歐洲地區以及歐洲人的海外殖民地。在那些運動範圍以外的地方，馬克思主義在那個時期幾乎不存在，但是日本是個例外。對於一九一四年以前印度的種種革命運動，馬克思主義沒有任何影響的跡象，雖然它們不僅受到英國知識分子的影響，也有來自俄國的啟發，雖然在一九一四年

以前的時期支持孟加拉恐怖主義者的選民後來也都很歡迎馬克思主義。而在伊斯蘭世界、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或者拉丁美洲（除了移民密集的「南錐體」〔southern cone〕以外），馬克思主義更是完全不存在。我們可以忽略所有這些區域。

另一方面，在某些歐洲國家，馬克思主義的散布非常重要而普遍，在那些國家裡，幾乎所有社會思想，無論和工人以及社會主義運動是否相關，都受到馬克思的影響，在這個脈絡下，馬克思與其說是既存的資產階級正統派（他們幾乎不存在）的挑戰者，不如說是對於社會及其變遷的分析的創始者之一。在部分東歐國家，尤其是帝俄，這個情況特別明顯。在那樣的國家裡，他們完全無法閃避馬克思，因為他已經是他們知識界的整體結構的一部分。這並不意味著所有受到馬克思影響的人都自認為是馬克思主義者。

二

雖然本章探討的時期不到三十年，卻可以視為獨立的單元，而且必須再區分為三個主要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多少以馬克思主義為取向的社會主義和工人政黨的崛起，從一八八〇年到一八九〇年初期不等，尤其是在第二國際的前五、六年期間這些運動的大躍進。該階段裡的重點不在於這些運動的組織、選舉或工會的力量，雖然它們的確很強大，但是它們在其國家以及（經由諸如勞動節的發起）國際突然侵入政治舞台，以及工人階級可觀的而有時候烏托邦式的浪潮，駸駸

然大有可為。資本主義面臨危機：它的末日似乎就在眼前，雖然沒有一定的形式。馬克思主義在工人運動裡的滲透（一八九一年，德國社民黨正式承認它），以及它在那些運動範圍以外的正面和負面的散布，在許多國家裡都有驚人的進展。

第二個階段始自一八九〇年中期，當時全球資本主義的反撲擴張態勢明顯。群眾社會主義工人運動儘管起伏不定，仍然快速成長，在該階段裡，有許多國家的群眾運動甚至更有組織的運動百花齊放，在若干地區裡，它們也合法化，而革命或完全的社會轉型漸漸不再是它們的直接目標。外部觀察者談到的從一八九八年起的「馬克思主義裡的危機」[4]，不只是關於資本主義仍然興盛的事實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意義為何的爭論，也就是「修正主義爭論」，它同時也是肇因於在當時風起雲湧的社會主義裡出現了若干旨趣南轅北轍的團體，例如在這些運動裡的民族分裂，諸如奧地利、波蘭和俄國。它顯然改變了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內部的爭論以及馬克思主義在它們外部的衝擊。

俄國大革命開始了第三個階段，直到一九一四年告終。一方面是由大規模群眾行動的反撲支配，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前夕，以及在幾年後，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幾年裡的勞工騷動；另一方面則是馬克思主義運動內部以及外部（革命工團主義）的左派革命派的復興。在同時間，有組織的群眾工人運動的規模也不斷擴大。一九〇五年到一三年期間，以阿姆斯特丹國際工會為首的各國社會民主聯盟人數倍增，從將近三百萬成長到將近六百萬。[5]，而在德國、芬蘭和瑞典，社會民主黨成為最大黨（擁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選票）。

當然，在社會主義運動以外的世界也越來越關注馬克思主義。由馬克斯·韋伯主編的《社會科學和社會政治學叢刊》（*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在一九〇〇年到〇四年間，只刊載了四篇文章探討該主題，但是在一九〇五年到〇八年間則有十五篇，而德國探討社會主義、工人階級和類似主題的學術論文，一八八〇年代每年平均只有兩、三篇，一九〇〇年到〇五年則有十·二篇，一九〇九年到一九一二年有十九·七篇。[6]由於當時的革命運動已經不能單純和馬克思主義劃上等號（在戰前的最後幾年，革命工團主義以及其他比較不明確的反叛形式，紛紛起來和它分庭抗禮），無論是潛在的同路人或批判者，使得馬克思主義對他們的衝擊既複雜而且難以定義。然而它在該時期裡或許也最容易散布，不只是經由為數眾多的前馬克思主義者的作品，或是那些覺得必須和馬克思主義建立關係的人們。

三

如果我們要更精確地探究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就必須考慮除了工人和社會主義政黨的龐大規模（以及政治影響力）以外的兩個主要變因：那些政黨信奉馬克思主義的程度，以及知識分子們獨尊馬克思主義的程度。

工人運動或者是正式等同於馬克思主義或漸漸傾向於它，或者是和其他社會主義類型的革命或類似的意識型態結合，或者基本上不屬於社會主義。大體而言，第二國際的大部分政黨，以德

國社民黨為首，都是屬於第一類，雖然馬克思主義在他們內部的領導地位模糊了許多其他意識型態的影響。然而，有若干國家，例如法國，主要受到比較古老而且本土的革命傳統的薰陶，就幾乎沒有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儘管在某些國家裡，左派社會主義者在政黨裡占優勢，在其他國家裡，則有敵對的意識型態以及運動與它抗衡。

不過，在敵對的左派意識型態當中，除了某些以民族主義為主的，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仍然有若干程度的滲透，部分是因為（除非有特殊的相反理由）和社會主義最偉大的理論家結盟有其象徵性的價值，但主要仍然是因為相較於他們如何成就其革命以及革命以後的未來（儘管很模糊）的想法，他們用以診斷社會弊病的理論分析顯得相當貧乏。我們於此主要探討的意識型態，除了原本的民族主義以外（它則潛入馬克思主義），還有無政府主義以及部分由它衍生出來的革命工團主義、各種民粹派趨勢，以及基進的雅各賓黨傳統，尤其是其革命形式。從一八九〇年代中期，以英國費邊社為知識圈核心的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改革派，也相當引人注目。它的規模儘管很小，卻有其國際影響力，不只是經由羈旅國外的成員，尤其是伯恩斯坦，也經由英國和荷蘭以及北歐的文化交流。然而，儘管費邊社的散布很耐人尋味，這個現象畢竟微不足道，我們於此略去不提。[7]

基進的雅各賓黨傳統大抵上對於馬克思主義無動於衷，即使（或許也正因為）他們裡面革命派的成員很尊敬這個偉大的名字，也都很認同跟他有關的主張。馬克思主義在法國很不尋常地停滯不前。一直到一九三〇年代，法國共產黨許多著名的知識分子都沒有被認真地歸類為理論派的

馬克思主義者，雖然他們許多人開始如此自稱。他們的知識圈刊物《思想》（*La Pensée*）創刊於一九三八年，至今仍題為「現代理性主義評論」。相反的，儘管馬克思和巴枯寧是有名的水火不容，無政府主義卻大量借用馬克思的分析，僅除了兩大運動之間有爭議的部分論點。我們對此不會很意外，在無政府主義於一八九六年被第二國際剔除以前（在若干國家甚至更晚），他們和馬克思主義並在革命運動當中並沒有明確的界野，都有一部分相同反叛和希望的氛圍。

正統馬克思主義和革命工團主義的理論分歧更大，正因為馬克思主義所排斥的革命主張不只是在於它關於組織和國家的觀點，而是在於考茨基的整個歷史分析的體系，他們認為它在理論上是歷史決定論，甚至是宿命論，而在理論上則是修正主義。的確，革命工團主義在意識型態的論辯當中對左翼知識分子很有吸引力，但是我們不要忘記，那些和馬克思主義沒有淵源的人，尤其是在一八九〇年代還太年輕的人，同樣也受到馬克思的論證薰陶。是故，柯爾，叛逆而沒有歐陸作風的年輕英國社會主義者，很自然地認為喬治．索雷爾的作品是「新馬克思主義」。[8]其實，革命工團主義的知識分子並沒有那麼排斥馬克思的分析本身，他們只是反對形式化的社會民主主義的必然演化論，以及年輕的葛蘭西所謂的在「實證主義和自然主義的外衣」底下讓人窒息的革命思想[9]，也就是反對給馬克思貼上達爾文、斯賓塞以及其他實證主義者的奇怪標籤，正如在義大利的馬克思主義。的確，第一代信奉馬克思主義的人們大多出生於一八六〇年代，很自然地將馬克思等同於當時各種流行的知識影響。對於他們而言，儘管馬克思主義既新穎而有創意，畢竟是屬於整個進步主義思想的層次，只是在政治上比較基進，而和無產階級特別有關。

相對的，在社會動蕩不安的東歐，沒有其他理論比馬克思主義更能解釋十九世紀走向現代的變遷，而它的影響也跟著無遠弗屆，即使那些國家還沒有發展出工人階級，更不用說工人運動，除了民族主義以外，也沒有什麼重要的資產階級意識型態。此即為什麼俄國，這個與社會扞格不入的階級和批判性的「知識界」（intelligentsia）的故鄉，早在所有其他國家以前就產生了許多《資本論》的忠實讀者，甚至到了後來，東歐更成為馬克思主義學術和分析的大本營。在政治上，馬克思在俄國的第一代信徒大多支持民粹派（他們在一八八〇年代以後也變身為馬克思主義團體），但是其中也有許多並不基進的經濟學家，他們接受馬克思的分析方法和術語。[10] 在俄國尤其盛行一種意識型態，主張資本主義的發展在歷史上是不可逆的，無論人們如何憎恨它，都無法由外部的阻力（例如農民的力量）去克服它，只能假借它內部必然產生的力量。言下之意就是，俄國也必須經歷資本主義的階段。

於是俄國馬克思主義有了一個弔詭：它既可以取代民粹派以農民為基礎的反資本主義革命（他們無論如何採用了馬克思的資本主義分析），而且在一個極端仇視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的國家裡證成它的發展。它產生了革命派以及「合法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怪異現象，他們相信經由資本主義的經濟成長，而又認為它未來的滅亡則是另一回事。在中歐和西歐，馬克思和資產階級不需要這種和解，那裡的思想家不約而同地認為自己是自由派。無論俄國知識圈的有什麼歧見，除了脫離主流者（托爾斯泰）以外，馬克思的影響可以說無所不在。

一八九〇年左右和社會主義無關的工運，在英美地區也同樣盛行，英國、澳洲、美國，也僅

限於該地區。然而在這些國家裡，馬克思主義同樣有其重要性，雖然不像在歐陸那樣。我們也不能低估大批德國和俄國移民的重要性，尤其是在美國，他們經常把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意識型態帶到新大陸，作為他們一部分的思想語言。[11]我們也不能低估美國在那個充滿社會衝突和動亂的時期裡對「大企業」的阻抗，使得許多思想家樂於接受對於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批判，或至少對它有興趣。我們不僅會想到范伯倫，也會想到進步主義的經濟學巨擘，例如理察．伊利（1854-1943），「他對於美國經濟學形成期的影響或許大過任何人」。[12]因此，雖然美國沒有開展出獨立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卻成為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作品和影響的重要大本營。它不僅影響到太平洋國家（澳洲、紐西蘭、日本），也影響到英國，一八九〇年代，許多馬克思主義工運人士從芝加哥的查里．柯爾出版社（Charles H. Kerr）讀到許多馬克思主義的作品，不只是馬克思和恩格斯，還包括狄慈根。[13]

然而，由於非社會主義的工運對於主流團體的知識霸權似乎沒有構成嚴重的挑戰，他們的知識分子還感覺不到任何迫切性。在一八八〇年和九〇年間，他們關於馬克思和社會主義的論辯，甚至比在一九〇〇年間頻繁得多。於是，劍橋知識分子的菁英團體裡的（秘密）討論社團，一般稱為「使徒」（The Apostles）（西季威克、羅素、謨爾、斯特拉奇、佛斯特、凱因斯、布魯克等人），在二十世紀初是個非常不關心政治的時期。儘管西季威克曾經批評馬克思，而在一八九〇年間和費邊社走得很近的羅素也寫過一本書探討德國的社會民主主義（1896）；一九一四年前的學生世代甚至紛紛信奉社會主義（雖然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形式），然而，那個圈子裡最

重要的、在政治上最活躍的經濟學家凱因斯，無論是對於馬克思的思想或是關於馬克思的論辯，總是興趣缺缺。[14]

四

據以界定馬克思主義的影響的第二個元素，是馬克思主義對於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團體的吸引力，無論當地的勞動階級運動的規模如何。當時有若干規模很大的工運幾乎沒有知識分子參與其中，例如澳洲（其實早在一九〇四年就產生了工黨政府）。或許是因為該大陸沒有多少知識分子。同樣的，西班牙以無政府主義為主的工運如火如荼，西班牙知識分子卻興趣缺缺。反之，我們所熟悉的馬克思主義革命組織，大多侷限於大學學生，雖然在第二國際的全盛時期，這樣的現象會很不尋常。然而，某些社會主義運動，例如在俄國，主要還是由知識分子組成的，因為在當地組織合法群眾工人運動的阻力非常大。同樣的，在某些國家裡，例如義大利，社會主義對知識分子和學院的吸引力不容小覷，至少在某個時期如此。

就此而言，我們不必深入探討關於知識分子團體的社會學，或者是他們是否形成獨立的階級（「知識界」），雖然馬克思主義的討論有時候很關注這個問題。所有國家總會有一群男人以及少數的女性，他們受過高等教育，社會主義以及馬克思主義對他們的吸引力也就會成為一個話題。[13]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辯論裡，我們現在所謂的「知識分子」主要是指那些擁有文憑的大學

生（Akademiker）。不過我們必須提到兩點。在許多國家裡，都有德語裡的「技術」（Kunst）和「學術」（Wissenschaft）的從業者的區分，雖然他們大抵上都是來自中產階級。於是，在法國，無政府主義在一八八〇年代吸引了許多「工匠」（廣義的），對於大學生（universitaires）卻沒有太大的吸引力。我們只要知道有此區別即可，不必在此多作解釋。馬克思主義和技藝的關係會在下文探討。其次，在某些國家裡，社會主義政黨主要是由少數知識分子組成的，大多數知識分子並沒有參與（例如德國和比利時），也有某些國家，「知識分子」和「左翼知識分子」（至少在他們年輕的時候）幾乎是可以互換的語詞，例如俄國，我們也必須注意這個區別。當然，大部分的社會主義運動的領袖都是知識分子（維克多・阿德勒、特洛斯查、杜拉提、饒勒斯、布蘭廷、凡德威爾德、羅莎・盧森堡、普列漢諾夫、列寧等人），它們的理論家也都是知識分子。

關於歐洲學生和學院的政治態度，並沒有充足的比較研究，更不用說包含成年知識分子在內的廣義的職業階級。關於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對他們的吸引力，我們的評斷只能是很粗略的。[16]

然而大體而言，在短短幾百年間，主要是在資本主義興盛的地區四周，它的吸引力可以說非常大。

在伊比利半島，大多數知識分子都是反對教廷的自由派和基進派。這或許是為什麼在西班牙戰敗後鼓吹變革的「九八世代」（la generación del 98），烏納穆諾、巴羅哈、麥斯圖、加尼維特、華里茵克蘭、馬查多等人，幾乎都不是自由派；但是他們也不是社會主義者。在英國的知識

分子大部分是自由派，只有少數對社會主義有興趣，雖然大部分是受教育的中產階級女性，而且多半是費邊社成員，她們也是一八八年到九〇年間所謂「新女性」的媒體刻板印象。直到一九一四年的前幾年，才出現重要的社會主義學生運動。費邊社大部分的男性知識分子，都是來自白手起家的新階級，他們的背景是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下層（蕭伯納、韋布、威爾斯、班尼特）。[17]而且，英國最有趣的左翼理論家霍布森，他和歐陸淵源很深，既受馬克思的影響（在其《現代資本主義的演化》〔*The Evolution of Modern Capitalism*〕裡），也影響到馬克思主義者（他的《帝國主義》〔*Imperialism: A Study*〕），他甚至不是費邊社成員，而是進步主義的自由黨。當地的中產階級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無論在人數或知識水準都望塵莫及，除了威廉·莫里斯以外（見下文）。

法國的革命傳統對該國的知識分子當然有其影響力，而既然它包含當地社會主義的元素，社會主義的影響也就顯而易見，雖然經常只是作為左翼主張的臨時圖章（相對於其他國家的恆久忠誠度，密歇爾斯說，法國在一八九三年選出的六個代表，到了一九〇七年前後，有五個不僅成為非社會主義者，甚至是反社會主義）[18]。同樣的，一個年輕的極基進主義也是資產階級傳統的一部分。所以說，在法國知識分子當中不難發現社會主義，而某些聲望很高的機構，例如高等師範學院從一八九〇年代起，就成為社會主義者或社會化的知識分子貨真價實的搖籃，尤其是德雷福斯時期。可是由於馬克思的影響（甚或號稱和馬克思結盟的社會主義政黨「蓋得黨」〔Guesdistes〕的吸引力）並不顯著[19]，它對該時期的法國知識分子的吸引力也就乏善可陳。

況且，在一九一四年以前，馬克思和恩格斯譯為法文的作品比英文版（如果把美國的版本也算起去）少得多，更不用說德文、義大利文或俄文版了。[20]

德國知識分子和學術圈，儘管在一八四八年仍然盛行自由主義，到了一八九〇年代普遍效忠威廉二世的帝國，對於社會主義更是口誅筆伐；而猶太人則是例外，根據密歇爾斯非正式的估計，在一九〇七年，有二成到三成的知識分子支持社會民主主義。[21]而在一八八九年到一九〇九年間，法國大學發表了三十一篇博士論文，探討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和馬克思的一般性領域，而規模大得多的德國學界在該時期只有十一篇博士論文探討類似的主題。[22]德國知識分子和學界對於馬克思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有成見，它們對他們並沒有太大的吸引力。再者，有證據顯示，對於社會民主主義有興趣的，至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幾年前，多半是溫和的修正主義者，而不是左翼分子；德國的社會主義學生聯合會（Socialist Students）也屬於修正主義陣營。當然，德國政黨的組成分子大多是無產階級；或許比其他群眾社會主義政黨都要來得多。[23]然而就算是在這些限定下，馬克思主義對於德國知識分子相對不足的吸引力，也可以從以下的事實窺見端倪：政黨必須從國外延請著名的馬克思理論家，例如波蘭的羅莎．盧森堡、奧地利和匈牙利的考茨基和希法亭、俄國的「帕弗斯」。

在西北歐小國當中，比利時和北歐諸國發展出相對強勢的工人階級群眾政黨，公開和馬克思主義劃上等號，雖然在比利時，基礎雄厚的工人黨（Parti Ouvrier）也體現早期本土左派傳統。在北歐諸國當中，丹麥對馬克思的興趣似乎高於瑞典和挪威。除了偶爾有醫師和牧師以外，挪威

大部分的政黨領袖都是工人階級。瑞典的運動和北歐其他國家一樣（包括組織嚴密的芬蘭），並沒有產生著名的理論家，在第二國際的論辯當中也沒有什麼重要的地位。在工匠的世界裡，社會主義（或無政府主義）的吸引力或許大一些，但是大體而言，北歐知識分子認為社會主義只是他們國家民主派和進步派的基進主義的左翼延伸，或許特別著重在文化和性愛道德的改革。說到當時瑞典知識分子的左派理論的代表人物，或者是經濟學家維克塞爾，他是基進的共和黨、無神論者、女性主義者、新馬爾薩斯主義者：他和社會主義始終保持距離。

在該時期裡，低地國家在歐洲文化裡所扮演的角色，或許是自從十七世紀以來最重要的。在以無產階級為主的比利時工黨裡，由於布魯塞爾的理性主義學術氛圍，知識分子和學界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凡德威爾德、于斯曼、德斯特里、戴尼斯、皮卡爾，以及左派的布呂克爾。但是我們或許要注意，無論是政黨或其知識分子的發言人，在國際運動中都傾向右翼，根據國際的標準，只是有一點類似馬克思主義而已。[24]我們懷疑凡德威爾德會不會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如果不是因為時空因素的話。誠如柯爾所說：「他加入社會主義運動的時候，馬克思主義化身為德國社會民主黨，成為西歐的社會主義運動的樞紐，任何歐陸的社會主義政治領袖，尤其是在國際層次上，都會理所當然地必須採取盛行的馬克思主義思考架構。」[25]尤其是蕞爾小國的群眾工人政黨。馬克思主義對於比利時知識分子的影響當然也就不會很顯著。

在荷蘭並沒有發展出具有政治份量的全國性工人運動，在所有西歐國家裡，只有荷蘭知識分子的社會主義發揮文化上的影響力，且知識分子在運動中的角色反而出奇的重要。[26]社民黨有時

候甚至被嘲笑是學生、牧師和律師的政黨。它終究還是成為以手工匠為主的政黨；可是荷蘭傳統上區分為若干信仰團體（喀爾文教派、天主教和俗世教派），各自形成跨階級的政治集團，而不像其他地方那樣，階級政黨的發展空間並不大。它似乎和俗世的文化區塊的顯著擴張有關。政黨起初大抵上都奠基於兩個非典型的區塊：弗里西亞（Frisia）農民（地處偏遠而且民族特色濃厚）以及阿姆斯特丹的猶太裔鑽石工人。在這些小規模的運動裡，諸如特洛斯查（1860-1930）（弗里西亞人，成為政黨溫和派的領袖）、赫曼．哥爾特（文學領袖，和女詩人羅蘭霍爾斯特以及天文學家潘尼科克為左翼革命派的主要人物），這些知識分子總是特別受人矚目。我們不僅訝異於知識分子在政黨中的角色，以及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家的崛起，像是犯罪學家邦格，尤其是本土的極左派知識分子在國際上的主導性。他們儘管和羅莎．盧森堡很類似，卻獨立於東歐的影響之外。荷蘭在西歐是個異類，雖然規模很小。

奧地利權傾一時的社民黨以好戰聞名，由於其領袖阿德勒（1852-1918）和晚年的恩格斯私交甚篤，它也和馬克思主義劃上等號。況且，奧地利是唯一創立馬克思主義學派的國家：奧地利馬克思主義（Austro-Marxism）。在哈布斯堡王朝，我們第一次走進一個大眾文化充斥著馬克思主義的地區，而社會民主主義對知識分子的吸引力也不容小覷。然而他們的意識型態卻難免深深烙有「國族問題」的特徵，它決定了王朝的命運。想當然耳，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也率先有系統地分析馬克思主義。[27]

在像捷克那樣沒有自主權的國家裡，知識分子大多被引導到自己語言上的國族主義，或者是

（在淪陷區裡的人民）想要加入的國家（羅馬尼亞、義大利）。即使是受到社會主義的影響，國族主義元素仍舊占上風，例如一八九〇年代，民粹派社會主義者從奧地利政黨分裂出來，成為捷克小資產階級基進派。雖然他們對馬克思主義如數家珍，卻能夠對它免疫：最著名的捷克知識分子，馬薩里克，以俄國研究和馬克思主義批判聞名國際。此外更有兩個主要文化的知識分子，日耳曼和馬札爾（以及猶太人）。要了解馬克思主義對於二元君主制裡的大眾文化的影響，就不能不考慮到另類的少數族群。

西歐猶太人中產階級少數族群在文化和政治上始終是被同化的對象，而他們也一直被允許同化：變成猶太裔英國人，例如狄斯累利，或是猶太裔法國人，例如涂爾幹，猶太裔義大利人，尤其是猶太裔德國人。在一八六〇年到七〇年代的奧地利，幾乎所有猶太人都認為自己是日耳曼人，也就是信仰一個統一的、自由的、更偉大的德國。然而奧地利被排除在德國以外、自從一八七〇年代末期開始的反閃族主義，文化上無法同化的大批猶太人集體向西方移民，以及猶太人教區的龐大規模，都使得該立場處境困難。不同於法國、英國、義大利和德國，猶太人不是少數人口，而是構成數量龐大的中產階級區塊：在維也納有百分之八到十，在布達佩斯更有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1890-1910）。猶太裔知識分子的處境（猶太人當然是教育體系最熱情的贊助者）[28]因此非常獨特。

在匈牙利，猶太人的同化作為馬札爾化政策的一部分，一直得到猶太人的熱烈支持。可是他們畢竟無法完全融入。在某個意義下，他們的處境有點像二十世紀後期的南非猶太人：他們被接

受為統治的民族，以對抗非馬札爾人（或非白人），但是由於他們的內聚力以及社會的特殊化，使得他們無法完全認同。他們在匈牙利的社會民主主義裡（他們沒有太大的理論興趣，而且在溫和壓制下運作）的角色並不是很突出。然而在一九〇〇年代，強大的社會革命潮流在學生運動裡方興未艾，使得猶太人在匈牙利左派陣營的地位在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後更顯著。更值得注意的是匈牙利馬克思主義者享譽國際。盧卡奇（1885-1971），雖然早在一九〇二年就成為社會主義者，而且和該國的馬克思主義、無政府主義和工團主義知識分子領袖薩博〔1877-1918〕一直有來往，但是直到一九一四年，才對馬克思主義真正產生興趣。

奧匈帝國當中的奧地利對於猶太人的邊緣化則時間更早且更明顯。和馬札爾人不同，奧地利有大量說德語的非猶太裔知識分子可以在公家機關和學校機構任職，兩個領域是重疊的。一八七〇年代崛起的「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基本上就是由這群人組成的，其中有少數猶太人（米塞斯兄弟是例外）：門格、維塞爾、波姆巴威克以及比較年輕的熊彼得和海耶克。此外，大部分猶太人附和的大日耳曼民族主義，最後特別和反閃族主義合流，雖然它不僅是主張反閃族主義[29]。它使得猶太人的忠誠和政治興趣失去了焦點。社會主義是個可能的替代品，例如阿德勒，雖然成員幾乎是當時少數年輕人。直到一九三八年，奧地利的社會民主主義始終熱情附和大日耳曼統一體。猶太復國主義（該語詞是由一個被極度同化的維也納知識分子畢恩包姆發明的）是後來的另一個替代品，雖然沒有那麼吸引人。一個強大、忠誠而好戰的工運的興起（主要是由說德語的工人組成的），對知識分子無疑有若干吸引力；而我們也不能輕忽以下的事實：在維也納，它是唯

一和反閃族主義群眾政黨唱反調的群眾運動。不過，大多數奧地利的猶太知識分子並不熱中於社會主義，他們汲汲營營於文化生活和個人關係，對於他們的文明危機，大抵上也都是與政治無關的託詞或內省性的分析。（社會主義對基督徒的吸引力更低。）談到該時期的奧地利文化（大多是維也納），我們會想到的名字都不是社會主義者：佛洛伊德、施尼茨勒、卡爾・克勞斯、荀貝克、馬勒、里爾克、馬赫、霍夫曼斯塔、克林姆特、洛斯、穆西爾。

另一方面，在大城市裡，尤其是維也納和布拉格，社會民主主義（其學術術語即馬克思主義）成為年輕知識分子不可或缺的經驗，從施尼茨勒的小說《到曠野之路》（*Der Weg ins Freie*, 1908）裡對於維也納文化人（主要是猶太人）的中產階級氛圍的生動描繪就可見一斑。難怪奧地利社會民主主義成為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的溫床，並且發展出「奧地利馬克思主義」團體：卡爾・倫納、奧托・鮑爾、馬克斯・阿德勒、艾克斯坦、希法亭、正統馬克思主義的創立者考茨基，以及人才薈萃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們。（奧地利大學不像德國那樣有系統地歧視他們。）其中卡爾・格林堡、路多・哈特曼、司提反・鮑爾於一八九三年創辦一份期刊，就是後來的《社會經濟史季報》（*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sgeschichte*），它成為德語世界經濟社會史研究的主要刊物，可是再也沒有反映它的社會主義起源。格林堡在維也納任教期間，於一九一〇年創辦了《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史文庫》（*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一般稱為格林堡文庫〔Grünberg's Archiv〕），成為社會主義（尤其是馬克思主義）運動研究的先驅。相反的，奧地利社會民主主義以擁有成就卓越的報紙以及廣泛的文化興

趣著稱：即使他們不很欣賞荀貝克，卻讓這位音樂革命家擔任工人合唱團指揮以維持生計。

「或許沒有其他國家的科學家、學者和著名作家當中有這麼多社會主義者，」一個美國作家談到義大利時如是說[30]。知識分子在義大利社會主義運動裡叱吒風雲的角色，以及當時（至少是在一八九〇年代）馬克思主義對他們的吸引力，經常為人稱道。他們在其中的人數並不算多（在一九〇四年不到百分之四）[31]，在一八九〇年初期的資產階級（男性）年輕人和學生當中，科學家顯然只是少數。然而，不像德國和奧地利大學裡學生和老師以保守派為主，義大利大學裡（例如杜林〔Turin〕）在學術和政治上都具有影響力的進步主義氛圍，經常成為義大利社會主義的傳聲筒（而法國學院派的社會主義充其量只是拾人牙慧）。不同於當時法國「大學生」當中流行的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義大利學院裡的知識分子非常熱中馬克思主義，使得義大利馬克思主義差不多就像是淋在義大利中產階級男性文化圈的實證主義、演化論和反教廷主義的沙拉上的沙拉醬。再者，它不只是年輕反叛者的運動。許多社會地位顯赫的成人也開始信奉義大利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拉布里奧拉生於一八四三年、龍布羅梭生於一八三六年、作家亞米契斯生於一八四六年，雖然第一國際的領袖們的年代主要是在一八五六年到六六年左右。無論在義大利知識圈盛行的是馬克思主義或者是馬克思主義的同路人的社會主義，他們對於馬克思主義顯然都很熱中。即使是極端的反馬克思主義者（有些人則是前馬克思主義者，例如克羅齊）也可以為此作證：帕累托自己也曾經為拉法格編輯的《資本論》選集（Paris, 1894）寫導論。

我們可以合理地談論整個義大利知識圈，雖然該國以地方主義和南北差距聞名，他們的知識

圈卻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即使他們也相當歡迎外國（德國、法國）知識圈的影響。從民族主義的觀點去思考知識分子的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之間的關係，其實沒有那麼站得住腳，因為地區的差異於此扮演重要的角色。北方工業地區（米蘭、杜林）知識分子和社會主義工運之間的關係，和比利時以及奧地利類似，而在那不勒斯或西西里島則不然。義大利的特殊性在於它並不符合西歐馬克思主義式的社會民主主義或是東歐的模式。它的知識分子們不是離經叛道的革命知識分子。他們熱中馬克思主義的浪潮在一八九〇年代到達巔峰，此後隨即平息下來，一九〇一年以後，社會黨大部分的知識分子很快地轉向改革派和修正主義，而該政黨也無法像德國和奧地利一樣發展出馬克思主義左翼反對派。

整個來說，義大利知識分子大抵都附和該時期西歐的基本模式：他們在其國家的中產階級裡都有很好的地位，一八九八年以後，他們也都被納入體系，雖然他們是社會主義政客。他們許多人在一八九〇年代都成為社會主義者，其實是有跡可尋的；由於義大利在復興運動時期（Risorgimento）以後的政治發展，一八八〇年代到九〇年代義大利工人和農民的悲慘困境以及大規模群眾叛亂，相較於比利時，他們更有理由成為社會主義者。青年們的寬容大方和叛逆個性更是助長該趨勢。社會主義中產階級知識分子不僅沒有被歧視，他們的社會主義甚至被視為進步主義以及共和主義的觀點，而他們的生活和職業也和非社會主義知識分子無甚差別。莫米利亞諾（1866-1924）在一八九三年成為社會黨鷹派，此後幾年間，他在中學的教師工作遇到麻煩，但是後來他在大學教書，甚或從事寫作，使得他和中學裡具有馬志尼派（Mazzinian）背景而專注

於學術的非社會主義者老師們沒有什麼差別。我們最多只能猜測說，如果他不是社會主義者，他可能會早幾年到大學教書。

簡言之，大部分西歐的社會主義知識分子至少都享有阿德勒所謂的「自由發展其精神興趣的個人豁免權和可能性」[32]。俄國的知識圈則不若此，雖然它最初起源自「富裕家庭階級」，但是它們本質上的革命者定義則和該階級迥然不同。鄉紳和軍官「大部分不能歸類於知識分子階級」，培西荷諾夫在一九〇六年信誓旦旦地說。[33]他們的職業以及對於政權和社會的反抗，使他們無法像西歐那樣被整合，無論所謂的知識圈是就主觀性和理想主義去定義的（如俄國民粹主義），或是定義為個殊的社會階級——它是一九〇〇年代初期俄國爭論不休的問題。剛好在一九〇〇年代，無產階級的成長以及越來越自負的資產階級，使得問題益顯複雜。由於知識圈裡有個越來越明顯的部分現在似乎是屬於資產階級（「正如在西歐，俄國的知識圈已經崩壞，其中資產階級的派系受到資產階級的操弄，因而和它合併在一起，」正如托洛斯基所說的）[34]，該階級是否獨立存在，也不再那麼清楚。然而這些爭論的本質顯示西歐以及以俄國為代表的國家之間其實南轅北轍。在西歐，人們很難像波蘭革命家馬查斯基（1866-1926）和他的評論者一樣主張說，知識分子是一個社會團體，以革命的意識型態為工具，藉助於無產階級，在他們剝削無產階級以前，先取代資產階級的地位。[35]

由於馬克思在對於俄國現代社會的分析上的核心角色，知識圈裡充斥著馬克思主義者，自是不在話下。左翼的所有立場，無論其本質和靈感是什麼，都必須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去定義。它

實在太重要了，甚至民族主義運動，也都受到它的影響。在喬治亞，孟什維克派最後變成地方性的「民族」政黨；普世猶太工聯（General Jewish Labour Bund），可以說是當時猶太人的民族性政治組織，也成了忠實的馬克思主義者；即使是相對溫和的猶太復興運動，也都明白顯示該影響。以色列建國先賢，大多是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後的猶太人第二次回流（second Aliyah）當中從俄國來到巴勒斯坦，也從俄國引進了革命的意識型態，啟發了當地猶太復興運動團體的意識型態結構。但是即使是不像猶太人那樣受馬克思主義影響那麼深的民族，也可以窺見其一斑。波蘭民族運動的主要陣營，即所謂波蘭社會黨第二國際，它是真正的工黨，在其中，舊有的馬克思主義傳統必須將自己重組為更抗爭性的、更忠實的馬克思主義者，也就是波蘭和立陶宛王國社會民主黨（在羅莎．盧森堡和約基希斯的領導下）。隨著亞美尼亞革命聯盟（Dashnaks）的興起（不過他們自認為是第二國際的分支），亞美尼亞也發展出類似的區分。簡言之，俄國和古老的民族傳統決裂的知識圈，莫不多少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

我並不是說他們都是馬克思主義者，或者在關於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詮釋上意見一致（後者尤其不可能）。俄國和其他地方一樣，一八九〇年代初期的大浪潮預見了民粹主義的土崩瓦解，各種最革命性而前衛的意識型態暫時匯聚成一般性的馬克思主義，而在下一個世紀裡，歧異和區分成為其特徵，此外也史無前例地出現了第一個明確的反馬克思主義，甚或是一個非政治性的知識圈。但是即便如此，它終究是從一個大熔爐裡誕生的，在那裡頭，它難免會和馬克思主義接觸且受其影響。

馬克思主義對於東南歐知識分子的吸引力相當有限，其原因在於：落後國家裡（如巴爾幹諸國）的知識分子幾不可見：他們率皆抵制德國和俄國的影響，例如希臘和羅馬尼亞，他們都以巴黎馬首是瞻[36]；他們也沒能產生重要的工人和農民運動（例如羅馬尼亞，知識分子各自為政的社會主義團體在一八九〇年代以後紛紛瓦解）；此外也包括他們排外的民族主義意識型態，例如克羅埃西亞。隨著民粹主義的影響，馬克思主義也滲透到該地區的部分國家（尤其是保加利亞），藉由瑞士大學，它們是革命動員的大本營，其他混雜著許多東南歐政治異議學生。在一九一四年以前，《資本論》沒有被翻譯成除了保加利亞語以外的任何東南歐語言。或許比較重要的是，馬克思主義畢竟滲透到這些落後地區，甚至到馬其頓的偏遠山谷，而不在於它相對有限的衝擊（除了受俄國影響的保加利亞以外）。

五

那麼在種種民族和地區的差異下，馬克思主義對於該時期的知識圈文化有什麼影響？或許我們最好先知道，這個問題本身是有偏誤的。我們要探討的，是馬克思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或非社會主義）文化的互動，而不是後者受前者多大的影響。我們沒辦法將它和非馬克思主義觀念在馬克思主義裡相對應的影響分開來看。更嚴格的馬克思主義者斥之為腐敗人心，正如列寧強烈駁斥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康德主義化以及馬赫的「經驗批判主義」的滲入。他們的抗議是可以理解

的：畢竟，如果馬克思想要成為康德主義者，他一點問題也沒有。再者，試圖在馬克思哲學裡以康德取代黑格爾的傾向，經常被認為是修正主義。然而，史家的工作不在於決斷什麼是「正確」或「不正確」的、純正或墮落的馬克思主義，其次，也是更重要的，試圖讓馬克思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的觀念互涉的傾向，是馬克思主義在知識圈的一般文化裡登場的最明確的證據。正是由於馬克思主義在知識圈裡粉墨登場，才使得馬克思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的觀念難以明確劃定界限，因為馬克思主義者和非馬克思主義者都活躍在一個兼容並蓄的文化裡。在一九六〇年代，左派傾向於將馬克思和結構主義、精神分析、學院的計量經濟學結合起來，證明了馬克思主義在當時對於大學知識分子的強烈吸引力。相反的，在英國經濟學家的著作裡，馬克思宛如不存在似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只存在於少數好戰團體，他們和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壁壘分明。

當然，許多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儘管主張正統馬克思主義，反對修正主義以及其他異端，但是很謹慎地不將異端的詮釋排除在社會主義運動論辯的合理範圍以外。作為政治實踐團體，他們不僅汲汲於維繫政黨的統一性（在群眾政黨裡即意味著要接納各種不同的理論意見），在傳統經典沒有提供任何線索的若干領域和主題上，他們也面對著建構起馬克思主義式的分析的任務，例如「民族問題」、帝國主義或其他議題。就此而論，他們沒有任何「馬克思主義怎麼說」的先天判斷，更不用說訴諸權威文本。因此，馬克思主義的論辯範圍非常寬廣。然而，只有馬克思主義正統的嚴厲限定，以國家力量和政黨威權禁止異端，才有可能讓馬克思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各不相謀。前者並不存在，而後者也效果不彰。因此，隨著在運動裡引進某些非馬克思主

義文化觀念而產生的影響，馬克思主義的觀念在運動以外的影響力也日漸顯著。它們是一體兩面的事。

如果不去論斷其本質或政治意涵，我們能夠評斷馬克思主義於一八八〇到一九一四年代在一般知識文化裡的地位嗎？在自然科學的領域裡，它當然是微不足道，雖然馬克思自己深受其影響，尤其是（達爾文的）演化生物學。自然科學家們對馬克思的著作鮮少感興趣，而恩格斯的作品對他們的意義也僅限於科學的普及和工運的工人教育問題。他的《自然辯證法》被認為不符合一八九五年來的科學發展，使得雅札諾夫沒有將它收錄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裡，在後來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文庫》（*Marx-Engels-Archiv*）裡也被擺在最後面。相較於第二國際時期，一九三〇年代著名的科學家們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強烈興趣真是不可同日而語。再說，在該時期裡的自然科學家也沒有證據主張政治基進主義，除了化學和醫學（大部分是德國人），而且是人數極少的團體。在西歐國家，他們當中不乏社會學家，正如法國高等師範學院的產物（例如年輕的朗之萬）。少數科學家曾經接觸馬克思主義，例如生物統計學家皮爾森[37]，他後來的意識型態有個大轉彎。馬克思主義者亟欲發掘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可是成效不彰。[38]生物學家們（大部分是英美的）主要的政治傾向，新馬爾薩斯主義優生學，在當時在政治上被視為左派，但是他們就算不討厭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也很難說跟它有什麼牽扯。

我們最多只能提到在東歐長大的科學家，例如居禮夫人，以及在瑞士大學求學和工作的人，他們大多數來自東歐基進知識圈，顯然對馬克思耳熟能詳，而且為馬克思主義爭辯不休。年輕的

愛因斯坦和來自蘇黎世的南斯拉夫裔同學結婚，因而也接觸到該氛圍。但是就實務而言，自然科學家們和馬克思主義的接觸只有傳記上的價值，因而無甚可觀之處。這個主題可以略而不談。

在哲學、甚至社會科學方面，情況當然大異其趣。馬克思主義提出了值得討論的深刻哲學問題。當時黑格爾哲學仍然盛行一時，例如義大利和俄國，討論非常熱烈。（由於沒有強大的馬克思主義運動，以牛津為主的英國黑格爾主義哲學對於馬克思興趣缺缺，雖然有些人醉心於社會改革。）黑格爾的故鄉德國，在當時則是以非黑格爾主義掛帥，而且不只是因為黑格爾和馬克思的家族關係。[39]由於德國社會民主黨缺乏哲學訓練，《新時代》必須仰賴諸如普列漢諾夫之類的俄國人去討論黑格爾哲學的主題。

相反的，新康德學派的影響力就大得多了，它不僅影響了德國某些馬克思主義者（例如修正主義者以及奧地利馬克思主義），在社會民主主義裡也相當受歡迎；例如佛蘭德的《康德與社會主義》（*Kant und der Sozialismus*, Berlin, 1900）。因此，馬克思主義出現在哲學裡是不可否認的事。

在社會科學方面，經濟學仍然極端仇視馬克思，主流學派的邊際主義（marginalist）的新古典主義（奧地利、英國和北歐、義大利和瑞士）和他的政治經濟學顯然無甚交集。奧地利學者極力駁斥他（門格、波姆巴威克），而英國和北歐在一八八〇年代以前甚至對他不屑一顧，他們當中有些人堅持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是錯誤的。[40]那並不意味說他們沒有感受到馬克思的存在。奧地利學派最卓越的年輕學者熊彼得（1883-1950）在他開始學術研究的時候（1908）就潛心探討

資本主義的歷史命運，以及除了馬克思以外的另一種經濟發展的詮釋問題（見氏著《經濟發展理論》〔*Theorie der wirtschaftlichen Entwicklung*, 1912〕）。然而，由於新正統派刻意限制經濟學的領域，使得它很難回答諸如成長和經濟危機之類的總體經濟學問題。說也奇怪，義大利人（從嚴格的非馬克思主義或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對社會主義的興趣，和奧地利人米塞斯剛好相反，證明了社會主義經濟學在理論上是可行的。帕累托主張說，它的無法實踐不能由理論去證明，其後巴羅尼的重要論文〈極權主義國家的生產管理部〉（Il ministro della produzione nello stato collettivo），也對二十世紀的辯論衝擊甚巨。某些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或刺激或許也可見於當時在美國流行的「制度學派」（institutional school），如前所述，許多經濟學家強烈支持「進步主義」以及社會改革，使得他們偏好批判大企業的經濟理論（伊利、威斯康辛學派；尤其是范伯倫）。

在德國幾乎沒有獨立於其他社會科學的經濟學，「歷史學派」以及「政治科學」（Staatswissenschaften）的概念的影響相當顯著。我們不能孤立地看待馬克思主義（例如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重大事實）對於經濟學的衝擊。不消說，威廉二世的德國的社會科學主流強烈反對馬克思主義，雖然曾經和馬克思本人針鋒相對的舊有的自由派（布倫塔諾、謝弗勒）[41]顯然比親俄的施莫勒學派更熱中於論戰。《施莫勒年報》（*Schmoller's Jahrbuch*）在一八九八年以前拒絕刊載任何關於馬克思的論文，而謝弗勒的《總體政治科學雜誌》（*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則以炮火齊發的論文（在一八九〇年到九四年間刊登了七篇）回應社會民主主義的興起，後來對於該主題才歸於沉寂。整個來說，如其所述，隨著社民黨的壯大，德國社會

科學和馬克思主義也越來越關係密切。

如果說德國的社會科學和專科的經濟學保持距離，它也不信任專科的社會學，這裡指的是英國和法國（以及其他國家），它們對於左派太友好了。[42]再說，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幾年（1909），德國才出現作為獨立學科的社會學。然而，如果我們概觀社會學思想，無論今昔，馬克思的影響始終存在。哥泰因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提供了重要的動能，他們的社會科學方法比科特勒更有說服力，甚至比孔德「更合乎邏輯、更一致」。[43]美國一位社會學家的話，可以證明馬克思主義的地位。斯默於一九一二年寫說：「馬克思是社會科學史裡少數真正偉大的思想家……我不認為馬克思為社會科學說了任何如他所說的蓋棺論定的話。儘管如此，我自信地預測，在歷史的最終審判裡，馬克思在社會科學裡的地位，將會像是伽利略贊物理學的地位一樣。」[44]

由於許多社會學家的政治基進主義立場，馬克思主義的影響顯然更上層樓，無論是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們都和社會民主運動同聲相應，例如比利時。於是，他現在已經被人遺忘的理論很難說是馬克思主義，在當時就在《新時代》（1, 1891）刊載了一篇〈俄國統治下的波蘭的社會主義〉。馬克思對於非馬克思主義者的直接影響也可見於德國社會學學會的若干創建者，例如韋伯、特洛爾奇、齊美爾以及滕尼斯，「馬克思果斷地揭露競爭的醜陋面，他所造成的影響……顯然僅次於霍布斯」。[45]韋伯的《社會科學和社會政治學叢刊》或許是德國社會科學界唯一刊載社會主義者作品的期刊，無論他們是接近社會主義、受其影響，甚或被認定是社會主義者。

在義大利、俄國、波蘭甚或奧地利的社會學裡，實證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陣營也折衷性

地襲取馬克思的理論，就此自不在話下，它當然也證明了馬克思的存在；更不用說比較偏遠的國家，在他們那裡，社會學幾乎就是馬克思主義，例如塞爾維亞少數實踐者。然而我們也必須提到馬克思主義在法國顯著的弱勢，例如在涂爾幹的學說裡。雖然法國社會學界的共和派以及德雷福斯陣營的氛圍相當左傾，若干《社會學年報》（*Année Sociologique*）的年輕成員也成為社會主義者，我們只看到哈布瓦赫（1877-1945）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而且可能只在一九一四年以前。

無論我們回顧思想史，找出若干被公認為現代社會學的先驅的思想家，或者只探討一八八〇年到一九〇〇年間舉足輕重的社會學（龔普洛維奇、塔岑霍夫、洛里亞、維尼亞斯基等人），馬克思主義的存在都是極為顯著而不容否認的。在我們現在所謂的政治科學領域裡，情況也是如此。在該時期主要由哲學家和法學家開展出來的關於「國家」的傳統政治理論，當然不會是馬克思主義，然而如前所見，他們強烈感受到歷史唯物論的哲學挑戰，並且試圖回應它。政治如何在實踐中操作的具體探討，包括諸如社會運動和政黨的新主題，同樣受到它的直接影響。當民主政治和大眾政黨使得階級鬥爭和群眾的政治管理（或者群眾的拒絕管理）成為迫在眉睫的實踐問題時，理論家們更需要藉助於馬克思去探索它們。奧斯特洛果爾斯基（1854-1921）在俄國人當中是個異類，馬克思對他的影響似乎沒有托克維爾、白芝浩或布萊斯（Bryce）那麼大。然而在奧斯特洛果爾斯基的學說裡，國家始終是少數人用以統治多數人的工具，它或許也影響到帕累托和莫斯卡，當然也部分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啟發，而馬克思主義對於索雷爾或和密歇爾斯的影響則顯

而易見。對於一個在當時無甚發展的領域，我們不必多作著墨。

如果說社會學顯然受到馬克思的影響，那麼官方學術史的堡壘則是極力對抗如此的入侵，尤其是在西歐。它不僅抵制社會民主主義和革命，也抗拒所有社會科學。它否認所有歷史法則、除了政治和觀念以外的其他力量的主宰地位，以及經由一連串既定階段的演化；其次，它更懷疑任何歷史概括化的合理性。早期的興策（Otto Hintze）說：「根本問題是在關於歷史現象是否有規律性的論辯上。」[46]或者如拉布里奧拉比較輕率的說法：「歷史將會也應該成為一種描述性的學科。」

因此，他們的敵人不只是馬克思，更包括社會科學家對於歷史領域的侵犯。在德國於一八九〇年代中期的激烈論戰裡（也有國際上的回響），主要的對手不是馬克思，而是好戰的蘭普雷希特，以及所有受孔德啟發的歷史學家，或是任何試圖從社會經濟演化推論出政治歷史的經濟史，甚或是經濟史本身。[48]然而在德國，在那些將所有「集體主義的」歷史斥為「唯物史觀」的人們心裡，馬克思主義顯然份量很重。[49]相反的，蘭普雷希特（年輕的歷史學家艾倫堡支持其說法，他的《富格家族的年代》〔*Das Zeitalter der Fugger*〕也遭到同樣的攻擊）主張說，他們指控他是唯物論者，只是要將他和馬克思主義劃上等號。由於批判他的《新時代》也認為在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當中，他「最接近歷史唯物論」，因此沒有幾個正統派的人相信他的辯解，他們認為他「承襲自馬克思的地方或許比他的學派所承認的還要多」。[50]

因此，如果只在公認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當中探討馬克思主義的影響，那會是個偏誤；

那樣的人並不多，有些人則會被斥為傳聲筒而愧為歷史學家。[51]就像在社會學的領域裡，我們要探索的是那些試圖回答和馬克思類似的問題的作者，無論他們得到的答案是否類似。也就是說，我們看到的是那些歷史學家，他們試圖將敘事的、政治的、體制的、文化的歷史領域整合成關於社會和經濟變遷的更寬闊的架構。其中有少數是正統學院的歷史學家，雖然蘭普雷希特對比利時歷史學家亨利．皮杭的影響很大，而他和社會主義一點關係也沒有。[52]他在《歷史評論》（*Revue Historique*）裡堅定地為蘭普雷希特辯護（1897）。[53]經濟社會史（大抵上和一般歷史有所區隔）是包容萬物的大地，而厭倦於官方保守主義的乾旱的年輕歷史學家們，開始覺得在這個專業領域裡悠遊自在。如前所見，即使是德國本身，第一本經濟社會史的期刊，也是（大抵上是奧地利的）馬克思主義者創辦的。他那個年代在英國最卓越的經濟史家喬治．安文，他開始研究他的題目，是為了駁斥馬克思，然而他認為「馬克思一直試圖導正歷史。正統歷史學家忽略了人類發展的所有重要因素」。[54]而充滿民粹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底蘊的俄國歷史學家的影響也不容低估：法國的卡瑞耶夫、盧奇斯基，英國的維諾格拉多夫。

總而言之，人們試圖將歷史整合到社會科學裡，尤其是強調社會和經濟在政治和思想發展裡的基奠性角色，而馬克思主義只是這個趨勢的一部分。[55]既然它是公認最完備、有力而一致的整合理論，儘管它並沒有和其他理論完全區隔開來，它的影響仍然相當重大。馬克思為社會科學提供的基礎比孔德更為嚴格，因為它涵攝了一套知識社會學，對於諸如馬克斯．韋伯之類的非馬克思主義者有「潛移默化的影響」，同樣的，有許多評論者知道真正挑戰傳統歷史的，並不是蘭普

雷希特之流，而是馬克思。

然而，馬克思主義對於非馬克思主義者的實際影響並不一定那麼明確而界線分明。它的影響所及，有個很大的灰色地帶，而且越來越明顯，雖然馬克思主義者和非馬克思主義者基於政治理由而極力撇清。當《歷史雜誌》（*Historische Zeitschrift*）的評論者們主張說，拉布里奧拉「比其他社會主義理論的新秀們更接近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們的概念」，或者說他「被公認為溫和唯物論的代表」時，他們的說法豈不是和馬克思主義不謀而合嗎？[56]他們顯然不認為如此，因為他們既否定拉布里奧拉，也駁斥馬克思。然而就在那灰色地帶裡，非馬克思主義者承認說，他們不能完全否認馬克思所說的，也承認說我們必須尋找馬克思主義對他們以及整個非馬克思主義者的文化的大部分影響。在馬克思去世的時候，它還不很顯著，因為除了東歐的知識圈以外，沒有多少人知道馬克思或讀過他的作品。到了一九一四年，他的影響越來越大。現在歐洲很少有知識分子不知道他的存在，而他的理論的某些層面也已經進入公共領域。

六

我們還沒有談到關於馬克思主義和藝術的關係更一般性的問題，特別是在該時期的藝術裡扮演重要角色的前衛文化。這兩個現象並沒有必然或邏輯的關係，因為主張說藝術裡的「革命者」必定也是政治學裡的「革命者」，那只是語意上的張冠李戴。另一方面，它們倒是一直有個存在

性的關係，因為社會黨和藝術文化的前衛派都是和資產階級正統對立的局外人；更不用說前衛派的許多成員和放浪形骸者總是年輕而貧窮。無論他們相互之間，或是和資產階級社會的道德和價值系統的異議者，都不得不和平共存。政治上的革命或是「進步主義」的少數者運動，不僅吸引了文化上的異端和另類的生活方式的邊緣份子，像是素食主義者、靈修者、通靈者等等，也包括主張獨立解放的女性、性別正統的挑戰者，以及尚未融入資產階級社會、或者以抗議的方式對抗它、或者覺得被它排斥的男性或女性。各種異端都有重疊的地方。每個文化史家對於這個氛圍都不陌生。一八八〇年代英國規模不大的社會主義運動足以為證。伊蓮諾．馬克思不只是個好戰的馬克思主義者，她也是個自由的職業婦女，拒絕正式的婚姻，曾經翻譯易卜生的作品，也是個業餘演員。蕭伯納是個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社會主義運動者，自學成功的文學家，音樂和戲劇的評論家，抨擊墨守成規的正統，在藝術和思想上鼓吹前衛主義（華格納、易卜生）。前衛的「美術工藝運動」（威廉．莫里斯、瓦特．克萊恩）從社會主義汲取許多養分，而性解放的前衛派，同性戀的卡本特和整體性解放的擁護者哈威洛克．藹理斯，也在相同的氛圍裡大聲疾呼。王爾德雖然不善於政治活動，卻醉心於社會主義，並且就該主題寫了一本書。

雖然前衛派和馬克思主義能夠和平共存，可是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藝術的作品並不多，出版的則更少。因此，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在藝術鑑賞問題上並不特別侷限於經典學說：馬克思和恩格斯並不喜歡一八四〇年代以後的當代前衛派。而由於創建者缺乏完整的美學學說，他們覺得有義務去開展它。關於當代藝術，社會民主主義（他們對於創建者沒有任何懷疑）可以接受的最明顯

判準是：藝術必須忠實而批判性地表現資本主義社會的現實情況，最好是強調工人階級，理想上是有助於他們的鬥爭。如此的判準並不蘊含著對於前衛派的偏好。傳統的作家和畫家同樣可以延伸他們的主題或社會同情，而的確有些溫和的進步主義者而非前衛派的畫家（利伯曼、萊伯），他們轉而描繪工廠場景、工人、農民，甚或工人鬥爭的場景。不過我們不必特別討論這點。

在一八八〇年到九〇年間，馬克思主義和前衛派之間的關係並沒有這種社會主義美學的問題，那個年代的主流，尤其是散文文學裡，是有著強烈社會和政治關懷的寫實主義作家，或者是可以如此詮釋的作品。有些人漸漸受到勞工階級興起的影響，而對工人特別有興趣。職是之故，馬克思主義者自然是很歡迎俄羅斯的偉大作家（西方世界大抵上將他們定位為「進步主義者」）、易卜生的戲劇以及其他北歐文學（哈姆生以及讓現代人跌破眼鏡的史特林堡），尤其是「自然主義」作家，他們公然著眼於資本主義現實世界的各個層面，而那是傳統作家不願意碰觸的（法國的左拉、莫泊桑，德國的豪普特曼、蘇德曼，義大利的維爾加）。許多自然主義作家都是政治和社會運動者，甚或像豪普特曼一樣受社會民主主義影響[57]，使得自然主義更加受歡迎。當然，思想家會謹慎區別社會主義意識以及單純的扒糞。梅林研究在一八九二年到九三年間的自然主義，認為那是「藝術開始仔細感受資本主義」的徵兆，而把它和印象派作類比（現在看起來沒有當時那麼語出驚人）：「我們的確可以如此解釋印象派……和自然主義……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齷齪穢行裡給人們的難以言喻的快感；他們在這樣的垃圾裡生活和工作，基於莫名的本能，當著折磨他們的人們的面，拋出最讓他們難堪的抗議。」[58]但是他說，這最多只是走向「真

正」藝術的第一步。然而，《新時代》畢竟為「現代主義者」開闢了專欄[59]，評論或刊載豪普特曼、莫泊桑、柯羅連科、杜思妥也夫斯基、史特林堡、哈姆生、左拉、易卜生、比昂松、托爾斯泰和高爾基的作品。而梅林自己也不否認德國自然主義受社會民主主義的影響，即使他認為「資產階級的自然主義者有社會主義的心態，正如封建制度的社會學家有資產階級的心態一樣，如此而已」。[60]

馬克思主義和藝術的第二個重要的交會點是在視覺上。一方面，許多有社會意識的視覺藝術家以工人階級為探索主題，並因而投入社會運動。在前衛派的文化，低地國家的角色非常重要，它們處於法國、英國和德國若干程度的影響交集，有一群特別受到剝削和虐待的勞動人口（比利時）。再者，如前所述，在該時期裡，這些國家在國際文化的角色（特別是比利時）更勝於幾個世紀以前：如果沒有它們的貢獻，無論是象徵派、新藝術、其後的現代主義建築，或是印象派以後的前衛派繪畫，都無法被世人理解。尤其是一八八〇年代的比利時藝術家麥尼埃（1831-1905），他和比利時勞工黨走得很近，創造了後來社會主義「工人」的標準意象：肌肉結實的裸胸工人，憔悴而痛苦的無產階級的妻子和母親。（梵谷對於貧窮世界的探索是更晚近的事。）對於繪畫主題的延伸到資本主義的受害者的世界裡，諸如普列漢諾夫之流的馬克思主義批判者則是隻字不提，即使那已經不只是歷史文件或是社會悲憫的表現。然而對於熱中於該主題的藝術家而言，它在外部世界以及馬克思主義的論辯氛圍之間搭起了橋樑。

和社會主義更直接有力的聯結，則是經由應用藝術和裝飾藝術。該聯結既直接且有意識，特

別是英國的美術工藝運動（British Arts and Crafts movement），其中大師威廉・莫里斯（1834-1896）成為某種馬克思主義者，對於藝術的社會改革無論在理論或實踐上都有卓越的貢獻。這些藝術支系不以個別而孤立的藝術家為出發點，而是以工匠自居。他們抗議創意的工匠被化約為資本主義工業的「操作員」，他們的目標不是要創作個別的藝術作品讓人單獨地沉思，而是整個人類日常生活的架構，例如村莊城鎮、房屋和室內裝潢。剛好，基於經濟的理由，他們的產品的主要市場也在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以及專業人士的中產階級，其命運有點像當時以及後來的「人民戲劇」的擁護者。[61]的確，美術工藝運動及其開展，亦即「新藝術」，是十九世紀真正舒適愜意的資產階級生活風格的先驅，郊區或半鄉村的「農舍」或「別墅」，以及亟欲表現其文化身分的新興的或地方性的資產階級城鎮特別喜歡的風格，例如布魯塞爾和巴塞隆納、格拉斯哥、赫爾辛基和布拉格。然而，前衛派的藝術家或即工匠以及建築師，並不侷限於供應中產階級的需求。他們開創了現代建築和城市計畫的先河，其中的社會烏托邦元素相當明顯，而這些「現代主義運動的先驅」，例如勒沙比（1857-1931）、格迪斯以及花園城市的支持者，都來自英國進步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氛圍。在這大陸上，它的擁護者和社會民主主義同氣連枝。比利時偉大的新藝術建築師，維克多・奧塔（1861-1947），設計布魯塞爾民眾之家（Maison du Peuple, 1897），范・德費爾德，後來德國現代主義運動的主要人物，在他的「藝術部門」裡講授關於威廉・莫里斯的課程。荷蘭現代建築的社會主義先驅貝拉赫（1856-1934）也設計了「阿姆斯特丹鑽石工會大廈」（1899）。

重點是，新政治和新藝術於此匯流在一起。更重要的是，開創該革命的原創性藝術家（主要都在英國），他們的應用藝術不僅受到馬克思主義的直接影響，例如莫里斯，也為社會民主運動提供了流傳國際的形象語彙，例如克萊恩。不僅如此，莫里斯在藝術與社會的關係方面更開展出很有力的分析，他在其中當然探討到馬克思，雖然我們也察覺到前拉斐爾派（Pre-Raphaelites）和拉斯金對他早期的影響。說也奇怪，正統馬克思主義關於藝術的思考對這些發展卻完全無動於衷。莫里斯的作品至今都不在馬克思主義美學論辯裡出現，雖然它們在一九四五年後聲名大噪，而且得到許多馬克思主義者的熱烈支持。[62]

至於一八八〇年到九〇年間另一個主要前衛團體，我們概稱為象徵派，他們和馬克思主義的關係就沒有那麼明顯。然而大部分象徵派詩人倒是支持革命和社會主義。在一八八〇年代初期的法國，他們主要的興趣是無政府主義，像是該時期的新畫家（印象派的老畫家對政治都很冷淡，畢沙羅是個奇怪的例外）。那或許不是因為他們在原則上反對馬克思——「大部分年輕詩人」都信仰「反叛的學說，無論是巴枯寧或馬克思」[63]，他們或許會歡迎任何反叛的大纛——而是因為他們對於法國社會主義領袖們（在饒勒斯崛起以前）無甚興趣。法國工黨絮絮叨叨的平庸在他們眼裡更是味如嚼蠟，而無政府主義者不僅更雅好藝術，他們早期的戰友裡也包括重要的畫家和藝評家費內翁。[64]相反的，在比利時，象徵派對比利時工黨（Parti Ouvrier Belge）比較有興趣，不只是因為它裡頭有無政府主義的叛亂份子，更因為它的領袖和發言人來自有文化的中產階級，他們顯然都喜好藝術。德斯特里有許多關於社會主義和藝術的著作，並且出版了雷東（Odilon

Redon）的石版畫畫冊；凡德威爾德和詩人過從甚密；梅特林克直到一九一四年都和政黨有往來；維爾哈倫幾乎成了它的官方詩人；作家埃克豪特和畫家赫諾普夫在工人社會黨裡也很活躍。的確，在象徵派流行的國家裡，幾乎沒有任何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對它嚴辭批判（像普列漢諾夫一樣）。藝術的反叛和政治的反叛的關係因此可以說是一團和氣。

於是，直到十九世紀末，文化的前衛派和少數有識者所欣賞的藝術，以及漸漸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社會民主主義，兩者有許多共同的地方。在新政黨裡成為領袖的社會主義知識分子（大多出生於一八六〇年代），都不至於老到無法接受「前衛的」品味：即使是年紀最大的維克多·阿德勒（1852-1918）和考茨基（1854-1938），在一八八〇年代都未滿四十歲。阿德勒是格林斯泰德咖啡館（Café Griensteidl）的常客，那是維也納藝術家和知識分子聚會的場所，他不只受到古典文學和音樂的薰陶，也是個熱情的華格納崇拜者（就像普列漢諾夫以及蕭伯納一樣，他比現代人更強調華格納的革命的和「社會主義的」蘊含），也是他的朋友馬勒的樂迷，布魯克納早期的支持者，也和那個世代幾乎所有社會主義者一樣，欣賞易卜生和杜思妥也夫斯基，他更翻譯維爾哈倫的詩，深深為他傾倒。[65]反過來看，如其所見，大部分的自然主義者、象徵派以及當時其他「前衛派」，也都被工運和社會民主主義吸引（除了法國以外）。它們的吸引力並不一定長久：奧地利文學家赫曼·巴爾，他自詡為「現代派」（the moderns）的代言人，在一八八〇年代就和馬克思主義分道揚鑣，而自然主義巨擘豪普特曼則轉向象徵派，那也證實了馬克思主義評論家在理論上的疑慮。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的分裂也有其影響，因為顯然有些人（尤其是視

覺藝術家）特別喜歡後者的純粹反叛性格。不過，「現代派」倒是和工運走得很近，而馬克思主義者，至少是他們當中的知識分子，也和「現代派」相互唱和。

基於至今仍然不明的原因，那個關係斷裂了一段時間。其中可能有若干理由。首先，正如一八九〇年代的「馬克思主義危機」所顯示的，西歐再也不相信資本主義即將崩潰，社會主義運動來到革命勝利的邊緣。以前知識分子和藝術家被界線模糊的工運吸引，那是由於在它周圍產生的希望、信心甚至烏托邦的願景氛圍，現在他們面對的是對未來不確定的運動，而且內部派系越來越激烈的辯論也使得它分崩離析。我們在東歐也看到意識型態的分裂：支持一個駸駸然走向馬克思主義的運動，正如一八九〇年代初期，或是在民族主義和反民族主義分裂以前的波蘭社會主義，那是一回事，而在相互抗衡甚或敵對的革命團體和前革命團體之間作抉擇，則是另一回事。

然而在西歐，新興的運動漸漸體制化，涉足於日常政治，而很難吸引藝術家和作家，儘管他們幾乎都成了改革主義者，以某種歷史必然性去解釋未來的革命。再者，體制化的群眾政黨，經常發展出他們自己的文化世界，也不太可能喜歡工人階級無法理解或贊同的藝術。的確，德國工人圖書館的訂閱者，漸漸從政治類轉向小說，儘管詩集和古典文學仍然乏人問津；可是他們最喜歡的作家，以創作冒險故事為主的格斯泰克，在前衛派看來則是索然無味。[66]難怪在維也納的卡爾·克勞斯，原本基於他自己在文化和政治上的異議而對社會民主主義產生興趣，卻在一九〇〇年代拋棄他們。他指責他們沒有在工人當中培養出夠嚴肅的文化水準，而且不贊成政黨發起的普選權的主要訴求。[67]

社會黨的革命左派在西歐原本是少數，工基進的前衛文化偏好工團主義或無政府主義的革命傾向。而在一九〇〇年以後，無政府主義者漸漸找到他們的社會基礎，尤其是在拉丁語區國家以外，在一個由居無定所的人以及自學的工人構成的氛圍，漸漸形成「流氓無產階級」（Lumpenproletariat）——在西方世界各式各樣的「蒙馬特區」——並且沉澱成一種普遍的次文化，由那些拒絕（或無法被同化）「資產階級」生活風格以及制度化的群眾運動的人們組成。[68]他們基本上是個人主義的、自主性的反叛，並不反對社會革命。他們經常只是在等待一個能夠參與的叛變和革命，再次動員群眾反戰或支持俄國大革命。一九一九年的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或許是他們最重大的政治宣示。然而無論在現實或理論上，他們都和馬克思主義漸行漸遠。馬克思主義者或其他社會民主黨顯然有理由討厭的尼采，儘管他仇視「資產階級」，卻成為無政府主義反叛者以及非政治性的中產階級文化異議者的精神導師。

相反的，二十世紀前衛派的文化基進主義則和品味老舊的工人運動切割開來，因為他們（以及工運本身）始終執著於他們所理解的語言以及表現藝術作品內容的溝通符號。十九世紀最後二十五年裡的前衛派還沒有完全捨棄這些語言，雖然他們開始扭曲它們。只要略作調整，我們不難分辨華格納和印象派、甚或許多象徵派「要說什麼」。可是到了二十世紀初期（一九〇五年巴黎的「秋季藝術沙龍」〔Salon d'Automne〕可以說是視覺藝術的轉捩點），情況就大異其趣。

再者，社會主義領袖們，即使是一八七〇年以後出生的年輕世代，也不再「接觸」了。羅莎・盧森堡必須澄清外界指責她不喜歡「現代作家」的說法；但是儘管她以前相當醉心於一八九

○年代的前衛派，例如德國自然主義詩人，她也承認她並不懂霍夫曼斯塔，而且她從來沒聽過格奧爾格。[69]甚至是托洛斯基，他自詡對於新文化時尚如數家珍（他為《新時代》撰寫關於魏德金的長篇大論，也評論若干畫展），對於一九○五年到一四年間的年輕前衛派卻不是特別熟諳，當然，除了俄國文學以外。和羅莎・盧森堡一樣，他不同意它的極端主觀主義——它表現「心境」的能力（盧森堡語）——此外一無所有。（「光是心境並不能說是人類。」）[70]和她不同的是，他試圖以馬克思主義去詮釋主觀主義的叛逆潮流，以及「純粹美學的邏輯」，它「很自然地將對學院派的反叛轉變成自足的藝術形式對於內容的反叛，認為內容是不相關的事實。」[71]他將它歸因於現代大城市環境的生活，特別是住在這個現代的巴比倫裡的知識分子對於該經驗的表現。盧森堡和托洛斯基無疑地都附和俄國美學理論裡特別強烈的社會關懷，可是究其極，他們其實是反映了東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們一個非常普遍的態度。對於藝術有興趣而亟欲跟上最新潮流的人們，或許就個人而言會培養對於藝術創新的品味，但是這樣的興趣如何和他們的社會主義活動以及信念結合呢？

那不只是年紀的問題，雖然第二國際的重要人物在一九一○年代沒有幾個低於三十歲的，大部分已經是中年人了。可想而知，馬克思主義者不能認同的，是墮落（而不是前進）到形式的藝術趣味，是一種實驗，放棄藝術的內容，包括他們公開認可的社會政治內容。他們無法接受的，是前衛派的選擇純粹的主觀主義、幾乎可以說是獨我論（solipsism），例如普列漢諾夫在立體派裡察覺到的。[72]遺憾的是（雖然情有可原），「在同情無產階級的資產階級思想家當中，沒有幾

個藝術家」；在一九一四年以前的幾年裡，投入工運的人比一九〇〇年代甚至更少。法國畫家的前衛主義是「抽離了所有知識和社會的感動，侷限於技巧的論辯」。[73]不僅如此，在一九一二年到一三年，普列漢諾夫甚至可以舉證說，「現在大多數藝術家都抱持資產階級的立場，對於我們時代重要的自由觀念冥頑不化。」[74]在眾多自稱「反資產階級」的藝術家當中，幾乎找不到幾個積極參與有組織的社會主義運動的人，即使是在無政府主義者裡頭，也不像在一八九〇年代那樣有許多熱情的畫家投入，倒是有許多人抱怨工人階級的平庸乏味，以及直言不諱的菁英主義者，就像是德國格奧爾克的擁護者，或是俄國的阿克梅派詩人（acmeist），以及攀權附貴（最好是女性）的人們，甚至是潛在或現實的反動主義者（尤其是在文學裡）。其次，我們也不能忘記，新的實驗前衛派不只要反叛學院派，也要推翻一八八〇年和九〇年的前衛派，他們以前跟工人以及社會主義運動走得比較近。

簡言之，在馬克思主義者眼裡，這些新興的前衛派無非資產階級文化危機的另一個病徵，而馬克思主義裡的前衛派也只是證明了過去無法理解未來而已。當然在新畫家依附的數十個贊助者（收藏家或畫商）裡，總有幾個是馬克思主義的同路人，例如莫羅索夫和希楚金。那個時代的叛逆藝術的業餘愛好者，在政治上不太可能是保守主義者。附庸風雅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例如盧那察爾斯基和波格丹諾夫，甚或會合理化他們對於改革者的同情，但是也很可能會引起反感。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的文化世界裡顯然沒有前衛主義的空間，馬克思主義正統的美學理論家（其實就是中歐和東歐）對它則口誅筆伐。

但是，如果說某些新興的前衛派對於社會主義或其他政黨始終漠不關心（有些人甚至成為反動主義者或法西斯主義者），那麼大部分藝術裡的反叛者只是在等待歷史的轉轍點，讓藝術和政治的反叛再度合併在一起。一九一四年以後，他們在反戰運動以及俄國大革命裡找到它。一九一七年以後，馬克思主義（列寧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和前衛派再度整合，主要發軔於俄國和德國。納粹黨所謂的「文化布爾什維克主義」（Kulturbolshewismus）（不無道理）不在本章討論範圍裡：第二國際時期的馬克思主義歷史。然而一九一七年以後的各種發展必須一提，因為它們導致馬克思主義美學理論在「寫實主義」和「前衛派」之間的分歧，盧卡奇和布萊希特、托爾斯態的信徒和喬伊斯的崇拜者之間的衝突。如前所見，這個分裂根植於一九一四年前的時期。

如果我們整個回顧第二國際的時期，我們一定會認為馬克思主義和藝術的關係有些齟齬，特別是在一九〇〇年以前，顯得僵持不下。馬克思主義者對於一八八年到九〇年間的「現代主義」運動很不以為然，只有馬克思主義邊緣的知識分子（例如在比利時）或是非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者和社會主義者才熱情擁護它們。在文化的足球賽裡，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藝評家們以講評員或裁判自居，而不是球員。儘管如此，他們對其藝術發展的歷史分析認為那只是腐敗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病徵（一個讓人印象深刻的分析）。然而我們不得不很訝異他們的評論如此膚淺。每個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都會認為自己是哲學和科學活動的參與者，無論多麼業餘；可是幾乎沒有人覺得自己是藝術創作的參與者。他們分析藝術和社會的關係，並且臧否學校、藝術家和作品的良窳。他們最多只是接受少數藝術家加入他們的運動，容許他們有個人和意識型態的狂想空間，正如資產

階級社會也會做的。因此，馬克思主義對藝術的影響可以說無關緊要。和當時的社會主義運動相互輝映的自然主義和象徵主義，就算馬克思主義者對它們完全沒有興趣，也會走出自己的路。其實，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在資本主義底下，藝術家的角色只是個傳聲筒，一個社會學上的病徵，或者是個「典型」。我們會說，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其實沒有什麼真正的藝術理論，而且不同於「民族問題」，他們也沒有政治上的急迫性去發現他們在理論上的捉襟見肘。

但是在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內部，關於藝術在社會的角色，倒是有個真正的理論，雖然馬克思的整個官方學說並沒有注意到它：主要是由威廉．莫里斯開展出來的。如果說馬克思主義者對藝術有什麼重大而深遠的影響，那麼應該是這個思潮，它捨棄資產階級時期（個別的「藝術家」）的藝術結構問題，探討在所有勞動裡的藝術元素，以及大眾生活的（傳統）藝術，捨棄藝術（個別的「藝術作品」）裡的商品生產的同義語概念，轉而探討日常生活的環境。那是馬克思主義美學唯一的支系，也就是對於建築的研究，並且認為建築是藝術的關鍵和巔峰。[75]雖然說馬克思主義的藝術批評是對於自然主義或「寫實主義」而言太過狂妄尊大，但是它對美術工藝運動卻非常關鍵，該運動對於現代建築和設計的衝擊至今仍然非常重要。

可是人們經常忽略它，因為英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之一[76]，威廉．莫里斯，只被視為著名藝術家，在政治上沒什麼份量，此外無疑地也是因為他將英國關於藝術與社會的理論傳統（新浪漫主義的中世紀精神、拉斯金）和馬克思主義融合在一起，可是該傳統和馬克思主義思想主流無甚接觸。它其實是源自藝術內部，是馬克思主義（至少莫里斯說它是），而且改變且影響了歐

洲大部分的藝術工作者、設計家、建築師和城市計劃者，甚至是博物館和藝術學校的規劃者。馬克思主義對於英國藝術的重大影響並非偶然，雖然它在該國的地位不值一哂。因為當時英國是歐洲唯一被資本主義完全改變的國家，為了工業生產而改變藝術的生產。難怪只有馬克思眼裡資本主義發展的「典型」國家會對於資本主義對藝術的影響提出重要的批判。也難怪在這個重要的藝術運動裡，馬克思主義元素會被人遺忘。莫里斯是個夠務實的人，他知道只要有資本主義，藝術就無法成為社會主義。[77]當資本主義從危機裡破繭而出，它就開始吸收且利用革命者的藝術。富裕而有教養的中產階級，工業的設計者，接管了它。荷蘭社會主義建築師貝拉赫，他最偉大的作品不是鑽石工會大廈，而是阿姆斯特丹證券交易所。最忠於莫里斯的城市設計者給他們的人民的城市，是後來住滿了中產階級的「花園郊區」（garden suburbs），以及遠離工業區的「花園城市」。藝術就是如此反映著第二國際的社會主義的希望和失望。

注釋：

1 與這個意思有關的引文，見：E.J. Hobsbawm, *Labouring Men*, (London, 1964), pp. 241-2；權威性的德國解讀見：R. Stammler in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2nd edn, 1900), article '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另見：Hobsbawm, op. cit., pp. 242-3。

2 關於相關文獻的概覽，見：K. Diehl's bibliography in *Hwb. d. Staatswissenschaften* (2nd edn, 1900), article 'Marx'。

4 馬薩里克在一八九八年原本的題目是「馬克思主義『裡頭』的危機」；但是在修正主義者的論辯裡，很快就變成「馬克思主義的危機」，正如拉布里奧拉所說的。另見：E. Santarelli, 'La revisione del marxismo in Italia nel tempodella Seconda Internazionale' (*Riv. Stor. del Socialismo* 4, 1958, p. 383n)。

5 美國工會在一九〇九年沒有資料，因此於此省略。資料來源：W. Woytinsky, *Die Welt in Zahlen* II (Berlin, 1926), p. 102。

6 E.J. Hobsbawm, 'La diffusione del marxismo' (*Studi Storici* xv, 1972, pp. 263-4).

7 費邊社的主要精神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分道揚鑣，它在一八八〇年代後期原本對於英國極左派的小團體有些影響。但是闡揚群眾觀點的《費邊社文集》（1889）在某些部分仍舊顯然有馬克思主義的影響，特別是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e）的章節。

8 G.D.R. Cole, *The World of Labour* (London, 1913), p. 167.

9 A. Gramsci, 'La Rivoluzione contro il *Capitale*' in *Scritti Giovanili* (Turin, 1958), p. 150.

10 R. Pipes, 'La teoria dello sviluppo capitalistico in P.B. Struvé' in Istituto G. Feltrinelli, *Storia del marxismo contemporaneo* (Milan, 1973), p. 485.

11 雖然規模比較小，少數東歐知識分子移民（主要是政治的），無論男女，都有助於馬克思主義在不受歡迎的國家的傳布，例如：法國的（Charles Rappoport）、英國的（Theodore Rothstein）。另見：G. Haupt, 'Le rôle de l'exil dans la diffusion de l'image de l'intelligentsia révolutionnaire' (*Cahiers du Monde Russe et Soviétique* xix/3, 1978, pp. 235-50)。

12 Richard T. Ely in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1968).

13 另見：E.J. Hobsbawm in *Studi Storici*, 1974, pp. 251-2。比利時的「工人騎士團」、英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丹尼爾．德萊昂（Daniel De Leon），以及後來（工團主義的）全球各地的「世界產業工人聯盟」（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它們的角色都很類似。

14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八八〇年到九〇年間對於馬克思最有興趣的英國經濟學家們，是在著名的「方法論戰」（Methodenstreit）裡失敗的少數者，他們大多被逐出經濟學的學術領域，而轉為經史家、社會改革者或政府公僕。

劍橋大學則是勝利的陣營。

15 見：Christophe Charle, *Les intellectuels en Europe au XIX siècle, essai d'histoire comparé* (Paris, 1996), part 2, pp. 143-311；但是關於沒有社會批判力的知識分子，見：Wolfgang J. Mommsen, *Bürgerliche Kultur und politische Ordnung: Künstler, Schriftsteller und Intellektuelle in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1830-1933* (Frankfurt, 2000), esp. pp. 178-215, and Christophe Prochasson and Anne Rasmussen, *Au nom de la patrie: les intellectuels et 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1910-1919) (Paris, 1996)。

16 見：Michels, *Soziologie des Parteiwesens*。他提到西歐醫生們對於社會主義的厭惡（法國和義大利除外）(Stuttgart, 1970, pp. 249-50)。

17 Hobsbawm, *Labouring Men*, chapter 14.

18 Michels, op. cit., pp. 99-100.

19 許多高等師範學院的學生在該時期成了社會主義者，其中唯一的法國工人黨成員是布拉克德魯梭（Bracke-Desrousseaux），著名的古典文學學者，馬克思的譯者。另見：H. Bourgin, *De Jaurès a Léon Blum* (Paris, 1938)。

20 見：Alexandre Zévaès, *De l'Introduction du Marxisme en France* (Paris, 1947)。他說，《資本論》在一八七二年到七五年翻譯期間，「幾乎無人聞問」。除了法國工人黨的期刊以及一本論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報導的書以外（1882, 1886），《共產黨宣言》只在一八九五年出版過（一八九七年再版），後來於一九〇一年才有大學教授安德勒（Charles Andler）的完整學院版。《法蘭西內戰》初版是在一九〇〇年，《霧月十八日》在一八九一年，《法國的階級鬥爭》在一九〇〇年。許多譯本是在一八九〇年後期出版的：《哲學的貧困》（1896）、《政治經濟學批判》（1899）、《價值，價格和利潤》（1899），《日耳曼革命與反革命》（1901）。重要的是，《資本論》第二、三卷不是在法國翻譯的，而是在比利時（Zévaès, op. cit., chapter X）。一九〇二年到一四年間則沒有多少作品出版。

21 Michels, op. cit., p. 255.

22 Hobsbawm, *Studi Storici*, p. 245.

23 R. Michels, 'Die deutsche Sozialdemokratie. Parteimitgliedschaft und soziale Zusammensetzung', *Archiv f. Sozialwissenschaft u. Sozialpolitik* 23 (1906), pp. 471-559.

24 在該時期，馬克思幾乎沒有和任何比利時社會主義者通信；寫給凡德維爾德的信也很客套(1894)。

25 G.D.H. Cole, *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II, p. 650.

26 見：Marcel van der Linden, (ed.), *Die Rezeption der Marxschen Theorie in den Nederlanden* (Trier, 1992), esp. pp. 16ff. and the chapters by H.M. Bock and H. Buiting。

27 西歐的社會主義者，包括馬克思主義者，並不重視民族問題，雖然它顯然存在。因此，比利時工黨沒有注意到弗蘭德斯問題，無疑是因為根特（Ghent）是它最堅固的堡壘。見：Vandervelde and Destrée, *Le Socialisme en Belgique* (Paris, 1903)；其中四十八頁的參考書目裡，沒有任何關於該主題的著作。民族主義和區域主義的運動只被視為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運動，在政治上無關緊要。

28 在匈牙利（1910），百分之二十的猶太男性受過四年教育，其他宗教的比例則有三倍；百分之十完成八年中學教育，其他宗教則為兩倍比例。(V. Karady and I. Kemény, 'Les juifs dans la structure des classes en Hongrie',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22, 1978, p. 35)。

29 在維也納，煽動性的基社黨在一八八〇年代掌握市政，是激烈的反閃族主義，雖然其領袖相當謹慎地選擇他的目標：「我來決定誰是猶太人。」

30 Robert Hunter, *Socialists at Work* (NY, 1908).

31 Michels, *Soziologie*, p. 259.

32 Max Adler, *Der Sozialismus und die Intellektuellen.*

33 A.V. Pešehonov, 'Materialy dlya istorii russkoy intelligentsii', cited in M. Aucouturier, 'L'intelligentsia vue par les publicistes marxistes' (*Cahiers du Monde Russe et Soviétique* XIX, 3, 1978, pp. 251-2).

34 *Intelligentsia i sotsializm* (1912), cited in Aucouturier, op. cit., p. 256.

35 Aucouturier, op. cit., p. 253ff.

36 雖然最有創意的理論家和社會主義領袖蓋瑞亞（Dobrogeanu-Gherea, 1855-1920）是俄羅斯民粹派馬克思主義流亡份子。

37 見：'Socialism and Darwinism' reprinted in *Neue Zeit* 16/1, 1897-8, p. 709n。另見：K. Pearson, in the *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 X (NY, 1974), p. 448。

38 另見：*Neue Zeit* 9/1, 1891, p. 171ff, 'Ein Schüler Darwins als Verteidiger des Sozialismus'。

39 馮貝婁（G. von Below）說：「除了極少數的例外，歷史學家莫不拒斥黑格爾的演變架構，以及其他嚴厲的獨斷系統……同樣的，他們也不同情唯物論的演變架構。」（'Die neuere historische Methode', *Hist. Ztschr.* 81/1898, p. 241）

40 它們也有助於說服費邊社的領袖們相信經濟正統學說，此即為經濟學裡的倫敦學派（一八八〇年代的費邊社機構），成為正統經濟學的大本營，甚至反對非馬克思主義的異端學說。

41 自從一八七〇年，雙方就爭論不休。說也奇怪，謝弗勒的《社會主義的本質》（初版於一八七四年）一般都被認為是關於社會主義的公平說法，除了德國以外，被人當作社會主義的導論。

42 另見：E. Gothein in *Hwb. d. Staatswissenschaften*, 2nd edn, art. 'Gesellschaft und Gesellschaftswissenschaft', p. 207; H. Becker and H.E. Barnes, *Social Thought from Lore to Science* (3rd edn, 1961) III, 1009：「許多義大利學者似乎把社會學和歷史唯物論的學說劃上等號。」

43 E. Gothein in *Hwb. d. Staatswissenschaften*, 2nd edn, art. 'Gesellschaft und Gesellschaftswissenschaft'.

44 'Socialism in the light of social science', i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xvii, May 1912, pp. 809-10.

45 Becker and Barnes, op. cit., p. 889; see also F. Tönnies, *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 (6-7th edns, 1926), pp. 55, 80-1, 163, 249.

46 'Über individuelle und kollektiv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 (*Hist. Ztschr.* 78/1897, p. 60).

47 *Hist. Ztschr.* 64/1890, p. 258.

48 另見：Breysig in *Hist. Ztschr.* 78/1897, p. 522, and G. von Below in *Hist. Ztschr.* 65/1891, p. 294。

49 見：*Hist. Ztschr.* 81/1898, 'Die neue historische Methode', pp. 265-6：蘭普雷希特「鄭重地駁斥唯物論的指控。他的確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是沒有人說他是。不過，他的歷史觀是唯物論的。的確，他沒有以經濟動機去解釋一切。但就算是馬克思主義者，也不會認為經濟動機是萬事萬物的原因；他們經常認為直接的動機是政治的或宗教的。」

50 G. von Below, op. cit., p. 262. For Marxian influences on Lamprecht。另見：L. Leclère, 'La théorie historique de M. Karl Lamprecht', *Revue de l'Université de Bruxelles* IV (1899), pp. 575-99。

51 另見：Kautsky, in *Hist. Ztschr.* 79/1897, p. 305。然而嚴格的馬克思主義者的作品也不能輕易忽視。法學家耶林尼克（G. Jellinek）特別讚許伯恩斯坦關於平等派（Levellers）和掘土派（Diggers）的先驅性探討（*Hist. Ztschr.* 81/1898, p. 117f），而非常討厭現代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羅伯·波爾曼（Robert Pöhlmann）也不得不對齊柯提（E. Ciccotti）的《奴隸制度的沒落》（Il *Tramonto della Schiavitù,* 1899）推崇有加，甚至承認馬克思主義對他有所助益。再者，他也承認說，這類型的作品在古代史的研究上相當先進（*Hist. Ztschr.* 82/1899, p. 110）。波爾曼曾經詳論古代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他在一八九三年時似乎還不知道馬克思，但是到了一八九七年，對他已經如數家珍了。

52 Bryce Lyon, *Henri Pirenne* (Ghent, 1974), p. 128ff.

53 'Une polémique historique en Allemagne' (*Revue Historique* LXIV/2, 1897, pp. 50-7).

54 R.H. Tawney, (ed.), *Studies in Economic History*, ed. (London, 1927), pp.xxiii, lxvi.

55 E.J. Hobsbawm, 'Karl Marx's Contribution to Historiography' (*Diogenes* 64, 1968).

56 E. Klebs, *Hist. Ztschr.* 82/1899, pp. 106-9; A. Vierkandt, *Hist. Ztschr.*84/1900, pp. 467-8.

57 豪普特曼的《織工》（Die Weber）和《弗洛里安·蓋爾》（Florian Geyer）公認是忠誠的社會主義戲劇。

58 F. Mehring, *Gesammelte Schriften und Aufsätze*, ed. E. Fuchs, *Literaturgeschichte* II (Berlin, 1930), p. 107.

59 另見：'Was wollen die Modernen, von einem Modernen', 1893-4, pp. 132ff, 168ff。

60 Mehring, op. cit., (1898-9), p. 298.

61 基於相同的理由，「人民戲劇」從未發展出來，雖然革命派的歌劇作曲家卡本提爾（Gustav Carpentier）試著以工人階級作為女主角（Louise, 1900），而現實主義（*verismo*）的元素也加入該時期的歌劇裡（Cavalleria Rusticana）。

62 E.P. Thompson, *William Morris, Romantic to Revolutionary* (London, 1955, 1977); Paul Meier, *La pensée utopique de William Morris* (Paris, 1972).

63 Stuart Merrill, cited in E.W. Herbert, *The Artist and Social Reform: France and Belgium 1885-98* (New Haven, 1961) p. 100n.

64 一八九四年無政府主義雜誌《反叛》（*La Révolt*）的訂閱者包括，都德（Daudet）、法郎士（Anatole France）、于斯曼、德列爾（Leconte de Lisle）、馬拉美（Mallarmé）、洛提和安東安（Aontoine）呂尼埃波埃（Lugné-Poe）的戲劇前衛派。這些團體似乎對任何社會主義評論都不感興趣。但是即使如詩人卡恩（Gustav Kahn）之流的早期無政府主義者，對馬克思仍然非常尊敬，而且支持所有左派的統一（Herbert, op. cit., pp. 21, 110-11）。

65 Max Ermers, *Victor Adler* (Vienna, 1932), pp. 236-7.

66 H.-J. Steinberg, *Sozialismus und deutsche Sozialdemokratie* (Hanover, 1967), pp. 132-5.

67 Caroline Kohn, *Karl Kraus* (Stuttgart, 1966), pp. 65, 66.

68 Cf. G. Botz, G. Brandstetter, M. Pollak, *Im Schatten der Arbeiterbewegung* (Vienna, 1977), pp. 83-5（論奧地利和德國的無政府主義）。

69 Rosa Luxemburg, *J'étais, je suis, je serai. Correspondance 1914-1919* (Paris, 1977), pp. 306-7.

70 同前揭。

71 L. Trotskij, ed. V. Strada, *Letteratura e Rivoluzione* (Turin, 1973), p. 467.

72 G. Plekhanov, *Kunst und Literatur* (Berlin, 1954), pp. 284-5.

73 J.C. Holl, *La jeune peinture contemporaine* (Paris, 1912), pp. 14-15.

74 Plekhanov, op. cit., pp. 292, 295.

75 William Morris, *On Art and Socialism*, ed. Holbrook Jackson (1946), p. 76.

76 他第一次出現在社會主義聚會（討論人民大樓的建造）是在一八八三年。

77 「考量到現代世界和藝術的關係，我們的長久任務不是生產特別的藝術，而是清理戰場，好給藝術一個機會。」（'The Socialist Ideal' in Morris, op. cit., p. 323）

第十一章 反法西斯主義的年代，一九二九年到一九四五年

一

一九三〇年代，在西歐以及英語系世界裡，馬克思主義成為非同小可的力量。在東歐以及部分的中歐，它早已是這樣的力量，而俄國大革命很自然地吸引了許多西方的知識分子以及其他反叛者和革命家。然而，出人意料的，在一九一七到二〇年間的革命浪潮退去以後，成為壓倒性主流的馬克思主義的類型，也就是第二國際的類型，它對於西方知識分子並沒有多少吸引力，尤其是出身資產階級的。他們對某些馬克思主義的異議團體反而比較感興趣，尤其是托洛斯基主義，但是相較於主要的共產黨，如此的團體太少了，因而可以略去不計。西方國家大部分的共產黨都是以無產階級為主幹，「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在他們當中的處境經常是很不尋常而尷尬的。[12] 其次，尤其是在「布爾什維克化」的時期之後，工人在政黨裡的領袖角色越來越吃重。不同於第二國際的其他政黨，共產黨的主要領袖很少是知識分子（除了若干低度開發國家或殖民國家），這些政黨也不會以擁立知識分子為榮，雖然他們很歡迎知識分子以其他身分和他們聯合陣線。因

此，一九三〇年代知識分子湧入共產黨，是個史無前例的現象：在一九三八年，英國共產黨大會的黨代表裡有百分之十五是學生或專業人士。[3]

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滲透到西方國家裡，不僅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是在地性的。政治難民對於社會主義的散布的重要性，尤其是對於馬克思主義，在第二國際時期已經相當引人矚目[4]，惜哉一九三〇年也是個大量政治移民的時期。再者，政治移民對於收容國的知識氛圍的衝擊也無遠弗屆，例如英國和美國，至於法國則沒有那麼明顯。但是對於西方國家本土世代的馬克思主義，則沒有什麼重大的衝擊。

那或許是因為讓他們驚豔的版本，都和共產黨以及蘇聯有關，早已經由「經典」（加上列寧、史達林和普列漢諾夫）的翻譯廣為流傳。馬克思主義的國際標準版於焉誕生，由一九三八年的《蘇聯共產黨簡史》裡的「辯證和歷史唯物論」可以看到系統性的例證。正統共產主義的難民不會帶在身上或到處宣揚，他們所記得的東西，就成了這個標準版的異本。大家都知道馬克思主義異端或馬克思主義的同路人的異說，因而會和他們保持距離，即使忠誠的共產黨員並不排斥和他們接觸，例如托洛斯基的信徒。

此外還有兩個因素，削減了馬克思主義流亡者的影響。第一個因素是語言。早期馬克思主義的論述有兩個主要語言，德語和俄語，在西方國家並不普及，甚至非常陌生。[5]除了美國以外，沒有太多俄國裔或德國裔的群眾能夠讀那些語言的作品，甚或對左翼文學有興趣。即使是正統馬克思主義願意接受的作家，如果沒有作品的翻譯，群眾仍然無法窺見堂奧。但是他們很少有譯

本問市。盧卡奇的研究作品的第一部全集，從一九五〇年起陸續出版英譯本，即使是像馬克思的《早期著作》（*Frühschriften*）這麼基本的作品，它在一九三二年出版，在法國只能經由兩、三個人閱讀德文版去發揮它的影響力，而且是很間接的。反過來說，經過翻譯的作品，其重要性會特別顯著，正如黑森（B. Hessen）探討牛頓的論文對於英國科學家的革命性影響一樣（見下文p. 294）。第二個因素則是本土的科學家越來越排斥移民潮。西方國家很不情願地收容希特勒的德國的政治難民或其他移民，除了美國的局部例外情況，他們既不受歡迎，也沒有融入社會。他們始終被排擠到社會邊緣，而且經常默默無聞。[6] 於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完全獨立於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傳統。關於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第一部、或許也是最好的英語著作，充分說明了第二國際時期的論辯和發展，最終在美國出版，那或許不是偶然的，在美國，移民者的馬克思主義（關於馬克思主義的認識）以及該時期當地的「新左派」的區隔沒有那麼明顯。[7]

因此，馬克思主義的滲入是個非常弔詭的現象。它是土生土長的，不是輸入的，因為它在每個國家裡的誕生都獨立於除了正式的共產主義以外的外在影響。同時，正因為如此，它讓人詫異地開展了一個整齊劃一的標準形式。可是這個齊一性並不能隱藏和本國知識分子隔離的明顯趨勢，和第二國際時期以及一九六〇年代以後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的國際性格形成強烈的對比。那部分是因為「共產國際」的集中化和重視紀律的結構，以及從它和蘇聯流出的作品越來越「官僚」的性格，但是在一九四五年以前，那是相當有選擇性的（見下文）。以各種語言發行的國際共產主義期刊，例如《國際新聞通訊》（*International Press Correspondence*）、《共產國際》

（*Communist International*），都和政治潮流息息相關，主要也都由政治領袖以及所謂運動的國際特約撰稿人執筆。而在一九三〇年代，任何語言的刊物都無法和《新時代》互相媲美。[8]理論、知識以及文化方面的馬克思主義或親馬克思主義的刊物，在一九三〇年末期，於各個西方國家陸續創辦，主要都是由沒有政治權威的知識分子執筆，除了他們當地的意見領袖以外，並沒有得到太多國際上的回響，雖然某些刊物有若干國際交流。於是，很弔詭地產生了地方性的異說和發展，由於關於主題並沒有國際「路線」，或者是沒有宣傳強制性的「路線」。於是，正如我們將看到的，許多獨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紛紛誕生，例如關於自然科學或英國文學，有些理論很不幸地在日丹諾夫（Zhdanov）時期被更無所不包的正統理論坐收漁利。然而，在沒有正式禁止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和文化地區裡，基本上都會根據當地的情況調整國際標準模式，那是一九三四年以後共產國際在國際路線方面的改變所帶動的發展。

只有在一個領域裡才稱得上有真正非集中化的左翼知識分子的國際主義。主要是在文學和藝術的領域。它們和左翼政治的關係，並不是經由理論的反省，而是他們的撰稿人以及支持者對於該時期的鬥爭者的情感認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藝術和左派重修舊好，但不是經由正統馬克思主義理論。光是在文化的領域裡，我們就看到對於正統學說的欺詐的反彈，甚至是在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當中。很少有共產主義者會公開挑戰「社會現實主義」，從一九三四年起，它在蘇聯就成了官方說法，雖然關於「現代主義」到底是什麼的論辯從未止息，而非正統派從來沒有屈服。布萊希特沒有向盧卡奇俯首稱臣。一九三〇年代從蘇聯流出的理論被人們大力吹捧，對於被

查禁的作品（尤其是在繪畫和雕塑）則噤若寒蟬，但是人們真正欣賞的，則是一九二〇年代留下來的蘇聯藝術和文學。很少人會公開反對關於「現代主義」藝術的國際明星的官方批判，但是更沒有幾個人（至少在私底下）會停止對於喬伊斯、馬諦斯（Mattisse）和畢卡索的讚嘆，儘管他們認真鼓吹的風格比較接近「社會現實主義」。[9]爵士樂在官方正統派眼裡如洪水猛獸，但是在英美世界裡，絕大多數的共產主義者和他們的支持者都是爵士樂的熱情崇拜者、擁護者和實際的支持者。

沒有和世界其他地方隔絕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們，無論他們出身哪個國家，都有個國際性的左翼文化。其中包括了認同共產主義或至少支持反法西斯主義的作家和藝術家，其中包括：馬爾羅、西洛內、布萊希特（在當時為人所知的他）、洛爾卡、帕索斯、艾森斯坦、畢卡索等人。[10]至於共產黨成員裡，則包括了官方多少承認為共產主義或「進步主義」的作家們：巴比塞、羅曼・羅蘭、尼克索等人。其中當然也會有來自上流文化的國際名人，除非他們被歸為反動派或法西斯主義：諸如喬伊斯和普魯斯特之類的作家，二十世紀初期的著名畫家（主要來自法國），「現代主義」的著名建築師，以及俄國製片家和卓別林。一九三〇年的創新性不在於由來自各國的名人構成的國際文化（其實主要是來自法國、美國、英國、俄國、德國和西班牙），而是在於它對於左派的政治認同。[11]那當然說不上是特有的馬克思主義文化，但是少數忠誠的馬克思主義者（更好說是共產主義者）在實踐上的角色也相當關鍵。[12]

二

一九三〇年代的知識分子越來越激進，那是源自對於早先資本主義造成的災難性危機的回應。它的直接源頭（至少對於年輕世代而言）則是一九二九年到三三年的經濟大蕭條。一九三一年英國的知識分子對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的興趣開始有增加的徵兆，在沉寂幾年之後，辯論辯證和唯物史觀重新成為少數學者和學生共產主義社團（劍橋大學）辯論的主題。讓那些少數潛在或現實的共產主義知識分子（以及範圍更大的各個社會階層）有興趣的，不只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全球性災難，它因為大規模失業以及小麥和咖啡的剩餘庫存（雖然人們極需它們）的崩壞，他們更關心為什麼蘇聯在表面上倖免於難。社會民主黨的漸進主義（gradualism）最資深的擁護者，費邊社的先驅，韋伯夫婦轟動一時的轉向「關於營利性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的馬克思理論」，由此可見一斑。[13]韋伯夫婦雖然對英國共產黨不屑一顧，他們在晚期卻對蘇聯讚美有加。

如果說，資本主義的瓦解和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工業化的對比，使得若干知識分子轉向馬克思主義，那麼希特勒的勝利（它顯然是該危機的政治結果），則讓更多人轉向反法西斯主義。隨著納粹政權的建立，基於三個理由，反法西斯主義成為最主要的政治議題。第一，法西斯主義本身，在當時仍然被視為義大利的一個運動，漸漸成為政治右派的主要國際媒介。在許多國家裡，法西斯主義政治運動，或是那些意欲攀附當時歐洲兩個法西斯主義國家的聲望和權力的人們越來越多。其他好戰的反動派運動和本土或國外的法西斯主義聯合陣線，或是尋求國外法西斯主義的

支持，或者將國際（尤其是德國）法西斯主義的崛起視為他們用以對抗國內左派的堡壘：正如所謂的「寧可要希特勒，也不要萊昂．布魯姆」。左派想當然耳地認為所有這些運動和法西斯主義是一丘之貉，並且強調它們其實和柏林以及羅馬沆瀣一氣。就像右派眼裡的共產主義，在左派眼裡的法西斯主義也不再只是外國人的問題，由於它的國際性格以及兩大強權的撐腰，因而成為山雨欲來的國內危機。想要理解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共和國的國際支持浪潮，就必須體會到，在歐洲鮮為人知的蕞爾小國裡的內戰，其實牽動著法國、英國、美國和義大利等國的未來。

其次，法西斯主義的威脅不只是在政治上。重要的是整個文明的未來——沒有人比知識分子更清楚這點。如果說法西斯主義踩熄馬克思主義，它也會踩熄伏爾泰和彌爾。就像它無情地丟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一樣，它也拒絕任何形式的自由主義。它排斥整個十八世紀啟蒙運動的傳統，以及在美國、法國大革命和俄國大革命崛起的所有政權。共產黨和自由派遭遇到相同的敵人和相同的滅亡威脅，不得不擠到同一個陣營裡。如果我們不清楚在對抗法西斯主義時，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是基於相同的理由，我們會很難理解為什麼左派很不願意批評那些年裡蘇聯的所作所為，甚或承認它，或者是蘇聯對於左派的批評充耳不聞。更不用說他們其實是相濡以沫，或者就像是一九三〇年代，無論史達林做了什麼駭人聽聞的事，那畢竟是俄國自己的問題，可是希特勒的所作所為卻威脅到世界每個角落。憲政和民主政府的廢除、集中營、焚書、政治異議份子和猶太人的大規模放逐或移民，包括德國學術界的菁英，使得這個威脅更是雪上加霜。再怎麼短視的人，現在也都明白義大利法西斯主義的歷史暗示了什麼事情。

法西斯主義在這個層面的威脅的重要性，從納粹德國無法從它的快速經濟成就獲取重大的政治利益就可見一斑。希特勒在一九三〇年代消除失業問題的宣傳效果，還不如墨索里尼在一九二〇年代的「讓火車準時到站」。納粹政權的評斷判準，顯然不在於它讓德國走出經濟蕭條的成就。

第三，也是最關鍵的，「法西斯主義意味著戰爭」。自從一九三三年以後，每年的情勢越發明顯，納粹在奧地利發動叛亂（1934），接著是衣索比亞戰爭（1935），希特勒收復萊茵蘭（Rhineland）以及西班牙內戰（1936）、日本侵略中國（1937），德國占領奧地利，在「慕尼黑協定」之後併吞捷克（1938）。一九一八年以後的世代活在陰影裡，擔心另一場世界大戰。一九三三年以後，沒有幾個人相信可以永久避免戰爭，可是法西斯主義者和法西斯政府並不把戰爭當一回事。在該時期，侵略者和防禦者的界線再清楚不過。但是那些不惜一戰的非法西斯主義國家，以及不想抵抗的國家（無論基於什麼理由）之間的界線就沒有那麼清楚。他們不只是區分為左派和右派：在傳統的保守派和愛國主義者裡也有反抗者，在非共產主義的左派裡也有綏靖主義者或和平主義者，特別是在法國和英國；而就算是反抗者也不想挑起戰爭，他們相信，只要聯合願意抵抗侵略且有威懾能力、必要時可以擊潰他們的國家和民族，建立強大而廣闊的陣線，就有機會避免災難（在慕尼黑協定以後就破滅了）。然而當侵略行為到處肆虐，反抗的必要性就越來越明確，他們的政治立場就轉向反法西斯主義陣營。最後戰爭和反抗就箭在弦上。如此一來，反法西斯主義漸漸和共產主義匯流，他們不僅在理論上率先主張成立廣大的法西斯聯盟的抵制政策，在實踐方面，他們也在鬥爭中扮演要角。一九〇四年五月以後，歐洲大部分地區率皆淪陷，

法西斯主義的危害始終如此猖獗，即使是一九三九年共產國際政策荒謬的臨時翻轉，也無法阻擋該趨勢。[14]

然而，知識分子和其他人轉向反法西斯主義以及左派（經常是馬克思主義的左派）的歷程，既不是直線性的，也沒有乍看之下那麼理所當然。前面已經提到共產國際和蘇維埃的政策的反覆不定，不再贅述：「第三時期」整肅派系策略的延遲，以及一九三九年到四一年的政策大轉彎。然而，我們還是得簡單討論一下其他使情況更複雜的因素。

就全球而言，最重要的是依附和殖民的國家。在這些國家裡，反法西斯主義不是最優先的問題，無論是因為歐洲法西斯主義的現象太遙遠，對他們的國內處境沒有太大的影響，例如大部分的拉丁美洲國家，或是因為法西斯主義並不是他們的主要敵人或威脅。在拉丁美洲，傳統右派（依附教廷的地方）甚至有可能同情歐洲的右派，他們傾向於和法西斯主義結盟，尤其是在西班牙內戰期間。有些循法西斯模式的極右派運動也風起雲湧，例如墨西哥的工團主義者，以及薩爾加多在巴西的整合主義（Integralistas）。就此而論，左派也會被等同於反法西斯主義，即使他們基於其他理由而不打算那麼做，例如支持馬克思主義的反帝國主義、歐洲強勢文化對於拉丁美洲知識分子的影響，以及他們的個人經驗。西班牙內戰於此顯然扮演關鍵的角色，尤其是在墨西哥、智利和古巴。另一方面，一九三〇年代的大多數拉丁美洲國家很願意採用法西斯主義的觀念和用語（它在歐洲是個頗負盛名的、成功的、流行的運動，也是拉丁美洲期待很久的意識型態樣式），但是它的意涵並不必然和它的發源地相同。在歐洲，對於被這些觀念吸引的政治人物或是

有政治企圖的年輕官員而言，如果他們要在國家發揮其影響力，絕對不可能藉由動員工人階級成為工會會員或是選票力量（例如阿根廷），或是加入工會發動社會革命（例如玻利維亞）。或許這對拉丁美洲的許多知識分子沒有什麼影響，但是我們也要注意不要膚淺地將歐洲的政治結盟類推到拉丁美洲。再說，拉丁美洲其實沒有涉入第二次世界大戰。

在亞洲（就其政治動員而言）、非洲（並沒有本土的法西斯主義）[15]，情況更為複雜，雖然日本（好戰的反共產主義強權）和德國以及義大利結盟，而英國、法國和荷蘭則是反帝國主義者的主要敵人。俗世的知識分子當然會反對歐洲的法西斯主義，因為它對其他膚色的民族有種族歧視。其次，這些國家的運動經常受到大都會的強烈影響，也就是西歐的自由主義和民主傳統，尤其是在印度國大黨。不過，反帝國主義者有理由採取愛爾蘭叛軍長久以來的觀點，也就是「英格蘭的困境就是愛爾蘭的機會」。的確，向殖民者的敵人尋求奧援，可以上溯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當時愛爾蘭和印度的革命份子（有些人後來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向德國求助以對抗英國。對於反法西斯主義者而言，對抗德國、義大利和日本優先於殖民地的解放，因而與反帝國主義者的本能和政治算計有所牴觸，除了衣索比亞和中國以外。隨著戰爭的爆發，問題不再只是學術性的，幾年後，地方性的政治生態益顯複雜（例如印度支那）。正統共產主義者[16]以全球反法西斯主義為優先，隨著戰爭一觸即發，他們在政治上也被孤立，例如一九四〇年的中東，一九四二年的南亞和東南亞。被等同於反法西斯主義理論或某種馬克思主義的左派知識分子，例如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以及整個印度國大黨，和英國帝國主義正面對立，甚至如孟加拉的鮑斯

（Subhas Bose），在日本的支持下，實際組織印度解放軍。在穆斯林的中東，大多數的反帝國主義者無疑都是親德的，無論意識型態為何。簡言之，在歐洲以外的地區，知識分子和反法西斯主義的關係並不適用歐洲模式。

歐洲的反法西斯主義有它自己的複雜心態。首先，一九三〇年代以後，情勢漸趨明顯，反法西斯聯盟不只必須接納政治中間派和左派，也包括任何個人、傾向、組織和國家，無論任何理由，只要他們願意反抗法西斯主義及其政權。群眾陣線必須變成「民族陣線」。共產主義者對於該情勢的合理認知，撼動了人們對於左派的傳統疑慮，包括它的知識分子，例如多列士向教廷伸出友好的手，當法國政黨以聖女貞德為訴求（她一直是極右派的象徵），英國政黨呼籲和邱吉爾結盟（他同樣是所有反動派以及反對工運者的象徵）。在解放或勝利以前，那或許沒有什麼為難的地方。由於納粹德國的威脅，和以前或未來的敵人結盟以對抗更大的危害便顯得很合理，尤其是那並不意味著意識型態的和解。極左派反對幫助衣索比亞對抗義大利，因為塞拉西是封建的君主（他們是對的），可是他們沒有得到太多的支持。另一方面，對於左派社會主義革命份子而言，為了全面性的反法西斯策略，是否必須犧牲（至少是暫時的）社會主義革命（那才是他們真正的目標），這個問題引起他們更深層的疑慮。基於推翻法西斯主義的必要手段，革命份子要做什麼樣的犧牲？會不會到頭來戰勝了法西斯主義，卻延遲了革命，甚至助長了非法西斯的資本主義？基於這些考量，革命份子的立場和殖民世界以及半殖民世界的反法西斯主義有若干共同點。

但是即使是知識分子，雖然他們的疑慮比其他好戰派更多，卻不會因此而有什麼困擾。就算是對於忠誠的革命黨而言，對抗法西斯主義也是攸關生死的問題。無論是共產主義者或是馬克思主義異議份子，都不認為反法西斯主義和革命有什麼不相容的地方。在共產國際的領域裡，有人竊竊私語說，全面性的反法西斯主義或許可以提供一個轉型到社會主義的策略。當然他們會特別公開強調反法西斯主義有限度的民主和防禦層面，才不會嚇跑非社會主義的反法西斯者，包括某些資產階級政府。我們底下會探討它所導致的歧義性。反過來說，極端份子則會很烏托邦地否認反法西斯主義和當前的無產階級革命有任何矛盾。即使是不認為全面性的反法西斯陣線會背叛革命的人們（例如托洛斯基，他被史達林的共產國際誤導，它是該陣線的主要支持者）也呼籲在任何適當的時刻（例如一九三六年的法國、一九四四年到四五年的法國和義大利）發動叛變，並且在一九三六年的西班牙鼓吹起義。我們會看到，當時這些烏托邦的主張並沒有太大的說服力。它們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倡議它的人們會被孤立或失勢，例如托洛斯基的信徒和其他馬克思主義異議團體。誓死抵抗法西斯主義的侵略的人們會傾向於立即對抗。如果現在輸了，明天的革命就沒有任何機會（即使是正在革命的西班牙）。

鬥爭的邏輯也突顯了左派反法西斯主義者的另一個複雜心態：和平主義。作為個殊的意識型態，它主要侷限於英美世界，它在工運裡非常盛行[17]，或者至少在一九三〇年代的自由派知識分子當中，或者是範圍更大的支持全面裁軍、國際交流和國聯的運動當中。它流傳甚廣，以深植人心的厭戰心態為形式，害怕如第一次世界大戰那樣的大規模浩劫，或者（如美國一樣）對歐洲

的戰爭置身事外。然而法西斯主義使得抱持這種心態的人們面臨無法解決的兩難困境，除非他們相信被動的不合作（一般是指甘地以及印度的非暴力抵抗）可以阻止希特勒。即使是知識分子，也很少人會真正相信它。因此，拒絕戰鬥差不多就是願意看著法西斯主義獲勝；而法國最熱中的和平主義者很自然地就成了賣國賊。[18] 替代方案就是放棄和平主義，並且主張說，為了抵抗法西斯主義，動用武力也是正當的。其實許多反法西斯的和平愛好者都作如是想，除了那些基於宗教而反戰的人們，例如貴格會（Quakers）。一九四〇年六月以後，許多號稱「拒服兵役者」（conscientious objectors）的英國年輕知識分子在戰爭爆發時紛紛披上戰袍。只有採取「孤立主義」的形式，拒絕任何戰爭（即使是對抗法西斯的戰爭）才有真正的政治力量，例如距離納粹德國非常遠的美國，他們不是很擔心希特勒的侵略。

簡言之，反法西斯主義壓倒歐洲左派的所有其他考量。正如無產階級的叛變直接表現在西班牙共和國和佛朗哥的武裝對抗，或者是武裝游擊隊和希特勒以及墨索里尼的戰鬥，反戰的奮鬥也很弔詭地變成為了反法西斯戰爭而動員知識分子。因為「劍橋科學家反戰團體」（Cambridge Scientists' Anti-War Group）而漸趨激進的科學家們，在一九三〇年代大聲疾呼地警告說沒有有效的方法防護空襲和毒氣，使得一九一八年以後的世代人心惶惶，現在卻成為主戰的科學家。基進的共產主義領袖，貝爾納、霍爾丹、布萊克特，其實都以他們開創性的研究如何保護民眾躲避空襲轟炸而介入戰爭。他們原本也是因此才和政府規劃者有所接觸。[19]

三

我們概括地談論了「知識分子」。而且動員所謂的「公共知識分子」對抗法西斯主義，的確相當震撼。在大多數非法西斯國家裡，若干藝文界（多半是文學家）的著名人物被吸引到右派，甚至成為法西斯主義，雖然在視覺藝術界很少見，而在科學界更是幾乎沒有。[20]然而他們畢竟形成非典型的少數團體。當時有些傳統主義的意識型態或許可以使他們傾向右派，例如最具影響力的英國文學批評家李維斯，他們周圍都是反法西主義者，甚至有些是馬克思主義的信徒，而他們甚至不敢對其主張表現出有條件的同情，直到他們脫離政治的競技場。[21]

在英國、法國和美國，被動員支持西班牙共和國或是更一般性的法西斯主義的人們，大都是有才幹和知識的菁英。宣布支持西班牙共和國的美國作品包括安德森、貝尼特、帕索斯、德萊賽、福克納、海明威、麥克列許、辛克萊、史坦貝克、懷爾德等人。西語系國家的詩人幾乎毫無例外地支持共和國。由於這些名人的宣傳價值非常顯著，而且在各種集會、公開演說和其他宣示的場合上被利用，因此知識分子在這方面的反法西斯主義記錄得特別詳盡。的確，對於該主題的解說幾乎都侷限於公眾的討論，基本上都在文學界和知識圈。[22]

才學不凡、懷瑾握瑜或者聲譽卓著的人們，他們的反法西斯主義在歷史上特別重要，而他們在該時期對馬克思主義產生興趣，也同樣重要，尤其是在一九三〇年到四〇年成年的世代。在某些沒有馬克思主義傳統的國家裡，例如英國和美國，該現象尤其引人矚目。（在美國，許多知識

分子特別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異議份子感興趣，主要是托洛斯基的信徒。）我們很難解釋為什麼在某個時期會召募到那麼多有識之士，然而該事實則是殆無疑義的。不過，反法西斯主義和知識分子的問題不僅止於此，在某些方面，由於反法西斯的知識分子的社會認同問題被混淆了，而使得分析更加困難。

就社會層面而言（並且暫時抽離民族的差異性），一九三〇年代的西方知識分子，大體上不是出身自資產階級（不一定包括「文化資產階級」，他們的社會地位是歸功於高等教育的傳統），就是從下層階級向上流動的階級。用最簡單的話說，就是那些理所當然地讓子女接受非技職性的高等教育的人們，以及一點都不理所當然的人們。由於五十或六十年來的舊有教育機構大抵上仍然侷限於既定的上層階級子女，這兩種類型的人就會有不同的教育模式和社會背景。而他們後來從事的行情則不會有那麼明顯的區別，雖然「傳統知識分子」比較古老而有聲望的職業，以及資產階級的「有機知識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的高等技術行業，都比較可能召募既有的資產階級，而資產階級的成員也比較可能支配這些行業裡的舊世代。另一方面，出身自比較貧窮的階級背景的知識分子，實際上也不再侷限於基層教職、官僚和牧職，雖然教職和公僕很可能仍然是他們最主要的出路。許多非手工藝的行業大幅擴張，使得第一代的知識分子有個棲身處，例如快速成長的大眾傳播領域，以及一般性的白領或基層的技術和設計工作。

這兩種人的區分有多麼明顯，則取決於國家的情況。國家的情況大抵上也會決定知識分子以及專業人士的政治認同感。法國的中學教師和大學教師主要是左派，而在德國則是明顯右傾。在

大部分的國家裡，從事嚴肅的學術工作以及從事藝術創作或娛樂業，兩者是涇渭分明的。他們的政治行為絕對不相同。最後，年紀、性別，以及民族或歷史淵源，都必須納入考量。在其他條件都相同的情況下，年輕人比他們的長輩更容易成為基進派，雖然他們不必然因此就主張左派的基進主義。女性知識分子幾乎被界定為左傾，不只是因為右派不約而同地仇視婦女解放，更因為願意讓女兒接受知識教育的家庭，多半是既有的資產階級的自由派或「進步主義者」。民族血統也可以決定知識分子是否比較強勢，尤其是某些族群的左派知識分子，例如猶太人（他們有好學的悠久傳統，也有被歧視的經驗）或是英國的威爾斯人（他們幾乎沒有本地的資產階級，其社會地位系統建立在知識和文化成就的高度價值，例如文學、教育、宣道）。反之，在其他族群裡，知識分子則可能比較弱勢，例如在美國的斯拉夫裔和義大利裔移民。大多數在中下階層，侷限於低階的手工業，或者如非裔美國人（不同於加勒比黑人）。

最後，特殊的民族或區域政治情境以及傳統，也具有決定性。在西歐和中歐的大學生一般都對反法西斯主義無動於衷，甚至比較可能右傾（例如德國、奧地利和法國）。而在巴爾幹國家（尤其是南斯拉夫），則是出了名的熱中於共產主義。英國和美國的學生或許對政府沒有太大的興趣，然而他們當中的右派組織並不是很突出，左派則顯然比從前壯大許多，在某些大學甚至佔優勢。印度學生主要都是反帝國主義者，但是孟加拉的民族主義學生會比較傾向於革命左派（在一九三〇年代則傾向於馬克思主義）。因此，關於知識分子和反法西斯主義，我們無法一概而論。出身自既有的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他們的政治態度始終引人矚目，正如在某些國家裡，知

識性行業理所當然地僅限於該階層的子女，而從基層爬到高層的知識性工作是很困難的事。當新世代的知識分子對於非法的義大利共產黨感興趣的時候，他們很自然地都是出身自該氛圍。阿門多拉、塞雷尼和羅西多利亞，在一九二〇年代後期經由那不勒斯大學加入義大利共產黨，他們或許都出身望族，但是顯然支持者也包括來自米蘭上層資產階級，以及其他地方的資產階級學生氛圍。[23]

同樣的，在英國，上層資產階級的年輕子弟，所謂「私立寄宿學校」（public school）的產物，始終是大眾目光的焦點，部分是因為他們在文化上的高度曝光率（例如左翼詩人團體，其中包括奧登、斯彭德、戴路易斯），部分則是因為一九三〇年代若干年輕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太投入了，甚至成為蘇聯祕密情報員（伯吉斯、麥克連、菲爾比、布蘭特）。我們不想於此討論為什麼在英國如此自信而堅定的統治階級的少數子弟會信奉共產主義。至今也沒有關於這個問題的系統性探究，除了在探討蘇聯情報員的脈絡下曾經順帶一提以外。[24]或許大部分年輕的叛國者都是「自由主義的先鋒」（forward from liberalism）（他們其中一個人的書名）。[25]在一九二〇年到三〇年的世代，有若干出身傳統自由主義或「進步主義」的上層中產階級家庭子弟成為共產主義者的例子，無論他們在該陣營的時間或長或短。[26]然而，就算是傳統保守主義以及帝國主義的家庭，也會有離經叛道的子女（例如菲爾比）。[27]即使是傳統的貴族階級，也有政治對立的跡象：雷德斯戴爾勳爵的兩個女兒以及一個兒子變成法西斯主義，一個女兒變成共產黨，她和邱吉爾的姪子結婚，她先生到西班牙參戰。

在美國，東歐百萬富翁家庭（例如拉蒙特家族、史崔特家族）的某些年輕菁英成員也對共產主義感興趣，雖然規模不很大。關於歐洲其他國家這個方面的社會史研究，可能有助於解釋其他地方的類似現象。在歐洲以外，西方教育大抵上僅限於少數菁英，一九三〇年代的共產主義，就像西方的自由主義以及地方文化現代化運動一樣，大體上僅限於殖民地政府官員和上流社會的領導階層。核心幹部也來自同樣的小圈子。一個印度家庭的四個孩子（都在英國讀書，其中一個在伊頓），有三個成為共產主義者，其中兩個後來當上政府官員和生意人，第四個孩子成為印度陸軍總司令。

不過，我們不能因為菁英投效共產主義，就忘記了許多反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學生（在英國和美國則是占大多數）並不是來自英國的「私立寄宿學校」或是美國的「預科學校」和「常春藤盟校」，也有許多知識分子根本沒有上大學。在一九三〇年的歷史裡，諸如倫敦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和紐約市立學院之類的馬克思主義機構，它們的角色並不亞於牛津和耶魯，甚至更重要。一九三〇年和四〇年出生的英國著名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大部分只有中學畢業，而且經常是出身非英國國教的自由黨或工黨的偏鄉家庭，雖然其中有些人和菁英一樣集中在牛津和劍橋的古老大學裡。在法國，拔擢賢才的窄梯讓共和國的基層公務員和教員的子弟發展更高層次的左翼知識活動，也讓專業人士的子女有機會接觸高等教育的傳統。[28]簡言之，在自由民主的國家裡，法西斯主義對於中下階層沒有太大的群眾魅力，反法西斯知識分子的募集就更加全面性。

在大多數沒有上大學的知識分子當中，該情況更加顯著。我們知道，英國左派讀書俱樂部（British Left Book Club）（全盛時期有五萬七千個會員，讀者人數有二十五萬）有百分之七十五的會員是白領階級、下層的行業，以及其他非學院派的知識分子。[29]他們和閱讀廉價而知識密度很高的平裝書的大眾很類似，一九三〇年代中期的英國，企鵝出版公司主要的知識系列就是由左派人士編輯的。在英國和美國，民歌和爵士樂的眾多熱情擁護者（裡頭有絕大多數的英國年輕共產主義者）也包括技術熟練的工人階級、基層技工和師傅、中產階級和學生。[30]方興未艾的新聞業、廣告和娛樂業，提供更多工作機會給知識分子，無論是不是大學生，如果他們沒有選擇傳統的公職或私人行業，尤其是英國和美國，他們比較容易踏入新領域。因此，在諸如好萊塢的電影工業中心（它也是主要的大眾媒體），以及與政治無關的或是沒有特別反動性格的新聞雜誌，就發展出反法西斯主義組織活動的新核心。[31]

因此，反法西斯主義並不侷限於知識菁英。在美國，它更包括圖書館員和社工，他們對共產主義特別感興趣。它包括被菁英瞧不起的那些人：「憤世嫉俗的雜誌撰稿人、罪有應得的電影編劇、未支薪的高中老師、沒有政治經驗的科學家。」[32]因此，它其實反映了知識圈的民主化。

四

既然反法西斯主義的運動比共產主義更無遠弗屆，共產黨也沒打算讓大批知識分子信奉馬克

思主義，雖然由於反法西斯政治動員的人數越來越多，共產黨很自然地找到他們潛在或現實的知識分子新黨員。他們主要的工作就是動員眾多知識分子，尤其是意見領袖，讓他們與反法西斯主義以及各種形式的和平訴求聯合陣線。有了以下形形色色的人物背書其訴求，他們也就幾乎沒辦法強調意識型態的判準：阿拉貢、貝納諾斯、尚松、科萊特、科埃諾、馬爾羅、馬里丹、蒙泰朗、羅曼，在希特勒占領布拉格以後，斯倫貝謝也加入該陣營。[33]

在某些國家裡，知識分子有左傾的悠久傳統，就算實際上加入共產黨，也不可能要他們大幅改變其意識型態，尤其是其顯赫名聲可以讓共產黨沾光的人物。在法國共產黨的情況尤其明顯，他們有強烈的革命傳統，而馬克思主義則很弱勢。「直到人民陣線、反抗運動、解放戰爭的年代」，法國傳統學院的左派知識分子，經常是社會主義者，「善、進步、正義、勞動、真理的信徒……才漸漸審慎地接納共產黨的歸順，那不是因為他們以前的理性主義、實證主義立場有所改變，而是正因為他們始終忠於自己。」[34]

即使到了一九四〇年後期，有些否認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教授們加入共產黨，是因為共產黨在反法西斯主義以及反抗運動的成績。這樣的知識分子完全不同於那些因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而加入共產黨的人（經常是年輕世代），以及在共產黨內部或外圍有系統地接受馬克思主義教育的人們。我們不要忘了，一九三〇年代，我們看到在國際上最有系統地出版、推廣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經典」。那是共產主義者的功勞。

然而，「舊」左派和「新」左派之間並沒有清楚的界線。一九三三年以後，當共產主義者堅

持資產階級革命的進步主義傳統以及反法西斯主義，他們和社會主義者以及自由主義者其實意見一致，「舊」左派也發現有需要找到共同的立足點。資產階級本身不就是要放棄理性主義、科學和進步的舊真理嗎？它們現在最堅定的捍衛者是誰？一九三六年，在聲譽卓著的《法蘭西新評論》的暫助下，弗里曼出版了影響深遠的《進步的危機》（*La Crise du Progrès*），鞭辟入裡地指出，他們共同的立足點就是辯證唯物論，長久以來，被它的對手棄若敝屣，認為它的唯物論是所有人性歸趣的敵人。現在蘇聯則代表著被資產階級摒棄的傳統和歸趣。

凡此種種，不僅使得反法西斯主義的知識分子更容易被馬克思主義吸引，也對馬克思主義本身的發展產生重要的影響。它加強了自身當中和理性主義、實證主義、啟蒙運動的科學傳統以及對於人類無限的進步能力的信仰最接近的元素。無論是否出於自覺，在相互交流當中，馬克思主義者比非馬克思主義者更願意大幅修正他們的理論。

但是他們不只是因為想要和非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組織對抗法西斯主義的共同陣營，要克服季米特洛夫所謂的「革命先鋒的孤立」意味著重建「因應處境變化的政策和策略」，但不是修正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實踐。很弔詭的，蘇聯的內部發展遠超過對抗希特勒的需要，反而讓馬克思主義的種種趨勢更接近十九世紀舊有的進步意識型態。再說，在反法西斯主義的經驗裡，希特勒和蘇聯的影響很難清楚劃分。

因此，當時盛行的「辯證和歷史唯物論」的詮釋（藉著史達林的威權，它成了共產黨的標準說法），並不是基於建立反法西斯陣線的需要，雖然它的確有所幫助。它是衍生自第二國際時期

的馬克思主義正統，其發言人是考茨基，而該正統又是奠基於恩格斯在晚期對於他和馬克思的學說的整理：一種馬克思主義的版本，既擁有科學的權威性、科學方法和預測的確定性，也主張可以藉由辯證唯物論去詮釋宇宙的所有現象，辯證法儘管源自黑格爾，但是唯物論基本是十八世紀法國哲學的路線。該詮釋（例如恩格斯的《論費爾巴哈》）將十九世紀高唱入雲的自然科學和馬克思主義媒合在一起——隨著細胞、能量轉換，以及達爾文的演化論這三個決定性的科學發現，科學在自身的發展當中（如恩格斯的看法）放棄了十八世紀膚淺的、靜態的、機械式的唯物論。

這倒沒什麼好驚訝的。「進步」和「革命」、十八世紀的唯物論和馬克思主義、自然科學的確定性和歷史的必然性的結合，對於工人階級運動一直有很深的吸引力。俄國的運動也不例外。再者，俄國大革命後的處境也助長了更堅定的科學主義。當革命無法成就馬克思和列寧所認為的主要目標，也就是「作為西方國家的工人革命的導火線，好讓兩者相輔相成」[35]，布爾什維克的主要任務，就必須是發展一個落後而貧窮的國家的經濟和文化，才能在外國強權環伺下求生存，並且在孤立而龐大的國家的建構社會主義。就物質的觀點而言，生產和技術必須優先考量（列寧的「電氣化」）。就文化的觀點而言，群眾的啟蒙則是首要之務，無論是大眾教育，或是破除宗教和迷信。對抗落後和追求「發展」無疑地不同於十九世紀的類似戰鬥。然而科學的種種主題，作為解放的力量的理性和進步，大抵上並無二致。在那樣的社會裡，「辯證唯物論」的力量並不只是源自傳統和權威，也來自於它作為作戰武器的實用性，以及它對於政黨裡的鷹派以及未來的黨員的魅力，他們大部分是工人和農民，它給他們信心、確定性和指導，告訴他們在科學上為真

的東西，讓他們相信勝利就在眼前。

如前所述，在蘇聯裡，知識分子對馬克思主義的興趣，在於資產社會裡的「進步的危機」以及關於它的傳統價值的信心喊話。在他們眼裡，馬克思主義扛起了資產階級社會拋下的理性和科學的大纛，成為啟蒙運動的價值的捍衛者，以對抗意欲摧毀它的法西斯主義。如此一來，他們不僅接受「辯證唯物論」，更是將它發揚光大，成為蘇聯以及國際的正統學說，尤其是新生代的馬克思主義者；而該時期大部分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都是新生代的馬克思主義者，對他們而言，馬克思主義和爵士樂、有聲電影以及偵探小說一樣新奇。

五

二十世紀的馬克思主義的脈絡，乃至於讀到這段歷史的讀者們的經驗，總是非常不同，如果我們要避免時代錯誤或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詮釋，就必須強調馬克思主義在反法西斯主義時期的特殊歷史性格。自從一九六〇年代以來，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被淹沒在馬克思主文學和論辯的洪水裡。他們就像在各種馬克思主義及作者的巨大超級市場裡。儘管任何一個國家裡大多數人的選擇其實是受到歷史和政治處境的宰制，他們仍然意識到在理論上的選擇範圍非常大。主要從一九六〇年代開始，至少在人文科學和社會學方面，馬克思主義和正規高等教育的內容整合。在大部分西方國家裡，一九三〇年代新崛起的馬克思主義者接觸到的文獻寥寥無幾，而且幾乎被官方

文化和教育排除在外，除了成為惡意攻訐的目標以外。即使是他們自己關於馬克思主義的作品，也是屈指可數。一九四六年以前，所謂「馬克思主義或是接近馬克思主義的」英文歷史著作（除了「經典」作品以外），總共只有差不多三十本書，以及幾十篇論文。[36]

新的馬克思主義者和既存的舊有馬克思主義傳統割裂的原因有四個。社會民主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分烈，使得他們不信任一九一四年以前的社會黨的馬克思主義及其後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標準版本的形成（列寧主義）大抵上埋葬了直到早期共產黨都存在的馬克思主義的本土革命傳統（例如在英國，他們和「平民聯盟」〔Plebs League〕結合）[37]。那也使得馬克思主義內部的某些傳統漸漸被邊緣化，雖然它們不曾遭到指摘。史達林的反對者以及「路線偏差份子」（deviationist）的消滅，也使得另一派的布爾什維克馬克思主義者的作品被查禁（例如波格丹諾夫以及後來的布哈林，更不用說托洛斯基）。就此而論，一九二〇年代末期的「布爾什維克化」（Bolshevisation）不只是在政治和組織上，也包括思想的層次。最後，如前所述，基於技術性的原因——語言和政治方面（希特勒崛起的效應）——使得既有的作品難以散布。古斯塔夫．麥耶曠世不朽的恩格斯傳記，一九三四年在荷蘭發行境外版，在德國直到戰後仍然無人知悉，而且英譯本也刪節得很粗暴。

我們前面說過，無知（特別是語言上的無知）並不一定會限縮當代馬克思主義的視域。即使一條鞭的正統理論在共產主義運動當中漸漸取得霸權，也可能引起反作用。在一九三〇年代的蘇聯，蘇維埃正統理論在各個層面都更加定義清楚、明確而且具有約束力，從文學、藝術，到經濟

理論、歷史、哲學，而且可以說是「辯證唯物論」的產物，甚至（現在看來就很明顯）包括對馬克思本身的修正[38]，可是當代西方國家的馬克思主義者大抵上對於該正統學說一無所知。這個正統學說還沒有正式宰制蘇聯以外的共產主義者。無論如何，儘管每個共產主義者都知道有義務直接駁斥政治異端（尤其是「托洛斯基主義」），在和政治無關的方面，新的正統學說並沒有在蘇聯以外的地方散布，重大的討論（除了關於藝術和文學以外）也沒有翻譯，因此始終乏人問津。

因此，它們對西方國家的共產主義者幾乎沒有什麼影響。整個一九三〇年代的英國、美國和中國的作者（後來更包括英語系國家），都在探討「亞洲生產方式」，蘇聯作者則已經避而不談。[39]在一本從英文（而且是由非共產主義的出版者發行的）改編的蘇聯哲學教科書裡，就增列了對於德波林和盧波爾標準的公開指責，可是一九三六年法國共產黨的官方出版社仍然堂而皇之地出版盧波爾的作品。[40]懂德語而且讀過《早期著作》的馬克思主義者，在他們的分析裡熱情地闡述巴黎手稿時期的馬克思，顯然不知道蘇聯對於這些早期作品的保留態度。況且，即使在《蘇聯共產黨簡史》著名的第四章裡（敷演辯證和歷史唯物論的新教條），也沒有被解讀為對於路線偏差者的批判，一般只被看作馬克思主義基本信念的生動流暢的闡釋。如果西方國家的共產主義者被要求，對於在蘇聯論爭當中被明指或影射觀點有問題的人，他們無疑會以同樣的忠誠和信仰加以駁斥，正如他們對托洛斯基口誅筆伐一樣，然而當時他們並沒有那樣的任務，而且他們也不知道俄國的共產黨被要求那麼做。

職是之故，一九三〇年的馬克思主義新生代大抵上忽略或根本不知道馬克思主義的其他各

種詮釋，即使是當時所謂的「西方馬克思主義」[41]，也沒有被等同於布爾什維克主義或是它的同路人。其次，不同於二十世紀下半葉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對於馬克思主義內部的理論爭議並不感興趣（除了在列寧和史達林的權威著作裡提到的，或是經由蘇維埃或共產黨國際決議的強制命令）。那樣的論辯一般會出現在對於以前的馬克思主義分析產生懷疑的時期，無論是在十九世紀末（修正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危機」），或是全球資本主義甚囂塵上以及後史達林主義的時代。但是一九三〇年的馬克思主義新生代卻覺得在資本主義產生巨大危機的年代沒有什麼理由要懷疑馬克思主義的預測，也不覺得有什麼理由要在經典裡探究其他的意義。相反的，他們認為馬克思主義是理解始終隱晦難解的各種現象。正如一個年輕而好戰的馬克思主義數學家所說的：「在許多事情仍然等待仔細探究的當下，馬克思主義者難免會覺得有廣袤的思想領域等待辯證性的理解。」[42]他們以探究浩瀚無垠的領域為其思想任務，認為經典以及從前的馬克思主義者的作品不是有待思想澄清的謎題，而是種種發人深省的觀念的集體寶庫。相較於它可能帶來的巨大進步，可能的裂隙以及內在的不一致性就沒有那麼重要。對於知識分子而言，其中最顯著的進步就是他們周遭的非馬克思主義者的批判。他們當然會著眼於此，而不會是其他馬克思主義者的批判，除非他們的政治忠誠度招致批評。當有個人察覺到批評，他會順其自然，他們甚至會覺得和他們意見不合的馬克思主義者很有意思，而不會認為他是什麼洪水猛獸。列斐伏爾在關於民族問題（1937）耐人尋味的反省裡，認為奧托．鮑爾對於民族的定義和列寧的差異，只是在於比較不精確，而沒有什麼危險的錯誤。[43]

然而我們必須注意到，新的馬克思主義者接受正統的詮釋，不只是因為他們不知道有其他詮釋，或者是不在意馬克思主義內部的細微學說差別，更因為它符合他們探究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柯爾施的《卡爾．馬克思》（一九三八年出版英文版）之所以無人聞問，不是因為他以前是異議者（只有若干德國流亡者知道他是），而是因為他似乎和他們的理解方式相距甚遠。關於馬克思的早期哲學，官方觀點認為它們「包含了馬克思年輕時的作品。它們反映了他從黑格爾的觀念論到堅定的唯物論的演變」。[44]但是列斐伏爾指出，儘管法國共產黨裡有足夠的哲學教師，他們都知道馬克思和黑格爾的關係的問題絕不止於此，但是對於普利策的《哲學基本原理》（*Principes Elémentaires de la Philosophie*）（以他在一九三五到三六年的課程為基礎）裡探討的黑格爾主義的馬克思，卻沒有任何回應，或者是當代英國人大衛．蓋斯特的《辯證唯物論教材》（*Textbook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雖然他對於列寧的哲學筆記如數家珍而且讚不絕口）。這些卓爾不群的思想家絕不只是媚俗者而已。

在反法西主義時期裡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其最特殊的性格在於有許多自然科學家對馬克思主義產生興趣，他們也積極參與更一般性的反法西斯主義，那可能是空前絕後的情況。

在一九六〇年和七〇年間，人們大體上不再相信馬克思主義是個涵攝自然宇宙和人類歷史的包羅萬象的世界觀，柯爾施和其他人在更早以前就已經提出類似的批評。但是在一九三〇年代，新生代的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感興趣的地方，或者是老一輩的和年輕的科學家對恩格斯的理論的興趣，就在於馬克思主義的完備性。[46]

該現象在英國、美國和法國尤其顯著，在德國帶來的浩劫以後，它們成為自然科學的西方重鎮。在最高層次上，當時頂尖的科學家，或是未來的科學巨擘，有許多人是共產主義者、同路人或是極左派。光是英國就至少有五個未來的諾貝爾得獎者。其次，當時英國最重要的科學中心劍橋大學，其中的科學家們的基進主義也是舉世聞名的。劍橋的「科學家反戰團體」創立時就有八十個研究工作者，而它在當時還是個不對外開放的團體。[47] 儘管只有少數人是行動主義者，至少大多數人是同情左派的。據估計，在一九三六年，英國有兩百多個四十歲以下的科學家，其中有十五個是共產黨員或是它的同路人，有五十個是中間偏左派，有一百個人同情左派，其他人則多半保持中立，只有五到六個人支持極右派。[48]

科學家反抗法西斯主義是想當然耳的事，因為法西斯主義國家有大量的科學家被放逐或移民。可是他們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興趣就沒有那麼理所當然，理由在於二十世紀的科學很難和十九世紀的模式妥協，而那正是恩格斯所依據的模式，也是列寧的哲學所要捍衛的。[49] 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和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當然都有流通。正如雅札諾夫秉著學術良知在其導論裡所說的，一九二四年，愛因斯坦曾經收到恩格斯的手稿，好從科學的觀點去評論它，而這位偉大的科學家說，「無論從現代物理學或是物理學史的觀點去看，它的內容都無甚可觀之處」，但是仍然值得出版，「因為它是很有趣的手稿，有助於說明恩格斯在思想上的重要性」。[50] 然而它不能被視為恩格斯的思想傳記，雖然當時劍橋有些年輕科學家認為它有助於建構他們對於科學的想法。[51] 我們也必須說，即使是那個時候的共產主義科學家，私底下也認為辯證唯物論和

他們的研究沒有直接關係。

我們不打算於此探討馬克思主義對於自然科學的詮釋的歷史，關於該時期的辯證法如何應用在自然科學上，也就不再贅述。[52]然而，關於馬克思主義對於自然科學家的吸引力，我們有三個評論。

第一，它反映了科學家對於十九世紀決定論的、機械主義的唯物論的不滿，使得他們更難以和這個解釋性原理妥協。它不僅在每個科學裡造成困難，也導致了科學的全面性分裂，在科學知識的革命性進展，以及它所要解釋的整體實在界給人們的混沌且不一致的印象，兩者的矛盾越來越明顯。正如一個傑出的年輕馬克思主義者（不久後在西班牙遇害）所說的：

> 個別學科的理論操作和一般性的整個科學理論之間的矛盾已經大到整個機械主義的哲學都要爆炸了。生物學、物理學、心理學、人類學和化學，它們的經驗發現已經讓麻木不仁的科學理論不堪負荷，整個科學四分五裂。科學家們對於一般性的科學理論完全絕望，托庇於經驗主義，放棄任何概括性的世界觀；或者是投靠折衷主義，將所有個別的理論胡亂湊成如拼貼布一般的世界觀，而不想整合它們；或者是埋首於專門的學科裡，在其中，所有世界都被化約成理論家特別關心的個別科學理論。無論如何，科學瓦解成無政府狀態；人們史無前例地對於實在界的任何實證知識完全絕望。[53]

那些覺得科學的世界觀因為過去幾十年來的發展而土崩瓦解的人們，無論是考德威爾筆下的「物理學的危機」，或是霍爾丹試圖克服的達爾文演化理論所造成的遺傳學難題[54]，或者是更一般性的觀點，對他們而言，辯證唯物論有三個主要的吸引力。首先，它聲稱能夠統合「所有」知識領域，因而阻止它的分裂。難怪大多數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科學家，例如霍爾丹、貝爾納、李約瑟，都以博學多聞著稱。在面對哲學上的不可知論、實證主義或是數學的遊戲論時，他們也堅信宇宙是客觀存在而且可以經由理性認識到的，而不是不確定的、不可知的。就此而言，他們是支持「唯物論」而反對「唯心論」的，也願意忽略諸如列寧的《經驗批判主義》的辯護裡在哲學上或其他方面的弱點。

其次，馬克思主義始終對於機械性的、決定論式的唯物論不假辭色，因而也宣稱能夠提出替代性的理論。再說，它所屬的科學陣營也一直是非伽利略的（non-Galilean）、非牛頓的（non-Newtonian），因為恩格斯從年輕學生時期，就受到德國「自然哲學」的耳濡目染，終其一生都對它心嚮往之。相較於伽利略，他更同情克卜勒。馬克思主義傳統的這個面向，可能會吸引某些科學家，在物理學界特別盛行的機械性化約論的模式，以及將實驗對象從它的脈絡抽離出來的分析方法（「假設其他條件都相等」），對他們的領域（生物學）或心態而言顯得特別不恰當。那樣的人們（李約瑟、瓦丁頓）對全體的興趣大於部分，也就是概括性的系統理論（當時還沒有這個術語），它可以將被傳統「科學方法」隔離的現象整合在一個有生命的總體實在界裡；例如說，「被轟炸卻仍然功能正常的城市」（李約瑟語，對於反法西斯年代特別貼切）。[55]

第三，辯證唯物論藉由在其思維裡涵蓋矛盾的概念，因而似乎提供了解決科學的不一致性的方法。（霍爾丹說：「不同的工人的發現似乎直截了當地相互矛盾。而此處重要的是辯證的進路。」）

因此，科學家眼裡的馬克思主義，並不是以更好的方式去建構種種可能被否證的假設，甚或是以無益於啟發的方式望著他們的農地。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裡的錯誤和陳腔濫調也不一定讓他們很困擾。他們覺得那是探究宇宙萬物的一個完備而統整的方法，在那個時代裡，所有理論都顯得支離破碎，而且一時間找不到東西可以取代。如果我們要理解他們為什麼要經由辯證唯物論探索新方法，就必須明白當時科學（例如物理學）的一團混亂，在一九三〇年代初期，新生代的科學家（海森堡、薛丁格、狄哈克）向新領域推進，而不在乎它的一致性，而「愛因斯坦、蒲朗克……牛頓物理學最後的『老衛兵』」試圖打「拖延戰術（防守）……而無法向敵人還擊」[56]。

然而，馬克思主義對於科學還有另一個重大的貢獻。它在科學史上的應用給與許多科學家振聾發聵的啟示：一九三一年，黑森在英國的一次研討會裡發表〈牛頓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的社會和經濟根基〉（The social and economic roots of Newton's *Principia*），顯示了科學家們的馬克思主義發展的重大意義。[57]它讓科學發展整合到社會的運動裡，藉此證明，科學解釋的種種「典範」（借用更晚近的用語）並不僅僅是衍生自知識探究的內在發展。而馬克思主義的具體分析的實際有效性，也不是這裡的主要議題。黑森自己的論文甚至有若干值得商榷之處。它的主要影響力，是在於該方法的創新和豐碩成果。

而它之所以影響甚巨，部分是因為第三個重要的貢獻，與其說是馬克思主義，不如說是馬克思主義科學家以及蘇聯對科學世界的貢獻：堅持科學的社會意義、規劃其發展的必要性、以及科學家在規劃當中的角色。早在一九三二年，在英國頗具影響力的科學家俱樂部「托茲和奎茲」（Tots and Quots），馬克思主義數學家李維（經由霍爾丹、霍格本、貝爾納的支持）發表一篇論文，探討「根據社會發展潮流」去規劃科學的必要性，並且第一次討論到馬克思主義，那應該不是偶然的事。[58]同樣的，在法國社會，科學研究缺少系統性的支持，左派科學家原本應該成為它的擁護者，而人民陣線政府也應該相信它的必要性：社會主義者佩蘭（Jean Perrin）以及共產主義的同路人朗之萬（後來成為共產主義者），以法國國家科學基金會（Caisse Nationale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為後盾，成為主要的推動者，該基金會後來成為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entre Nationale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而伊萊娜．約里奧居禮則成為國家科學院副院長。當時最重要也最有影響力的馬克思主義科學作品，當屬貝爾納的《科學的社會功能》（*The Social Function of Science, London*, 1939），只因為他慷慨激昂的意見得到許多並不特別同情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家們的支持：主張科學家應該被視為第四或第五「階級」，並且批判國家和社會沒有認識到科學在生產（和戰爭）中的角色，也沒有藉助於科學去規劃社會資源。該呼籲在當時得到廣泛的回應，因為科學家覺得只有他們自己才知道新的科學革命（例如核能物理）在理論和實踐上的蘊含是什麼。那是個歷史的諷刺，科學家們第一次（也是最成功的一次）說服政府重視現代科學理論對於社會的必要性，是在反法西斯主義的戰爭當中。而那也是更大且更悲劇性的諷

刺，讓美國政府相信製造核子武器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並且由反法西斯主義科學家國際團隊建造的，是反法西斯主義的科學家們。

許多自然科學家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興趣，最終也只是曇花一現。即使蘇聯的內部發展（特別是李森科事件）沒有激起科學家的反抗，因而在一九四八年以後幾乎沒有科學家主張共產主義，或者它也不會持續很久。在史學以及馬克思主義的討論裡，它幾乎銷聲匿跡，至少是在當時，人們聲稱馬克思關於自然科學沒有說過什麼（或者說他也不想說什麼），而恩格斯的著作被斥為十九世紀的演化論者以及科學和哲學的門外漢的作品。然而那不只是提醒我們不要輕忽馬克思主義和自然科學的關係，在反法西斯的時期裡，它更是知識分子的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元素。它既反映了和馬克思主義以前的理性主義以及進步傳統的傳承關係，也讓人們認識到，唯有經由實踐和理論的革命才能延續該傳統。而它也有助於解釋為什麼當代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真誠擁護蘇聯的正統辯證和歷史唯物論，而不只是因為它出自蘇聯才接受它（多少有合理化的意味）。

對於馬克思主義者而言，馬克思主義既蘊含著和理性、科學、進步的舊有資產階級（以及無產階級）傳統的傳承，也意味著理論和實踐上的革命性轉變。對於因為要打擊共同敵人而和共產主義者合併的非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而言，則沒有如此重要的理論蘊含。他們只是支持馬克思主義者而已。即使他們對於那些論證很陌生，卻認識到（或者自以為認識到）熟悉的態度和渴望，或者就像凱因斯一樣（他不算是馬克思主義或社會主義的同路人），他們至少欣賞且尊重年輕的狂熱者的希望、信心、衝動、道德力量、英勇和自我犧牲。

在現代政治裡，除了自由派以外，所有人都微不足道，戰後世代三十五歲以下的知識分子共產黨倒是例外。我也喜歡且尊敬他們。或許在他們的感覺和本能裡，他們是我們現存典型擇善固執的英國紳士，就像前人一樣，參加十字軍東征、鼓吹宗教改革、平定大叛亂（Great Rebellion），為我們爭取我們的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讓上個世紀的工人階級更人性化。[59]

各行各業的知識分子「同路人」，基本上屬於這個氛圍，而人們在論述他們的歷史時，總是帶著事後諸葛的懷疑和嘲諷。[60]這個語詞本身就有歧義性，因為在冷戰時期，反共產主義藉著該語詞，將自由派和共產黨在法西斯主義上的廣泛政治共識以及反法西主義的實踐上的必要性，和另一小撮人混為一談，他們只是在共產黨大會的「開放」平台上幫襯著簽署他們的宣言，或者是更少數的團體，他們只知道為蘇聯的政策搖旗吶喊。這些團體的界線既模糊而且搖擺不定，但是仍然必須釐清。由於反法西主義的迫切需要，使得對於它的強勢作為的批評畏首畏尾，正如戰爭的勢在必行也使得任何妨礙團結力量以對抗希特勒和軸心國的聲音噤若寒蟬。但是那並不意味著他們是「同路人」。

喬治．歐威爾在英國的文學際遇即足以為證。對於史達林主義、西班牙內戰當中的共產黨政策，以及英國左派的種種傾向，他無不嚴詞批判，但是他遭受到的困境並不是來自共產黨（他和他們沒什麼交涉）或是他們的同情者，反而是來自非共產黨和非馬克思主義的編輯和出版商，他們不願意出版可能「助他人威風」的作品。[61]況且，直到戰後時期，儘管歐威爾聲名大噪，讀者仍然無法接受這類的作品。他的《向加泰羅尼亞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只賣了幾百本。

稱得上「同路人」的知識分子（所有條件都相符者），其實包括許多形形色色的人們，基於不同的思想來源和同情的理由，雖然他們大多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也幾乎都非常厭惡戰爭，創傷始終難以撫平。他們大部分是自由派或者左派理性主義者。他們很少對馬克思主義或者共產黨有好感。他們自視甚高的知識分子角色，使得他們不願意參加任何長期運動或是服從什麼黨紀。羅曼·羅蘭、亨利希·曼、福伊希特萬格等人，儘管有時候願意介入政治事件（例如左拉），而且人們也對他們唯言是聽，可是他們卻是「作壁上觀」（au dessus de la mêlée）（超脫於混戰之上）（羅曼·羅蘭語）。

他們甚至對俄國的大事或其他革命無甚興趣，況且，像羅蘭、亨利希·曼、阿諾·茨威格，因為蘇聯內政的高壓統治和恐怖主義的面向而對它敬而遠之。在希特勒崛起以前，他們甚至抗議蘇聯政權。[62] 在一九三〇年代，反法西斯主義是讓他們支持和捍衛蘇聯的唯一理由。正如湯瑪斯·曼在一九五一年所說的，「如果說有什麼別的原因讓我不得不尊重俄國大革命，那應該就是對於法西斯主義始終不變的反對立場。」[63] 然而他們相信他們在蘇聯那裡看到的，基本上是啟蒙運動、理性主義、科學和進步的傳承。

而就在那個時期，人們或許以為蘇聯會排斥西方國家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史達林的恐怖統治，以及蘇聯文化的淪陷到冰河期。但是當時在西方國家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社會裡也發生了大地震，經濟衰退、法西斯崛起以及世界大戰的山雨欲來給人們的三重創傷。長久以來對於蘇聯的落伍和野蠻的印象，似乎不及於它在西方自由主義沒落的時期公開承諾繼承啟蒙運動的種種價值

和抱負，它的計劃性工業化（和自由主義經濟的危機形成強烈的對比），更不用說它的反法西斯主義角色。「蘇聯建設」（套用插圖豐富的對外宣傳期刊的題名）看起來就像是以理性、科學和進步、啟蒙運動的直系後裔以及法國大革命的形象建構起來的社會。它成為以人類為目標的社會工程的典範，期待更美好的社會的人類希望的力量。對於烏托邦的希望、革命本身的社會爆發，以及貧窮和高度的期望、理想和荒謬的混合，乃至於一九二〇年代的文化繁華，有些作者可能不為所動，但是對這個時期的蘇聯歷史卻興味盎然。

再者，儘管革命期間的蘇聯以及早期共產黨拒絕他們的自由派人道主義，現在卻開始強調他們和它的共同點。盧卡奇在反駁前衛派時主張說，不僅創作最好的文學，在政治上也最實證的文學的，正是偉大的資產階級文豪和他們的繼承者，高爾基、羅曼·羅蘭、亨利希·曼和湯瑪斯·曼。這個評斷不僅符合他的品味和批判原則（更不用說自從一九二八年到二九年的「勃魯姆提綱」〔Blum Theses〕以後就無法暢所欲言的政治傾向），更符合廣泛的反法西斯主義陣線的原則，那些原則現在也成為共產黨的官方政策。

因此，將馬克思主義者和非馬克思主義者凝聚在一起的，不只是聯合對抗共同敵人的現實需要。一九三六年蘇聯憲法比它的若干前身更能被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人士」接受。由於經濟衰退和希特勒的崛起的突顯和催化，突顯了一個深遠的意義，也就是兩者同樣屬於法國大革命的傳統，理性、科學、進步和人道主義價值的傳統。藉由這個版本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兩者更容易劃上等號，在該時期裡，它成為官方版本，而且由於西方馬克思主義中心轉移到法國和英美國家，

在那些國家裡，無論是馬克思主義者或非馬克思主義者，都是在充滿著該傳統的文化裡養成的。

六

然而反法西斯主義最初並不是學術理論的入口。它最主要是政治行動、政策和策略的問題。它所面對的馬克思主義者包括知識分子和非知識分子，在反法西斯時期踏入政壇的，以及政治資歷更深的人，他們曾經面對的政策分析和決定，也是本章不能略而不提的。

在目前的研究裡，我們沒辦法估算在反法西斯運動當中動員了多少知識分子，但是我們可以有信心地說，正如德雷福斯事件，整個知識圈對它都很感興趣，它動員了許多知識分子加入政治行動，尤其是它提供了許多機會，讓他們以知識分子的身分參與其中，而不像從前那樣。難怪有些人到西班牙去打仗，雖然沒有人特別鼓動他們；更何況在英國，人們更暗地裡勸阻學生志願從軍。[64]不過他們不是以知識分子的身分加入國際縱隊（International Brigades），而是當個士兵。他們加入戰時反抗運動也不會令人意外；更不用說加入武裝游擊隊，有時候甚至成為領袖人物。這些行動都不限於知識分子。該時期史無前例的情況在於個別知識分子對於反法西斯運動的貢獻程度（在共產黨運動裡最早看到）：他們不僅是宣傳的符號（雖然他們很突出），他們在媒體（出版、報紙、電影、戲劇等等）、科學的工作，或其他人們需要他們的地方，更讓他們能夠發揮專長。科學家們自動自發地動員反戰，以及後來的支持戰爭，都是史無前例的事。

再說，就像歐本海默，主持製造第一枚原子彈的科學家，他的一生只有在特殊的歷史環境下才能夠理解。在一九三〇年代，像他這樣的知識分子，很自然地就成為反法西斯主義者，並且對共產主義產生興趣。但是讓政府注意到核子武器的可能性的，也只有反法西斯主義的科學家，因為只有科學家才知道這個可能性，也只有具有政治意識的科學家才會察覺到趕在法西斯主義者以前發展出該武器的緊迫性。這樣的人不可免地成為政府裡的要角，並且參與國家最重要的機密：沒有別人能夠發現或編造必須成為機密的東西。同樣的，他們的立場也難免變得複雜而艱難。他們的道德和政治立場不僅和操縱國家機器的那些人相左（即使只是在自由的科學交流上），國家機器也越來越不信任這些知識分子，而當蘇聯在戰後變成主要敵人時，他們更是被當作反法西斯主義者和親共者。他們在軍事技術方面的意見以及在道德政治方面的主張，也很難清楚劃分界線。雖然在眾人一心一意對抗法西斯主義的時候，沒有人覺得有什麼問題，但是戰後核武政策的議題（例如是否應該製造氫彈）在道德和政治方面就留下更大的意見分歧的空間。

歐本海默成為冷戰時期最轟動一時的犧牲者：美國政府地位最顯赫也最有影響力的科學顧問，以莫須有的理由被控為蘇聯從事間諜活動，以「安全風險」為由，禁止他接觸軍事機密。像他這樣的人以及他的政府的爭議，在任何以前的戰爭裡都不可能發生，因為沒有任何武器如此依賴單純的大學科學家的領導和專家技術。後來的科學家們也不太可能遇到這種事，因為他們沒有像他們的前輩那樣的政治經歷，尤其是他們不屬於現在人滿為患的科學官僚，或是那些以非政治性的專家身分從事製造毀滅性武器的人們。那是反法西斯主義時期以及涉入的政府特有的爭議。

因此，反法西斯主義給知識分子（其中有馬克思主義者）帶來的，不只是新的任務和機會，也包括政治和公共行為方面的新的難題。而對於共產黨以及親共者，這些難題顯得特別尖銳。我們不打算於此探討他們在法西斯主義潰敗以後對於各種情勢發展的反應。對於共產黨在反法西斯主義時期的個殊政策改變的後果，我們也不擬贅述，雖然有些政策，尤其是蘇聯在一九三九年到四一年的政策轉向，以及美洲某些共產黨（「白勞德主義」〔Browderism〕）的暫時解體，在共產黨當中造成相當大的震撼。大致上說，共產主義運動的國際路線在一九三四年到四七年間始終維持不變，在暫時的偏離以後，也都能夠回到它的主要路線。我們也不需要探討共產黨內部的領導階層和知識分子之間的特殊衝突和傾軋，雖然那些情況的確存在。在反法西斯主義時期，相較於大量知識分子投入運動，政黨對於他們的政治價值的重視（由那些更「開明的」、沒有特定政黨傾向的期刊和協會的增多可見一斑）[65]，以及他們自發性的行動的廣大範圍，那些齟齬當然顯得微不足道。個人的離開或開除有各自不同的理由，而對於共產黨的政策和蘇聯最鞭辟入裡的批評無疑都來自知識分子，但是由於當時共產主義運動沒有發生重大的分裂，知識分子團體也沒有大規模的脫黨（除了美國以外），而持不同意見的馬克思主義團體在當時也不成氣候，自認為代表「忠誠的」無產階級的那些政黨，以及基本上被視為「小資產階級」而「不可靠」的知識分子，他們雙方的緊張關係整體而言都在控制當中。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採取了反法西斯主義政策，因而招致了若干重大的爭議。從「階級對抗階級」的路線到支持反法西斯主義和人民陣線，我們會在別處討論這個改變的衝擊，但是必須於此

強調它在共產黨所相信的政治裡所代表的巨大改變。他們的信仰始終是和自由主義以及社會民主主義正好相反，以保護布爾什維克、投入世界革命，防止任何修正主義或向現狀妥協的污染。

它所造成的爭議是心理上的而不是理論上的。為了共黨國際第七次世界大會的路線，他們並不難找到馬克思主義的證成和先例，而且由於它看起來符合常識，因而更有說服力。共產黨在「布爾什維克化」和「階級對抗階級」時期所面對的爭議，在於如何以不同於純粹謀略的說法去擬議新路線，以暫時向現狀讓步，接著就會回復舊有的鬥爭；或者是以有別於欺騙的說法。第七次世界大會本身就見證（對共產黨而言）了新路線的創新性，它堅持那不是和舊路線的決裂，而是因應特殊的政治緊要關頭，當然也可以藉機糾正以前可以避免的「錯誤」。基於種種權謀理由，同時也不想排除蘇聯國家政策的選項，他們不願意自由而清楚地討論新觀點，使得它們的創新性難以突顯。至於共產黨員，無論是舊有的或新生代的，形式上仍然承認蘇聯是推翻「剝削者的階級統治」的唯一決定性形式[66]，而他們是否真的理解或接受新觀點的蘊含，我們也不得而知。

然而，我們至少可以很保留地說，新路線顯然不只是策略性的暫時階段。它擬議另一種有別於暴動奪權的社會主義過渡的模式，甚或是如「埃爾科利」（Ercole Ercoli）的報告所說的，一種可能的和平過渡。藉著「新民主」或「人民民主」的概念，它設想的政權過渡形式不會是「無產階級專政」。再者，它蘊含著一種共產主義的政治學，它在實質上不會是無產階級和資本主義者之間的階級鬥爭的延伸，認為「階級聯合」是必要且可能的，因而直接衍生自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它其實是設想或蘊含一種既自主的而又專為獲取工人階級領導或支配整個國家的政治學。無

疑的，法西斯主義被形容為資本主義的極端且合乎邏輯的版本，雖然它沒有主張說所有資本主義都是法西斯主義。他們當中少數親法西斯主義者可能被等同於「壟斷資本家」（例如法國的「兩百家族」），他們可能被形容為「農民、工匠和小資產階級群眾」以及工人們的剝削者。然而，反法西斯主義的檢驗標準不是階級立場或意識型態，而只是他們是否願意加入反法西斯主義陣線，或更確切地說，加入對抗德國法西斯主義，它才是戰爭的主要煽動者。資本家在戰後被沒收財產，不是因為他們是資本家，而是因為他們是法西斯主義者和賣國賊。

現在回頭看，新路線的涵義比當時所見更清楚。如果我們重讀共產黨一篇關於西班牙內戰的分析，陶里亞蒂的《西班牙革命》（*The Spanish Revolution*, December 1936）的開頭部分，它的要旨應該殆無疑義。西班牙人民的鬥爭是「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為了他們的解放最偉大的群眾鬥爭事件，僅次於一九一七年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那是一場革命。儘管它是要「解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課題」，它是要「……以符合廣大人民利益的新方式去解決它們」，也就是說，它不僅僅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陶里亞蒂也說，它和一九〇五年或一九一七年完全不能相提並論）。它是武裝鬥爭的狀態，以軍事叛變舉事。它被迫要將作為反對階級的地主以及雇主的財產充公；它可以吸取俄國大革命的經驗；最後一點，「西班牙工人階級奮力奪取在鬥爭當中的領導角色，以摧陷廓清的鬥爭形式和規模烙下無產階級的印象。」它也不同於列寧在一九〇五年擬議的「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民主專政」，因為「在內戰的壓力下，它採取了一系列些許踰越革命民主專政綱領的措施」。由於戰爭的必要性，它不得不走向「國家整體經濟的嚴格管制」。結果，「如果人民

勝利了，新的民主不得不和所有保守主義相左；因為它擁有自身繼續發展的所有條件，它為由西班牙工人階級領導的經濟發展和政治成就提供保證。」

簡言之，作為共產國際的發言人，陶里亞蒂所提出的，是如果由反法西斯主義鬥爭的具體情況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策略，也就是內戰的形式，而有別於一九〇五年到一七年俄國的革命歷程。關於鬥爭的形式容或有論辯的空間，也就是共和政府的政策，以及贏得戰爭勝利的最佳方式。但是關於該分析的革命觀點，則沒有爭議的空間，雖然我們必須說，後來共產黨關於西班牙的聲明傾向於對該國事件的革命性格輕描淡寫。然而陶里亞蒂刻意模稜兩可而曖昧的說法（「符合廣大人民利益」、「些許踰越」、「自身繼續發展的所有條件」等等），儘管對於老布爾什維克而言很清楚它的涵義是什麼，但是它保留了刻意的歧義性元素。無論是提醒非社會主義的反法西斯主義者說，共產黨認為「人民陣線對法西斯主義的最終勝利」是為了無產階級的勝利鋪路，或者是對共產主義者坦承，新路線和他們以前關於革命策略的假設的決裂有多麼嚴重，顯然都不是上策。因為兩者最多只是著眼於反法西斯主義鬥爭的當前任務而已。

但是凡此種種並沒有影響到一九三六年到三九年熱情支持西班牙共和國的廣大民眾。西班牙內戰鼓動了反法西斯主義規模最大的自主性國際動員，尤其是知識分子，甚至大於戰時的反抗運動，因為它獨立於政府之外，既不必回應自己的國家興亡的問題，也沒有關於敵人的本質的分歧意見。它倒是使得國際右派產生分裂，因為其中有些派系（甚至包括教廷）同情共和國或是憎惡它的敵人。它團結了左派，從自由民主主義者到無政府主義者，儘管它的眾多派系相互仇視。左

派許多事務上都有歧見，包括對抗佛朗哥的最佳戰略，但是在對抗他的必要性上則沒有異議。我們可以說，對於國外大多數共和國的同情者而言，最重要的事是打敗佛朗哥，而不是往後西班牙政權性質的問題。我們甚至可以說，大部分共和國的同情者，就像戰時抗暴的支持者一樣，都期望法西斯主義以後的政權應該是「新的」、甚或是「革命性的」（其意義多少有些模稜兩可），應該是更自由也更正義的社會，無論如何，不只是恢復以前的狀態而已。

但是對於馬克思主義者而言，反法西斯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關係問題更加具體而尖銳，而對於共產主義者而言，籠罩在辯論上空的濃霧從未消散。作為共產主義者，他們相信廣大的反法西斯主義陣線會讓他們更接近權力的轉移。共產黨趁機大幅壯大自身，反抗運動（反法西斯主義陣線的合理產物）實際上將政治鬥爭變成武裝鬥爭，在反法西斯時期崛起的共產黨不僅比以前更強大（除了西班牙和德國部分地區以外），加入許多反法西斯主義的政府，在許多國家裡甚至真的導致權力的轉移。

因此，很少共產主義者會為了異議的馬克思主義者或是其他人的批評真正感到困擾，他們主張說，為了加強反法西斯主義的團結，他們背叛了階級鬥爭和革命，而蘇聯也對外國的革命沒興趣（或許除了紅軍所發動的革命以外）。或許國家或國際聯合對抗主要敵人的某些更極端的情況讓好戰份子很震撼，因為它們牴觸了他們的本能、傳統甚或經驗。然而，一般而言，就其代表反法西斯主義的必然性而言，共產主義路線顯得有說服力而且務實。除了為西班牙內戰而作戰的共產主義政策以外，有什麼替代方案嗎？無論在當時或現在，答案是沒有。[67] 多列士在一九三六年

反駁皮維特的宣告（「人民陣線不是革命」）有錯嗎？歷史學家和左派份子眾說紛紜，但是在當時它似乎是合理的，而不是偏激的言論。義大利和法國的共產黨始終被嚴厲抨擊說它們在一九四三年到四五年間沒有採取更基進的政策，甚或試圖奪權，但是它們主要在抗暴和解放時期召募的新黨員，似乎很能接受政黨的路線，而不覺得哪裡不對。至於蘇聯，共產黨員似乎無法想像它不能給與國外社會主義奧援，他們的政治分析的假設在於，無論蘇聯的國際政策是什麼，世界上第一個且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以及那些意欲在其他地方以它的模式建立社會主義的人們，他們兩者的利益基本上必須是完全相同的。

的確，關於反法西斯時期的共產主義路線的有效性，那時候的論辯並不是很重要，除了關於當時被孤立的馬克思主義極端論者。他們之所以聲名大噪，不只是因為史達林死後以莫斯科為中心的共產主義運動的瓦解，更因為他們發現，儘管反法西斯主義策略非常成功，卻沒有解決如何繼續走向社會主義的問題，除了在某些國家裡，共產黨因為戰爭的關係而奪得政權。[68]但是，反法西斯主義祕而不宣的觀點刻意的模稜兩可，延遲而且的確阻礙了對於該問題的清楚分析。

職是之故，討論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或是任何共產黨的馬克思主義者）對於它的態度如何的問題，經常是很困難的事，甚或是不可能的。而在確定戰勝法西斯主義以前，它幾乎不成問題，也就是一九四三年前後，雖然它曾經在西班牙內戰的背景下被設想過。在法西斯主義垮台以前，世界接下來何去何從的問題，似乎只是個學術問題。當勝利在望，共產主義者看到「人民民主」或「新民主」的新觀點，但是基於對共產國際以及戰爭狀態的失望，那些觀點既沒有正式頒

布（例如第七次世界大會裡的反法西斯主義），也沒有在整個共產黨裡系統性地宣傳和討論。反倒是出現在從蘇維埃以及其他共產主義地區流出一系列的文件裡，或者是顯然有特別目的的政黨決議裡，有些甚至在後來被撤銷。

「人民民主」以一面倒的方式登上政治舞台，卻沒有驅散籠罩著該語詞的歧義性。它可以被視為短期的觀點，為了維持國際最大的聯合陣線的利益所作的必要讓步，在其中，每個國家都為了對抗軸心國而戰鬥。共產黨想到要重拾對其國內或國外的盟友的仇恨，他們也就準備好對付未來的敵人，而不再全力對抗現在的敵人。從一九四二年十月以後的共產國際的「新路線」，就可以清楚看到該暗示。[70]解放後的國家的政體會是「各種民主」（以人民為取向或是「新」民主），但是建立這些政體的計劃不是「社會主義綱領」（正如奧地利共產主義者的務實評論），它當前的任務「既不是實現社會主義，也不是導入蘇維埃體系」（季米特洛夫語），而是「鞏固民主和議會政體」。[71]因此，全國性反法西斯主義統一體的形式類似的政府，以及他們在解放後的東歐和西歐的共產黨夥伴，兩者之間的界線始終很模糊。

但是我們也可以將它視為第七次國際大會的路線裡所暗示的轉型的合理發展。擴大全國性反法西斯主義統一體的「反法西斯主義聯合陣線的政府」，可以想像成自我轉型為負責漸進而和平地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機關，建立工人階級在反法西斯聯軍的領導權，而該領導權則是來自於承認工人階級在反法西斯主義裡的領導角色，以及從共產黨那裡得到的地位。在這個意義下，它是有別於一九一七年的蘇聯的另一條社會主義進路，而且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另一條進路（正如季

米特洛夫以及繼他之後的發言人切爾文科夫在一九四七年九月的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的就職典禮當中所說的）。[72]然而，由於沒有多少人公開討論它，關於它可行與否的政治條件始終曖昧不清，而且在那樣的轉型期裡，史無前例的多黨政治問題也一樣混沌不明。在共產主義運動裡，這些問題從未公開提出，直到後來，該觀點正式被放棄（無論在東方或西方國家）。

第三，我們也可以從戰後國際關係去詮釋新路線。人們既設想著戰時聯盟的延續，以及它所蘊含的非法西斯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的長期和平共存。再說，共產主義者公開而有系統地討論戰後情勢，人們主要是從這些觀點去了解的，尤其是一九四三年年末由史達林、羅斯福和邱吉爾出席的德黑蘭會議（Tehran Conference）。它至少讓某些共產主義知識分子憂心忡忡。不過，雖然德黑蘭觀點並不排除社會主義過渡的「人民民主」觀點[73]，它卻也暗示著，在某些國家裡，應該謹慎地將和平共存的更大的需求，甚至是其他的種種發展機會，置於社會主義運動的鬥爭之上。露骨地說，「英美統治集團必須相信，他們對蘇聯的聯合作戰……不會因為紅軍獲勝的刺激而使得蘇聯的社會主義體系擴散到西歐。」[74]在美國，人們可以合理地假設，既然社會主義沒有任何現實的機會，維持資本主義（願意和蘇聯合作的資本主義）會是他們國家裡的共產主義政策的基礎，可是他們也不願意排除其他左翼的選項；那或許就是為什麼法國在一九四五年公開指責「白勞德主義」。不過，「德黑蘭觀點」暗示著，在蘇聯預期的影響圈外的某些共產黨，或許會接受他們的國家有個長久的資本主義遠景，雖然我們不清楚是哪些國家，他們要多久或多快才會放棄社會主義轉型的鬥爭，或者他們的共產黨員在這些環境下有什麼未來的願景。這些問題

始終沒有得到解答，因為除了在美國曇花一現的白勞德以外，沒有人提出這些問題。

在反法西斯主義將要告終的年代，有種種不確定性和曖昧。然而它們正好說明了反法西斯主義策略自始即隱含的歧義性。正如托洛斯基和其他人指出的，它暗示著一條為社會主義政權鬥爭的進路，和當時布爾什維克以及其他社會革命者所想像的「無產階級革命」扞格不入。他們的看法是對的，雖然他們形孤勢單，因為拒絕大部分知識分子（無論是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為了戰勝法西斯主義而必須採取的政策，而他們自己又提不出合理的替代策略。然而該策略始終流於空談，從來沒有人清楚闡釋它，況且，關於法西斯主義之後的未來的討論，除了含糊其辭以外，幾乎在整個時期都噤若寒蟬。同樣忠誠的共產黨員，例如陶里亞蒂和狄托（Josip Tito），他們可能從反法西斯主義路線解讀出非常不同的政治行動蘊含，除非高層權威的決議排除了可能的選擇。

因此，盤旋在未來的理論迷霧，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困擾著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主要是因為當前的任務非常明確，在對法西斯主義的勝利露出曙光以前，共產黨的策略（除了一九三九年到四一年暫時的插曲以外）提供了易懂且讓人信服的指導，告訴他們「現在」要做什麼。歸根究柢，對於他們大部分人而言，對抗法西斯主義才是當務之急。如果失敗了，關於未來的辯論就只是紙上談兵罷了。對於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而言（無論年輕年長），反法西斯主義顯然不是他們的最終目的。他們支持它的理由只在於它有助於最後推翻整個世界的資本主義，或至少世界大部分地方的資本主義。然而在現實裡，它根本不需要這樣的理由。無論未來會怎樣，法西斯主義都

是邪惡的，必須奮起反抗的。在經濟衰退以及對抗法西斯主義的鬥爭當中，在陷入黑暗的時代裡（也正因為如此），有個世代的知識分子信奉馬克思主義。倖免者經常會感到很失望。他們沉湎於過去，想要知道他們是否做錯了什麼，他們的錯誤是什麼，他們的高度期待哪裡出了錯。很多人都不再是馬克思主義者。很少人會後悔支持西班牙內戰或參與對抗法西斯主義，無論是作為平民、穿制服的軍人或是反抗者。那是他們可以小小驕傲一下的過去。對於某些人而言，那只是他們政治經歷的一部分，那個時代的倖存者會心滿意足地回顧它。

注釋：

1 關於共產主義運動的一般性處境，見：Aldo Agosti, *Bandiere Rosse: Un profilo storico dei comunismi europei* (Rome, 1999), p. 35-40。關於西方共產主義知識分子的不同來源和意識型態的外觀，見：Thomas Kroll, *Kommunistische Intellektuelle in Westeuropa* (Cologne-Weimar-Vienna, 2007)，比較一九四五到五六年的法國、義大利、奧地利和英國。

2 百分之九十五的德國共產黨只受過小學教育，百分之一上過大學（H. Weber, *Die Wandlung des deutschen Kommunismus*, Frankfurt, 1969, II, p. 29）。關於知識分子在無產階級（非法）政黨裡的處境，見：Giorgio Amendola, *Un'isola* (Milan, 1980)。

3 *For Peace and Plenty. Report of the Fifteenth Congress of the CPGB* (London, 1938)。有證據顯示，議會的組成和整個政黨的組成大同小異，比較：K. Newton, *The Sociology of British Communism* (London, 1969), pp. 6-7。

4 見：Georges Haupt, 'Emigration et diffusion des idées socialistes: l'exemple d'Anna Kuliscioff' (*Pluriel* n.14, 1978,

pp. 2-12)。

5 多布（Maurice Dobb）必須藉助於譯者，才能寫成他關於蘇聯經濟的第一部巨著：*Rus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the Revolution* (London, 1928)。

6 像柯爾施、班雅明、博蘭尼（Karl Polanyi）、艾里亞斯（Nobert Elias）之類的人物，無論是馬克思主義與否，都是如此。

7 P.M. Sweezy, *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NY, 1942).

8 *Unter dem Banner des Marxismus* (*Pod znamieniem marksizma*)。它比較像是理論討論的國際期刊，在一九三〇年代中期停刊，而且逐漸向蘇聯正統靠攏。再者，它只在德國和俄羅斯發行。

9 另見拉狄克（Radek）典型的詭辯：「如果要素描或速寫人類最微細的動作，有必要求教於普魯斯特之類的偉大藝術家嗎？問題不在這裡。問題在於我們是否有自己的大道，或者這條大道是否有國外的實驗指引。」（*Problems of Soviet Literature* (Moscow, 1935), p. 151）。

10 關於這類文學的跨越派系，見：Lehmann, *New Writing in Europe* (London, 1940)。

11 關於該文化和政治氛圍很好的概述，見：J.M. Richards, *Autobiography of an Unjust Fella* (London, 1980), pp. 119-20。

12 （由共產黨組織的）英國藝術家國際協會（1933-39）籌辦的展覽（主題多半是「反對法西斯主義和戰爭的藝術家」），包括學院藝術家、構成主義者、立體派、超現實主義、社會寫實主義、後印象派、德國二十世紀藝術，以及法國藝術家，例如葛侯美（Gromaire）、列格（Leger）、羅特（Lhote）、扎德金（Zadkine）。它自己的好戰分子大抵上都是寫實主義者，但是受到馬克思主義（李維拉〔Rivera〕、歐洛斯科〔Orozco〕）以及美國藝術（葛羅普〔Groppe〕、班・夏恩〔Ben Shahn〕）的影響，而不是蘇聯的模式。見：Tony Rickaby, 'The Artists' International' (*History Workshop* 6, Autumn 1978, pp. 154-68)。

13 Beatrice Webb, *Our Partnership* (London, 1948), pp. 489-91.

14 蘇聯國家利益的觀點不一定荒謬，而是因為假設將新政策一條鞭地強加在世界各地的共產黨是最符合世界共產主義甚或蘇聯的利用。

15 除了南非布爾人（Boer）某一派的納粹同情者。

16 南亞和東南亞剛好是異端共產主義贏得大眾支持的唯一地區，尤其是錫蘭。

17 蘭斯伯里（Geroge Lansbury），英國工黨領袖（1931-35），是個熱情的反戰派。

18 Pascal Ory, *Les collaborateurs 1940-1945* (Paris, 1976), pp. 135-6。

19 見：Gary Werskey, *The Visible College* (London, 1972); S. Zuckerman, *From Apes to Warlords* (London, 1978); Andrew Brown, *J.D. Bernal: the Sage of Science* (Oxford, 2005); Simon Winchester, *Bomb, Book and Compass: Joseph Needham and the Great Secrets of China* (London, 2008)。

20 但是在德國占領下，文學比視覺藝術更堅持拒絕奉承占領者，尤其是表演藝術。另見：Henri Michel, *The Shadow War: Resistance in Europe 1939-1945* (London, 1972), p. 141。

21 關於其季刊《審視》（*Scrutiny*）的政治立場，見：Francis Mulhern, *The Moment of 'Scrutiny'* (London, 1979), part II, chapter 2。

22 例如：Aldo Garosci, *Gli intellettuali e la guerra di Spagna* (Turin, 1959)。

23 試比較：G. Amendola, *Un'isola*, pp. 96-7（法西斯警察的證詞）。P. Spriano, *Storia del PCI* (Turin, 1970), III, pp. 194-201. Thomas Kroll, op. cit., pp. 361-6, 382-90, 394-402。

24 Andrew Boyle, *The Climate of Treason* (London, 1980), chapters 1-4。關於「公學的叛變」，見：Esmond and Giles Romilly, *Out of Bounds* (London, 1935), and Philip Toynbee, *Friends Apart* (London, 1954). Miranda Carter, *Anthony Blunt: His Lives* (London, 2001)。

25 Stephen Spender, *Forward From Liberalism* (London, 1937).

26 茲舉幾個例子：湯普生（Edward Thompson）（著名的印度自由的擁護者），卡里特（E. F. Carritt）（牛津道德哲學家），史特拉旦利（St Leo Strachery）（具影響力的雜誌《觀察家》的編輯）。

27 作者想到有許多共產主義學生，他們的親戚都是著名的保守派政治人物或法官。關於英國的一般狀況，另見：T. Kroll, op. cit., pp. 511-3, 525-33。

28 至於白手起家的中學教師，包括科涅特（G. Cogniot）和帕侯（A. Parrwaux），他分別是《思想》雜誌的社長和祕書。另外有薩波（A. Saboul），研究法國大革命的歷史學家。

29 Stuart Samuels, 'The Left Book Club'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John Lewis, *The Left Book Club* (London, 1970)。由出版社的記錄推論出的俱樂部的資料，見：Richard Overy, *The Morbid Age: Britain between the Wars* (London, 2009), pp. 304-6。

30 Francis Newton, *The Jazz Scene* (Harmondsworth, 1961), caps 13, 14, App. 1.

31 對於一九三〇年代好萊塢的影響，見：Patrick McGilligan and Paul Buhle (eds), *Tender Comrades: A Backstory of the Hollywood Blacklist* (NY, 1997)。

32 以上謬誤的列舉，出自：Arthur M. Schlesinger Jr (Harvard, Cambridge and the court of J.F. Kennedy), *The Age of Roosevelt: The Politics of Upheaval* (Boston, 1960), p. 165。

33 J. Fauvet, *Histoire du Parti Communiste Français* I (Paris, 1964), pp. 267-8.

34 Annie Kriegel, *The French Communists* (Chicago & London, 1972), pp. 175-6.

35 *Communist Manifesto*, *Werke* 19, p. 296（俄文版前言）。

36 是根據英國共產黨歷史學家團體於一九五五年編輯的圖書目錄推算的，包括美國作品和翻譯。

37 Stuart Macintyre, *A Proletarian Science* (Cambridge, 1980) and R. Samuel, '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 I' (*New Left Review* 120/1980, pp. 21-96).

38 尤其是刻意淡化馬克思裡頭的黑格爾元素，將「亞洲生產方式」從他的分析裡移除。本章不擬討論該修正是否合理或不成問題。

39 Cf. K. Wittfogel, *Oriental Despotism*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1957), p. 401ff.

40 M. Shirokov and J. Lewis (eds), *A Textbook of Marxist Philosophy* (London n.d. -1937), p. 183; I. Luppol, *Diderot* (Paris, 1936).

41 P. Anderson, *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London, 1976).

42 C. Haden Guest (ed.), *David Guest: A Scientist Fights for Freedom. A Memoir.* (London, 1939), p. 256.

43 H. Lefebvre, *Le nationalisme contre les nations* (Paris, 1937), p. 128。當然，作者以更正統的觀點公開駁斥鮑爾，但是以特別加注的方式說是經由史達林的「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的文本的「直接啟發」（ibid., p. 225）。

44 H. Lefebvre, *Le matérialisme dialectique* (Paris, 1939), pp. 62-4.

45 分別於巴黎（1946）和倫敦（1939）死後出版。

46 「馬克思主義的『哲學』也懂得一種奇特的風潮。在寫《反杜林論》時，恩格斯在自然科學、物理學和化學認真探究新的事物，顯示自然世界也符合馬克思和他應用在歷史和社會的演變的『辯證法』。而現在的科學家，甚或是偉大的科學家，他們經由發現他們各自的科學裡的『哲學』，也提出相同的說法。」（'A. Rossi', *Physiologie du Parti Communiste Français* (Paris, 1948), p. 335）。該書寫於一九四二年。

47 E.H.S. Burhop in M. Goldsmith and A. Mackay (eds), *The Science of Science* (London, 1964), pp. 33.

48 C.P. Snow in John Raymond (ed.), *The Baldwin Age* (London, 1960), p. 248.

49 霍爾丹，共產主義天才生物學家，他承認列寧的時空觀點和相對論不相容，但是他自我安慰說，列寧在一篇文章裡接受相對論，不過拒絕它的唯心論詮釋，「可惜我無法讀到它的翻譯本」。（*The Marxist Philosophy and the Sciences*, London, 1938, p. 60）他將這件事和列寧的接受新經濟政策相比較。

50 *Marx-Engels Archiv*, Band II (Erlangen, 1971) pp. 140-1。德國社民黨顯然接受和該黨有來往的少數自然科學家其中一位的建議，不打算（在恩格斯死後不久）出版手稿，但是那個科學家「熱中於經驗主義，厭惡辯證法」。（Ryazanov in *Marx-Engels Archiv* II）對於批評恩格斯的學說過時的說法，雅札諾夫的辯護很謹慎，而手稿最早並不是收錄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裡，而是在《馬克思恩格斯文庫》，作為補遺，而不是他的著作。

51 個人資料。

52 J.B.S. Haldane, op. cit., and *A la lumière du marxisme* (Paris, 1936).

53 Christopher Caudwell, *The Crisis in Physics* (London, 1939), p. 60.

54 J.B.S. Haldane, 'A Dialectical Account of Evolution' (*Science and Society* I/4, 1937, pp. 473-86).

55 Joseph Needham, 'On Science and Social Change' (*Science and Society* X, 3, 1946, pp. 225-51)；一九四四年寫於中國。李約瑟是個基督徒、馬克思主義者、胚胎學家、歷史學家（胚胎學史、英國革命以及中國科學與文明），一直在探索一個非伽利略的科學世界觀，他是對於十九世紀模式感到失望的一個特別有趣的例子。

56 Caudwell, op. cit., pp. 21, 3.

57 *Science at the Crossroads* (London, 1931).

58 S. Zuckerman, *From Apes to Warlords* (London, 1978), p. 394. Appendix I。詳細提到「托茲和奎茲」。

59 在 *New Statesman* 28.1.1939裡的對話。

60 D. Caute, *The Fellow Travellers: A Postscript to the Enlightenment* (London, 1973).

61 B. Crick, *George Orwell: A Life* (London, 1980), pp. 310-19；探討歐威爾在《動物農莊》的爭議。另見馬丁（Kingsley Martin），《新政治家和國家》（*New Statesman and Nation*）的編輯，談到他拒絕刊登歐威爾支持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POUM）的文章：「我更在乎西班牙的戰爭打輸，勝於我生命裡的任何事……雙方都窮凶極惡；但是我必須基於公開的理由做決定，到頭來總有一方會打敗另一方。」（P. Johnson in *New Statesman*, 5.12.1980, p. 16）。

62 茨威格抨擊一九三〇年最早的公審大會。（D. Caute, op. cit., p. 279）

63 J. Rühle, *Literatur und Revolution* (Munich, 1963), p. 136.

64 國際縱隊似乎沒有很多知識分子（除了職業革命家），雖然他們的出現在美國人和捷克分隊裡顯得異常醒目。Andreu Castells, *Las Brigadas Internacionales de la guerra de España* (Barcelona, 1974), pp. 68-9。另見：N. Carroll, *The Odyssey of the Abraham Lincoln Brigade: Americans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Stanford, 1994); Rémy Skoutelsky, *L'Espoir guidait leurs pas: les volontaires français dans les Brigades Internationales* (Paris, 1998); Richard Baxwell, *Volunteers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the British Battal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Brigades, 1936-1939* (London, 1994)。

65 法國的期刊有：*Commune* (*Revue littéraire française pour la défense de la culture*)、*Europe*、*La Pensée*；另外是有更廣大的人民陣線基礎的周刊：*Vendredi*；在英國則有左派讀書俱樂部、短曇花一現的 *Left Review*、*Modern Quarterly*，以及戰時和戰後的 *Our Time*；在美國有：*New Masses*、*Science and Society*、*Partisan Review*。

66 季米特洛夫在第一次共產國際大會上說：「這個（反法西斯聯合陣線的）政府不能帶來最後的拯救……最後它必須為社會主義革命做準備：蘇維埃政權，而且唯有蘇維埃政權，才能帶來拯救。」

67 引用一個著名的傳統學者的話，共產主義的國際縱隊對他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社會革命（對某些人）以前或許是個天堂，但是現在它是愚人的天堂：如果沒有精實的軍隊，它的日子就所剩無幾了。創造那個天堂的人們證明沒辦法從事像佛朗哥對他們發動的那樣的戰爭。」見：Bernard Knox, 'Remembering Madrid'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6.11.1980, p. 34)。

68 我們不擬探討對於新社會主義政權的可能批評。

69 第克羅（Jacques Duclos）在《共產主義手冊》（*Cahiers du Communisme,* April 1945）裡批評一九四四年美國共產黨的瓦解的文章被視為權威，沒多久以後，美國共產黨就重建了。

70 Wolfgang Leonhard, *Child of the Revolution* (London, 1979), p. 208.

71 E. Lustmann, *Weg und Ziel: die Politik der österreichischen Kommunisten* (London, 1943), p. 36. Dimitrov in 1946, cited in F. Fejtö, *Histoire des démocraties populaires* (Paris, 1969), I, p. 126.

72 Fernando Claudin, *La crise du mouvement communiste: du Komintern au Kominform* (Paris, 1972), p. 533; Eugenio Reale, *Avec Jacques Duclos au banc des accusés* (Paris, 1958), pp. 75-6.

73 Earl Browder, *Teheran and America: Perspectives and Tasks* (NY, 1944), p. 14。「它為每個民族保留在這架構裡自己決定它所要的政府和社會組織形式。」

74 同前揭：pp. 13-14。

第十二章 葛蘭西

安東尼奧・葛蘭西死於一九三七年。在他死後七十五年的前十年裡，除了他從一九二〇年認識的老同志以外，幾乎是默默無聞，因為他的作品很少出版或流通。那不意味著他就沒有影響力了，因為陶里亞蒂或許可以說是領導義大利共產黨走上葛蘭西的路線，或至少是他對葛蘭西路線的詮釋。不過對於其他地方大多數人而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前，即使是共產黨員，葛蘭西也只是個名字而已。他過世十年後，在義大利聲名鵲起，甚至在共產黨的圈子以外的人們對他也備極推崇。共產黨大量出版他的作品，尤其是伊瑙迪出版社。儘管人們對於這些早期版本頗多批評，它們至少使得葛蘭西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而義大利人也將他視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更是二十世紀義大利的主要人物。

但是僅止於義大利。因為在那十年裡，基於現實的因素，葛蘭西在他的國家以外一直是無人聞問，因為幾乎沒有他的翻譯作品。的確，即使是他感人肺腑的獄中書簡在美國和英國的出版計畫也胎死腹中。除了少數在義大利有個人人脈或是懂義大利語的人（大部分是共產黨）以外，他或許只活在阿爾卑斯山的這一邊。

到了第三個十年，國外終於對葛蘭西第一次激起真正的興趣。他們無疑是受到去史達林化的

刺激，甚或是陶里亞蒂在一九五六年以後成為發言人的獨立態度。無論如何，在該時期裡，我們總算看到他的第一本英譯作品選集，以及在共產黨以外關於他的第一次討論。除了義大利以外，英語系國家是最早持續關注葛蘭西的地區。弔詭的是，在同一個時期裡，義大利自己對於葛蘭西的批評聲浪越來越尖刻，義大利共產黨在他的作品的詮釋問題上也爭議不斷。

最後，在一九七〇年代，葛蘭西終於完全得到他應得的評價。在義大利，經由《獄中書簡》（1965）完整版的出版、各種早期作品和政治著作的出版，尤其是學問震古鑠今的傑拉塔納詳實考訂年代的《獄中札記》（1975），他的作品的出版總算有了讓人滿意的學術基礎。由於共產黨致力推動有系統的歷史編纂，葛蘭西的生平以前他在共產黨歷史裡的地位也更加清楚。我們不擬於此概說一九六〇年代中期義大利的葛蘭西論戰。在國外，葛蘭西的作品總算有差強人意的翻譯選集，尤其是霍爾．史密斯和諾厄．史密斯主編的兩大冊，由羅威出版社（Lawrence & Wishart）出版。此外更有諸如費奧里的《葛蘭西傳》（*Antonio Gramsci: Life of a Revolutionary*）的重要二手資料的翻譯。[1]我們也不打算於此綜觀越來越多關於他的英語文獻（各自代表不同的但一致敬重的觀點），而只強調一點：在他死後四十年，人們不再有任何不認識葛蘭西的藉口。更重要的是，現在人們就算沒有真正讀過他的作品也都認識他。葛蘭西諸如「霸權」的典型術語，出現在馬克思主義裡，甚或偶爾出現在非馬克思主義者關於政治和歷史的討論裡，而且定義很寬鬆，正如兩次大戰期間的佛洛伊德。葛蘭西成為我們的思想世界裡的一部分。作為馬克思主義一個有原創性的思想家（我認為是自一九一七年以來西方國家裡最有原創性的一位），他的地

位已經獲得一致的肯定。然而他到底說了什麼，以及他為什麼那麼重要，至今沒有太多的討論，大家只知道他很重要。我只突顯關於他的重要性其中一個理由；他的政治理論。

思想家並不抽象地發明觀念，而只能從他們的時代的歷史和政治背景去理解他們，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雖然馬克思強調說人類創造他們自己的歷史（或者你想說人類想出他們自己的想法），他卻也說，他們只能在眼前的條件下，在既有的、承襲的條件下去創造。（著名的《霧月十八日》裡的話）。葛蘭西的思想很有創意。他是個馬克思主義者，更是個列寧主義者，我不打算浪費時間為他反駁各個派系的指控，他們聲稱完全明白誰是馬克思主義者，而誰不是，而且擁有他們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版本的著作權。然而對於在馬克思主義的典型傳統裡長大的我們而言，無論是在一九一四年以前或是一九一七年以後，他經常是個讓人咋舌的馬克思主義者。例如說，他的著作裡很少談到經濟發展，而有大量的政治論述，包括克羅齊、索雷爾、馬基維利的觀點，在經典作品裡，他們通常不會是主角。所以，我們必須探索他的背景和歷史經驗，以解釋他的獨創性。不消說，這絕對不會減損他的思想地位。

當葛蘭西被關在墨索里尼的監獄裡時，他是義大利共產黨的領袖。在葛蘭西時代的義大利，有許多歷史上的獨特性，造就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獨創性分歧。我簡單提一下其中幾點。

一、義大利是世界資本主義的縮影，在一個國家裡，包含了大都會和殖民地，先進和落後的地區。葛蘭西出生在薩丁尼亞島（Sardinia），那裡象徵著義大利的落後，更不用說是老舊而半殖民地的地區；杜林及當地的飛雅特（Fiat）工廠（他在那裡成為工人階級領袖），則象徵著

工業資本主義最進步的階段，以及大部分農民如何轉型成為工人。換言之，一個義大利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有絕佳的機會領會到已開發的資本主義世界和「第三世界」的本質及其互動，而不像各自來自其中一種世界的馬克思主義者。順便說一下，僅僅將葛蘭西視為「西方國家的共產主義」的理論家，那是很荒謬的事。他的思想既不是只針對工業先進國家，也不是只能適用它們。

二、義大利歷史的獨特性有一個重要影響，也就是就算在一九一四年以前，義大利的工人運動既涉及工業，也和農業有關，既是無產階級的，也是以農民為基礎的。就此而論，它在一九一四年以前的歐洲可以說獨樹一幟，不過我們不打算於此細說它，而僅以兩個例證彰顯其重要性。共產主義影響力最大的地區（艾米利亞〔Emilia〕、托斯卡尼〔Tuscany〕、翁布里亞〔Umbria〕）都不是工業區，而戰後義大利工會運動的偉大領袖，狄維多利歐，他是南方人，而且是個農場工人。知識分子在工運裡舉足輕重，義大利並不是絕無僅有的國家，他們大多來自落後且半殖民的南方地區。然而該現象卻相當耐人尋味，而且在葛蘭西的思想裡扮演重要的角色。

三、第三個獨特性則是義大利民族和資產階級社會的歷史特性。再次，我不擬贅述細節。我們只要記住三點：（一）、在幾個世紀以前，義大利的近代文明和資本主義領先其他國家；但是它無法守成，因而在文藝復興和復興運動（Risorgimento）期間停滯不前；（二）、不同於法國，資產階級沒有經由革命勝利建立社會，也不同於德國，它沒有接受舊有的統治階級紆尊降貴地提出的妥協條件。它成就了部分的革命：義大利統一的成就，部分是來自上層階級（加富爾），部分要歸功下層階級（加里波底）；（三）、因此，在某個意義下，義大利資產階級沒有

（或者沒有完全）成就它在創建義大利國家方面的歷史任務。它的革命是不完全的，而諸如葛蘭西之類的義大利社會主義者，因而特別意識到他們的運動的可能角色，作為國家未來的領導者，國家歷史的承載者。

四、無論以前或現在，義大利不僅是個天主教國家，在該國裡，教廷是個很特別的義大利機構，一個沒有國家機器的統治階級。在義大利，民族菁英文化往往優先於民族國家。所以，義大利的馬克思主義者比其他人更清楚葛蘭西所謂的「霸權」，也就是不只是以強制力為基礎的權威。

五、因此，基於各種理由（我剛才提到了幾個），義大利是某種政治經驗的實驗室。這個國家有悠久的政治思想傳統，從十六世紀的馬基維利到二十世紀初期的帕累多以及莫斯卡；即使是我們所謂政治社會學的外國先驅，也都和義大利有關，他們的觀念甚至承襲自義大利的經驗，我說的是索雷爾和密歇爾斯。難怪義大利馬克思主義者會特別重視政治理論的問題。

六、最後還有個重要的事實。在一九一七年以後，相較於英國、法國，我認為甚至是德國，義大利更具有社會革命的種種主客觀條件。然而革命並沒有出現，相反的，法西斯主義崛起。想當然耳，關於俄國十月革命為什麼沒有延伸到西方國家，這些國家如何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替代性策略和戰術，關於這些問題的分析，義大利馬克思主義者遙遙領先。那也正是葛蘭西著手要做的事。

這也是我的主要論點，也就是葛蘭西對於馬克思主義的主要貢獻，在於開創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理論。儘管馬克思和恩格斯有大量政治著作，卻不願意在該領域開展出一個概括性的

理論，大抵上是因為（正如恩格斯晚期在粉飾唯物史觀的書信裡指出的）他們覺得更重要的是指出，「國家的種種法定關係以及形式不能就其自身去理解，而必須根植於生活的物質條件」（《政治經濟學批判》前言）。於是他們尤其強調「政治學、法理學和其他意識型態的觀點如何衍生自基本的經濟事實」（恩格斯致梅林信）。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討論諸如統治的本質和結構、國家的構成和組織、政治運動的性質和組織之類的問題，大部分是基於時事評論，一般是附屬於其他論證，除了關於國家的起源和歷史性格的理論以外。列寧覺得有必要就國家和革命問題開展出更有系統的理論，在奪權前夕聽起來自然很合理，但是我們都知道，在他完成理論以前，十月革命就接踵而至。我也將指出，第二國際時期關於社會主義革命的結構、組織和領導問題的密集討論，都是著眼於實踐的問題。它的理論概括化只是附帶的、臨時的事，除了民族問題的領域以外，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繼承者幾乎是從無到有。我不是說這無助於重要的理論創新（例如列寧），雖然理論的創新很弔詭地都是基於實用的目的，而不是理論的需要，即使有馬克思主義分析的支撐。例如說，如果我們讀到列寧關於政黨的新觀念，會很意外論爭裡鮮少提到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即使有許多知名人物加入論戰，例如考茨基、盧森堡、普列漢諾夫、托洛斯基、馬爾托夫、雅札諾夫。其中的確暗示著一個政治理論，不過只是若隱若現。

這個裂痕有許多原因。無論如何，在一九二〇年代以前，它似乎無關緊要。但是自此以後，它成為越來越嚴重的缺點。除了俄國以外，革命不是失敗就是沒有發生，系統性的重新思考成了當務之急，不只是運動如何奪權的策略，也包括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技術性問題，在一九一七年以

前，人們從未將它們視為具體而當下的問題認真思考。在蘇聯內部，當蘇維埃政權從最初的杌隉不安到持續執政，就其政治結構和體制而言，作為一個「公民社會」，他們應該有什麼樣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問題漸漸浮現。基本上，這個問題直到近年來才開始困擾著馬克思主義者，在蘇聯的共產黨、毛澤東主義者以及「歐洲共產黨」之間爭辯不休，更不用說共產黨運動以外的人們了。

我必須強調，我們現在談的是兩組不同的政治問題：社會主義社會的策略和本質。葛蘭西試圖把握兩者，雖然我覺得某些評論者過度專注於其中一方，也就是策略。但是，無論這些問題的性質為何，沒有多久，就再也無法在共產主義的運動裡去討論它們。其實，我們大可以說，葛蘭西只能在作品裡解決那些問題，因為他身陷囹圄，和外界的政治隔絕，他的寫作不是為了當下，而是為了未來。

這並不是說，他沒有就一九二〇年代和三〇年代初期的局勢從事政治寫作。其實，在理解他的作品時的一個困難就是，我們大多數人不清楚或忘記了的局勢和討論，他總是認為對它們如數家珍是理所當然的事。培瑞．安德森最近提醒我們說，他最獨特的思想其實是在一九二〇年代初期共產國際的論爭時開展出來的主題。無論如何，他終究是在馬克思主義裡闡述一個完整的政治理論的種種元素，而他或許是第一個這麼做的馬克思主義者。我不打算概說他的觀念，而只抽出幾個元素，並且突顯它們在我心裡的重要性。

葛蘭西之所以是個政治理論家，不僅在於他將政治視為「一個自主性的作為」（《獄中札記》），在歷史發展的脈絡和限制裡，更因為他特別著眼於探究「政治科學在馬克思主義世界的

系統觀念裡應有的地位」（同前揭）。然而那不僅意味著他將他心目中的英雄馬基維利（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裡鮮少出現的人）的作品裡的那種討論引進馬克思主義裡。對他而言，政治不只是成就社會主義的策略核心，更是社會主義本身的核心。正如霍爾．史密斯和諾厄．史密斯正確指出的，他認為它是「核心的人類行動，個人意識和各種形式的社會及自然世界接觸的手段」（《獄中札記》）。簡言之，它的含義比一般的用法更廣。甚至比葛蘭西自己狹義的「政治的科學和藝術」更廣，他將它定義為「研究和詳盡觀察的所有實踐性規則，有助於喚醒對於實際世界的興趣，激發出更嚴謹也更有力的政治洞見。」它部分地隱含在實踐本身的概念裡：理解世界就是改變世界。而所謂的實踐，人類自己創造的歷史，儘管在既有的（而且正在發展中的）歷史條件裡，就是他們的所做所為，而不只是人們藉以意識到社會的矛盾的種種意識型態。用馬克思的話說，它就是他們如何「鬥爭到底」。簡言之，這就是所謂的政治行動。但是那也部分承認了一個事實，也就是政治行動本身是個「自主性的作為」，儘管它是「生於經濟生活的『恆久』而『有機』的地域」。

這也適用於社會主義的構成，或許尤有甚者。你或許會說，對葛蘭西而言，社會主義的基礎不在於經濟意義下的社會化，也就是由社會擁有和規劃的經濟（雖然這顯然是它的基礎和框架），而是在政治和社會學意義下的社會化，也就是所謂在集體人類形成習性的歷程，使社會行為成為自動自發的，而不再需要一個外在機制將規範加諸其身；自動自發的，卻也是有意識的。當葛蘭西談到生產在社會主義裡的角色時，它不只是創造一個物資豐饒的社會的手段，雖然我們

可以附帶說，他並不懷疑生產極大化的優先性。那是因為對於人們在資本主義底下的意識而言，人們在生產中的地位是個關鍵；因為工人在大工廠裡的經濟是這個意識的自然學校。或許是從在杜林的經驗出發，葛蘭西並不認為現代的大工廠是個異化的場所，而更好說是社會主義的學校。

但是重點在於，社會主義裡的生產因而不能只是被視為各自獨立的技術和經濟問題；他認為必須同時將它視為政治教育和政治結構的問題。即使在資產階級社會（它在這方面是進步的），工作的概念是教育的重點，因為「當人們發現社會和自然的秩序是以工作為中介，以理論和實踐的行動，他們便創造了擺脫所有巫術和迷信的世界體制的最早元素。它為世界的歷史性和辯證性觀念的後續發展提供了一個基礎，以理解運動和改變……，將當代世界想像為過去所有世代的綜合，而將自身投射到未來。這是小學的現實基礎。」我們順便也注意到葛蘭西的一個經常出現的主題：未來。

由一九三一年九月著名的一封信，可以突顯出葛蘭西的政治理論的主題：

> 我關於知識分子的研究是個大計畫……我對於知識分子的觀念遠超過該語詞的時下意義，它主要指的是偉大的知識分子。該研究也讓我推論出國家的若干界定。它通常被理解為政治社會（也就是強制性機構的專政，讓群眾遵循著當時最主要的生產和經濟的類型），而不是政治社會和公民社會（也就是一個社會族群對於整個國家社會的霸權，經由所謂的民間組織，例如教會、工會、學校等等）的平衡。公民社會正是專屬於知識分子的行動場域。[2]

國家作為強制性體制和霸權體制的平衡（你也可以說是兩者的統一），這個觀念本身沒有什麼創新之處，至今對那些務實看世界的人們而言。統治階級顯然不只是依賴於強制力和權威，也依賴於衍生自霸權的認可，也就是葛蘭西所謂統治團體的「知識和道德的領導權」，以及「主要的支配性團體加諸社會生活的一般性方向」。葛蘭西的創新之處在於他說，即使是資產階級的霸權，也不是自然而然發生的，而是經由有意識的政治行動和組織所成就的。以前義大利文藝復興的城市資產階級，唯有憑著諸如雅各賓黨的行動，才有辦法變成全國性的霸權（正如馬基維利所說的）。一個階級必須超越葛蘭西所謂的「行會」（economic-corporative）組織，才能在政治上擁有霸權；那剛好也是為什麼最好戰的工會主義始終是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底層（subaltern）。我們由此推論說，「支配性」、「霸權」和「底層」的區別是很根本的。那是葛蘭西的另一個創新，也是他的思想關鍵。因為革命的基本問題在於如何讓底層階級取得霸權，相信自己是未來的統治階級，並且讓其他階級信任他們。

對葛蘭西而言，「政黨」（「現代王子」）的重要性就在這裡。因為除了一般政黨在資產階級時期的發展的歷史意義以外（葛蘭西對此有精采的闡述），他也承認說，唯有透過它的運動和組織（也就是透過政黨），工人階級才能發展它的意識，並且超越自發性的「行會」或工會階段。其實，在社會主義成功的地方裡，政黨總是轉型成為國家，兩者是互為因果的。關於政黨的角色的一般性觀點，葛蘭西受列寧主義影響甚深，雖然在關於政黨組織或者政黨活動的本質方面並不必然如此。然而我認為他在關於政黨的本質和功能的討論上超越了列寧。

然而儘管政黨和階級在歷史上經常被劃上等號，但是畢竟不是同一個東西，而且可能會有分歧，尤其是在社會主義的社會裡，因此產生了許多實踐上的問題。葛蘭西很清楚這些問題，以及官僚化等等的危險。的確，他對於列寧主義在蘇聯的發展的憎惡甚至讓他銀鐺入獄。我很想可以說他為這些問題找到答案，但是我不確定他有什麼超越其他人的成就。不過，葛蘭西關於官僚集中制的評論，雖然非常濃縮而艱澀難懂（即《獄中札記》），卻很值得認真研究。

葛蘭西另一個別出心裁的地方，在於他堅持說，統治的機制，無論是霸權或其權威的形式，基本上都是由「知識分子」組成的。他不是將知識分子定義成特殊的菁英或是特殊的社會範疇，而是社會為了這些目的的一種功能性專門化。換言之，對於葛蘭西而言，所有人都是知識分子。現在這點很重要，因為它支撐了上層結構在社會歷程裡的自主性角色，出身工人階級的政治家甚或不一定是工作臺上的工人。然而，儘管葛蘭西對此經常有精闢的歷史論述，我卻不認為這些評論對於葛蘭西的政治理論而言有他自己所想的那麼重要。尤其是，我認為他的區分「傳統的」知識分子以及一個新階級所產生的「有機的」（organic）知識分子，並沒有他想像的那麼重要，至少在某些國家裡是如此。或許是因為我在這裡沒有完全掌握他艱澀複雜的思想，而我也必須強調說，從葛蘭西大篇幅地探討這個問題，足見它對他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葛蘭西的策略思想不僅（一如往常地）充滿精湛的歷史洞見，而且有重要的實踐意義。我想我們在這方面必須區分三件事：葛蘭西的一般性分析、他關於共產黨在個殊歷史時期裡的策略的看法，以及義大利共產黨對於策略的實際看法，他們自然是受到陶里亞蒂及其後繼者

對於葛蘭西的解讀的啟發。我不想提到第三點，因為這樣的討論和本文無關。我也不想細說第二點，因為我們對葛蘭西的論斷並不取決於他對於一九二〇年代和三〇年代的特殊情勢的評定。我們或許可以說，馬克思的《霧月十八日》是一部深刻而根本的作品，即使馬克思自己對於一八五二年到七〇年的拿破崙三世的態度以及他對於其政權的政治穩定性的看法經常不切實際。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對於葛蘭西自己或陶里亞蒂的策略的批判。他們兩者都是可以辯護的。撇開這些不談，我想要突顯葛蘭西的策略理論裡的三個元素。

第一個元素並不在於葛蘭西在西方國家選擇一個持久戰或「陣地戰」的策略，以抵抗他所謂的「正面攻擊」或機動戰，而是在於他「如何」分析這些選擇。有鑑於一九二〇年代初期的義大利以及大多數西方國家並不會有十月革命這樣的東西（前景也不看好），他顯然必須考慮一個長遠的策略。但是他其實沒有就他所預測且倡議的持久的陣地戰探究任何特殊的結論。它或許會直接導致社會主義的過渡，或是任何機動戰和攻擊的任何階段，或是其他策略階段。一切都必須視具體情勢的變化而定。然而，他的確思考一個可能性，很少有馬克思主義者如此清楚面對它，也就是革命在西方國家裡的失敗可能會長期削弱藉由他所謂的「消極革命」（passive revolution）產生的進步力量。一方面，統治階級或許會同意若干要求，以先發制人並且防堵革命，另一方面，革命運動或許會在實踐上（雖然在理論上不一定會）接受它的無力，開始被侵蝕，在政治上被合併到體系裡（見《獄中札記》）。簡言之，「陣地戰」必須作為一種戰術有系統地通盤思考，而不是革命者在無法構築防禦工事時才要做的事。從一九一四年以前的社會民主主義的經驗，葛蘭西

當然理解到馬克思主義並不是歷史決定論。光是等待歷史自然而然地讓工人掌權，那是不夠的。

第二個元素在於葛蘭西堅持說，讓工人階級成為可能的統治階級的鬥爭，必須在權力轉移以前就開始，而不只是在轉移期間或以後。但是這個鬥爭不僅僅是「陣地戰」的一個面向，它是革命者在任何環境下的策略的決定性面向。當然，如果可能的話，在權力轉移前取得霸權，在某些國家裡特別重要，他們統治階級的權力是建立在群眾的底層性（subalternity），而不是在於強制手段。在大多數「西方」國家尤其如此，不管極左派怎麼說，而他們毫無疑問地終究還是會動用強制手段。我們看到，在智利和烏拉圭，超過某個臨界點以後，以強制手段維持統治就顯然和表面或實際的共識的行使水火不容，統治者必須在霸權和武力、在懷柔和鐵腕之間作抉擇。當他們選擇武力時，結果經常是不利於工人階級運動。

然而，在某些以革命推翻舊有的統治者的國家裡，例如葡萄牙，如果沒有霸權的力量，即使是革命也會舉步維艱。它們仍然需要贏得那些尚未脫離舊政權的階級足夠的支持和共識。就策略去思考，霸權的基本問題不在於革命者如何奪權，雖然這個問題很重要。而是在於他們如何不只是被接受為在政治上存在的或不可缺少的統治者，更是個嚮導和領袖。就此而言，顯然有兩個層面：如何贏得共識，以及革命者是否準備好行使領導權。具體的政治情勢，無論是國內或國際的，可能讓他們事半功倍或是困難重重。一九四五年的波蘭共產黨可能就沒有被接受為霸權力量，雖然他們已經摩拳擦掌：但是多虧國際情勢，他們總算鞏固政權。一九一八年的德國社民黨原本可以被接受為霸權力量，但是他們無意於此。德國革命的悲劇正在於此。捷克共產黨在一九

四五年和一九六八年原本也都可能被接受為霸權力量，而他們也準備好扮演該角色，可是情勢不許可。在權力的轉移（無論其性質或速度如何）以前、期間或以後，霸權的爭取都是個關鍵。

第三個元素在於葛蘭西的策略以持續的、有組織的階級運動為核心。在這個意義下，他的「政黨」理念回歸到馬克思自己晚期將政黨視為有組織的階級的觀念，雖然相較於馬克思和恩格斯，甚或列寧，他重視的不是正式的組織，而是政治領導和結構的種種形式，以及他所謂的階級和政黨之間的「有機」關係的本質。在十月革命的時代，大多數工人階級的群眾政黨都是社會黨。大部分的革命理論家，包括一九一七年以前的布爾什維克，都不得不從行動主義者的中堅政黨或團體的觀點去思考，他們只要一有機會，就會動員群眾不自覺的不滿，因為群眾運動通常不是也不被許可有改革主義者。他們還不能以永久扎根的、同時又是革命性的群眾工人階級運動的觀點去思考，它在他們國家的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葛蘭西在杜林運動裡形成他的理念，該運動是個罕見的意外。然而儘管創造出某些共產主義的群眾政黨，是共產國際的重大成就，但是有跡象顯示，例如「第三時期」的派系主義，國際共產主義的領導階層（有別於發生過群眾勞工運動的國家裡的共產主義）並不清楚用老方法發展出來的群眾勞工運動的種種問題。

葛蘭西所堅持的革命者和群眾運動的「有機」關係在這裡相當重要。義大利的歷史經驗讓他很清楚沒有這種「有機」關係的少數革命份子，他們是「志願者」的團體，一有機會就動員「在政治上的吉普賽幫眾或游牧民族，而根本不是真正的群眾政黨」（《獄中札記》）。即使是現在（尤其是現在），許多左派政策，基於類似的理由，並不是奠基於有群眾組織的真正的工人階

級，而是知識工作者的階級，以對於工人階級或任何其他可動員的團體的某種外部觀點為基礎。葛蘭西的原創性在於他是個從未向這個誘惑屈服的革命者。真正的有組織的工人階級，而不是理論上應然的，才是他的分析和策略的基礎。

可是正如我一再強調的，葛蘭西的政治思想不只是策略性的、工具性的或是實用性的。它的目標不僅是先獲得勝利，然後開始不同的分析的順序和類型。值得注意的是，當時他以某些歷史問題或事件為出發點，而由此去鋪陳他的理論，不只是關於統治階級或類似情況的政治學，而是一般性的政治學。那是因為他始終意識到所有人類的政治關係之間的共通性，或至少在歷史上形形色色的各種社會裡，例如說領導者和被領導者之間的差異。他從來沒有忘記，社會不只是經濟支配和政治權力的結構，也沒有忘記，即使被階級鬥爭撕裂，那些社會仍然有其凝聚力（恩格斯很早以前就說過），而從剝削的解放則是讓社會有機會建構為自由人類的真正共同體。他從來沒有忘記，社會（現實的或可能的社會）責任的承擔不只是照顧眼前的階級、派系甚或國家的利益：例如說，它預設了「和過去、傳統或未來」的傳承。因此，葛蘭西認為革命不只是沒收剝奪者的財產，更是一個民族的創造，一個國家的實現，例如義大利，既是對過去的否定，也是過去的完成。的確，葛蘭西的作品提出人們很少討論到的重要問題，在革命裡到底革除了過去裡的什麼東西，保留了什麼東西，為什麼要鼎故革新，以及怎麼做；也就是傳承和革命之間的辯證的問題。

但是對於葛蘭西而言，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當然是因為它既是人民動員和自我蛻變的工具，也是思想和道德改變的工具，更是集體的自我開展，後者則是人民在新霸權階級及其運動的領導下，透過鬥爭的改變和自我完成的過程之一。雖然葛蘭西和馬克思主義一樣，對於社會主義的未來都有耽於空想之嫌，但是不同於其他思想家，他的確在運動本身的性質裡找尋線索。如果他將它視為政治運動、政黨，詳盡而微觀地分析它的性質、結構和發展，如果他探索的是常態性而有組織的運動的出現（有別於瞬間的「爆發」），窮究它的毛細管和分子的元素（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是因為他認為未來的社會是奠基在他所謂透過這樣的運動（也「唯有」透過它）的「集體意志的形成」。因為唯有如此，至今一直在底層的階級才能夠翻轉為可能的霸權階級，或者說是有能力去建造社會主義。唯有如此，藉由它的政黨，它才能真正變成「現代王子」，政治上的轉化的引擎。而在自我建設時，它在某個意義下就已經建造了新社會的基礎，也由此可窺見其一斑。

最後我要問，為什麼我在本章著眼於作為一個政治理論家的葛蘭西。不只是因為他是個特別有趣而且刺激的理論家。當然也不是因為他在如何組織政黨或社會方面有什麼妙方。就像馬基維利一樣，他是探討社會應該如何建設和轉化的理論家，而不是在探討建構的細節，更不用說政治記者才會問的瑣事。那是因為在馬克思主義者當中，只有他最懂得政治作為社會的一個特殊向度的重要性，也因為他知道政治不只是涉及權力而已。這點在實踐上非常重要，不只是對於社會主義者而已。

資產階級社會，至少在已開發國家裡，一直很重視他們的政治架構和機制，我不打算於此探討其歷史理由。這就是為什麼政治機構成為推動資產階級霸權的有力手段，使得諸如捍衛共和、守護民主，或是保護公民權和自由之類的口號，將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團結在一起，而主要卻是對統治者有利，但是這不是說它們和被統治者無關。因此，它們不只是在強制甚或露骨的權謀臉上搽脂抹粉而已。

社會主義的社會，同樣基於各方面的歷史理由，也專注於其他任務，尤其是規劃經濟，而鮮少注意到他們的現實政治和司法制度以及程序（除了某些重要的問題以外，例如權力的問題，或是在多民族國家裡各個民族之間的關係問題）。人們總是以非正式的方法解決它們，有時候甚至違反了既有的憲法或政黨規章，例如定期召開代表大會，而且經常遊走在灰色地帶。在極端的情況下，例如近年來的中國，對國家的未來造成影響的重大政策決定，似乎都是從高層一小撮統治者的鬥爭裡突然產生的，而政策的性質總是很不清楚，因為從來沒有公開討論過。在這些情況裡，顯然有什麼地方不對勁。撇開這個政治疏失的其他缺點不談，如果人民被排除在政治程序以外，甚至被放任對於公共事務去政治化而冷感，我們又如何能夠期待它們能改變人類的生活、創造社會主義的「社會」呢（而有別於由社會擁有和掌控的經濟）？人們漸漸明白，大多數社會主義社會的政治體制的缺失，正導致嚴重的弱點，而必須加以匡正。無論是在尚未實現社會主義國家，或是已經實現了的，社會主義的未來都必須取決於是否更加注意這些問題。

葛蘭西在強調政治的重要性時，讓人們注意到社會主義的構成以及社會主義的成就的一個關鍵性面向。它是我們必須留意的警訊。因此，以政治為其分析核心的重要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尤其值得現在的我們閱讀、標記並且心領神會。

注釋：

1 葛蘭西的《獄中札記》有完整的英譯本（Joseph A. Buttigieg, (NY, 1992-97）。完整的《獄中書簡》見：*Letters from Prison,* Frank Rosengarten (ed), 2 vol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Y, 1993-94)。最普及的版本仍然是：Q. Hoare and G. Nowell-Smith (eds),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 (London, 1971)。另見：David Forgacs, *A Gramsci Reader: Selected Writings 1916-35*; James Martin (ed), *Antonio Gramsci: Critical Assessments of Leading Political Philosophers* 4 vols (London and NY, 2001)，收錄關於該思想家的眾多意見。最新的作品見：Anne Showstack Sassoon, Gramsci and *Contemporary Politics: Beyond Pessimism of the Intellect* (London and NY, 2000) and P. Ives, *Language and Hegemony in Gramsci* (London and Ann Arbor, 2004)。

2 A Gramsci, *Lettre del Carcere* (Turin, 1965), p. 481.

第十三章 對葛蘭西的接受*

葛蘭西在歐洲和美洲

讀過一本一九九四年關於葛蘭西的國際影響力的書的人，或許都會同意他的第一個西班牙擁護者的話，費南德茲．布耶教授說：「葛蘭西是個經典，也就是說，他是個從來沒有流行過、卻一直有人在閱讀的作者。」然而，這本書的每一章都在見證一個弔詭：這個經典作者在國際上的際遇隨著左派知識分子的時尚的改變而起起落落。在一九六〇年代，阿圖塞席捲拉丁美洲的旋風擋了葛蘭西的路，雖然阿圖塞在法國的名望也讓大眾認識了當時默默無聞的義大利人，阿圖塞對他有褒有貶。民眾對葛蘭西的接受度大抵上和一九六〇年到七〇年代「新左派」的極盛期相符，由此可見流行的元素特別明顯，他們很能夠消化庫坦奧所謂互不相容的思想元素的「大雜燴」（zuppa eclectica）。在一九九〇年代，流行的元素更加明顯，以前的左翼人士轉變為新自由主義

* 本章原本收錄於論文集：*Gramsci in Europa e America*, Antonio A. Santucci (ed), (Rome and Bari, 1996)。

者，他們再也不理會那些可能喚起他們舊時熱情的東西。正如伊莉娜・葛立果莉娃談到一九九一年後的俄國時所說的：「現在一切和馬克思主義有關的觀念傳統都會被譴責。」所以，一九九三年的俄國，「或許是全世界最後一個有『葛蘭西學派』的國家」。

同樣明顯的，如果不是葛蘭西死後四十年的情勢如此詭譎多變，他可能不會在世界思想的舞台上擔任要角。如果不是他的同志和崇拜者陶里亞蒂堅定地保存且出版他的作品，並且在義大利共產黨裡給與它們一個核心的地位，或許根本不會有人認識他。在史達林主義的情況下，這絕對不是非此不可的選擇，尤其是葛蘭西眾所皆知的異端學說，即使共產國際第七次世界大會的路線使得他的學說風險小了一點。無論陶里亞蒂自己後來如何批判葛蘭西，他在葛蘭西死後致力於「為他排除眼前的麻煩，保障他在『未來的政黨生命裡』有一席之地」[1]，從他回義大利的那一刻開始，始終堅持葛蘭西的核心地位，為葛蘭西後來的因緣際會打下了基礎。戰後不久出版的作品儘管有許多編輯上的舛錯和缺漏，卻使得葛蘭西聲名鵲起；撫今追昔，這個代價是值得的。多虧陶里亞蒂的堅持不懈，以及義大利共產黨的新聲望，在史達林死前，光是《獄中書簡》就在許多國家出版，包括某些「人民民主政治」。如果當地的共產黨沒有那麼做，也沒有別人會做。雖然沒有多久就完成了若干傑出的英譯本，但是在英國和美國，直到數十年後才有出版商願意出版《獄中書簡》。

即使如此，除了少數親身見識到義大利反抗運動、或是和戰後義大利左派有個人情誼的外國人以外，葛蘭西的「接受史」（Rezeptionsgeschichte）其實始自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大會。整整

二十年期間，國際共產黨運動一直試圖擺脫史達林和共產國際的傳統。在「社會主義陣營」裡，則反映在幾乎官方的承認葛蘭西為政治思想家和殉道者，蘇聯在一九五七到五九年出版葛蘭西的三大冊選集，蘇維埃代表出席一九五八年的第一次「葛蘭西大會」，重量級的而且暗底裡是修正主義的蘇聯代表出席第二次大會（1967），都是其見證。的確，在一九五六年以後的二十年間，著書探討葛蘭西的非義大利籍作者們，無論是當時或以前，很少不是熱情的馬克思主義者。一九七〇年代以前，在這個領域裡很難想像有任何非馬克思主義者，除了美國歷史學家史都華．休斯（他對義大利特別有興趣）以及英國的歷史學家詹姆士．卓爾（他專攻左派歷史）。當然，葛蘭西最後終於走進學院的文獻裡。

更確切地說，除了義大利以外，葛蘭西主要被視為共產主義思想家，為某些國家提供馬克思主義的策略，在他們的國家裡，十月革命只是個激勵而不能成為他們的模式，也就是說，為那些不具足革命環保和情勢的社會主義運動。在雅爾達備忘錄（Yalta Memorandum）到恩里科．貝林格過世期間，義大利共產黨的崛起和成就，很自然地將一般被認為是其策略啟發者的思想家的影響力散播出去。在一九七〇年代的「歐洲共產主義」期間，葛蘭西的國際聲望無疑到達巔峰，而在一九八〇年代有一些滑落，除了在西德，他在那裡被發掘得比較晚，人們對他的興趣在一九八〇年代初期正值高峰。當時左派還沒有放棄更傳統的叛亂和武裝鬥爭策略的希望，而偏好其他的思想導師。於是葛蘭西以怪異的兩階段方式滲透到拉丁美洲：一九五六年到六〇年以後共產黨馬克思主義的開始；以及一九七〇年代武裝鬥爭策略瓦解以後。

國際上關於葛蘭西的討論，似乎和義大利關於他們國家最偉大的思想家的激辯涇渭分明。義大利關於葛蘭西的主要著作都沒有翻譯，尤其是英文，除了費奧瑞的傳記，雖然有若干義大利文學的介紹，例如沙宣和墨菲撰寫和編輯的作品。那並不讓人意外。外國人在閱讀本國作者時，無論他們的興趣有多廣，總會以不同於本國讀者的態度去解讀，而像葛蘭西這樣和他的國家現實環環相扣的思想家，外國人和本國人的解讀難免會有分歧。不管怎樣，義大利某些激辯的主題不是關於葛蘭西的辯論，而是支持或（比較多是）反對義大利共產黨的某些政策階段。對於門外漢而言，或許有些索然無味。然而我們必須說，對外國讀者影響最大的，是葛蘭西的作品文本，而不是他的國家裡堆積如山的批判和詮釋的文獻。也就是說，那是在葛蘭西的主要作品集出現各種譯本的時代，或者是最早的時候，在第一個本地的葛蘭西學派站上思想舞台介紹還沒有任何翻譯的思想家的時候。基本上，我們可以說，義大利以外的國家開始接受葛蘭西，是在一九六〇年到六七年葛蘭西的作品出版的時候。

因此，國際接受葛蘭西的程度始終受限於左派政治起起落落的際遇。就某個程度而言，往後也必然如此。因為葛蘭西是出類拔萃的政治實踐的哲學家。大多數所謂「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權威，其實都可以被解讀為學院派，包括：盧卡奇、柯爾施、班雅明、阿圖塞、馬庫色諸人。他們的寫作和具體政治現實總是有點距離，甚或像列斐伏爾一樣，有時候會一頭栽進去，像是個政治創制者一樣。葛蘭西不能無視於這些現實，因為他的論證再怎麼概括化，總是探討著在他身處的個殊環境裡以政治改變世界的現實條件。就像列寧一樣，他無意於學術生涯，雖然和列寧不同，

他是個天生的知識分子，一個總是受到觀念強烈吸引的人。他是唯一身兼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以及馬克思主義群眾政黨的領袖的人，這並不是偶然的（如果我們撇開比較沒有創意的布魯諾·鮑爾不談的話）。歷史學家、馬克思主義者、非馬克思主義者，都認為他實至名歸，其中一個理由就在於他拒絕為了抽象和化約論的政治模式而脫離具體的歷史、社會和文化的現實領域。

因此，人們很可能會繼續從他的政治著作解讀葛蘭西，用他自己的話說，「研究和詳盡觀察的所有實踐性規則，有助於喚醒對於實際世界的興趣，激發出更嚴謹也更有力的政治洞見」。我不相信只有左派才在找尋這些洞見，雖然基於明顯的理由，那些和葛蘭西有志一同的人都把他視為指引。誠如布提吉格所說的，美洲的反共產主義者憂心忡忡，因為葛蘭西仍然能夠激勵後蘇聯時期的左派，即使列寧、史達林、托洛斯基和毛澤東已經銷聲匿跡。然而，儘管人們期望葛蘭西仍舊可以作為左派成功的政治行動的指引，他們卻很清楚，他的國際影響力已經滲透到左派以外的地方，也超越了工具性政治的領域。[2]

附帶一提，英美世界的工具書可能把他簡化成幾個字（我完整引用該辭條）：「安東尼奧·葛蘭西（義大利政治思想家，1891-1937），見『霸權』辭條。」[3]如果布提吉革引用的報導真的相信是葛蘭西將「公民社會」的概念引進現代政治論述的，那聽起來會很荒謬。[4]然而接受一個思想家為永恆的經典人物，經常可以從這些膚淺的工具書窺見一斑，他們顯然對他一無所知，只曉得他「很重要」。

葛蘭西死後五年，在義大利以外的地方已經如此「重要」，他在本國歷史和文化裡的地位幾

乎自始就得到承認。現在則得到全球大多數地方的承認。的確，以加爾各答為中心的方興未艾的「底層研究」歷史學派，暗示著葛蘭西的影響力仍然在擴大中。他走過了最初讓他成為國際矚目焦點的政治危機。他也度過歐洲共產主義運動本身。他已經證明了他獨立於意識型態流行的起伏不定。現在還有誰敢說阿圖塞或史賓格勒會再度流行起來？他也熬過了學術界圈地的如封似閉，那就像是其他許多「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家的命運。他甚至避免了成為任何一種「主義」。

他的作品未來的際遇如何，我們不得而知。然而他的成就已經足以確定且證成對於他在國際間的接受度的歷史研究。

英語世界的葛蘭西

國際上人文藝術科學[5]的文獻經常引用的世界級作家名單裡，沒有幾個義大利人，而十六世紀以後出生的只有五個人。例如說，維科和馬基維利都不在其列。其中卻肯定有葛蘭西。引述並不表示認識或理解，卻意味著被引述者有其思想地位。葛蘭西死後五十年，他的地位已經無庸置疑了。對於英語世界的歷史學家尤其如此。

戰爭使許多英語系的反法西斯主義知識分子來到義大利，葛蘭西在戰後不久即在該地區聲名大噪。早在一九四八年，他的作品就在《泰晤士報文學增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裡

被人同情地討論，也就是《歷史唯物論與克羅齊的哲學》（*Il materialismo storico e la filosofia di Benedetto Croce*）出版不久以後。他在義大利以外的地方被人發掘，歷史學家居功厥偉。有個歷史學家編纂了他的第一本非義大利語的文集（Louis Marks, *The Modern Prince*, London, 1956），早在一九五八年，一個著名的美國歷史學家，在以現存語言而言最家喻戶曉的二十世紀初期歐洲思想通史著作裡，就以「葛蘭西和馬克思的人文主義」（Gramsci and Marxist Humanism）為題討論他（H. Stuart Hughes, *Consciousness and Society*）。另一位英國歷史學家蓋文．威廉士則在一九六〇年首次以非義大利語討論「葛蘭西思想裡的霸權概念」（The concept of egemonia in the thought of Antonio Gramsci）（*Th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同時有另一位美國歷史學家完成他的博士論文，幾年後成為義大利以外第一本論述葛蘭西的書：坎密特的《葛蘭西與義大利共產黨的起源》（*Antonio Gramsci and the Origins of Italian Communism*, Stanford, 1967）。簡言之，在一九六〇年代，英語世界是除了義大利以外最熟識葛蘭西的地方，雖然仍有所不足。霍爾．史密斯和諾厄．史密斯嚴選編輯的葛蘭西作品集，自一九七一年起，也讓英語讀者更方便閱讀。[6]

葛蘭西對於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當然也有重大的影響，比起其他西方國家，他們在英語世界特別活躍而有影響力。不過並沒有一個歷史研究的「葛蘭西學派」，葛蘭西對於歷史學家的影響也很難和他對整個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區分開來。葛蘭西的作品和風範尤其有助於敲開在馬克思主義思想外圍形成的教條硬殼，他們在訴諸經典正統時，隱藏了和列寧一樣別出心裁的策略和評

論。葛蘭西幫助馬克思主義者擺脫粗俗的馬克思主義，也讓左派的對手很難再將馬克思主義斥為決定論式的實證主義的變形。

在這個意義下，葛蘭西主要的啟發不是在於葛蘭西學派，而是馬克思主義。關於馬克思自己所說的「人創造自己的歷史，但不是在他們所選擇的條件下創造的，……而是在承襲自過去的、眼前的、既有的條件下」（《霧月十八日》），有若干不同的說法（或者如威廉士所說的：「葛蘭西的馬克思主義是以人為中心，但它是個歷史意志，和歷史的客觀實在接軌」）[7]。儘管和當代其他馬克思主義者大異其趣，葛蘭西的主張政治和文化的自主性，甚至讓人不由得聯想到馬克思，它是如此的尖銳，就連已故的馬克思主義學者李希特海姆都沒有忘了評論一番。[8]

因此，在史學裡對於各種發展的權威性概述，很自然地都會特別在此脈絡去看葛蘭西。[9]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家也可能會說：「葛蘭西對於馬克思歷史學家的影響並不是特別新奇的事。我不認為葛蘭西探究歷史的方法有別於馬克思自己的方法。」[10]他的影響力並不因此稍有減損。努力要和墨守成規的共產主義傳統劃清界線的歷史學家們，當他們發現到這個「卓爾不群的理論家」（李希特海姆語）是站在他們這一邊時，受到無比的激勵和啟發。再者，一九五〇年代崛起的或東山再起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很少人像他如此浸淫於歷史裡，因而不像他那麼受到歷史學家的青睞。

然而，葛蘭西對於歷史學家還有個特別的影響，不只是經由葛蘭西鼓勵他們轉向（或回到）馬克思。因為葛蘭西自己的理論作品的某些概念不僅蘊義豐饒，為歷史分析增添了新的向度，他

自己更有許多探討歷史和政治問題的著作。

他對於義大利歷史的反省，儘管在他自己的國家有許多討論，不過在其他地方並沒有太多回響，除了義大利研究者們有限的團體以外。另一方面，在一個歷史研究的特殊領域，或是一組領域，葛蘭西的直接影響力很強烈，甚至是風行草偃。那是意識型態和文化的歷史，影響所及，主要是「黎民百姓」，尤其是工業發展以前的社會。葛蘭西在這個領域的影響力源遠流長。早在一九六〇年代，我就說過，「葛蘭西的作品裡最激勵人心的暗示，是呼籲我們比從前更注意關於『底層階級』世界的研究。」[11]

底層階級世界的歷史和研究自此就成為成長最快最興盛的歷史研究領域。探討該領域的，不只是馬克思主義者以及許多所謂左翼民粹主義者，更包括其他意識型態的歷史學家。該領域的成長不是因為葛蘭西呼籲這樣的研究；任何認真浸淫其中的人都不得不注意到一個認真思考它的不世出的思想家（在西方馬克思主義裡是獨一無二的，除了馬克思自己以外）。因為高度文化的歷史學家以及在作品裡表現的觀念可能在呼籲一個悠久的傳統，大眾文化的新領域裡的歷史學家們卻是幾乎在黑暗中摸索前進。在諸如「心靈史」（histoire des mentalités）之類的單調概念核心裡的思想空洞也是如此。即使是被這個觀念影響的非馬克思主義者，像是傑出的劍橋歷史學家彼得．柏克，也不約而同地轉向葛蘭西的作品，例如在他開創性的《早期現代歐洲的大眾文化》（*Popular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London*, 1978）。的確，如果沒有更貼近葛蘭西或是更明白地使用他的觀念，就很難或不可能討論大眾文化或任何文化的問題；正如柏克暗示湯普生和

威廉士會做的。[12]

但是葛蘭西在這個領域以及他所思考和寫作的事物裡的思想交戰之所以那麼強烈，就在於它不是純粹學術性的。實踐刺激且豐富了他的理論，也是他的理論的目的地。他對於研究意識型態和文化的學生們的影響力之所以出乎尋常的明顯，是因為儘管他們關心大眾文化，但是該領域也不是純粹學術性的。大多數踏入這些研究的人們的目的，並不是要寫博士論文或是寫書。就像葛蘭西一樣，他們熱切地關心未來和過去：關心構成大多數人類的平常百姓的未來，關心民族和文明的未來。在他死後七十年，我們要感謝葛蘭西的，不只是思想的激發，更在於他告訴我們，改變世界的努力，不僅和原創性的、精細的、讓人耳目一新的歷史思考並行不悖，更是非它不可。

注釋：

1 P. Spriano, *Gramsci in carcere e il partito* (Rome, 1988).

2 Q. Hoare and G. Nowell-Smith (eds),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 (London, 1971), p. 175.

3 A. Bullock and O. Stallybrass (eds), *The Fontana Dictionary of Modern Thought*, (London, 1977).

4 Q. Hoare and G. Nowell-Smith (eds),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

5 'The 250 most-cited authors in the Arts and Humanities Citations Index, 1976-1983' (in Eugene Garfield, 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Current Comments* 48, December 1986).

6 Q. Hoare and G. Nowell-Smith (eds),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

7 Gwyn A. Williams, *The Welsh in their History* (London, 1982), p. 200.

8 G. Lichtheim, *Marxism* (London, 1964), pp. 368-70. See also the same author's *Europ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1972), pp. 44, 218-20.

9 Georg G. Iggers, *Neu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Munich, 1978), p. 51.

10 Abelove, Blackmore, Dimock and Schneer (eds), *Visions of History* (NY, 1983), p. 38.

11 E.J. Hobsbawm in *Società*, XVI, 3, p. 456.

12 Peter Burke, 'Revolution in Popular Culture', in R. Porter and M. Teich (eds), *Revolution in History* (Cambridge, 1986), p. 211.

第十四章 一九四五年到八三年馬克思主義的影響

沒有任何思想家像他那麼成功地實踐自己的指令：「到現在為止的哲學家們都只是在詮釋世界：重點是改變它。」（《論費爾巴哈》）馬克思的觀念成為鼓舞歐洲大部分地區的勞工和社會主義運動的教條。經由列寧和俄國大革命，它也成為二十世紀社會革命基本的國際教條，從中國到祕魯，同樣受到歡迎。由於認同這些教條的政黨和政府的勝利，這些理念的各種版本成為某些國家的官方意識型態，在巔峰時期，他們的人口占世界的三分之一，更不用說在世界其他角落規模和重要性程序不一的許多政治運動。其他有如此地位的思想家，或許只有過去偉大宗教的創建者，而除了穆罕默德以外，沒有人能夠有如此風捲殘雲地征服世界。在這個方面，沒有任何俗世的思想家差堪比擬。

馬克思自己是否贊成人們以他之名所做的事，而對於這些幾近於神學而被官方視為不可挑戰的真理的教條，他會有什麼看法，固然很耐人尋味，不過僅止於學術上的臆測。其實，無論它們和他自己的理念有多麼天差地遠，就文獻或者推論所及，它們在歷史上的確衍生自他的理念，這個在思想和行動上的淵源是可以直接確認的。它們屬於馬克思主義的歷史。馬克思的觀念是否在邏輯上蘊含著這些發展，那是個不同的而且有區隔的問題。人們對這個問題討論了很多，主要是

因為至今以馬克思之名（通常包括那些聲稱是其信徒的革命領袖，列寧、史達林、毛澤東等人）建立的政權和政府有某種家族相似性；或是因為它們都有和自由民主大異其趣的負面特徵。

本章不打算回答這個問題，但是或許可以提到兩點。由於任何觀念都會比它的原創者活得更久，因此它也就不受限於它原來的意圖和內容。基於人們的詮釋能力的種種條件限制，甚或是偏好某個前人的說法，無論在實踐或理論上都會受制於無法預料的大規模的修正和轉變。聲稱是基督徒並且由《聖經》得到他們的權威來源的政權，可以從耶路撒冷的封建王國到震顫教派，從俄羅斯沙皇的帝國到荷蘭的共和國，從喀爾文的日內瓦到喬治國王的英格蘭。基督教神學在不同的時代裡吸收了亞里斯多德和馬克思。一切都可以聲稱衍生自耶穌的教義，雖然其他同樣虔誠的基督徒經常很不以為然。範圍這麼大的觀念和實踐，都宣稱是直接或透過其後繼者推論自馬克思的文本，或是與它相容。如果我們不知道他們都主張這個推論關係，我們或許會思考以下的種種差別：例如猶太復國運動的集體農場（kibburzim）和波布的柬埔寨，希法亭和毛澤東，史達林和葛蘭西，羅莎．盧莎堡和金日成，他們的差異比相似性明顯得多。並沒有理論上的理由說馬克思主義政權應該採取某種形式，雖然我們有很好的歷史理由去解釋為什麼在一九一七年以後短短的時期裡，在許多工業世界邊緣或以外的國家裡，那些經由本土革命、模仿和征服建立的政權，會發展出相同的正面或負面的特徵。[1]主張說馬克思主義理論必然蘊含著列寧主義且唯有列寧主義（或其他主張是馬克思主義正統），這種論證是站不住腳的。

然而我們可以說，任何一組觀念，包括馬克思的，必然會因為成為動員群眾的重要政治力量

而蛻變，無論是透過政黨和運動，透過政府或其他方式。任何理念都是如此轉型，哪怕是經由形式化、穩定化和教育的單純化，如果不是在小學和中學，在大學也經常如此。詮釋世界或改變世界，不管再怎麼有機地聯結，都不是同一回事。無論那是經由非正式的信念模式，例如區分十九世紀的商人和記者以及他們所依據的亞當．斯密的真正作品的信念，或者（在極端的情況下）透過不容有異議的正式教條，那都是次要的。蛻變的事實始終存在。的確，過去思想家的觀念的學術性歷史，尤其是政治觀念的歷史，大多是以死後的重新詮釋去重新發現思想家的原始意義和意圖，以及他們的思想的原始意義和脈絡。唯一能逃脫這樣的命運的作品，多半是人們不屑一顧的，或者是受限於特定時空環境，沒多久就被人遺忘的。現在的亞當．斯密不再是一七七六年的亞當．斯密，除了對於少數專家學者以外。馬克思也難免如此。

就歷史的觀點而言，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衝擊無疑是馬克思最重要的成就。但是思想衝擊儘管和政治衝擊不可分，馬克思主義者所造成的思想衝擊卻是最不顯著的。對於人類的思想世界造成重大蛻變的思想家並不多。馬克思是其中之一，此外還包括牛頓、達爾文和佛洛伊德。這些名字暗示著，它們所代表的思想蛻變很難做比較，除了說它們都突破各自的專業領域，滲透到一般教育文化裡。這並不是說，佛洛伊德甚或達爾文的思想能力上和牛頓旗鼓相當。不管他們的思想成就的能力或性質如何，這個名單上的名字畢竟屈指可數。馬克思在那上面的地位自然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兩個方面很特別。第一，如本書所證明的，他實際上是死後才被列上去的。的確很少人在馬克思生前預料到他會如此聲名遠播。第二，那是在一個固執的、宏偉的、熱情的，而且遠

遠不止於無關痛癢的思想批判的世紀裡完成的。許多諤諤之士努力要證明馬克思的錯誤和不足，他們當中有些人以前是馬克思主義者，後來卻成為他的批判者。對於翻轉整個思想世界的思想家們而言，這並不罕見。然而其他人走的路似乎沒有這麼風狂雨驟，而對他們的嚴厲思想批判也僅限於他們的專業領域。在馬克思逝世一百年期間，有太多人以筆、打字機、公共平台，或是審查者的藍筆和警察的分遣隊，對他的觀念口誅筆伐。並沒有人懷疑他的思想地位。尤其甚者，他在全球意識型態上的地位可以說空前絕後；他的作品以及他所啟發的思想更有影響力，也有更多人閱讀和討論。雖然前身為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黨否認他的影響力，而蘇聯既失去對於左派的吸引力，隨著去史達林化，也失去在信奉馬克思主義傳統的革命支系之間的領導地位。

這個了不起的紀錄有三個可能的因素。馬克思主義持續被攻擊，因為在馬克思死後不久，它就在世界各地被等同於威脅現狀的強大政治運動，自從一九一七年以後，則被等同於在顛覆國際的、危險的、有威脅的國家和政權。直到一九九〇年代，它始終代表著如洪水猛獸般的政治勢力。再者，它在理論上也一直是國際性的，因此它提出的批判也可能有普世性的威脅或錯誤。就此而言，它不同於那些和特定民族或種族劃上等號的學說，也因而不太可能改變其他限定於特定地區的、在理論上具有普遍性的教義，或是被它們改變，例如東正教或伊斯蘭教的什葉派。

再者，馬克思主義一直是披著嚴謹的思想外衣，對現狀進行革命性的批判，而且迅即成為眾多批判當中最有影響力的、最主宰性的一個。到了一九七〇年代，所有想要以更好的「新」社會取而代之的反對現狀者，甚至所有想要回到被理想化的「舊」社會的人們，都把他們的目的稱為

「社會主義」。但是馬克思主義分析在社會理論裡的地位舉足輕重，批判社會主義難免都會暗示著批判馬克思。他逝世一年後，有一個對於當時的社會主義非常詳盡的研究[2]，儘管注意到在馬克思主義以外的原來的「烏托邦的」、「互助論的」學派盡皆銷聲匿跡，卻仍然只能花一章的篇幅去探討馬克思。而到了二十世紀下半葉，人們在討論各種社會主義學說時[3]，基本上都是從它們和馬克思主義學說的關係切入，它已經被默認為社會主義的核心傳統。

同樣的，主導著這樣的批判的理論，不僅吸引了那些想要批判現存社會的人吸引了那些想要為它辯護的，而另一方面，對於革命者的提議心存疑慮的人則被驅使去抨擊馬克思。只有在將馬克思主義學說等同於關於現狀的官方意識型態的政權下，情形才有所不同。然而，由馬克思主義政權統治的國家畢竟是少數。無論如何，除了蘇聯以外，所有這些國家都不超過三十年到四十年，革命後的第一代或最初幾代的馬克思主義裡的社會批判元素都保留了某個重要性意義，或者漸漸瘖啞了。

馬克思主義或者關於馬克思主義的論辯在二十世紀下半葉的知識界之所以居於核心地位，還有第三個原因：它對於知識分子無與倫比的吸引力。由於中學和大學教育的蓬勃發展，該時期的知識分子以史無前例的速度倍增。固然知識分子只只是偶爾集體對於馬克思主義產生興趣，而且大多數人都不很長久。再者，有某些時期、地區和知識性職業，對於馬克思主義特別免疫，甚至對它很反感。然而，在所有和現代運動有關的意識型態當中，作為一種理論，馬克思主義一直是最有趣的。它不僅讓政治作為和行動可以大展身手，在討論和理論的闡發方面也有極大的空間。

在《國際社會科學百科全書》（*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 1968）的索引裡，和「馬克思」或「馬克思主義」有關的辭條遠多於其他思想家，即使我們撇開「列寧主義」不談，這個現象既不是偶然的，也不只是反映思想潮流而已。

一九四五年以後的二十五年間，由三個事件構成的複合體，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討論的形成，產生重大的影響：自一九五六年以來，蘇聯以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種種發展，和一九五〇年代以外（被誤稱為）「第三世界」國家有關的發展，尤其是拉丁美洲，以及一九六〇年代末期在工業資本主義國家讓人震驚而意外的政治激進運動的爆發。就它們直接或間接的現實政治意義而言，它們的重要性程度各自不同，雖然不在於它們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討論的衝擊。它們也無法清楚地彼此分割開來，尤其是在一九六〇年代以後。

「蘇聯」複合體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有三個影響：首先，因為蘇聯和其他東歐國家的去史達林化有實踐性的和理論性的影響。它使人們承認說，這些社會的實際組織及其運作（更不用說它們的經濟）需要改革，尤其是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其後幾年以及一九六〇年代後期。它也導致某種思想的解凍，讓人們可以重新思考，甚或鼓舞人們重新探討在史達林時代緊緊封鎖的種種問題。

其次，自從由一個「領導政黨」（也就是蘇聯）所主宰的一條鞭式的共產國際運動垮台以後，對馬克思主義也造成重大的影響。這個鐵板一塊的統一體，因為南斯拉夫自一九四八年以來的分裂而日趨式微，隨著中國和蘇聯在一九六〇年左右的決裂而消滅。所有共產黨，以及在他們內部的馬克思主義的討論，多多少少都因為這個垮台而受到影響，或者正好是因為在法理上或

事實上承認說，現在已經可能有各式各樣的「走社會主義的民族道路」（或是在社會主義內部的道路），而且有時候是條康莊大道。再者，即使是對於那些追求一個國際性的理論正統的人們而言，各種分庭抗禮的正統的存在也產生了重新調適的棘手問題。

第三，由於社會主義世界內部經常很戲劇性的政治事件，更確切地說，是在蘇聯和中國影響範圍內的國家，例如早期東歐對於一九五六年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反應（波蘭、匈牙利），一九六〇年代後期的危機（「布拉格之春」（1968）是創痛最深的），波蘭從一九六八年到一九八一年接踵而至的大變動，以及中國在一九五年代後期、一九六〇年代中期（「文革」）、毛澤東死後的政治大地震，我們可以看到蘇聯複合體如何影響馬克思主義內部的發展。

最後，全球社會主義地區和其他地方漸趨緊密的直接溝通，哪怕是經由新聞、旅遊、文化交流、社會主義國家的大批移民，都會影響到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因為關於那些發展的資訊已經膨脹到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很難對它們視若無睹。如果說這些國家仍然是西方國家的革命者的典範甚或是烏托邦，那大抵上是因為西方國家的革命者對它們的認識太少了，有時候既沒有辦法也不想要認識更多。許多西方國家的革命者將中國「文化大革命」理想化，和真正的中國完全沒有關係，就像孟德斯鳩的《波斯人信札》（*Lettres persanes*）和伊朗無關，或是十八世紀的「高貴的野蠻人」和大溪地無關一樣。他們都用遙遠國家的經驗，對世界的另一個角落進行社會批判。然而，隨著溝通和資訊的成長，在隨風飄蕩的紅色國旗下尋求烏托邦的企圖已經明顯幻滅。自一九五六年以來，大多數西方國家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得不總結說，現存的馬克思主義政權，從蘇聯

到古巴和越南，和他們所嚮往的社會主義社會或是正在建構社會主義的社會相差甚遠。所有馬克思主義者也被迫回歸到一九一七年以前的社會主義者的立場。在為社會主義辯護時，他們必須再次將社會主義視為資本主義社會製造的難題的解答，未來的希望，可是沒有充足的實踐經驗可以證明。

反過來說，從社會主義國家出走的「異議份子」移民，讓人們更容易將馬克思以及馬克思主義完全等同於那些政權，尤其是蘇聯。這種說法在以前是用來將任何不願意完全且不加批判地支持莫斯科的人趕出馬克思主義的團體，現在卻是被那些完全拒絕馬克思的人拿來用，因為他們主張說，由《共產黨宣言》出發的唯一道路，其終點是史達林的俄國勞改營，或者是其他由馬克思信徒統治的國家裡類似勞改營的地方。這個反應在心理上是可以理解的，夢想破滅的共產主義者們沉思著「失職的上帝」。而對於在社會主義國家裡（或來自那些國家）的異議知識分子而言，更是可想而知，他們完全拒絕和他們的官方政權有關的任何東西，尤其是這些政權所採用的思想家理論。在思想上，它既是證明也是論題，就像所有基督教徒在邏輯上必然推論出教宗專制論，或是所有達爾文主義者都會歌頌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

「第三世界」的複雜事件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有以下兩個影響。

第一，他們著眼於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民解放鬥爭，以及由去殖民化而產生的許多運動和某些新政權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口號很感興趣的這個事實，他們也專注於和馬克思主義聯想在一起的（至少是他們所想的）國家結構和策略。這樣的運動和政權在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裡尋

求啟發，它們大多數原本都很落後，而試圖以自己的努力擺脫落後。「第三世界」裡的許多運動和政權至少偶爾會主張以社會主義為其鵠的（經常被歸類為非洲社會主義、伊斯蘭社會主義等等）。如果這些社會主義有個模範，它應該是衍生自由馬克思主義者統治的政權。馬克思主義的作品以及其他關於前殖民地或次殖民地國家的作品的數量自然也大幅成長。

在全球資本主義一片欣欣向榮的數十年裡，似乎只有依賴性高的、「低度開發的」世界才會引頸企盼社會革命。因此，第二個影響就在於，「第三世界」的經驗讓馬克思主義者專注於佔優勢的已開發國家之間的關係、該地區可能轉型為社會主義的個殊性質和問題，以及影響其未來發展的社會和文化的特性。這些面向不只牽涉到眼前的政治策略的問題，也涉及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問題。再者，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實踐者和理論家的意見也南轅北轍。

我們在史學領域裡可以看到關於「第三世界」經驗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互動的一個顯著例證。從封建制度到資本主義的過渡的性質，一直讓馬克思主義學者醉心不已，雖然會有馬克思主義政治人物的干預，因為至少在俄國，那涉及眼前關切的問題。在那裡，「封建主義」還是不久前的現象，階級性質飽受爭議的沙皇「專制主義」才剛被推翻，對於這些問題進一步的詮釋者（例如波克羅夫斯基）則被他們的對手等同於政治上的反對派（不管對或錯）或是鼓吹它的理論。在日本，它也是個政治判斷的問題。多布在其《資本主義發展之研究》（1946）（很謙虛的書名）氣度恢宏地對於該問題提出系統性的研究，在一九五〇年代引起國際性的論辯，我們於此不擬就這些論證多作討論。[4]

有幾個問題還在爭論中。封建制度裡是否有個基本的內在矛盾（一個「普遍規律」），瓦解了封建制度，最後使得資本主義取代它？如果真的有（大多數正統馬克思主義者相信有），那又是什麼？如果沒有的話，也就是說，如果封建制度似乎是個自我穩定的經濟系統，那要怎麼解釋它被資本主義取代的現象？如果有個解體的機制，它是否在所有封建制度裡都發生過？如此一來，就必須解釋為什麼除了歐洲地區以外，資本主義並沒有發展起來，或者它只發生在該地區，那麼就必須分析它有別於世界其他地區的特性。史威濟在批評多布時提出的難題點燃了論爭，問題就在於，以封建制度內部主要的「生產關係」所隱含的機制去解釋它的解體，也就是地主和農奴的關係，無法讓史威濟滿意。相反的，史威濟選擇強調（或者說是重申，因為以前已經有許多非馬克思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說過了）**貿易**在侵蝕和轉變封建制度經濟當中的角色。「貿易的成長是西歐封建制度沒落的決定性因素。」[5]

論戰斷斷續續直到現在，終於平息下來。然而，在一九六〇年代，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歷史起源問題有了個截然不同的新面貌，雖然顯然衍生自舊有的論戰當中史威濟的一方。新的論點由法蘭克發難（*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1967），由華勒斯坦接續闡述並且從事歷史記錄[6]，他早先是研究當代非洲的政治學家，後來從那個出發點投入歷史研究。這個詮釋有三個主要的命題。第一，資本主義基本上等於**市場**關係，在全世界的規模上，則等於一個「世界體系」的發展，它由一個世界市場構成，其中有許多已開發的「核心」國家，主宰著「外圍」並且剝削它。其次，這個「世界市場」的建立，可以溯自十六世紀最早的殖民征服時期，它

創造了一個基本上屬於資本主義的世界，必須以資本主義經濟的觀點去分析它。第三，「核心」資本主義的宗主國，藉由支配和剝削其他國家而發展他們自己，既創造了核心國家的漸進的「發展」，也造成了「第三世界」漸進式的「低度發展」，也就是擴大了世界的兩個地區在資本主義底下的鴻溝而無法跨越。

一九七〇年代，人們重新燃起對於這些歷史問題的興趣。那原本是反映了當地的左派特殊的政治論辯，尤其是一九五〇年到六〇年的拉丁美洲。

使該大陸的左派內部分裂的論爭，是關於革命者的國內主要敵人的本質。國際的敵人顯然是「帝國主義」，他們認為主要是美國。但是國內主要的戰火是要反抗控制著廣大的落後地區的地主，以及出口到世界市場以進口工業商品的農業經濟，或者是反抗當地的資產階級？但是對於工業化有興趣的地方資產階級團體（由國家支持代理進口），以及正統共產黨，則傾向於主張說，拉丁美洲的主要課題是打破農業利益和「大莊園制度」（latifundism）（經常很寬鬆地等同於「封建制度」或其餘緒）。對於「民族」資產階級而言（在充滿馬克思主義者的大陸上，就連許多商人也接受這個標籤），這意味著排除工業化的主要政治障礙，以及全國性產品的全國性市場的主要經濟障礙：最終就是將貧窮而被邊緣化的農民趕出現代經濟以外。對於正統馬克思主義者而言，那意味著創造一個共同的民族陣線，對抗美國的帝國主義以及當地的「寡頭政治」。這蘊含著，這些國家還沒有將直接轉型到社會主義的鬥爭排在議程裡，它們的確也沒有。那也蘊含著共產黨在大多數的情況下不願意採取更激烈的叛亂和武裝鬥爭。另一方面，對於極左派而言，

共產黨的政策背叛了階級鬥爭。他們主張說，拉丁美洲不是個封建經濟，甚或「雙重」經濟的組合，而擺明了就是個資本主義經濟。資產階級是主要敵人，由於他們的利益和美國帝國主義完全不相悖，因而基本上可以劃上等號，並且充當美國和國際壟斷資本的馬前卒。其次，成功的革命的客觀條件就是當下，而它的直接目標就是社會主義，而不是當前的「資產階級民主階段」。由於蘇聯和中國幾乎在同一個時期分裂（中國在該時期顯然專注於農民革命，最後包圍和攫獲城市），以及古巴卡斯楚的勝利，使得左派的分崩離析雪上加霜。

雙方的論證的優缺點不是我們現在要探討的。它們只是將現代的政治往回投射到歷史裡去。如果說，自從十六世紀以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一直**是資本主義經濟的重要部分，那麼「封建」或落後國家的轉變為繁榮的資產階級資本主義國家也一直是個聲東擊西的話題。如果說，「發展的障礙」（在一九五〇年代和六〇年代是個分析的熱門議題）不在於封建的殘餘或是國內類似的問題，而是在於，殖民或新殖民國家對於國際資本主義核心國家的依賴使得他們的低度發展更加沉痾難治，那麼農業國家和工業國家的衝突就沒有那麼重要，而且也沒辦法創造消弭低度發展的條件，而唯有社會革命和社會主義才辦得到。

工業世界和其他地方的關係的性質，顯然不只是歷史問題而已。它既提出了至今一直在討論的「帝國主義」的問題（不過是在新的歷史脈絡裡），也提出了如何定義或重新定義這兩個部分的世界的問題。形式上的**殖民地**（也就是在外國力量的直接治理下，既沒有自己的政策決定，也沒有自主的政府）幾乎銷聲匿跡，使人們懷疑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是否有必然的關聯。光憑

政治的去殖民化本身，幾乎無法改變那些地區以及宗主國的經濟關係，雖然它可能影響到以前統治該殖民地的國家的地位。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分析而言，去殖民化並沒有什麼差別，因為那些其實只是帝國經濟的一部分的地區，雖然形式上是主權國家，而在名義上雖說是獨立國家，卻臣服於外國勢力，這已經是早已承認的事實。另一方面，「第三世界」之類的詞語的流行，意味著更全面性的重新分類。

「第三世界」這個概念並不是馬克思主義首創的，雖然馬克思主義和其他理論一樣，也會使用這個模糊而權宜方便的說法，但是它和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沒有任何關係。不過馬克思主義者不會堅持拒絕使用它，因為它顯然符合對於殖民或新殖民國家的帝國主義剝削的修正模式，他們因為資本主義的操作本質而一直淪於貧窮而沒有工業化，而且由於社會革命的前景在已開發家裡似乎越來越遙遠，看起來只能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苟延殘喘。就此而論，「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關係只是年代前後的問題而已。中國的革命總結了一個社會主義突飛猛進的時期，在馬克思主義領導下的國家由一個（或者說是兩個，如果把蒙古算進去的話）增加到十一個。增加的國家都來自歐洲以外：越南（1954-75）、古巴（1959）、以前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地、衣索比亞、索馬利亞、南葉門、柬埔寨、一九六〇年到一九七〇年代的尼加拉瓜。那些自稱是社會主義而不一定擁有或接受馬克思主義者的領導的國家（儘管多半沒什麼說服力而且只是暫時的），都是在「第三世界」地帶。所有這些國家，無論是不是馬克思主義，持續面對著貧窮和落後的問題，以及對於美國及其盟友的仇恨（馬克思主義國家）。在這方面，「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體

系和願景看起來沒有他們的共同處境那麼重要。

其實，在一九六〇年到到七〇年代的過程裡，單一的、無所不包的、「低度發展的」「第三世界」越來越沒有說服力，大抵上也被拋棄了。不過，儘管「第三世界主義」時期延續下去，馬克思主義的思考卻受到它強烈的影響。既然那個世界裡的運動看起來不是以工人階級為基礎（在大多數那些國家裡幾乎不存在），馬克思主義者就轉向分析其他階級的可能革命者，尤其是農民。自從一九九〇年以來，許多馬克思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一直投入農業和農民問題。這個領域裡的馬克思主義文學（對於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的反省對它影響甚大），以及對於俄國民粹派理論家恰亞諾夫的重新發現，顯得沛然莫可禦。[7]對於「第三世界」的興趣或許也對在該時期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人類學貢獻卓著，尤其是在法國（戈德利耶、美亞索）。

最後，一九六〇年代的基進浪潮，對馬克思主義有兩個主要的影響。首先，有更多人創作、閱讀和購買馬克思主義的作品，聲勢之浩大，使得馬克思主義的討論和理論因而汗牛充棟。其次，在某些國家裡，它的規模之龐大，它的出現之猝不及防，它的性格之前所未有，許多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理所當然的事，現在看起來都必須全盤重新思考了。有歷史意識的人們會想起，就像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一樣，它也快速地興起又隕歿。就像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一樣，它留下的問題比乍看下要多得多。

基進浪潮有幾個很奇特的地方。它起初是個年輕知識分子的運動，他們都是學生，在一九六〇年代裡，全世界的所有國家的學生人數大幅成長，他們一般都是中產階級家庭的子女。在某些

國家裡，它一直是學生或未來的學生，但是在其他國家，尤其是法國和義大利，它為工人階級的產業運動提供了多年來規劃罕見的火花。它是個超乎尋常的國際運動，跨越已開發國家和附屬國家、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的界線：在南斯拉夫、波蘭、捷克，以及墨西哥、法國和美國的歷史裡，一九六八年是個重要的年代。然而，它之所以引人矚目，是因為它橫掃了正值經濟繁榮巔峰的已開發資本主義社會。最後，它對於若干國家的政治系統和體制的衝擊，即使只是曇花一現，卻是非常戲劇性的。

就馬克思主義而言，它創造了一個「新左派」，儘管它想和馬克思或其他馬克思主義者的名字劃上等號，它的視野卻遠遠超越了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的限制。於是我們看到無政府主義趨勢的重生，無論是一種自覺的現象，或是以表面上的馬克思主義標籤作偽裝（例如西方國家許多「毛派」），或者是以非政治或反政治的文化異議的形式。我們也看到，儘管出現了若干熱中於宣傳它們和馬克思的關聯性的政治團體，但是它們訴求的策略和政策是傳統馬克思主義革命者所拒絕或不信任的，這則是不爭的事實。「赤軍團」或「紅色旅」比較像是俄國民粹派的恐怖主義的模式，而不是列寧的模式，而西歐的民族分離主義運動（它在歷史上的前身經常是政治上的右派甚或極右派），現在也會使用馬克思主義革命的語彙，有時候還很煞有介事。這個運動的其他副產品，也包括在一九七〇年代到八〇年代關於以前所謂「民族問題」的馬克思主義論辯的復甦。

在一九五〇年代以來影響馬克思主義發展的長期因素裡，有兩個相互糾結的因素特別突出：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政治的意識型態的社會基礎的改變，以及世界資本主義的轉變。

不同於第二國際或第三國際時期，一九五〇年代以來，馬克思主義的成長主要是在於知識分子，他們現在形成了一個越來越大也越重要的社會階層。的確，它反映了這個階層裡的重要成分的基進化，尤其是年輕的成員。以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根基大抵上都是在體力勞動者的運動和政黨。這並不是意味著工人們會創作或閱讀關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書或小冊子，雖然自學的好戰派工人階級（布萊希特所說的「讀書的工人」〔lesender Arbeiter〕）構成了這類馬克思主義文學的中堅份子，他們在討論社團、課堂上、圖書館以及勞工運動相關機構裡研究它。於是，在一八九〇年到一九三〇年間，在南威爾斯的煤田成立了數百間礦工圖書館，該地區的工會和政治運動者（自一九一四以來則以基進著稱）都在那裡形構他們的思想。[8]那只是意味著，在這些運動裡，有組織的工人接受、贊成且吸收了某種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學說（一種「無產階級科學」），成為他們部分的政治意識，而大部分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或者參加運動的知識分子，基本上都認為是為工人階級服務，或者是透過歷史上必然興起且勝利的無產階級去解放人類的運動。

從一九五〇年代初期開始，在社會主義勞工政黨贏得群眾基礎的世界大多數地方，他們顯然不再前進，反而節節敗退，無論是他們的社會民主或共產主義形式。[9]再者，在工業化國家裡，構成勞工運動的核心的體力勞動階級，相較於其他就業人口，也都處於相對劣勢，有時候甚至是絕對劣勢。再者，它的內部一致性和力道也在減弱當中。工人階級生活水準顯著提升，商業廣告和媒體大量集中在個人或家庭消費者的（真正的或被引誘的）欲望，工人階級生活也跟著私有化，無疑地削弱了工人階級團體的凝聚力，它以前一直是無產階級群眾政黨和運動的力量元素之

一。然而，非體力勞動工作的成長，以及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普及，使得他們流失的比例遠甚於從前，包括高所得的技術工人階級的子女、勞工運動的潛在無產階級中堅份子和領袖，以及最可能研究和閱讀的那些工人階級。一九七三年南威爾斯礦工圖書館的調查悲觀地指出（當時圖書館只剩下三十四家），「不同於一九三〇年代，到了一九六〇年代，閱讀已經不再是煤田裡的主要消遣活動。」[10]後代的人們不一定不再相信他們的父母親的目標，或是不再積極參與政治。但是他們強烈意識到他們父母和他們自己的世界之間有一道鴻溝，尤其是在英國，這樣的經濟產生了結合自傳、報導和意識型態的反省的動人文學，其中的若干作家，例如雷蒙．威廉士，成為左派天空裡的熠熠明星。

這樣的發展難免對於工人階級運動和馬克思主義造成深遠的影響，因為兩者的成長都是基於相信資本主義在自掘墳墓，無產階級（體力勞動工人階級）在數量、自我意識和力量上都大幅成長，以政黨或運動為其代表，在歷史上注定要更傾向社會主義（也就是革命性的，雖然他們的意見可能和社會主義的意涵剛好相反），而且作為歷史不可避免的歷程的載具，它必然會勝利。然而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西方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以及在它們內部的勞工運動，似乎都為這個遠景增添疑慮。

另一方面，體力勞動者失去了社會運動以前給與他們（以及他們給與社會運動）的歷史信心。英國保守黨的一個政治領袖回憶說，在一九三〇年代，一個出身工人階級的卓越而積極的勞工黨下院議員告訴他說：「你的階級是正在沒落的階級：我的階級是屬於未來的階級。」[11]我們

很難在一九八〇年代想像這樣的互換。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政黨，雖然早就知道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歷史預測無助於指導政治決策，但是他們的成員和領袖對於那負責指引其歷史方向的羅盤的不確定性，卻讓他們無所適從。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自從一九五六年以來的發展加劇了他們的慌不擇路，也越來越難以承認或不贊成。對於馬克思主義至今視為理所當然的東西徹底地重新思考，從馬克思和其他「經典」的基本分析到長程和短程的政治策略和戰術，已經是勢在必行的事。

在一九一七年以後和蘇聯以及共產國際運動有關的馬克思主義主要傳統裡，這樣的重新思考越來越窒礙難行，直到這個越來越教條化的正統開始瓦解。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傳統自此以固定僵化著稱，而馬克思主義分析的修正過程也被刻意擱置，只因為對一九〇〇年以來的馬克思主義者以及受到共產主義運動陶塑的人們而言[12]，「修正」以及「修正主義」暗示著放棄甚或背叛馬克思主義。當修正馬克思主義的分析的運動發生時，新舊馬克思主義的對峙也跟著突然加劇。因此我們原本可以在戰後馬上就觀察到戰後資本主義的性質改變。諸如加爾布雷斯之類的非馬克思主義者，以及諸如斯特拉奇和熊斐德之類的前馬克思主義者，早在一九五〇年代就開始著手了。然而儘管忠誠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同情的批評者都同意說，在一九三〇年代，馬克思主義「對於世界經濟危機以及法西斯主義的挑戰，仍然致力於一個雖然不夠充分但可以自圓其說的解釋」（李希特海姆語），或者說，「一九三〇年代的大蕭條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貝倫和史威濟）[13]，他們也都同意說，「在建構一個後資本主義社會理論方面，它並沒有比自由主義成功」

（李希特海姆），「對於『富裕社會』某些主要特性的理解也無甚幫助」（貝倫和史威濟）。對於那一代的大多數人而言，馬克思主義並沒有（或者遲疑）正視他們想要改變的世界的現實情況。

年輕知識分子大規模地基進化（主要在他們的求學過程當中），使得馬克思主義內部的革新現在益顯石破天驚，因為它整個改變了支撐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社會基礎。馬克思主義政黨和組織（大部分都很小）紛紛出現，他們的成員和領袖大部分都有學位文憑。[14]正如工會的發展所顯示的，有組織的體力勞動者在工業裡的地位江河日下，非體力勞動者當中的工會制度的數量和重要性也水漲船高，尤其是成長中的公共部門、組成公司的行業和職業、媒體，以及和社會責任有直接關係的行業，教育、醫療、社會保險等。在這些職業裡，越來越多受高等教育的人投入非體力勞動。再者，年輕知識分子的基進化，不僅使大眾更加熱中於馬克思主義著作，造就了更多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也為他們的複製提供了一個機制。

馬克思主義的元素也瀰漫在學生們的公共論述的語言裡，來自學生基進主義（有時候是地方性的，例如拉丁美洲，有時候有傳染性，例如一九六〇年代的歐洲國家）的人們成為老師和傳播工作者。的確，不只是在新興國家裡，政治裡的決策者、公務員和媒體，有越來越多基進世代的學生投入這些領域。馬克思主義在和教育以及傳播相關的機構找到堅定的據點，因而鞏固它的影響力。一九六〇年代的孩子從事可能是他們許多人未來終身的事業（除非有系統的政治整肅）。儘管有些人時或會修正或放棄他們年輕時的信念，他們自己倒是不受學生基進主義的劇烈變動的影響。

這個發展是始料未及的。在那以前，情勢突然變得很明顯，有個傑出的馬克思主義評論者已經指出，在「已開發」國家裡，似乎「轉向對於現代社會本身的批判」，大抵上是「為了支持知識界拒絕由現代工業和科技創造出來的世界；而這個論辯的主戰場已經從大學開啟」[15]。而不同於以外的地方則在於信奉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出乎意料的多，主要是因為世界各地高等教育機構及其學生數量的顯著擴張，那樣的擴張是史無前例的。

知識分子的基進化（主要是年輕人）有許多特徵，反映在因應那個氛圍而產生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裡。首先，它原本不是經濟的不滿和危機的作用。的確，它在一九六〇年代以引人矚目的方式出現，正值「經濟奇蹟」、資本主義擴張和繁榮的巔峰年代，在大多數國家裡，學生的教育和就業前景一片欣欣向榮。因此，它的批判的主要方向不在於經濟，而是社會和文化面。如果有哪個學科可以代表對於社會批判的研究的話，那應該非**社會學**莫屬，這門學科因而吸引了無數的基進學生，也幾乎和「新左派」的基進主義劃上等號。其次，馬克思主義在傳統上都是和工人階級聯結（在「第三世界」的版本裡則是農民），基進的年輕學生們，無論是他們的生活型態和社會出身，都和工人以及農民不同，儘管他們在理論上熱情地認同他們。如果他們是既得利益的資產階級的子女，他們最多只能像以前的俄國民粹派那樣「走向人民」，或是吹噓說他們的團體裡有少數無產階級、農民或黑人。如果他們自己是出身自無產階級或農民，比較常見的是下層中產階級的背景，他們的處境和未來生涯也自然而然地讓他們脫離他們原生的社會環境。他們不再是工人或農民，他們的父母親或鄰居也會對他們另眼相看。再者，他們的政治觀點也比大多數工人基

進，當兩者同時投入激烈行動時（例如一九六八年五月的法國）。

因此，「新左派」的知識分子有時候會認為工人階級不再是革命者而對他們不屑一顧，因為他們被併入資本主義（甚或變成「反動派」），馬庫色的《單向度的人》（*One Dimensional Man*, London, 1964）就是這方面的分析的權威作品。或者他們至少會對當時的群眾勞工運動和政黨嗤之以鼻，無論是社會黨或共產黨，認為他們是背叛了社會主義志業的改革派。反過來說，幾乎所有已開發的資本主義國家，甚至有些其他國家，被動員的學生在群眾裡一點也不受歡迎，因為他們被視為中產階級的特權子女，或者是未來的特權統治階級。「新左派」氛圍裡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因此是在某種隔離當中發展出來的，它和馬克思主義的實踐的聯結也很有問題。

第三，這個氛圍創造出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就以下兩個意義而言是學術性的：因為它主要訴求的大眾是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學生，而且是以學術界以外的人們很難懂的學術用語表現，其次，用李希特海姆的話說，它「緊扣著馬克思主義體系裡和政治行動最沒有關係的那些元素」。[16]它證明了對於純理論的明顯偏好，尤其是最普遍且抽象的學科，也就是哲學。一九六〇年以後，馬克思主義哲學作品的出版如雨後春筍，讓基進知識分子興味盎然的國內或國際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辯論，總是和哲學家有關：盧卡奇和法蘭克福學派、葛蘭西學派、沃爾佩、沙特、阿圖塞以及他們形形色色的門徒、批評者和對手。難怪在某些國家裡的中學教育都有哲學課程，例如德國、法國和義大利，但是即使英美國家的一般高中裡沒有哲學課程，他們哲學討論的品味也令人刮目相看。

哲學也會潛入其他學科裡，例如阿圖塞就把馬克思的《資本論》視為一種知識論作品。它甚至取代了實踐，正如（在同樣的地區）短暫流行過的「理論性實踐」（**theoretical practice**）。對於現實世界的探究和分析退到關於它的結構和機制的概括化思考後面，甚或更一般性的方法論研究。理論家不自覺地從現實世界的實際問題和展望的思考陷落到關於「各種生產形式」的「接合」（**articulation**）的一般性辯論裡。[17]已故的普蘭查斯在駁斥外界對他的批評時說他並沒有從事具體的分析或是指涉「經驗和歷史的具體事實」，辨稱那些批評是經驗主義和新實證主義的徵兆，雖然他承認他的作品有「某種**理論主義**」（**theoreticism**）之嫌。[18]理論抽象的極端，一般認為是受到法國傑出的哲學家阿圖塞的影響，一九六五年到七五年是其全盛時期，它在國際的流行程度讓人嘆為觀止，但是我們也不能忽略純粹理論化的一般性魅力。它讓許多老派的馬克思主義者很困惑，而且不只是在那些盛行經驗主義的國家。[19]

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者並不會拒絕專注於抽象理論，尤其是馬克思自己一生窮究的那些問題，例如在經濟理論裡的問題。除了這些作品本身的思想趣味，以及探討這些主題的人們在思想上的優缺點以外，重新思考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礎，是將馬克思自己以及馬克思主義的作品視為一致且融貫的思想體系而從事批判性的檢驗時必要元素。然而這樣的理論化和對於世界的具體分析相去甚遠，而這樣的理論化和馬克思自己的作品之間的關係，也很像是科學哲學家和工作中的科學家的關係。後者經常很讚賞前者，但是在他們的實際研究裡，前者對後者也經常沒什麼幫助，尤其是當科學哲學顯示他們無法充分證明他們窮其一生嘗試建立的理論時。

然而，知識分子基進化的結果絕不止於理論性的，因為他們不被認為（他們自己也不認為）可以跨越階級的界線加入工人，更因為知識分子和工人在社會階層上的隔閡越來越大。在極端的情況下（例如美國），在越戰期間，前者支持反戰運動，而後者則是支持戰爭。但是就算兩者都站在左派立場，他們的政治關注焦點也大相逕庭。所以說，左派知識分子比單純的無產階級組織更關心環境和生態問題。這兩個團體的組合在政治上總是最堅不可摧的：在巴西有左翼的支持，在波蘭有反共組織的支持，兩者都在一九八〇年代。因此，他們之間的隔閡或者說缺少協調，無論長期與否，很可能影響到馬克思主義運動企圖改變社會的實踐性遠景。同時，經驗顯示，以知識分子為主要基礎的政治運動，不太可能像傳統社會主義者或共產主義的勞工政黨那樣，以階級意識和階級忠誠作為堅固的凝聚力，產生群眾政黨，他們的確也不是群眾政黨。這也可能影響到以此為基礎的團體的政治機會和遠景，他們所闡釋的馬克思主義學說的確如此。

另一方面，知識分子在馬克思主義的舞台上的角色越來越吃重，尤其是年輕人或學院派或兩者皆是，促使雙方核心極為快速的溝通，甚至跨越民族界線。這個階級的成員流動性很大，也特別習慣於快速的溝通；再者，他們的聯繫和網路通常很難以瓦解，除非是有系統的、粗暴的國家行動。學生運動在各大學間的蔓延速度即為例證。因此，新的階段無論在理論或實踐上，都造就了有效的非正式的國際主義，就在馬克思主義運動自一八九八年以來有組織的國際主義幾乎銷聲匿跡的時候。其實那只是非正式的世界性（容或有爭議）馬克思主義文化。當然，民族性的和區域性的模式仍然存在，也有些馬克思主義作家不很清楚國外發生了什麼事。另一方面，在有些存

在著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的國家裡，對於所有關心這類議題的人們而言，有些名字並不很熟悉，無論他們原本是以英文、法文或其他可以理解和翻譯的各種世界語言。加入馬克思主義的國際論述領域的障礙，有語言上的（例如日文著作）或是經濟上的（例如窮困的印度知識分子階層，無力負擔沒有補助的書籍的價格，或是由於缺少外幣，而無法進口更多的外國出版品）。然而，相較於馬克思主義歷史裡更早的時期，這個論述世界在幅員上更廣闊，參與辯論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或其他作家的人數也更勝以往（同時也更具有異質性）。

最後，我們該怎麼總結馬克思主義直到一九八三（正值馬克思過世百年）的趨勢和發展？

首先，它失去了任何具有主宰性或約束力的國際正統的凝聚，例如一九一四年以前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以及蘇聯在取得全世界馬克思主義的領導權的時期的共產黨。人們也更難以將異端的詮釋視為非馬克思主義，反過來說，其他以激進的改變為目標的政黨和運動的策略，現在也在他們的意識型態衣領別上馬克思的徽章。在這時期裡也出現了若干對立和衝突的馬克思主義正統，例如蘇聯集團和中國。馬克思主義政黨內部不同的馬克思主義詮釋之間的論戰越演越烈，甚至在某些共產主義政黨裡，很難說哪個馬克思主義的詮釋佔上風。在這樣的政黨裡，也產生了對立的趨勢或派系，以及數不清的團體和組織，主要是舊有的共產主義政黨裡的左派，他們都以馬克思主義為名，而分裂的團體也更容易產生意識型態上合理的進一步決裂。現在馬克思主義也傾向於和其他意識型態合併，天主教、伊斯蘭教，以及民族主義，而有些團體，無論他們抱持什麼意識型態，則是言必稱馬克思或其他馬克思主義者（例如毛澤東）。馬克思主義人口不斷改變的社會

組成，也助長了多元主義的趨勢，但是（透過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新成員）也傾向於讓馬克思主義超越狹義的政治領域，延伸到一般性的學術和文化領域。

新的多元主義必須有別於一九一四年以前對於歧見的寬容。德國社民黨內部容忍伯恩斯坦的修正主義，但是政黨以及一大群馬克思主義駁斥他的理論，說它既不可取也不符合正統。現在，儘管有些馬克思主義者提出的理論引起其他人的懷疑和厭惡，但是對於什麼才是正當的詮釋，什麼不能算是「馬克思主義」，無論在國內或國際上，都很少有公認的共識。這在諸如哲學、歷史和經濟學的領域裡尤其顯著。

馬克思主義的這個定義不明確的多元化，以及權威詮釋的式微，其結果之一，就是馬克思主義內部重新出現「理論家」。然而，不同於一九一四年以前的時期，「理論家」不再和特定政治組織甚或政策有緊密的關係，更不用說有什麼重要的政治功能（即使是非正式的），例如考茨基他那個年代。隨著史達林的過世，政黨領袖不再自動地等同於理論家，除了某些社會主義國家以外，他們還會製造出某些怪誕的狂人（例如北韓），雖然在由知識分子領導的小規模運動裡，領袖的確身兼理論家。即使是在國際的馬克思主義論辯裡擁有聲望和影響力的人物以及聚集在他們身邊的「學派」是政黨的成員（例如說，阿圖塞是法國共產黨黨員），他們也不被認為可以「代表」政黨。簡言之，他們傾向於沒有從屬關係的個人，以著書立說發揮其影響力。自從一九五〇年代以來，在不同的時期，基於各種目的，總是有些人物捲入馬克思主義的論戰，例如阿圖塞、馬庫色、沙特、史威濟、貝倫、科萊蒂、哈伯瑪斯、法蘭克。這個時期的多元主義有一個特色，

也就是不僅他們的馬克思主義的性質，甚至是他們和馬克思主義的實際關係，有時候都很曖昧不清。既然作品還在流通，作者死了沒有也就沒有多大關係，除了他們不能就對於他們的作品的詮釋提出評論以外。正統的瓦解使得以前許多傑出的馬克思主義者回到馬克思主義論辯的公共場域裡，再度受到讚賞，並且啟迪後進：盧卡奇、班雅明、柯爾施、鮑爾、葛蘭西、馬里亞特吉、布哈林和盧森堡。

其次，如前所述，據以判定什麼才是馬克思主義的界線越來越模糊不清。那是可以想見的，因為許多馬克思主義者，包括信奉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都滲透到學院的教學和論辯，儘管是在冷戰時期。那是很自然的副產品，是由基進學生構成的新群眾的訴求，而他們也發現到，以前被認為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元素的，現在都必須重新思考。一九七八年的一個歐洲（非馬克思主義的）史學研究指出，「在近幾十年來，馬克思主義的史學家成功打進專業行會」，使得該研究裡和馬克思有關的索引遠多過其他人，除了蘭克和馬克斯．韋伯以外。[20]例如說，在法國，馬克思主義只是思想領域的一個成份，該領域還包括索緒爾、李維斯陀、拉康、梅洛龐蒂），或是任何其他對於法國高年級大學生有影響力的人，或是在巴黎的第五區和第六區（arrondissements）裡經常被討論的人。在這樣的文化裡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或許會覺得將馬克思主義翻譯成任何流行的理論用語會是個好主意，既讓不習慣馬克思主義術語的讀者比較容易理解，也可以用批評者自己的理論觀點向他們證明說，馬克思主義的說法是有效的。這樣的時期典型的產物，就是柯恩以「二十世紀分析哲學特有的清楚和嚴格的標準」[22]的術語，重新闡釋歷史唯物論的觀

念。或者他們也會乾脆將馬克思主義和其他舉足輕重的理論組合在一起，例如結構主義、存在主義、精神分析之類的。

新馬克思主義者經常是在他們已經在中學或大學習得其他知識和理論以後，才對馬克思主義產生興趣，那會影響到他們後來的馬克思主義。所以說，對於在戰後（1948）才成為共產黨員的成年的阿圖塞而言，指出他的思想背景根本不是馬克思主義，而且當他著手寫作探討馬克思的時候，他對斯賓諾沙的作品可能還比對馬克思的作品來得熟。如果新馬克思主義者夠年輕的話，他們現在或許會坐在老師腳邊，而老師們自己有時候結合了他們在年輕作為革命者的時期認識到的馬克思主義的元素，以及其他思想的影響和發展。原則上，這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受高等教育的馬克思主義者，以前試圖在馬克思主義和大學文化之間的鴻溝（那是正統刻意強調的）搭起橋樑。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和法蘭克福學派顯然如此。不同於以往之處在於，在一個危機的年代，以及對於體制化的、分離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堡壘的不確定性，受過大學教育的知識分子開始集體基進化。

同時，馬克思主義也漸漸被迫放眼馬克思主義以外的世界，因為馬克思主義思想的自我孤立和自我設限，成為共產主義發展時期的一個顯著特徵（無論是在正統或是諸如托洛斯基派的異端），也創造了一個偌大的領域，馬克思主義者很少思考它，但是非馬克思主義者卻相當重視。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就是很好的例子。一旦實施中央計畫經濟的馬克思主義政府察覺到他們的計畫和管理的缺點，他們就再也不能將資產階級學院派的經濟學斥為資本主義的一種護教學，反過

來說，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也不能自限於換湯不換藥地重申「政治經濟學」的正統（那原本是用來證明資本主義既無法解決它的問題也沒有「根本」改變其性格），而對於社會主義經濟學的評論，則只限於無意義的概說。[23]無論是哪個理論正統，社會主義的社會裡的經濟學家（即使他們沒有被正式承認為經濟學家）在實務上必須考慮到作業研究（operations research）以及編程，因而和資本主義社會裡的經濟學家的作品殊途同歸，也會使用到它們，包括探討社會主義經濟學的作品[24]。有些經濟學的重要發展可以回溯到東歐馬克思主義者或其他試圖解決一九二〇年代蘇聯經濟新問題的人，因此和馬克思主義有血緣關係，即使它們早就被排除在官方的馬克思主義正典以外。這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

因此，如果馬克思主義者不認為他們的理論只是一種意識型態，用以正當化他們排他性的對與錯（「反馬克思主義」）的主張，那麼他們再也沒辦法不去知道非馬克思主義者在他們的領域做了些什麼。的確，在學院裡養成的新世代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很難對那些知識視若無睹。反過來說，由於基進學生的壓力，也會讓長期忽視馬克思主義或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大學開設關於該主題的特別課程。在一九七〇年代的英語系國家裡，它們變得很普遍。然而，即使沒有這些壓力，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力也明顯滲透到學校機構和科系裡，部分是因為老一代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還沒有退休，而一九六〇年代的年輕世代加入他們的行列，但是大部分是因為在許多領域裡，即使是那些不特別同情馬克思主義的人，也將它的貢獻整合進來。在歷史和社會科學的領域裡尤其如此。無論是年鑑學派歷史學家們，或是主要人物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他們在

早年都沒有受到馬克思主義太大的影響。然而相較於其他作者，無論是在法國或國外，布勞岱在其晚期的重要作品《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économie et capitalisme, XVe-XVIIIe*）裡引用到馬克思的地方都要多得多。這位聲名顯赫的歷史學家根本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是關於這個主題的重要作品很難不追溯到馬克思。由於這個輻輳點，在許多大領域裡，馬克思主義者和非馬克思主義者的研究總是殊途同歸，使得我們很難判別某個作品是不是屬於馬克思主義，除非作者有特別的宣揚或駁斥、辯護或抨擊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者漸漸傾向於放棄古老的權威詮釋，使得人們很難說所有作品都是出自某個陣營或是其他陣營的，那甚至是無意義的。

馬克思主義者不僅願意重新思考馬克思主義的傳統，甚至馬克思自己的理論，這是一九五〇年代以來的第三個發展特徵。當然，這也不是什麼新鮮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內部的論辯，從一九六〇年代風雲再現[25]，一直很熱烈，如果沒有高層威權教條打壓的話。一九〇〇年代也有人試圖基於各種理由去修正馬克思的部分分析，而不只是伯恩斯坦的「修正主義」。的確，將馬克思主義主要視為一種「方法」而不是教義體系，這個作法似乎是源自早期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有一部分是很委婉地表達對於馬克思自己的作品的不同意見。

因此，在一九六〇年代和一九七〇年代，馬克思主義漸漸抽掉馬克思主義裡的勞動價值論或是利潤下降法則，揚棄「不是人的意識決定其社會存在；相反的，是他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他們的意識」（也就是馬克思關於「基礎」和「下層結構」的觀點）之類的命題，他們也認為馬克思在

一八八二年以前的作品不足以作為馬克思主義，從傳統馬克思主義的角度去看，他們會被形容為哲學上的唯心論，而不是唯物論，或者他們會否認這兩個立場的差異，他們會全盤否定恩格斯，或者認為「歷史研究不僅在科學上、甚至在政治上都是沒有價值的」。[26]我不認為馬克思主義歷史以前有任何一個時期，這些和以前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的信仰扞格不入的命題，被自認為是馬克思主義者的人們如此鋪天蓋地地宣揚和積極地接受。

歷史學家的功能不在於評斷對於馬克思主義大部分學派和潮流認為的理論核心的全盤修正是否有效，雖然他打包票說，他們的許多重新思考會讓脾氣出了名的差的馬克思暴跳如雷。我們可以中立地說，對於馬克思自己的說法（更不用說是恩格斯以及後續的「經典」）的挑戰，代表著馬克思主義思想傳統的連續性的極度破裂。同時，無論是不是誤導，他們也代表著努力以革新去加強馬克思主義，並且進一步開展馬克思主義的思考，而他們本身也成了馬克思驚人的氣勢和魅力的證明。因為他們顯示了兩件事：承認馬克思主義「現代化」（aggiornamento）的需要，不斷地探究馬克思自己的思想裡可能的錯誤和不一致，但是他們同時也相信，整體而言，馬克思自己的思想提供了理解和改變世界的根本方針。

時間無疑地會清除掉某些理論的雜草，部分是因此有些理論的重建者會遵循著他們的馬克思主義論證邏輯，有些人則會從此銷聲匿跡，除非有個博士生在找論文題目或是研究馬克思主義歷史時發現他們。關於什麼樣的理論發展可以說是合理地衍生自馬克思自己的思想，或是和它一致，而馬克思的思想有哪個部分是可以放棄而無損於他的整個一致性的分析的（這是個更加莫

衷一是的問題），有一天或許可能會有個共識。若是如此，馬克思傳統的連續性或許可以重新建立，雖然不是以唯一「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的角度，而是重建一個場域的界線，在那裡頭，論辯和異議可以合理地主張說是來自馬克思的思想傳承。但是即使重建了這樣的思想連續性，所謂主流的馬克思主義還是會和所謂邊緣的馬克思主義共存，後者不管什麼理由，總會主張說他們的觀念和馬克思主義的親屬關係，雖然思想上的DNA驗證不能支持他們的主張。由於他們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可以說是馬克思主義的一部分，他們的確離開了馬克思主義就很難理解，就像主張是基督宗教的那些邊緣或融合的宗教和信仰，的確是基督宗教歷史的一部分，不管他們的教義和一般的基督宗教有多麼遙遠。[27]最後，隨著難以判別什麼是屬於馬克思主義的模糊地帶越來越大（而且不只是在學術上），主流和邊緣的馬克思主義將會和平共存，雖然他們現在沒有。

然而有一點是很清楚的。即使關於什麼是馬克思主義的主流（或各種潮流）的共識重新出現，人們和「經典」的原始文本的距離會遠甚於以往。他們不太可能像從前那樣經常引用它們，或是將它們視為內在一致的理論和學說的融貫體系，也不認為它們可以直接用來分析描述當前的經濟和社會，或是馬克思主義的行動的直接方針。馬克思主義傳統的連續性的破裂，或許沒辦法完全修復。

「經典」文本很難作為政治行動的指導手冊，因為現在的（或許未來亦然）馬克思主義運動的處境迥異於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紀前半葉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規劃其策略和戰術的那個年代（除了偶然而短暫的歷史意外事件以外）。列寧過世後的半個世紀，大部分舊有的共產

主義政黨仍然在他們的國家裡努力要取代資本主義，尋求新的策略，因而放棄馬克思主義裡猶如聖經基要主義的東西（雖然許多老黨員還是很懷念古老的確定性）。反過來說，如果人們滿懷著對於舊有的確定性的渴望，而馬克思主義的「教義」只能「正確地」闡述和應用（雖然某個團體的「正確」可能是另一個團體的「錯誤」），那麼這類的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就會漸漸萎縮。他們試著將它化約為幾個簡單的元素，幾乎就像口號一樣：階級鬥爭的根本重要性；對工人、農民或第三世界的剝削；拒絕資本主義或帝國主義；革命和革命（包括武裝的）鬥爭的必要性；譴責「改革主義」和「修正主義」；「前鋒部隊」的不可或缺等等。這樣的簡化使得馬克思主義可以擺脫和現實世界的複雜結構的接觸，因為他們的分析只是要證明已經以純粹形式的觀點宣示了的真理。因此，它們也可以和純粹的唯意志論（voluntarism）或者好戰派偏好的其他策略結合。基本上，這個基要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殘餘形式，作為行動的指導方針，是由傳統的列寧主義的簡化元素組成的，除非這些元素最終也淪為修辭（例如新無政府主義者）。從過去的鬥爭經驗，從諸如列寧之類的革命政治學的卓越實踐者，顯然有許多可以借鏡之處，但不是以文字引述過去及其文本。

儘管馬克思的一般性經濟理論以及對於資本主義的發展的分析應該仍然是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起點，但是一個時期的「經典」文本不能用以描述資本主義後來的各個階段。列寧一貫的現實主義也承認這點。他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不同其他嘗試分析一九〇〇年以後的資本主義新階段的馬克思主義作品[28]，沒有提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任何文本，除了《馬克思

恩格斯書信集》裡兩段探討大英帝國對於英國工人階級的影響的部分。然而，自從一九一七年以來，大量探討當時資本主義的發展的馬克思主義作品，都沒有看到這個前例，只是忙著證明列寧（或其他馬克思主義者，但是比較罕見）的文本基本上仍然是對於資本主義的一個發展時期的有效分析，雖然他很輕率地稱之為「最後」的時期；或者是忙著批判它；或者（當它顯然過時了的時候）隨便抓一段他在一九一七年講過的話，編造成「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理論，以解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時期。[29]

現在，大家都承認說，馬克思自己的理論，雖然是以體系的方式建構的，但是至少在一個重要方面缺少同質性。因此我們或許可以說，它既有對於資本主義及其趨勢的分析，同時也以無比的先知熱情，從衍生自黑格爾的哲學的觀點，表達了透過無產階級去成就一個完美社會的人類夢想的歷史期待。在馬克思自己的思想發展裡，第二個面向是先於第一個，而且它在思想上是不可能從前者推論出來的。換言之，它們有質的差異，例如以下兩個命題：資本主義本質上會產生無法克服的矛盾，一旦「生產工具的集中化以及勞工的社會化到了和資本主義的發展水火不容的時候」，它就不可免地為自己創造了淘汰的條件；或者是說，後資本主義社會將會終結人的異化，讓個人的所有才能都能完全發揮。這是兩種不同的論述形式，雖然或許最後都可能證明為真。[30]

再者，人們也從未否認說，馬克思並沒有留下一個完成了的理論體系（《資本論》只有一卷是真正完成的），而且也很難否認說，他並沒有總是能夠將「他的高瞻遠矚」[31]轉換成讓人信服的理論分析。因此，在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裡，在馬克思主義者之間有「長期爭執不下的理論問

題」，而他們之間「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詮釋也南轅北轍」。[32]這自然會促使理論家鑽研大量的馬克思文本，但是他們是試圖將它們組織成一個融貫的、一致的和務實的整體，而不是視為權威性的「馬克思怎麼說」的論述。任何訓練有素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很少會認為對於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的通俗闡述（例如恩格斯的《反杜林論》第二部，或是列寧的《馬克思主義精義》）有什麼說服力。有一個時期，社會主義工人群眾政黨對於激進派和黨員的馬克思主義教育是政黨的主要功能，而這樣的闡述，或者是馬克思相關的基本文本（例如《價值、價格和利潤》），則扮演重要的角色。隨著這樣的政黨的轉型或式微，以及主張只有一個「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的正統的沒落，它們的角色也就被廢除了。無論如何，主要針對知識分子（無論是激進派或學院派）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對於經典文本的態度比較有批判性。[33]

我們最後可以談一下自一九五〇年代以來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第四個特徵。馬克思主義一窩蜂地致力於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領域研究，自然也包括和政治行動有直接關係的主題。一九四七年以後，很少有馬克思主義者以**馬克思主義者**的身分深入自然科學和科技的龐大而重要的領域，有些地區的人們甚至一致否認說馬克思主義在該領域有任何重要性，或是它基本上是探討「自然」，除非是意指著「人性」。[34]這不僅和馬克思以及恩格斯形成對比，他們兩個人顯然都對自然科學和思想很感興趣也有話要說（雖然恩格斯比馬克思更投入一些），也和一九三〇年代的潮流大相逕庭，當時有許多自然科學家，主要在英國和法國，被馬克思主義吸引，並且熱中於將它應用到他們的研究主題上。到了現在，科學、社會事件和政治，比從前更加彼此糾纏不清，當然，

許多科學家也都明白自己的社會角色和責任。有基進的甚至主張革命的科學家，也有馬克思主義科學家，雖然一九六〇年代年輕基進的「新左派」特別仇視科學和科技（他們經常以拒絕哲學裡的「實證主義」作為偽裝）。這很可能讓從事這些專業的人們對於基進的左派興趣缺缺，除了一些生命科學的支系以外，他們顯然不能迴避關於人和社會的本性的討論（在遺傳學裡就有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的著名科學家，例如美國科學家古爾德）。然而，基進科學家的馬克思主義和他們的專業理論以及實踐並沒有太大的關係。

我們可以大膽猜想，在一九八三年的社會主義國家裡，大多數的自然科學家和科技人員，也都會認為馬克思主義和他們的專業活動無關，雖然他們不願意公開表示意見，儘管他們和所有認真的科學家一樣，對於自然科學和社會的現在以及未來的關係，一定也會有他們的看法。

這個情勢代表著馬克思主義的規模明顯地縮小，它對以前人們最強烈的吸引力，正是在於它似乎可以建構一個完備的、包羅萬象的、發人深省的世界觀，而人類社會及其發展只是這個世界觀的其中一部分。這個吸引力會延續下去嗎？很難說。我們或許只是注意到，對於將非人類的宇宙完全趕出馬克思主義，有若干反彈的跡象。[35]我們或許也注意到否認世界的客觀存在和可理解性（他們的理由是，所有「事實」只是因為人類心智裡的概念的先天結構才存在）的哲學潮流已經不再流行。（它的確很難和實踐結合，無論是科學家或是那些想要以政治行動改變世界的人。）

基於前面的概說，也就難怪一九五〇年代以來的評論者會再度談到馬克思主義的危機問題。以前的確定性（或是和這些確定性分庭抗禮的版本），無論是關於資本主義的未來，關於可能推動過渡到新的社會體系的社會和政治力量，關於即將要實現的社會主義的本質，關於宣稱已經完成這個轉型的社會的性質和遠景，凡此種種，現在都遭到懷疑。的確，它們已經不復存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包括馬克思自己的理論，都接受了深刻的批判性檢驗，以及一大堆分庭抗禮的、但是一般都影響深遠的重新闡述。以前大多數馬克思主義會接受的，現在都遭到嚴厲的質疑。如果我們撇開社會主義國家的官方意識型態以及一般規模比較小的基要主義派系不談，所有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都會假定說，馬克思主義的傳統理論和學說有必要整個重新思考、修改和修正。另一方面，馬克思逝世一百年後，對於馬克思主義的重新思考或修正，並沒有任何具有主導性的版本。

然而，如前所述，對於傳統馬克思主義的質疑，和馬克思主義對於全世界知識分子的吸引力和影響力的成長是攜手並進的。這顯然不是活躍的、不斷成長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就像在一八九〇年代那樣）的魅力所致，因為在這個時期的大多數政黨的記錄都不怎麼鼓舞人心。更不是因為那些號稱代表「真正存在的社會主義」的國家的吸引力。相反的，儘管和蘇聯（不管對或錯，它被視為第一個工人的國家，第一個工人革命以及建立第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的認同，對於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好戰派（以及一九四五年以前的其他輔翼組織），是個很大的鼓舞，但是它和知識分子越來越疏離，更不用說群眾了。的確，一九五〇年代以來反馬克思主義的主流，總是循

著一條簡單的政治論證路線，甚至拒絕任何修正的、擴大解釋的「新馬克思主義」，他們的理由是，除非他們放棄馬克思主義，否則**不可避免地**都要走向列寧主義或類似的主義。以前會試圖證明馬克思的種種理論在思想上是無效的，但是並沒有放棄它們，現在漸漸沒有人這麼做了，而現在更幾乎沒有人會試圖將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斥為在思想上是微不足道的。

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力的增加是由於其他因素的關係。一九五〇年代意識型態的陣地的掃蕩無疑是個助力。在一個時期裡，法西斯主義的挫敗幾乎使得右翼的基進主義被視為準革命論述的用語而銷聲匿跡，因為人們將它和希特勒主義聯想在一起，而一九五〇年代的自由派的社會批判，經常自鳴得意地歌頌現存的西方社會解決所有問題的能力，因而將戰場讓給了馬克思。人們會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確是因為他們覺得必須從根本批判資產階級社會以及其中昭然若揭的不公不義（例如在「第三世界」），以及到處存在著顯然無法接受的政權。

＊ ＊ ＊

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在全世界的思想浪潮，在一九七〇年代到達巔峰，尤其是在出版自由的國家裡，在威權政府和軍國主義政府朝不保夕的國家裡，例如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臘。新的或舊的馬克思主義文本處處可見，從德國基進派非法的「海盜版」（Raubdrucke），到在政治上沒有不良紀錄的出版社，例如英國的企鵝（Penguin）出版集團，西德的蘇爾坎普出版社（Suhrkamp）。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三大冊（仇視）馬克思主義的歷史，麥克米倫

（Macmillan）出版了馬克思傳記（對馬克思友好的）。馬克思主義者自己也成立了出版社（例如新左派出版社〔New Left Books〕），或是規劃野心很大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在英國）或是馬克思主義史（義大利）。馬克思逝世百年紀念將近時，馬克思主義或許可以回顧半個世紀的非凡進展。

有跡象顯示，情勢不再對馬克思有利，但是很少評論家預測到趨勢翻轉的速度和規模。當然，在我參與寫作伊諾第出版社的《馬克思主義史》（*Storia del marxismo*）時，我也沒有預測到，那是同類型作品當中野心最大的計畫，在義大利共產黨選舉大勝時期的全國性慶典期間出版。馬克思逝世百年紀念以後的二十五年間，應該是他的傳承的歷史裡最黯淡的年代。

注釋：

1 在這樣的政權下的已開發工業國家，在二次大戰後，如果沒有蘇聯的支配，是不會有那些特徵的。

2 John Rae, *Contemporary Socialism* (London, 1884).

3 例如：'Socialism' by Daniel Bell 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Y, 1968)。

4 Introduction by R.H. Hilton to *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London, 1954).

5 同前揭：p. 41n。

6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NY, 1974)。法蘭克論文的早期的批評，見：Ernesto Laclau, 'Feudalism and Capitalism in Latin America' (*New Left Review* 67, 1971)。

7 重要的作者包括：伍爾夫（Eric Wolf）、夏寧（Teodor Shanin）和阿拉維（Hamza Alavi）。恰亞諾夫的重新發現要歸功於馬克思主義者索爾納（Daniel Thorner）。

8 關於這些圖書館的名單、它們的館藏和「歷屆校友」，見：Hywel Francis, 'Survey of Miners' Institutes and Welfare Libraries, October 1972-February 1973' (*Llafur I*, 2, May 1973, pp. 55-64)。

9 一九七〇年代初期，某些奄奄一息的社會主義政黨的明顯復興，例如在法國、西班牙或希臘，我們不應該被它們誤導了。它們不再是遵循傳統路線、以無產階級為基礎的群眾政黨，而是對於社會異質選舉人的動員體系，主要是結合了對於現存保守派政權的不滿以及對於國家、經濟和社會的各種改革要求。

10 H. Francis, op. cit., p. 59.

11 該軼聞得自巴特勒爵士（R.A. (Lord) Butler）。

12 如前所見，「新左派」的一個大派系，以及它裡頭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論有興趣的成員，原本是被政黨開除的前共產黨員，或是以布爾什維克傳統組成的團體，或是相關組織。

13 G. Lichtheim, *Marxism* (London, 1961), p. 393; P. Baran and P.M. Sweezy, *Monopoly Capital* (NY, 1966), p. 3.

14 不只包括許多革命派系和團體，也包括轉型了小型共產主義政黨，例如在瑞典。

15 Lichtheim, op. cit., pp. 393-4.

16 同前揭：p. 394。

17 關於自阿圖塞以來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裡的「接合」一詞的發展的討論，見：A. Foster-Carter, 'The Mode of Production Debate' (*New Left Review* 107, 1978, pp. 47-78)。

18 N. Poulantzas, 'The capitalist state: a reply to Miliband and Laclau' (*New Left Review*, 95, 1976, pp. 65-6)。他的主要作品有：*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 (London, 1973), *Facism and Dictatorship* (London, 1974) and *Class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London, 1975)。

19 比較從一個資深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的觀點對於阿圖塞既禮貌又無情的批判：P. Vilar, 'Histoire marxiste, histoire en construction: essai de dialogue avec L. Althusser' (*Annales* 281, 1973, pp. 165-98)。

20 Georg G. Iggers, *Neu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Munich, 1978), p. 157.

21 Paul A. Samuelson, *Economics* (tenth edition, 1976), chapter 42.

22 G.A. Cohen, *Karl Marx'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ce* (Oxford, 1978), p.ix.

23 其例證見：O. Kuusinen (ed.), *Fundamentals of Marxism-Leninism* (Moscow, 1960), part III and chapters 22, 23。

24 其早期例證見：Oskar Lange, *Political Economy I: General Principles* (Warsaw, 1963)。其中一章：'The Principle of Economic Rationality'，有一篇附錄：'The mathematical foundations of programming'，提到弗里施、薩繆森和梭羅的作品。朗格（Lange）是個重要的社會主義學者，在戰後回到波蘭。

25 大抵上是受到斯拉法的《用商品生產商品》（*The Production of Commodities by Means of Commodities*）的刺激，它導致「李嘉圖派」和「非李嘉圖派」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論戰。

26 這句話引自：B. Hindess and P.Q. Hirst, *Pre-capitalist Modes of Production* (London, 1975)，它開頭寫道：「這本書是一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作品」。

27 這不是說，主流的馬克思主義就比邊緣的更正確，只是它們更忠於馬克思而已。

28 例如說：Hilferding's *Finance Capital*和Rosa Luxemburg's *Accumulation of Capital*，經常提到馬克思。

29 語出：*State and Revolution*。當人們承認一九七〇年代和八〇年代的分析關於這個不重要的文本的權威性，使得忠實的列寧主義者不得不主張說，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和戰後早已很盛行。（另見：staatsmonopolistischer Kapitalismus' in *Wörterbuch der marxistisch-leninistischen Soziologie*, Berlin E., 1977, p. 624ff.）

30 關於年輕和年長的馬克思主義者之間的決裂的辯論非常重要，很類似阿圖塞所說的「知識論的斷裂」（rupture épistémologique），它也預見了正統蘇維埃馬克思主義拒絕承認《早期著作》屬於馬克思主義的作品，重點不在於馬克思是否放棄了黑格爾的傳承，或是一八四三年巴黎手稿的論證。他當然沒有。重點是將兩種不同的展望未來的方式結合在一起的結果。

31 J.A. Schumpeter,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London, 1954), p. 573.

32 P.M. Sweezy, *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London, 1946), p.vii.

33 比較：M. Desai, *Marxian Economic Theory* (London, 1974)。那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給學生的好例子：「這本書探討馬克思的經濟學，視其為持續的研究計畫，許多莫衷一是的問題都還沒有解決。」

34 G. Lichtheim,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Marx's Thought', in *From Marx to Hegel* (NY, 1971), p. 69：「對於馬克思而言，唯一要思考的『自然』顯然是人自己的本性，以及他經由其『實踐行動』改變的環境。外在世界，就其自在自為的存在而言，是不相關的。」

35 例如：Sebastiano Timpanaro, *On Materialism* (London, 1975)。

第十五章 衰退中的馬克思主義：一九八三年到二〇〇〇年

馬克思逝世百年以後，馬克思主義無論在政治或思想上都顯然節節敗退，接下來的二十五年間持續如此，儘管在二十世紀末有可能復甦的跡象，弔詭的是，在諸如《紐約客》（New Yorker）的約翰·卡西迪之類的商業世界裡的觀察家眼裡，那是再清楚不過的事，當他回想起他關於資本主義經濟越來越難以控制的全球化的預測。但是不容懷疑的是，二十五年來，在一些地區，馬克思不再被認為和這個時代有關的思想家，而在世界大部分地區，馬克思主義被化約成僅止於中年或老年人漸漸凋零的殘兵敗將的觀念。五十巨冊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譯本，從一九七〇年代開始進行，終於在二〇〇四年出版，最後大功告成，得到的是沉默的反應。一九七〇年代另一個氣度恢宏的計畫，一百二十二冊新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MEGA），完整收錄馬克思和恩格斯寫下的每個字，也如火如荼地進行。它並沒有引起任何關注，或許除了關於思想連續性的個案研究以外，從共產黨政權計畫和資助的事業，到跨國的學術活動，它的政府和意識型態的蘊含卻被遺忘了。

乍看下，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急轉直下的磋跌的原因很明顯。在形式上等同於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政權，在一九八〇年代的歐洲顯然遭遇危機，在中國的路線則是戲劇性地扭轉。蘇聯及

其歐洲的衛星國家的解體，不可免地將「馬克思列寧主義」掃蕩廓清，那原本已經是他們國家的宗教，由政治威權宣告教義，官方主張的權威則勝過理論和事實。其實它並不一定影響到在自稱是「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的地區以外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因為史達林的《蘇聯共產黨簡史》被接受為「辯證和歷史唯物論」的標準概說（就算不是布爾什維克黨史）的年代早已經過去了。無論如何，蘇聯教條式的正統排斥任何對於蘇聯社會現狀的真正馬克思主義分析。正如前幾章所述，自從一九五六年以來，非國家性的共產主義政黨裡的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都開始批判這個正統，無論是公開的或是（在遵循莫斯科路線的共產黨）意有所指的，而一九五六年以後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政治主流，托洛斯基派和毛派，都以厭惡蘇維埃意識型態和蘇維埃政權著稱。

不過，蘇聯和蘇維埃模式的垮台不只是重創共產黨，更延燒到世界各地的社會主義，因為儘管有明顯的缺點，它們唯一的目標就只在於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社會。它們也創造了一個超級強權，和舊有的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主義在全世界抗衡了半個世紀。就這兩個層面而言，它的挫敗極其顯著，更不用說它在大多數方面相較於西方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的劣勢，即使是對於那些並不認同華盛頓意識型態的優越心態的人們也是如此。資本主義已經忘記它也會有瓦解的一天。在社會主義者眼裡，蘇聯的終結澆熄了從十月革命的傳統裡出現一個不同的、更好的社會主義（就像是布拉格的春天所謂的「人性的」社會主義）的希望。經過了八十年的實踐，那些堅持原始的社會主義希望、以互助合作而非競爭建構一個社會的人們，不得不撤退到思辨和理論裡。他們當中的馬克思主義者不能迴避他們的理論對於未來的預測明顯失敗的問題。

凡此種種，都讓非國家性的社會主義者懷憂喪志。在「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的國家內部，它完全摧毀了任何沒有依附在殘存的亞洲執政黨底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在那些國家裡，共產主義（「先鋒黨」）被設定為少數選定的領袖和運動者的教義，而不是像天主教或伊斯蘭教那樣的普世信仰。光是這點，就足以讓那些不需要意識型態的地區非政治化。讓民眾團結在一起的，是人民對國家的傳統向心力，歷史的傳承、愛國情操、民族認同感或其他認同，甚至是對於既有權力的形式服從的習慣，而不是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信仰，除了孩子們強迫性的道德和政治教育的餘緒以外。當體系瓦解以後，它只留下各種傳承、記憶和象徵，而沒有對於一個公民宗教（civic religion）的忠誠。

到了一九九〇年代，大多數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已經沒有空理會體系，或者轉向沉默的或公開的抗議（如果他們以前是新政權解放以後的熱情支持者），就像大學的共產主義者成為波蘭團結工聯的智庫一樣。即使他們仍然忠於社會主義，他們也致力於批判「現實存在」的版本，希望能夠改革它們。這個情況也漸漸適用於體系本身的領導幹部。一九八〇年前後，一個在波蘭的美國研究生注意到，波蘭政黨官員普遍拒絕自稱是「共產黨員」。她剛好問一個中央委員會的委員是不是共產黨員，他沉默了半晌才說：「我是個實用主義者（pragmatist）。」[1]

在黨員之間，馬克思主義（不同於由高層頒布的不容挑戰的教條）的根基也不穩固。對於大多數黨員或有抱負的黨員而言，他們的意識型態是否為真，那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不能應用，如果它不是具有約束力的話。「如果像史達林一樣，路線改變了怎麼辦？」一個英國學生

在莫斯科高級黨校問一個蘇聯同學。「他瞪了我一眼，彷彿我是個政治文盲似的。『那麼它就會成為現在的真理。』」[2]當體系崩壞，它的菁英份子無疑會有很多懊悔，包括失去全國性的意識型態，但是很少人會覺得放棄它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版本有什麼不妥，除非他們屬於和教義相關的次級團體，就像梵諦岡的神學家之類的。無論如何，他們毫無困難地適應了後蘇維埃時期的俄羅斯的國家保護、叢林資本主義以及黑手黨勢力的組合。

不過，棄守馬克思主義，不能僅僅歸咎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政權的崩壞或轉型。因為它顯然早在那以前就已經開始了。其中一個因素，是歐洲非國家性的共產黨性格的逐漸腐敗和改變，以及它們失去對於一九四五年以後的世代和知識分子的領導權，例如在法國和義大利，這些政黨控制著左派。我們也不能低估由反法西斯主義、世界大戰和反抗運動組成的年齡層逐漸退出公共舞台的因素，無論是政治或文化的。歐洲非國家性的共產黨以及社會主義政府的危機，在一九八〇年代初期再明顯不過。其實，早在列寧在西方先進國家乏人問津，已經有一陣子了，雖然基進學生運動到了一九六八年以後才發現這點。一九七三以後，在快速全球化的跨國經濟裡，自由放任政策在全世界復甦，在那樣的年代裡，支持以國家行動推行費邊社的漸進改革主義的伯恩斯坦，是否也察覺到這點，我們不是很清楚。在雷根總統和柴契爾夫人的年代則是再明顯不過。在密特朗總統於一九八一年的政策白皮書計畫失敗以後，尤其引人注目。然而，在一九七〇年代，儘管新時代已經開始了，書店和研究室裡的馬克思主義卻是奇貨可居，政治和勞工聯盟的主戰派也大獲全勝。

撇開政治不談，馬克思主義在知識分子當中已經在退潮，雖然直到一九八〇年代以前並不很明顯。而且不只是馬克思主義，而且是當前所有關於人類社會的觀念，它們曾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主宰著西方世界的思想，而馬克思主義只是其中之一。就連自然科學也遭到抨擊，不只是因為科技可能或實際造成的損害，也因為它們作為理解世界的模式的有效性遭到質疑。

在經濟學裡，這個現象或許最不明顯，馬克思主義在那裡頭始終是個邊緣角色，雖然前十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有三位是在早期的蘇聯培養出來的（或部分培養），或者仍然在蘇聯任教（列昂惕夫、庫茲涅茨和康托羅維奇）。然而，當海耶克在一九七四年和他在意識型態上的對手，來自瑞典的默達爾，共同獲獎，而在一九七六年則頒給傅利曼，那明顯意味著完全拋棄凱因斯學派和其他干預主義理論，回歸到漸漸強硬的自由放任主義。直到一九九〇年代末期，這個盛行一時的共識才出現裂痕。

至少在美國以外，在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裡，尤其是社會學和歷史，馬克思主義者和非馬克思主義者的一個方法學上、而非政治或意識型態上的共同取向，早已經昭然若揭。從十九世紀開始，嘗試理解社會運作的社會學，和馬克思以及意欲改變世界而不只是詮釋世界的一般性目標不謀而合。涂爾幹、馬克思和馬克斯·韋伯，取代了它在學院的創始者孔德和斯賓塞，雖然我們沒有理由相信說，馬克思自己會認為它是個判然有別的研究領域。自從一九六〇年代以來高等教育不同凡響的擴張，給了社會學獨特的重要地位（目前英國五十四所大學機構設有社會學系或包含社會學），而政治的基進化使它成為許多學生的熱門選擇。隨著大學裡的基進氣氛的退潮，它在

思想上的重要地位也跟著銳減。

歷史也跟學生的基進主義有關，但是它作為一個研究領域的演變更加發人深省。在這裡，馬克思主義是現代化的潮流的一部分，主要藉由動員在當時日新月異的社會科學的洞見和方法，試圖灌溉貧瘠的傳統史學，這樣的史學討厭任何形式的概括化，大抵上自限於政治、軍事和體制的敘事，以重要人物的行為舉止的角度，記錄事件的年代序。到了十九世紀末，來自迥然不同的學科和意識型態的改革者匯聚在一起，終於讓人看得見他們的存在，但是在圍攻學院的碉堡上幾乎沒有進展，除了在它的外圍設立「經濟和社會史」的前哨部隊以外。在兩次大戰之間，尤其是一九三〇年代，他們有些進步，但是直到二次大戰以後，他們才成為主力。

接著，他們其實啟發且改變了歷史領域，主要是透過偏好媒合歷史和社會科學的期刊，尤其是布洛赫和費夫賀著名的《經濟社會史年鑑》（*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自從一九二九年以來，一直是傳統史學的激烈對手，在布勞岱的影響下，成為全世界最重要的歷史期刊，他也在剛建好的「人文科學之家」（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成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和舊有的大學幾乎是對立的機構。年鑑學派就其思想起源和支持對象而言，絕非馬克思主義者，但是它有助於鼓舞英國歷史學家成立期刊《過去與現在》（*Past & Present*）。在缺少和老式學院對立的正式機構的情況下，它是英語系國家裡溫和得多了的同類型期刊。兩者都影響到德國在一九六〇年以綱領式的標題「歷史社會科學」的史學改革，經由設立新方向的大學，尤其是畢勒斐而加強其體制面向。啟發德國的改革者的，

不是馬克思，而是馬克斯．韋伯。在此同時，在美國也創辦了很特別的跨學科期刊《社會與歷史比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後來擴大成立更活躍的「社會科學史協會」（Social Science History Association）。

無疑的，到了一九七〇年，改革者已經確定基調，只剩下傳統史學家還在負隅頑抗。大學學生漸趨基進的團體的大規劃擴張，加強了他們的影響力，使得「社會史」和更理論性的社會學成為年輕知識分子可以選擇的武器。我們很難評估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在這些發展當中的角色，但是它們在該領域於一九七一年的引用書目裡，遠遠超過其他歷史學家或歷史學派[3]，而對於研究一九〇七年到二〇〇七年的英國史學的歷史學家而言，「趕走某些早期過時的教科書，甚至是在更遠的書架上的」，是馬克思主義的作品。[4]但是馬克思主義的少數（除了在共產主義專政的國家裡，歷史學家在那裡別無選擇），只是範圍更大的史學現代化運動裡的一份子，現在該運動看起來已經獲勝了。

進步主義的歷史現代化者的自信而極端的簡單化（例如在法國），難怪會引人非議。舉一個明顯的例子，由於法國人蔑稱為「事件的歷史」以及馬克思主義者貶抑為「個人在歷史裡的角色」的忽視，使得當時一直沒有任何夠格的「希特勒的德國」或「史達林的蘇聯」的歷史作品。[5]然而從一九七〇年中期開始，我們看到的不只是這樣。對於思欲以社會科學去理解人類集體的結構和改變，顯然有新的懷疑。在那同時，社會學和社會人類學也有類似的反客觀和反結構的轉向，和所謂「批判理論」的版本合併，產生了後現代主義的相對主義的某些極端形式。新古

典主義經濟學將社會化約成理性追求其利益的個體的群聚（agglomeration），他們的目標是與歷史無關的市場平衡。新的歷史學家揚棄了社會科學和關於社會變遷的跨學科「大哉問」所重視的種種方法，回歸到敘事的（尤其是政治敘事）而不是結構的分析。他們一方面探討文化和觀念，另一方面設身處地地思考個人的歷史經驗。有一個重要的學派，不僅拒絕歷史和社會的概括化和可預測性，更否認客觀實在世界的概念。擺脫現在的「現代主義」主流的批判性轉向，並沒有特殊的政治或意識型態取向。布勞岱和他的年鑑學派和馬克思一樣，都是它的批評對象。雖然新的修正主義的某些面向和傳統保守主義互相吻合，例如歷史的不確定性（對於歷史提出許多反事實或「如果……？」的問題），但是它主要是發源自一九六八年以後的基進主義氛圍。所謂歷史的「後現代主義者」甚至一直是左派革命者。

馬克思主義在非共產主義世界的撤退，因而是一九七〇年代更一般性的社會和人文科學的變異的一部分。它和冷戰時的意識型態、對蘇聯的厭惡以及對於執政的共產黨的抗議和控訴沒有明顯關係。儘管後者在一九五〇年代和六〇年代很強勢，如前所見，它們和包括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在內的政治基進主義的高漲卻能夠共存。它更不是期待歐洲共產主義政權的垮台，那些嫌惡它們的人們並沒有認真期待那一天，直到它山雨欲來以前。我們也不能將它歸因於社會民主主義的發展危機，它在歐洲的執政黨在一九七〇年代的確比從前增加許多。除了少數例外，在二十五年當中的反馬克思主義者和反共產主義者的名單裡，並沒有什麼新人。即使是那些控訴「失職的上帝」的人們，也都早在一九七〇年代以前就和他們各自的共產黨決裂。西方國家的冷戰專家有系

統地透過「文化自由代表大會」（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對抗蘇聯的「觀念戰」，自從被揭露接受美國中情局的資助以後，實際上就已經告終。

真要說的話，馬克思主義的撤退是從舊有的基進左派自己發動的，其導火線是不同的馬克思主義版本關於自動的歷史演變以及革命行動的角色的內在齟齬。如果歷史發展不可免地會導致資本主義的終結，以及社會主義的勝利，那麼自願的行動就不會是決定性的角色，除非熟透了的蘋果從歷史的蘋果樹上掉下來。即使如此，革命行動除了撿起它們以外，還能做什麼嗎？其實，只有四面楚歌而沒有社會革命的前景的革命者們，才會有這樣的問題。一九一四年以前渴望行動的左派基進份子，拒絕和期待歷史演變的德國社會民主主義劃上等號的那種馬克思主義。年輕的葛蘭西甚至說到「針對《資本論》的革命」。不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由於列寧的關係，把他們的極端基進主義拉回到馬克思主義。一九六〇年代，同樣奮不顧身地投入行動的新左派基進運動，就在西方資本主義巔峰時期發生，那時候由於薪資的提高、社會福利，以及企業集團和工會的共生關係，使得它越加穩固。他們當然沒有拋棄馬克思，他滿臉于思的臉至今已經是個革命的圖像，雖然漸漸被率性叛亂的更貼切的偶像切．格瓦拉給取代了。

然而，他們不喜歡馬克思主義的地方，不在於社會黨將馬克思曲解為不可避免的「勞工大躍進」，而是列寧以他為名的嚴厲而中央集權的政黨組織。就革命史的角度看，他們代表了從馬克思翻轉到巴枯寧。他們討厭蘇聯共產黨的地方，不外乎遵守紀律的中央集權、集中命令的真理，以及屠殺史達林的祭品的行動。自動自發，由下層階級發起，更不用說暢所欲言（「做你自己的

事」），成了行動的基調；他們懷疑任何領導權，任何決定率由草根性的代表大會的各種聲音產生。反過來說，有人繼續追求馬克思主義革命者的傳統目標，也就是政權的轉移，再也不能指望階級壓迫的社會裡創造歷史的列寧式的「革命情勢」。他們漸漸把希望寄託在小規模的非法團體有計畫的叛亂或恐怖主義行動，例如傳統上被馬克思主義者摒棄的團體。在貧窮而未開發的國家裡，他們可以主張說，這些地區持續在社會戰爭邊緣，一旦被諸如切．格瓦拉之類的游擊隊「聚焦」，戰爭就會引爆。（實際上，這個由古巴得到靈感的理論在一九六〇年代和七〇年代在它揀選的大陸上完全失敗，無論德布雷有多麼辯才無礙。）[6]在經濟富裕的情況下，他們只能撤退到古老的無政府主義「行動宣傳」（propaganda by the deed）的口號，小型團體的恐怖行動，在渴求頭條新聞和聳動的形象的媒體社會裡，它終究會造成意想不到的巨大衝擊。

因此，從一九五六年後的舊有的（馬克思主義）左派的動亂，以及一九六〇年代新的文化基進主義，產生了許多趨勢，它們擺脫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分析，卻仍然待在左派陣營裡：尤其是英國的《歷史工作坊》（*History Workshop*）運動和期刊、德國的《日常生活史》（*Alltagsgeschichte*）、印度的「底層階級學派」（subaltern school）、形形色色的「批判理論」、女性主義的生力軍，以及其他主張代表「新社會運動」的認同史，期望它們能力填補傳統勞工運動危機留下的裂痕。

在這同時，人們發現到（由一九七〇年代初期的羅馬俱樂部〔Club of Rome〕發表的報告），人類生產能力難以控制的增加，是未來環境災難的根源，這和馬克思主義作為展望更好的

未來的演化理論訴求背道而馳。馬克思主義在一九三〇年代在枯竭的資產階級社會那裡看到的「進步的危機」，現在轉過來指向他們自己。資本主義的進步本質所導致的不義和壓迫，固然一直引人非議，但是現在控訴的對象卻是進步本身。左派支持者漸漸致力於抵擋和限制人類宰制自然的力量的擴張，而那是以前的馬克思主義者所歌頌的或至少認為是不可避免的（就像全球化一樣）。馬克思主義特別無力抵抗「歷史的不可避免性」的觀點從正面到負面的翻轉。

受過大學教育的、日漸成長且在政治上呼風喚雨的階級轉向左派，或許可以翻轉馬克思的命運，因為在歷史上，對他的理論感興趣的，總是和個人或團體的政治基進化、或是威權主義時期的國家的出現有關。在西方國家則不會有這種情況，雖然有證據顯示，在歐洲以外的國家，政治運動會提高人們對於和馬克思主義有關的文獻的興趣，例如一九七〇年代以來的巴西、台灣、南韓和土耳其的不同時期。[7]相反的，西方國家左派大本營的危機，以勞工為基礎的社會民主運動，則是使得他們內部對於社會主義興味索然。就我所知，過去二十五年來，沒有任何一個歐洲左派政黨領袖宣稱資本主義本身是個無法接受的體系。唯一毫不遲疑地那麼說的，是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再者，將一九六八年的叛逆世代融入蓬勃的資本主義體系裡（這次是「情境主義者」〔Situationists〕），是再簡單不過的事，相較於以前任何的體系，它提供更多樣的個人品味和生活風格，而且漸漸操作且表現為以媒體為導向的、攤在大眾面前的經濟和社會。學術成就漸漸帶來獲利。一九九〇年代和二〇〇〇年代，是第一個出現擁有研究學位的億萬富翁的年代。有個幽默作家說，二〇〇八年的世界金融危機，是因為聰明的研究生進入金融業，而不像以前都是知識平

庸的人，於是他們發明了大多數資本家都搞不懂的複雜算術。[8]思想最活躍的學生眼前看到的，不是社會變遷，而是他們的職場生涯。

此外，我們也不要忘記一個更普遍的現象：十八世紀啟蒙運動關於社會變化的意識型態的一般性撤退，以及另一種對於社會運動的啟發的興起或復甦，尤其是傳統宗教心照不宣的現代化版本。儘管它們在歐洲沒什麼吸引力，但是在一九七九年的伊朗革命裡大放異彩，那是二十世紀最後一次大規模的社會革命。即使不是如此，二十世紀下半葉的歷史和思想發展，也顯然瓦解了傳統上衍生自馬克思的政治分析、綱領或預測。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的發展和操作模式的基本分析仍然有其力量。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興趣在未來的任何復甦，無疑地必須以大規模地重新校正對於他的思想的傳統觀點為基礎。

如果不是大多數共產主義政權的垮台、其他人刻意放棄他們傳統的方法和目標，以及以勞工為基礎的社會民主主義的自發性危機，或許不足以解釋馬克思主義在這二十年期間為什麼會在知識分子的論述裡幾乎完全邊緣化。既然以前受馬克思鼓舞的表面上的馬克思主義體系和運動難以為繼，或是放棄了他們的傳統目標，那麼它在政治上也就不再那麼重要，在思想上也不必花太多時間在被歷史懷疑的理論。無論如何，冷戰已經結束。弔詭的是，即使對手早已經冰消瓦解，他們還在憤怒地指摘，就像在波蘭，猶太人明明已經從那個國家消失了，反閃族主義卻繼續存在。

冷戰反共的辭令還在繼續，不是針對以前可怕的對手，而且要滿足全世界的優越感，以及西方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的最高權威。他們越來越有自信，以一個普世人權的意識型態為藉口，進

行武力或軟實力的干預，藉此作為在動亂的世界裡的秩序維護者。他們指摘的，不是馬克思的理論和分析（因為論證萎縮了），而是他對革命的展望（他們辯稱那誤導了理想主義的年輕人），以及他和任何其他對於自由主義的挑戰被認為蘊含著或鼓吹的極權主義，更不用說社會主義的抱負對市場社會的自我管理的理性設下的重重阻礙。總而言之，馬克思被塑造成恐怖行動和集中營的啟發者，而共產主義者也被認為是恐怖行動和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辯護人，即使他們沒有參與其中。我們不清楚這些辭令如何說服那些沒有在冷戰時期因為「失職的上帝」而改變信仰的人。我們很難想像這樣的詛咒會在二十一世紀存在多久，即使是今天，也只有三十歲以上的人才對冷戰有一點記憶。

然而，到頭來，馬克思會出其不意地回到這個世界，在這個世界裡，資本主義被提醒說，它的未來之所以被質疑，不是因為社會革命的威脅，而是因為它肆無忌憚的全球操作的本質，對此，相較於信仰自由市場的理性選擇和自我矯正機制的人，馬克思已經證明是更有洞察力的嚮導。

注釋：

1 這段插曲是諾曼．戴維斯（Norman Davis）在英國一場探討共產主義在歐洲的沒落的學術討論會裡談到的（二〇〇九年十月十五日到十六日）。

2 Jim Riordan, 'The Last British Comrade Trained in Moscow: The Higher Party School, 1961-1963', Socialist History Society, SHS Occasional Paper 23, 2007.

3 Felix Gilbert and Stephen R. Graubard (eds), *Historical Studies Today* (NY, 1971, 1972).

4 Robert Evans, 'The Creighton Century: British Historians and Europe 1907-2007', in David Bates, Jennifer Wallis, Jane Winters (eds), *The Creighton Century 1907-2007* (London,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2009), p. 15.

5 現代主義社會觀點的擴大直到一九九八年到二〇〇〇年才產生一部歷史巨著，克爾蕭（Ian Kershaw）兩大冊的《希特勒》。至於關於史達林的蘇聯的類似作品則還沒出現。

6 Régis Debray, *Révolution dans la révolution, et autres essais* (Paris, 1967).

7 我以我自己的書的翻譯和發行的比例作為指標。

8 見：Calvin Trillin, 'Wall Street Smarts'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15.10.2009, p. 6)。

第十六章 馬克思和勞工：長路漫漫的世紀

關於馬克思主義歷史的一系列研究，似乎應該有一篇文章探討工人階級的組織性運動才合適。對馬克思而言，無產階級注定是「資本主義的挖墓者」，是社會轉型的基本主體。在二十世紀，大多數組織性的工人階級運動和政黨都和馬克思對於新社會的夢想（「社會主義」）有關，反過來說，所有馬克思主義者，幾乎沒有例外的，都認為工人階級政黨和運動是他們所選擇的政治行動領域。然而無論馬克思主義或勞工運動，除非被視為獨立的歷史主體，而且彼此的關係複雜而變動不居，否則就沒辦法理解，更不用說它們各自對於二十世紀的歷史的衝擊。

儘管讀過《共產黨宣言》的人都知道，勞工運動要回溯更早以前，不過在十九世紀末開始審視勞工運動和它們的意識型態，是有其道理的。英國重要的勞工史始於一八九〇年代，尤其是韋布的對於工會主義的傑出研究。第一次全球比較性審視則是出現在一九〇〇年：庫勒曼（W. Kulemann）的《工會運動》（*Die Gewerkschaftsbewegung. Darstellung der gewerkschaftlichn Oranisation der Arbeiter und Arbeitgeber aller Länder*）。最早由社會主義新政黨內部寫作的歷史，也是出現在同一個時期，也就是一八三八年梅林的德國社會主義政黨史的第一個版本。

尤有甚者，在一八九〇年代，歐洲政府終於承認組織嚴密的勞工運動的政治地位。英國政府

於一八九三年到九四年出版第一本《勞工統計摘要》（*Abstract of Labour Statistics*）；比利時政府在一八九六年開始發行《勞動雜誌》（*Revue du Travail*）。英國首相羅斯貝利於一八九四年首度親自仲裁雇主和工人的一次糾紛。五年後，法國總理瓦德盧梭見賢思齊，也受施耐德和克魯索冶煉廠的罷工工人邀請前往調解。同年，法國政府採取一項對於勞工政黨（至少是社會主義政黨）極為震撼的措施。它任命一個社會主義者，四十歲的米勒韓，擔任商業部長。在那以前，社會主義者多年來認定他們既不會組成也不會合組政府，除非以革命或大罷工拉下資本主義，或至少是頑固的社會黨憑一己之力贏得大選。在意識型態上，就是這個危機開啟了二十世紀勞工的政治史。

為什麼歐洲政府決定要認真面對勞工呢？當然不是因為他們的經濟力量，儘管有許多雇主宣稱工會將會扼殺產業。工會組織仍舊是很薄弱，英國和法國大約只有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選票，在德國更少。勞工也不是政治的主要角色，除了德國以外，。社民黨是在選舉上最大的選舉力量，擁有百分之三十的（男性）選票。但是，如果真的要推行選舉民主（似乎也勢在必行），勞工政黨可望成為主要的選擇力量，在一九一四年以前的北歐以及其他國家也的確如此。不過，真正讓政府緊張的，不是選票的多寡，而是工人們明顯的階級意識，它表現在來勢洶洶的新「紅色」階級政黨。誠如一九〇六年銳意改革的自由黨政府裡的貿易委員會主席邱吉爾所說的，如果保守黨和自由黨的兩黨體系瓦解，英國政治會變成開放階級政治，也就是說，由階級利益的衝突主導的政治。在英國，大多數人民認為自己是「工人」，這似乎是迫在眉睫的事，但是避免階級鬥爭的政治，其實是一個一般性的問題。

米勒韓危機迫使新的勞工政黨史無前例地（但不是最後一次）思考他們和正在運作的體系的關係。提出這個問題的時機顯然已經成熟，因為幾乎就在同時（一八九九年秋天），德國馬克思主義早期的中流砥柱，艾德華．伯恩斯坦，出版了他的改革主義宣言作品，《社會主義的前提以及社會民主黨的任務》（*Die Voraussetzungen des Sozialismus und die Aufgaben der Sozialdemokratie*），在國際運動上引起激烈的論戰。就在那個時期，也第一次出版諸如《馬克思主義的危機》（馬薩里克所著，他後來成為捷克總統）之類的作品，這應該不只是巧合而已。

米勒韓和伯恩斯坦的修正主義的論戰背後的核心問題是：改革或革命？一八九〇年代末期，資本主義的立即瓦解仍然遙遙無期，至少在已開發的經濟裡是如此，那麼勞工運動的歷史功能在哪裡呢？換言之，社會主義是否有非革命的道路？米勒韓和伯恩斯坦的事件尤其惡名昭彰，因為他們不得不用專橫霸道的方式問問題。他們必須駁斥伯恩斯坦，因為他激怒了所有共產國際的人，明目張膽地提議修正馬克思主義，因此被所有人大肆撻伐。處理米勒韓事件的運動則比較謹慎，因為該事件涉及的是個人問題，和理論本身無關。有人提出折衷方案，讓個人而非政黨實際上有機會參與「資產階級政府」。至於伯恩斯坦，其實社會民主黨接受以下的主張：勞工在資本主義下的生活條件的改善，是運動的主要訴求；可是他們斷然拒絕他關於修正主義的理論性證成。事實上，在一九〇〇年以後，就連在資本主義的主要國家裡的馬克思主義勞工運動，也心照不宣地和資本主義共生，而不是處於戰爭狀態。

儘管勞工和社會主義密不可分，這兩個運動卻不能劃上等號。米勒韓和伯恩斯坦是社會主義

的一個危機，但不是勞工運動的危機。有個勞工歷史學家的國際研討會張冠李戴地在辯論這個主題：「作為一個失敗的現代性計劃的勞工運動」。勞工運動和階級意識不是「計劃」，而是在某個社會生產階段裡的受薪階級具有邏輯必然性而且在政治上幾乎無法迴避的特徵。「計劃」一詞其實比較適合社會主義，也就是意圖以新的經濟體系和新社會取代資本主義。在所有包含工人階級的社會裡，都會出現勞工運動，除非有高壓統治和恐怖主義的防堵。勞工運動在美國歷史裡扮演重要的角色，至今他們在民主黨裡仍然如此。同時，他們也問：「為什麼美國沒有社會主義？」尤其曾經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松巴特，在一九〇六年，社會主義在美國的缺席或無關緊要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事，無論是作為一種意識型態或政治運動。在英國，自由黨和工黨的工會運動一直在政治上支持自由黨，在一次大戰以後，才和它完全斷絕關係。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在阿根廷屢遭挫敗，他們很難理解那個國家在一九四〇年代怎麼會發展出政治上獨立而基進的勞工運動，其意識型態（裴隆主義〔Peronism〕）僅僅是由對一個譁眾取寵的將軍的忠誠構成的。

此外也有積極反社會主義、真誠的勞工運動，例如波蘭團結工聯，以及和特定民族主義和宗教綁在一起的勞工運動，無論是否和意識型態有關。因此，英國政府在一九七〇年代試圖將天主教徒延攬到北愛爾蘭政府裡，卻因為基督新教的工人階級的大罷工而胎死腹中。反過來說，歷史記錄了既沒有也從未尋求階級基礎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包括正統和異端的基督教運動，以及各種建立公社的十九世紀的「烏托邦社會主義者」，很弔詭的是，在英國比美國或其他地方都更受歡迎。

當然，不可否認的，從《共產黨宣言》到一九七〇年代，和社會主義無關的勞工運動只是少數例外。的確，我們實際上很難找到任何一個和社會主義者或是在社會主義運動裡培養出來的人們無關的勞工運動。勞工運動和社會主義的共生關係明顯不是偶然的。雙方都從中獲利，除了那「真正現存的社會主義」體系以外，它們廢止了以宣稱代表工人階級以及社會主義為名的勞工運動。

不過，勞工運動和社會主義並不必然是目標一致的。的確，從考茨基到列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都主張說，勞工運動並不會自然而然地衍生出社會主義，而必須從外部引進。這或許是誇張之辭。或許有人辯稱，美國、法國和工業革命的年代，使得以迥然不同而且更好的社會終結並且取代現有秩序的可能性，成為整個思想氛圍的一部分，至少在西方國家是如此。因此，工人們集體追求更好的生活條件，蘊含著更好的、也就是更符合社會正義的社會的可能性，以及一個以共同體和互助合作而非競爭為基礎的社會。窮人的運動比較傾向於贊成且偏好這個願景。必須從外部引進勞工運動的，是另一種東西：新社會的專屬名字和內容，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策略，尤其是全國性的、在政治上獨立的階級政黨的概念。諸如工會之類的組織，以及互助合作的社會，或許可以從工人們的生活經驗裡產生，但是政黨不行。

馬克思和恩格斯從《共產黨宣言》以來的基本貢獻在於，工人的階級組織在邏輯上必須是全國性、甚至是超越國家的政黨。（顯然只有在憲政的、自由的或資產階級民主的國家裡才有可能。）這是個極具歷史意義的命題，不只是對於勞工運動（如果沒有國家支持它們對抗雇主，

它們很難達成目標），更包括一般性的現代政治結構。它也被證明很務實，因為這樣的政黨，有些還保有原來的階級從屬關係，例如工黨、西班牙工人社會黨（El Partido Socialista Obrero Español）、瑞典社會民主工人黨（Sveriges Socialdemokratiska Arbetareparti）、挪威工黨（Det Norske Arbeiderparti），都在馬克思逝世以後誕生，注定要在非共產主義的歐洲國家裡成為執政黨或是主要的反對黨。這是在歐陸上持續不變而且重要的紀錄。無獨有偶的，勞工運動必須變成或維持革命性的信念，也被它打破了，因為它們在資本主義底下只會計窮力竭。至於主張無產階級基於歷史的必然性而將會成為「真正的革命階級」的假設，現在看起來顯然是沒有根據的。再者，歷史已經告訴我們，革命是太過複雜的事件組合，因而沒辦法單純地視為階級結構的複本。像馬克思主義者一樣企圖解釋為什麼大多數工人階級政黨固執地拒絕扮演嫁禍給他們的革命者角色的左翼理論家和勞工歷史學家，應該可以省下許多時間、精力和思慮了。

簡言之，已開發的資本主義的（憲政）國家（在那些國家裡，革命是乏人問津的事），將革命者約束在勞工運動內部或外部，但是大多數有組織的勞工，即使是有階級意識的，通常不是革命者，縱然他們的政黨忠於社會主義。在諸如俄國和鄂圖曼帝國之類的國家裡，情況自然大相逕庭，政治的改善只能期待透過革命。

所以說，在二十世紀初期，在已開發的資本主義的核心國家裡，似乎沒有什麼東西阻礙勞工和一個繁榮的經濟體系的共生關係。無論是資本主義的瓦解，或是該地區典型的自由而漸漸民主化的憲政的崩壞，看其來都遙遙無期。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所受到的危害似乎沒有全球帝國主義

結構來得大，因為在「落後」世界裡，「先進」世界的經濟、文化和軍事優勢極為明顯。的確，在革命是真實的願景而不只空談的「落後」國家裡，馬克思主義者很清楚，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前面唯一的路。因此在俄國，所謂「合法的馬克思主義者」將馬克思主義轉變成一個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意識型態，但是，在一九一七年以前，即使是布爾什維克黨也相信，即將來到的革命的直接目標，是資產階級和自由的社會，因為唯有如此，才能為推進到無產階級革命、接著到社會主義創造歷史條件。

第一次世界大戰似乎打破了所有這些期待。從一九一四年到一九四〇年代末期的「大災難時期」（Age of Catastrophe）都在戰爭、社會和政治的崩潰以及革命的陰影下，尤其是俄國十月革命。舊世界一切都不對勁了。戰爭以革命以殖民地的動亂收尾。資產階級自由民主的憲政法治國家，將政權拱手讓給在一九一四年以前想像不到的希特勒德國和史達林蘇聯。即使是經濟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在一九三〇年初期的危機裡似乎也崩潰了。如果不廢止民主和勞工運動，資本主義還能繼續存在嗎？只有全球資本主義的深層困擾才能解釋這個問題，即使在蘇聯以外，人們也可能很煞有介事地認為史達林的蘇聯的舊式工業經濟是個比西方國家更有活力的體系，以及取代資本主義的全球性的可能選項。一直到一九六〇年代，仍然有資產主義的政治人物，例如英國首相麥克米倫，他和赫魯雪夫都認為社會主義經濟比西方國家的經濟更有生產力。即使是那些對於蘇聯的經濟成就和潛力態度比較保留的人們，也不能否認它在全球政治的重要性以及軍事力量。第一次世界大戰摧毀了沙皇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戰讓俄國變成超級強權。對於剛解放的殖民

地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國家而言，蘇聯及其社會主義，實際上成為如何克服落後問題的一個經濟模式。

因此，社會主義者和勞工運動在大災難時期的政治議題從如何和資本主義共存轉向如何終結它。比起經由眼前的改革慢慢走向遙遠而沒有被認真追求的社會主義，革命以及接下來的新社會的建設，似乎是個更好的願景。韋布夫婦，英國費邊社的啟發者，漸進式改革主義的使徒，實際上鼓舞了伯恩斯坦在一八九〇年代的修正主義，他們在一九三〇年代放棄了改革主義，信奉蘇聯的社會主義。

不過，雖然在一九一七年以後，一切都改觀了，資本主義的大本營並沒有遭受最終的瓦解或社會主義革命的威脅——革命僅限於體系邊緣的國家。彼得格勒蘇維埃的革命並沒有在柏林鞏固陣地，現在看起來，那的確也是不切實際的想法。因此，修正主義的共生基礎仍然很穩固。再說，政治人物和企業家對它越來越感興趣，認為它可以抵擋社會革命和全球共產主義運動的幽靈，在相互仇視的改革派的社會黨和革命派的共產黨之間的區別越來越尖銳。兩次大戰之間所缺少的，是可以提供向勞工運動讓步的必要條件的經濟繁榮。無論如何，即使是在最杌隉不安的時代，這些國家裡大多數的勞工運動成員，都拒絕從改革派政黨轉向革命派政黨。在兩次大戰中間，共產黨只有在三個合法承認它們的國家裡得到群眾的支持，即使是在那裡，它們也不及社會民主主義：德國、法國和捷克。如果說芬蘭共產黨也算是合法的話，那就有四個國家。兩次大戰中間的其他地方的共產主義政黨得到的選票最多只有百分之六（比利時、挪威和瑞典），即使如

此，也只是曇花一現而已。

在二次大戰後，透過充分就業以及後來的福利國家的審慎的政策，以一九四五年後的數十年間（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七三年）資本主義經濟的突飛猛進為基礎，他們繼續推動共生關係，作為西方國家資本主義的結構性改革政策的一部分。如果不是兩次大戰中間的經濟大蕭條和希特勒德國的崛起的慘痛經驗，他們還會如此有自覺地企圖整合勞工嗎？在反法西斯主義的反抗運動期間裡突然生起的恐共心態的因素有多大？現在他們背後的靠山，是一個超級強權。如果沒有希特勒和史達林，伯恩斯坦會獲勝嗎（「運動是一切，最後目標不重要」）？不太可能。

因此，在西方資本主義的新黃金年代裡，勞工運動的修正主義模式在資本主義的核心國家盛行一時。一九五九年德國社民黨的哥德斯堡綱領（Godesberg Programme）正式放棄馬克思主義，正象徵著它的勝利。把馬克思主義扔掉似乎沒有任何損失，除了感傷的回憶以外，因為當黃金年代尾聲將近（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七三年）的時候，改革主義的目標實際上已經達成了，工人生活的改善遠超過一九一四年以前最樂觀的改革代表人物所能想像的。不過，修正主義政黨仍然以工人階級為基礎，儘管放棄社會主義的「最終目標」而被它內部的左翼份子惡意中傷。他們主要的票倉，體力勞動階級，仍繼續投票給他們。直到後來，他們才開始放棄他們的階級政黨。

其實，直到一九七〇年末期生產力的驚人擴張，仍然需要大量的產業工人，他們仍然是主要的選票來源。當新的勞工階級意識突然創造出無產階級群眾政黨時，比起十九世紀末，在一九七〇年代的資本主義歐洲裡，或許有更多的無產階級，無論是相對的或絕對的。然而，現在我們也

看到，這些工人階級政黨，儘管結合了改革派和革命派，從未獲得過半數的選票，直到二次大戰以後。

撇開兩次戰爭中間的時期不談，在資本主義核心國家裡的勞工運動直到一九七〇年代危機以後的發展，可以總結如下。

即使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統治階級在面對政治漸趨民主化時（由於新勞工政黨的壓力而加速）的政策，已經開始轉向社會改革。在非法西斯主義國家裡，這個歷程在兩次大戰中間加快腳步，但是直到二次大戰結束才系統化，以諸如「充分就業」和「福利國家」之類的口號。就算在一九一四年以前，民主化和經濟成長也鼓勵公開承認有節制的勞工運動的價值，雖然德意志帝國是個大例外。結果，勞工運動和政黨實際上會和他們的民族國家劃上等號。這個情況在一九一四年戰爭爆發之際再明顯不過了。

那場戰爭結束以後，工人階級組織的數量和力量都有驚人的成長。雖然在兩次大戰中間中輟，在二次大戰期間和結束後又重新開始。除了傳統上積弱不振而且不穩定的工業國家以外，如法國和西班牙，勞工組織的力量在一九七〇年代或許達到巔峰。勞工政黨因而成為維繫國家和體系的力量。在一次大戰期間和過後，他們的代表加入政府，旋即由他們自己組成政府，雖然直到一九四五年後，他們才有辦法在沒有非社會主義政黨支持的情況下獨立執政。這個發展也在一九七〇年代到達極致，在奧地利、比利時、丹麥、芬蘭、挪威、葡萄牙、後法朗哥時期的西班牙、瑞典、英國和西德，都曾經由社會黨執政。此外還包括一九八一年的法國和希臘。接著危機

來臨。

革命派在西方資本主義的核心國家的勞工運動裡扮演什麼角色？不管他們的理論是什麼，在現實上他們不可能是革命派，因為資本主義既沒有沒落，社會主義的過渡也遙遙無期。另一方面，他們也有其利用價值，因為即使是非社會主義的勞工運動，也必須結合工廠裡的階級鬥爭和對國家政府的政治施壓，更不用說用以表現他們的訴求的理念。在工會強勢的地方，革命派總是扮演重要的角色，使得在英國或美國的共產黨即使只有一小撮人，他們的政黨在政治上也微不足道，卻有著不成比例的顯著效果。共產黨在英國工會運動裡的影響力在一九七〇年代到達巔峰，而當時的共產黨已經大限將至。

在「大災難時期」留下來的獨裁政權（西班牙和葡萄牙）底下，非法的共產主義者仍然是主要的抗暴力量，並在一九七〇年代的民主轉型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很快就被邊緣化了。在義大利，歐洲最大的共產主義群眾政黨，由於美國的壓力，有系統地被排除在政府之外，它也和蘇聯漸行漸遠，走向社會民主主義模式。法國共產黨在一九七〇年代採取了好幾年的改革政策，重建了社會黨的密特朗所發起的新人民陣線之類的一部分。在一九八一年到八四年社會黨總統底下，它進入政府一小段時間，那是共產黨自一九四七年以來的頭一遭，但是沒多久就回到傳統的強硬路線。自從以一九七四年以來，它在大選和策略上都輸給重建的社會黨，它的群眾支持也在一九八〇年瓦解。

在資本主義核心國家以外的地區，包括那些在一九一七年和一九四五到四九年受到列寧主義

革命影響的國家，情況就大不相同。俄國的布爾什維克以無產階級為名奪得政權，他們的五年計畫創造了大量的產業工人階級，但是他們也廢除了我們所知道的勞工運動。直到蘇聯垮台以前，任何不受黨和國家控制的工人組織都被禁止，一九四五年以後執政的共產黨都遵循這個模式。在共產主義的世界裡可以寫一部工人階級的歷史，甚至是勞工衝突的歷史，但是寫不出勞工運動的歷史，除了一九八〇年代的波蘭的團結工聯以外。

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社會主義或其他勞工運動（不管是否要考量在澳大利亞以及少數其他溫和派的例外），都是跟著俄國革命開始的。第二國際在那些地區幾乎不存在，社會民主主義也沒有容身之地，更不用說伯恩斯坦的政策了。另一方面，在某些國家裡（主要是在美洲），我們看到一個現象，基於歷史的理由，它在古老世界很少見，蠱惑民心的國家領導人都偏向勞工運動，以利用他們對抗舊有的大地主菁英份子，在阿根廷和巴西尤其如此。在墨西哥，革命體制黨（PRI），在墨西哥革命以後的體制化政黨，也扮演相同的角色。其實，直到一九七〇年代及其後真正工業化的開始以前，在這些地區幾乎找不到任何勞工組織，除了礦工、能源、運輸、船務和紡織業以外。然而在那之後，有兩個發展和一百年前的歐洲若合符節。它們是韓國群眾工會運動的興起，以及巴西的工黨（PT, Partido Trabalhista Brasileiro），都在一九八〇年代。列寧主義的影響（無論正統或異議）在這些運動裡很重要，但只有在少數國家。一如往常的，無論運動背後的意識型態是什麼，幾乎所有運動都發生在那些比和平民主國家更習見軍事政變、革命、巷戰和槍枝的國家。在中國和越南，一如在蘇聯，大量工業化並沒有產生獨立的勞工組織。

然後，在一九七〇年代，一切都改觀：人們不再指望列寧和伯恩斯坦。每個人都知道蘇聯體系已經瓦解，而非國家性的共產黨也日漸凋零。比較罕見的是，就連伯恩斯坦式的社會民主主義也被掃蕩廓清。改革主義依賴三個基礎。第一個基礎是工人階級的規模和成長、將異質的勞工和窮人焊接成單一階級的那個意識，以及資產階級民主政府（即使是在一九一四年以前）是否願意對這個重要的票倉讓步，如果他們不太基進的話。但是自從一九七〇年以來，核心資本主義國家（「第一世界」）的體力勞動階級已經萎縮，無論是相對的或是絕對的，他們一致的和作為團結力量的階級意識也喪失殆盡。就連在他們裡頭無條件地堅守以前的運動的團體，紛紛轉向經濟自由主義的政黨，例如在柴契爾夫人執政的英國，以及雷根政府的美國。在一九八〇年代，我們也看到對工人階級選民有吸引力的右派基進民族主義政黨，尤其是在法國（以勒龐為首）以及奧地利（海德）。再者，富裕的消費者社會財富的大量增加也造福工人階級，因而侵蝕了認為唯有團結和集體行動才能讓工人階級的個人真正改善生活的公理性信念。

植基於十八世紀啟蒙運動的左翼意識型態的沒落，包括社會主義，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我們不得而知。在歐洲，它或許不重要，但是在亞洲和非洲則不然，尤其是穆斯林地區。一九七九年的伊朗革命，是自克倫威爾以降，第一次不是受俗世意識型態鼓舞、而是以宗教語言訴諸群眾的大規模革命，在這個例子裡，則是以伊斯蘭教什葉派的語彙。其結果是，從巴基斯坦到摩洛哥的廣大地區，陸續出現伊斯蘭教政治化的原教旨主義（遜尼派），並且奪得政權。如前所見，在那同時，馬克思主義和左派社會民主主義江河日下，工人和學生也都去政治化。

俄國革命給了改革主義第二個基礎：對於共產主義和蘇聯的恐懼。二次大戰期間和過後，至少在歐洲，由於對兩者的恐懼升高，使得政府和雇主必須提出充分就業和社會保險體系的對策。但是當蘇聯不再存在，隨著柏林圍牆的倒塌，資本主義可以忘記什麼叫恐懼，因此對不可能持有股份的人民失去了興趣。不管怎樣，即使是一九八〇年代和九〇年代大量失業的符咒，似乎失去了鼓動其受害者基進化的古老力量。

然而，改革主義以及一九四五年以後的充分就業，不只是政治問題，也是經濟問題，正如凱因斯和北歐社會民主主義的瑞典經濟學家所預測的。這就是改革主義的第三個基礎。它不僅成了社會黨政府的政策，也是幾乎所有政府的（就連美國也不例外）。它為西方國家帶來了政治的穩定以及史無前例的經濟成就。直到一九七三年以後的新年代，當經濟和戰後改革政策不再有那麼多正面效果，當時席捲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的基進經濟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意識型態說服了政府。對他們來說，勞工運動、勞工政黨，甚至是公共社會福利體系，都只不過是那保證獲利和經濟以及全體福祉（一如意識型態者所說的）極大化成長的自由市場的絆腳石。理想上，它們都應該廢除，雖然現實上不太可能。「充分就業」現在已經被勞工市場的彈性以及「自然失業率」（natural rate of unemployment）的學說給取代。

那也是民族國家在跨國全球經濟的推進以前就撤退的時代。儘管勞工運動理論上是主張國際主義，實際上都只是在它們自己國家的範圍裡，和它們的民族國家綁在一起，尤其是在二十世紀下半葉由國家推動的混合式經濟和福利國家。當民族國家撤退，勞工運動和社會民主黨就失去他

們最有力的武器。他們在跨國操作上始終成效不彰。

當資本主義進入新的危機時期，我們就來到了勞工運動史裡一個奇特的時期的終點。在急速工業化的「新興經濟」裡，工業勞工不可能沒落。在舊有的資本主義的富裕國家裡，勞工運動仍然存在，雖然他們的力量大抵上是汲取自政府部門，儘管有新自由主義的運動，那力量卻沒有萎縮的跡象。正如馬克思所預測的，由於大多數的經濟活動人口都依賴於他們的工資和薪水，因此認識到給薪者和受薪者的區別，西方國家的運動才能延續。階級鬥爭因此會持續不斷，無論是否有政治意識型態的輔翼。

再者，貧富差距以及利益迥異的社會團體之間的隔閡，也會繼續存在，不管那些團體是否叫作「階級」。無論社會階級的差異是否源自一兩百年前，政治總會持續下去，雖然其中只有一部分是階級政治。

最後，勞工運動會繼續存在，因為民族國家並不會消滅。國家和政府當局始終是唯一能夠分配其人民的社會生產的機構，既合情入理，又能滿足市場無法給予的人性需要。因此，從以前到現在，政治一直是社會運動鬥爭的必要向度。的確，二〇〇八年開始的巨大經濟危機，對右翼份子而言，相當於柏林圍牆的倒塌，它讓人們頓時醒悟到，經濟有麻煩的時候，國家是最重要的東西，正如它對新自由主義的勝利也是極重要的，當政府以有系統的私有化和放鬆管制奠定基礎時。

然而，一九七三年到二〇〇八年的時期對於社會民主主義的影響，則是在於它放棄了伯恩斯

坦。在英國，它的領導者覺得他們不得不依賴於全球自由市場自然而然地導致的經濟成長的利益，再加上由它提供的社會安全網。「新勞工」和市場導向的社會劃上等號，且直到二〇〇八年破滅以前幾乎和勞工運動斷絕關係。這個情況很極端，但是，或許除了統一後的德國和西德之外在其他堡壘裡的改革派社會民主主義（包括碩果僅存的義大利共產黨）的處境也急遽惡化。共產主義者分裂為溫和派的「歐洲共產主義者」以及強硬路線的傳統主義者，已經沒落到變成西方國家不足一哂的政治力量。

然而，這個時期終究也過去了，就在二〇〇八年，世界驀地陷入「大災難時期」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剛開始的時候，勞工的處境並不一致。在歐洲許多國家裡，它的政黨仍然在政府裡，不管是單獨執政或是加入「大聯合政府」（西班牙、葡萄牙、聯合王國、挪威、德國、奧地利和瑞士）。突然的金融崩潰使得國家再次扮演經濟行為者的角色，雇主和工人都指望他們的政府挽救僅存的國家產業。再者，職場激烈主張和群眾不滿的跡象也越來越明顯，雖然工人們「走上街頭」（即法國人說的 **descendre dans la rue**）的傳統已經漸漸式微，但是它在歐洲某國家及其他地方仍舊不死，而且有其政治重要意義，例如阿根廷。重要的工會運動仍然存在，大抵上也還是由出身社會主義傳統的人領導，不管是社會民主黨或共產主義者。理論上，和左派意識型態聯結的勞工運動的復甦似乎是可能的。但是實際上，它的短程前景不甚樂觀，即使他們不記得一九二九年到三三年的經濟大蕭條的直接政治影響，就是歐洲幾乎所有地方都拋棄了勞工運動和左派主張。傳統上作為勞工智囊的社會主義者，他們也不知道如何克服眼前的危機。不像一九三〇年

代，他們沒辦法指出有哪個共產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政權可以倖免於該危機，也提不出務實的社會主義的改變方案。在西方世界舊有的資本主義國家裡，「去工業化」（de-industrialisation）已日漸凋零，其主要基礎（工業工人階級）也持續萎縮，無論是在工業或選舉方面。在情況不若此的新興國家裡，勞工運動或許可能擴張，但是他們沒有現實的理由必須和傳統社會解放的意識型態結盟，無論是因為後者和現存或以前的共產主義政權掛鉤，或是早期的「紅色」運動在當時已經萎縮了（撇開拉丁美洲不尋常的例子不談）。

誠然，在左派古老的意識型態分裂而沒落期間，也興起了某些基進或左翼的思想，但主要是建立在中產階級的基礎上。它主要關心的事情（例如環境保護或當時激烈的反戰）和勞工運動的行動沒有直接關係。勞工運動的成員甚至可能反對那些議題。勞工運動想像的是社會轉型，而他們代表的卻是抗議而不是願景。我們很容易說出他們反對什麼（他們是「反資本主義者」，雖然對於資本主義可能一點概念也沒有），但是我們幾乎看不出來他們有什麼替代方案。這或許能解釋巴枯寧式的無政府主義會復活，那是十九世紀社會主義理論的一支，完全不知道推翻舊社會以後該怎麼辦，因而最適合沒有任何願景的激烈社會不滿的情境。儘管它可以透過媒體興風作浪、和警方的對峙甚或恐怖行動而得到社會關注，但是對於今天的勞工運動的未來，它其實沒有任何意義。雖然它很類似十九世紀的「行動宣傳」，但再也沒有無政府工團主義這類的東西。

我們不清楚由種族、宗教、性別、生活風格或其他集體認同構成的想像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是否能夠填補社會主義左派意識型態的隕歿留下的空隙。政治上的種族民族主

義最有機會，因為它訴諸草根性的工人階級仇外和保護主義的政治主張，在一個結合了全球化和大量失業的年代裡，它得到前所未有的共鳴：「我們」的產業是為國家，而不是為外國人；國內的工作優先給本國人；打倒外國有錢人的剝削以及外國移民窮人等等。理論上，諸如天主教和伊斯蘭教之類的普世宗教，對於仇外都會有其限制，但是不管是種族或宗教，都被用來作為阻擋危險的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潛在障礙，因為它會摧毀古老的生活方式與人際網絡，而不會有任何新的建樹。從政治急轉到民族主義或信仰的民粹式極右派，在歐洲前共產主義國家、南亞、西亞以及拉丁美洲最有可能爆發。在美國，經濟危機可能會使它相對地傾向左派，例如經濟大蕭條時代的羅斯福，但在其他地方則不大可能。

然而，情況已經有所好轉。我們重新發現資本主義不是個解答，而是個問題。半個世紀以來，它的成功被視為理所當然，傳統上對它的負面聯想也轉為正面的。現在商人和政客不僅能夠以「自由企業」的自由為傲，也堂而皇之的以自身為資本家自豪。[1]自從一九七〇年代以來，人們既忘記了二次大戰後促使他們改革的那些恐懼，也忘記了後來西方國家經濟「黃金年代」的改革所帶來的經濟利益，整個體系擺盪到另一端，我們甚至可以說那是自由放任政策（「政府不是解答，而是問題」）的病態版本，終於在二〇〇七到二〇〇八年內爆。在蘇聯體系垮台將近二十年後，它的意識型態者相信他們已經走到福山所說的「歷史的終點」，「經濟和政治解放的不加掩飾的勝利」[2]，在一個確定的、持續性的、自我穩定的資本主義社會和政治世界秩序裡的成長，無論在理論或實踐上都沒有受到挑戰，也不可能被挑戰。

凡此種種，現在都已經站不住腳了。二十世紀試圖將世界歷史視為私人的與公共的、純粹個人主義和純粹集體主義之間的零和博弈，但是從一九八〇年到二〇〇八年的蘇聯經濟以及「市場基本教義」經濟的相斷瓦解，使得這個看法不攻自破。回歸到其中任何一端都不太可能。自從一九八〇年代以來，社會主義者，無論是馬克思主義者或其他陣營，都沒有辦法對於資本主義提出傳統的替代方案，除非他們重新思考什麼是「社會主義」，並且放棄以體力勞動階級作為社會轉型必然的主要代理人的預設。但是一九七三年到二〇〇八年市場社會的歸謬論證（reductio ad absurdum）的信仰者也同樣無所適從。我們眼前或許看不到任何一個替代體系，卻再也不能排除現存體系的分裂或瓦解的可能性。兩個陣營都不知道在那個情況下會發生什麼事。

弔詭的是，雙方都有興趣回到一個重要的思想家，他的思想精華就在於**批判**資本主義以及不知道資本主義全球化會是什麼結局的經濟學家，正如他在一八四八年所預測的。我們再次看到，經濟體系的運作既必須從歷史角度去分析，作為一個歷史階段而非終點，也要就現實層面去分析，也就是不從理想上的市場均衡的角度，而是以產生可能改變體系的階段性危機的內在機制。現代的危機或許是這些危機其中之一。我們也再次看到，在這些巨大危機之間，「市場」在面對二十一世紀的主要問題時如何束手無策：不知節制、持續飆的高科技經濟成長，在追求無法永續的利潤時創造出了全球財富，其代價卻是使得生產、人工，以及全球自然資源漸漸變成不被珍惜。經濟和政治的自由主義，無論是各自為政或是以組合的方式，都無法為二十一世紀的問題提供解答。我們再次到了認真思考馬克思的時候了。

注釋：

1 新風潮是以美國《富比士》雜誌為發軔，它在一九六〇年代就已經自詡為「資本主義工具」。

2 F.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89), p. 3.

中外文人名對照表

加爾布雷斯 John Kenneth Galbraith
卡本特 Edward Caprpenter
卡西奧多魯斯 Cassiodorus
卡貝 E. Cabet
卡斯楚 Fidel Castro
卡萊爾 Carlyle
卡菲洛 Carlo Cafiero
卡瑞耶夫 Nikolai Ivanovich Kareev
卡雷 Carey
卡爾・克勞斯 Karl Kraus
卡爾・倫納 Karl Renner
卡爾・格林 Karl Grün
卡爾・格林堡 Carl Grünberg
卡爾・馬克思 Karl Marx
古斯塔夫・麥耶 Gustav Mayer
古爾德 Stephen Jay Gould
司提反・鮑爾 Stefan Bauer
史丹福・拉佛 Stamford Raffle
史坦貝克 John Steinbeck
史威濟 Paul M. Sweezy
史特林堡 Strindberg
史特勞斯 Strauss
史崔特家族 Whitney Straights

三劃

凡德威爾德 Emile Vandervelde
于斯曼 Joris Karl Huysmans
大衛・蓋斯特 David Guest

四劃

切・格瓦拉 Che Guevara
切爾文科夫 Chervenkov
孔多塞 Condorcet
孔德 Auguste Comte
巴札德 Bazard
巴克爾 Buckle
巴貝夫 Babeuf
巴枯寧 Bakunin
巴羅哈 Pío Baroja
戈德利耶 Maurice Godelier
比昂松 Björnstjerne Björnson
毛瑞 Maurer
王爾德 Oscar Wilde

五劃

加尼維特 Angel Ganivet
加里波底 Caribaldi
加富爾 Cavour

皮卡爾 Edmond Picard
皮佑 Pillot
皮爾森 Karl Pearson
皮維特 Marceau Pivert

六劃

伊莉娜・葛立果莉娃 Irina Grigor'eva
伊萊娜・約里奧居禮 Irène Joliot-Curie
伊爾米諾 Irmino
伊蓮諾・馬克思 Eleanor Marx
休姆 Hume
列昂惕夫 Wassily Leontief
列斐伏爾 Henri Lefebvre
列寧 Lenin
多布 M. H. Dobb
多列士 Maurice Thorez
安東尼・克羅斯蘭 Anthony Crosland
安東尼奧・內格里 Antonio Negri
安東尼奧・葛蘭西 Antonio Gramsci
安德烈 Andréas
安德森 Sherwood Anderson
托克維爾 Alexis de Tocqueville
米勒韓 Alexandre Millerrand
米塞斯 Mises
考夫曼牧師 Rev. M. Kaufmann
考茨基 Karl Kautsky
考德威爾 Christopher Caudwell
艾夫林 Edward Eveling
艾伯特 Hébert
史都華・休斯 H. Stuart Hughes
史塔姆勒 Rudolf Stammler
尼克森 J. Shield Nicholson of Edinburgh
左拉 Zola
布呂克爾 De Brouckère
布里索 Girondin Brissot
布哈林 Bukharin
布洛赫 Marc Bloch
布倫塔諾 Lujo Brentano
布朗基 Blanqui
布勞岱爾 Fernand Braudel
布提吉格 Joseph Buttigieg
布萊克特 Patrick Blackett
布萊希特 Bertolt Brecht
布萊斯 Bryce
布雷 Buret
布榭 Buchez
布魯克 Rupert Brooke
布魯克納 Anton Bruckner
布羅德瑞克 Broderick
布蘭廷 Karl Hjalmar Branting
布蘭特 Anthony Blunt
弗里曼 George Friedmann
弗林特 Flint
弗雷德里克・恩格斯 Frederick Engels
瓦丁頓 C. H. Waddington
瓦特・克萊恩 Walter Crane
瓦德盧梭 Waldeck-Rousseau
白芝浩 Walter Bagehot

李斯特 Liszt
李森科 Lysenko
李維 H. Levy
李維林・斯密 Llewellyn Smith
李維斯陀 Claude Lévi-Strauss
杜克佩提歐 Ducpétiaux
杜岡巴拉諾夫斯基 Tugan-Baranowsky
杜拉提 Filippo Turati
沙宣 Anne Showstack Sassoon
沃爾佩 Galvano Della Volpe
狄哈克 Dirac
狄斯累利 Benjamin Disraeli
狄慈根 Joseph Dietzgen
狄維 Gabriel Deville
貝尼特 Stephen Vincent Benét
貝尼爾 François Bernier
貝拉赫 H. P. Berlage
貝倫 Baran
貝納諾斯 Georges Bernanos
貝爾佛 Balfour
貝爾納 John Desmond Bernal
貝德葉夫 Nicolai Berdyaev
辛克萊 Upton Sinclair
邦格 W. Bonger
里爾克 Rainer Maria Rilke

八劃

亞米契斯 Edmondo De Amicis
亞當・斯密 Adam Smith
卓別林 Charlie Chaplin
艾克斯坦 Gustav Eckstein
艾倫堡 R. Ehrenberg
艾德禮 Clement Attlee
西季威克 Henry Sidgwick
西斯蒙第 Sismondi

七劃

亨利・皮杭 Henri Pirenne
亨利希・曼 Heinrich Mann
亨利・柯曼 Henry Colman
亨利・喬治 Henry George
佛斯特 E. M. Forster
佛斯特牧師 Rev. C. Foster
佛蘭德 Karl Vorländer
伯吉斯 Anthony Burgess
克卡普 Kirkup
克林姆特 Gustav Klimt
克倫威爾 Cromwell
克勞塞維茨 Clausewitz
克羅齊 Benedetto Croce
利伯曼 Liebermann
坎帕內拉 Campanella
坎密特 John M. Cammett
希法亭 Rudolf Hilferding
希楚金 Sergei Shchukin
希爾頓 R. H. Hilton
希爾德布朗德 B. Hilderbrand
李卜克內西 Wilhelm Liebknecht
李希特海姆 George Lichtheim
李約瑟 Joseph Needham

者羅曼・羅斯多爾斯基 Roman Rosdolsky
邱吉爾 Winston Churchill
門格 Menger
阿米安 Ammianus
阿拉貢 Louis Aragon
阿門多拉 Giorgio Amendola

九劃

保羅・威勒 Paul Weller
哀奇沃思 Edgeworth
哈布瓦赫 Maurice Halbwachs
哈伯瑪斯 Jürgen Habermas
哈姆生 Hamsun
哈威洛克・藹理斯 Havelock Ellis
哈基斯金 Hodgskin
哈靈頓 Harrington
威克斯提 Philip Wicksteed
威廉・戈德溫 William Godwin
威廉・司馬特 William Smart
威廉・莫里斯 William Morris
威廉・湯普森 William Thompson
威爾斯 H.G. Wells
威爾赫姆・魏特林 Wilhelm Weitling
恰亞諾夫 Aleksandr Chayanov
施尼茨勒 Arthur Schnitzler
施利曼 Schliemann
施莫勒 Schmoller
柯恩 G. A. Cohen
柯爾 G.D.H. Cole
和普魯斯特 Marcel Proust
坦納 Tanner
季米特洛夫 Georgi Dimitrov
尚松 André Chamson
居禮夫人 Marie Sklodkowska-Curie
帕弗斯 Alexander Parvus
帕索斯 Dos Passos
彼得・柏克 Peter Burke
拉布里奧拉 Antonio Labriola
拉弗雷 Laveleye
拉法格 Paul Lafargue
拉康 Jacques Lacan
拉彭內拉伊 Laponneraye
拉斯金 Ruskin
拉蒙特家族 Lamonts
拉歐提耶 Lahautière
拉薩爾 Ferdinand Lassalle
易卜生 Ibsen
松巴特 Werner Sombart
波布 Pol Pot
波克羅夫斯基 M. N. Pokrovsky
波那洛帝 Buonarroti
波姆巴威克 Böhm-Bawerk
波格丹諾夫 Alexander Bogdanov
波納 Bonar
波爾什涅夫 Porshnev
波緒埃 Bossuet
法克斯威爾 Foxwell
法蘭克 A. Gunder Frank

庫朗熱 Fustel de Coulanges
庫格曼醫師 Dr Kugelmann
庫茲涅茨 Simon Kuzenets
恩里科・巴羅尼 Enrico Barone
恩里科・貝林格 Enrico Berlinguer
朗之萬 Paul Langevin
格迪斯 Patrick Geddes
格斯泰克 Friedrich Gerstäcker
格奧爾格 Stefan George
格奧爾格・毛瑞 Georg von Maurer
海因德曼 Hyndman
海明威 Hemingway
海耶克 Friedrich von Hayek
海涅 Heine
海森堡 Heisenberg
海德 Jörg Haider
烏納穆諾 Miguel de Unamuno
特洛斯查 Pieter Jelles Troelstra
特洛爾奇 Ernst Troeltsch
班尼特 Arnold Bennett
班傑明・富蘭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班雅明 Walter Benjamin
索緒爾 Ferdinand de Saussure
翁封丹 Enfantin
荀貝克 Arnold Schoenberg
馬丁・尼可勞斯 Martin Nicolaus
馬伯里 Mably
馬克斯・阿德勒 Max Adler
馬克斯・韋伯 Max Weber
馬里丹 Jacques Maritain
柯爾施 Karl Korsch
柯羅連科 Vladimir Korolenko
查蘇利奇 Vera Zasulich
洛里亞 Loria
洛斯 Adolf Loos
科瓦列夫斯基 M. M. Kovalevsky
科埃諾 Jean Guéhenno
科特勒 Adolphe Quetelet
科萊特 Sidonie-Gabrielle Colette
科萊蒂 Licio Colletti
約南德斯 Jornandes
約基希斯 Leo Jogiches
約瑟夫・熊彼得 Joseph Schumpeter
約翰・弗蘭西斯・布雷 John Francis Bray
約翰・希克斯爵士 Sir John Hicks
約翰・韋德 John Wade
約翰・格雷 John Gray
約翰・雷伊 John Rae
美亞索 Claude Meillassoux
胡伯 V. A. Huber
范伯倫 Thorstein Veblen
范・德費爾德 H. Van de Velde
韋布夫婦 Sidney and Beatrice Webb

十劃

倍倍爾 August Bebel
哥泰因 Eberhard Gothein
埃克豪特 Georges Eekhoud
庫坦奧 Carlos Nelson Coutinho

梅特涅 Metternich
梅曾 Meitzen
理查・瓊斯 Richard Jones
理察・伊利 Richard Ely
畢沙羅 Camille Pissarro
畢恩包姆 Nathan Birnbaum
畢勒斐 Bielefeld
畢達哥拉斯 Pythagoras
笛卡兒 Descartes
莫米利亞諾 Felice Momigliano
莫泊桑 Maupassant
莫斯卡 Gaetano Mosca
莫塞斯・赫斯 Moses Hess
莫瑞里 Morelly
莫羅索夫 Morozov
陶里亞蒂 Palmiro Togliatti
麥尼埃 Constantin Meunier
麥克列許 Archibald Macleish
麥克米倫 Harold Macmillan
麥克連 Donald Maclean
麥斯圖 Ramiro de Maeztu
傅立葉 Fourier
傅利曼 Milton Friedman

十二劃

傑瑞米・邊沁 Jeremy Bentham
凱因斯 J.M.Keynes
喬伊斯 James Joyce
喬治・安溫 George Unwin
喬治・索雷爾 George Sorel
馬里亞特吉 José Carlos Mariátegui
馬查多 Antonio Machado
馬查斯基 Jan Waclaw Machajski
馬庫色 Herbert Marcuse
馬勒 Gustav Mahler
馬爾托夫 Julius Martov
馬爾羅 Malraux
馬赫 Ernst Mach
馬薩里克 Thomáš Masaryk
高爾基 Gorki
涂爾幹 Durkheim

十一劃

勒沙比 W. R. Lethaby
勒普列 Le Play
勒龐 Jean-Marie Le Pen
基佐 Guizot
培西荷諾夫 Pešehonov
培瑞・安德森 Perry Anderson
密歇爾斯 Robert Michels
崔佛羅帕 Trevor-Roper
康托羅維奇 Leonid Kantorovitch
康斯坦丁・佩克爾 Constantin Pecqueur
康寧漢副主教 Archdeacon Cunningham
梭羅・羅傑斯 Thorold Rogers
梅林 Franz Mehring
梅洛龐蒂 Maurice Merleau-Ponty
梅特林克 Maurice Maeterlinck

費奧里 Antonio Fiori
費奧瑞 Fiore
費爾巴哈 Feuerbach
雅札諾夫 David Ryazanov
黑森 B. Hessen

十三劃

塞拉西 Haile Selassie
塞雷尼 Emilio Sereni
塔岑霍夫 Tatzenhofer
奧古斯坦・提耶里 Augustin Thierry
奧托・鮑爾 Otto Bauer
奧利偉 Sydney Olivier
奧斯特洛果爾斯基 Ostrogorski
奧登 W. H. Auden
愛爾維修 Helvetius
愛德華・伯恩斯坦 Eduard Bernstein
葛拉罕 W. Graham
詹姆士・卓爾 James Joll
賈克・阿塔里 Jacques Attali
賈克・胡 Jacques Roux
路多・哈特曼 Ludo M. Hartmann
路易・布隆 Louis Blanc
路易・阿圖塞 Louis Althusser
路易斯・摩根 Lewis Morgan
道森 W. H. Dawson
雷克勒 Leclerc
雷昂鐵夫 Leontief
雷納爾 Raynal
雷蒙・威廉士 Raymond Williams
喬治・索羅斯 George Soros
喬治・歐威爾 George Orwell
斯特拉奇 Lytton Strachey
斯特魯維 Friedrich Georg Wilhelm von Struve
斯彭德 Stephen Spender
斯賓諾沙 Spinoza
斯默 Albion Small
普列斯考特 Prescott
普列漢諾夫 Georgi Plekhanov
普利策 Georges Politzer
普魯東 Proudhon
普魯塔克 Plutarch
普羅提洛 M. Prothero
普蘭查斯 Nicos Poulantzas
湯恩比 Toynbee
湯普生 E. P. Thompson
湯瑪斯・曼 Thomas Mann
湯瑪斯・摩爾 Thomas More
湯瑪斯・霍吉斯金 Thomas Hodgskin
華里茵克蘭 Ramón del Valle-Inclán
華勒斯 Graham Wallas
華勒斯坦 I. Wallerstein
萊伯 Leibl
萊克格斯 Lycurgus
萊昂・布魯姆 Léon Blum
菲爾比 Kim Philby
費內翁 Félix Fénéon
費夫賀 Lucien Febvre
費南德茲・布耶教授 Fernández Buey

赫曼・哥爾特　Herman Gorter
赫普納　Adolf Hepner
赫魯雪夫　Khrushchev
赫諾普夫　Fernand Khnopff
齊柯提　Ciccotti
齊美爾　Georg Simmel

十五劃

德布雷　Régis Debray
德札米　Dézamy
德波林　Abram Deborin
德國的考茨基　Benedikt Kautsky
德斯特里　Jules Destrée
德萊賽　Theodore Dreiser
德雷福斯　Dreyfus
歐本海默　J. Robert Oppenheimer
歐洛修斯　Orosius
潘尼科克　A. Pannekoek
滕尼斯　Ferdinand Tönnies
魯貝爾　Maximilien Rubel
墨菲　Chantal Mouffe

十六劃

盧卡奇　Georg Lukacs
盧那察爾斯基　Anatoli Lunacharski
盧奇斯基　Loutchisky
盧波爾　Luppol
穆西爾　Robert Musil
興策　Otto Hintze
蕭伯納　Bernard Shaw
雷德勒　E. Lederer
雷德斯戴爾勳爵　Lord Redesdale

十四劃

圖爾戈　Turgot
熊斐德　Schonfield
瑪策廉　Marcellinus
瑪麗・伯恩斯　Mary Burns
福山　Fukuyama
福伊希特萬格　Lion Feuchtwanger
福克納　William Faulkner
維尼亞斯基　Leon Winiarski
維克多・孔西德隆　Victor Considérant
維克多・阿德勒　Victor Adler
維克多・奧塔　Victor Horta
維克塞爾　Knut Wicksell
維科　Vico
維勒梅　Villermé
維塞爾　Friedrich von Wieser
維爾加　Verga
維爾哈倫　Emile Verhaeren
維諾格拉多夫　Vinogradov
蒙泰朗　Henry de Montherlant
蒙森　Mommsen
蒲朗克　Planck
蓋文・威廉士　Gwyn A. Williams
豪普特曼　Hauptmann
赫伯特・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
赫克納　Heinrich Herkner
赫曼・巴爾　Hermann Bahr

羅西多利亞 Manlio Rossi-Doria
羅伯特・歐文 Robert Owen
羅倫茨・馮・史坦恩 Lorenz von Stein
羅素 Bertrand Russell
羅曼・羅蘭 Romain Rolland
羅莎・盧森堡 Rosa Luxemburg
羅傑斯 Thorold Rogers
羅斯貝利 Lord Rosebery
羅斯福 F. D. Roosevelt
羅德貝圖斯—雅格措夫 J.K. Rodbertus-Jagetzow
羅蘭霍爾斯特 Henrietta Roland-Holst

二十劃

蘇德曼 Sudermann
饒勒斯 Jean Jaurès

二十一劃

蘭克 Leopold von Ranke
蘭普雷希特 Karl Lamprecht

二十二劃

龔普洛維奇 Ludwig Gumplowicz

諾厄・史密斯 Nowell Smith
霍夫曼斯塔 Hugo von Hofmannsthal
霍布森 J. A. Hobson
霍格本 Hogben
霍爾丹 J. B. S. Haldane
霍爾巴赫 Holbach
霍爾・史密斯 Hoare Smith
鮑桑葵 Bosanquet
默達爾 Gunnar Myrdal
龍布羅梭 Cesare Lombroso

十七劃

彌爾 J. S. Mill
彌爾納 Milner
戴尼斯 Hector Denis
戴路易斯 Cecil Day-Lewis
薛丁格 Schrödinger
謝弗勒 Schäffle
韓森 Hanssen

十八劃

薩博 Ervin Szabo
薩爾加多 Plinio Salgado
謨爾 G. E. Moore
魏特夫 Wittfogel
魏德金 Franz Wedekind

十九劃

懷爾德 Thornton Wilder
瓊斯爵士 Sir William Jones
羅白塔 Rodbertus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如何改變世界／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作；林宏濤，黃煜文翻譯. -- 一版. -- 臺北市：麥田，城邦文化出版：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2014.12
面；　公分
譯自：How to change the world
ISBN 978-986-344-177-9（平裝）
1. 馬克斯主義　2. 馬克斯經濟學
549.3　103022906

HOW TO CHANGE THE WORLD:
Marx and Marxism, 1840–2011
by Eric Hobsbawm
Copyright © Eric Hobsbawm 2011
All rights reserved.

歷史選書 58

如何改變世界——馬克思與馬克思主義，回顧、反思，與前瞻

作　　者／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
翻　　譯／林宏濤、黃煜文
責任編輯／王家軒
校　　對／陳佩伶

國際版權／吳玲緯
行　　銷／陳麗雯　蘇莞婷
業　　務／李再星　陳玫潾　陳美燕　杜幸君
副總編輯／林秀梅
副總經理／陳瀅如
編輯總監／劉麗真
總 經 理／陳逸瑛
發 行 人／涂玉雲
出　　版／麥田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100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41號5樓
電話：(02)25007696　傳真：(02)25001966
部落格：http://blog.pixnet.net/ryefield
發　　行／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台北市民生東路二段141號11樓
書虫客服服務專線：02-25007718・02-25007719
24小時傳真服務：02-25001990・02-25001991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09:30-12:00・13:30-17:00
郵撥帳號：19863813　戶名：書虫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E-mail：service@readingclub.com.tw
歡迎光臨城邦讀書花園　網址：www.cite.com.tw
麥田網址／http://ryefield.com.tw
香港發行所／城邦（香港）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駱克道193號東超商業中心1樓
電話：(852) 25086231　傳真：(852) 25789337
E-mail：hkcite@biznetvigator.com
馬新發行所／城邦（馬新）出版集團【Cite(M)Sdn. Bhd】
41, Jalan Radin Anum, Bandar Baru Sri Petaling,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 90578822　傳真：(603) 90576622
E-Mail: cite@cite.com.my

封面設計／王志弘
印　　刷／前進彩藝有限公司

■2014年（民103）12月　一版一刷　Printed in Taiwan.

定價：550元
ISBN：978-986-344-177-9

著作權所有・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城邦讀書花園
www.cite.com.tw

9 789863 441779 00550
ISBN978-986-344-177-9 RH3058 NT$550 HK$183
cité 城邦 麥田出版 Rye Field Publications, A division of Cité Publishing Ltd.

霍布斯邦VS馬克思、恩格斯 當代最壯闊之革命傳統的經典考掘與闡釋

1840

「蘇聯的崩裂解放了馬克思，人們不再將馬克思等同於列寧主義與列寧政權。大家越來越了解可以從各種不同的角度思考馬克思對世界的看法。更重要的原因是，1990 年代以後浮現的全球化資本主義世界，有許多重要面向都不可思議地被《共產黨宣言》所言中。1998 年是《共產黨宣言》這部令人吃驚的小書出版一百五十週年紀念，同時也是全球經濟遭受重創的一年。諷刺的是，再度挖掘出馬克思的不是社會主義者，而是資本家……」

how to change the world: marx and marxism

如何改變世界：馬克思與馬克思主義，回顧、反思，與前瞻

馬克思、恩格斯及後世所有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家、思想家，與千千萬萬底層的無產階級鬥士共同締造了一百多年來人類歷史最波瀾壯闊、高潮迭起的篇章。近年來，隨著資本主義弊端的叢生，這個曾經啟蒙、激勵無數渴望公平與自由之心靈的思想又再度為世人所重。《如何改變世界》作為一位終身信奉共產主義的史學家在超過半世紀中累積的著述，在此時此刻問世正可謂是滋潤、豐富左派精神之及時雨。

本書收錄了霍氏從 1956 到 2009 年來撰寫的共十六篇論文，內容主要是回顧馬克思思想的發展及其身後的影響，並試圖釐清許多關於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爭議：人類歷史必然是單一線性地前進嗎？在通往共產社會的路途上，資本主義是必經的階段嗎？國家在階級鬥爭中扮演什麼角色？重讀《共產黨宣言》是否可以幫助我們預言今天的資本主義即將覆亡？對任何關心資本主義與人類未來命運的讀者來說，這是一本不可或缺的深刻歷史分析。

2011